

歌德文集

5

Goethes Werke



诗与真（下）

刘思慕 译

歌德文集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GOETHES WERKE

In zehn Bänden

Fünfter Band

DICHTUNG UND WAHRHEIT

(Ⅲ . und Ⅳ . Teil)

目 录

第 三 部

第四部

第十一卷

我在塞逊海姆的树荫下把我的故事——把寻常的事与不能想象的事十分巧妙地交错组成的故事——讲完之后，我看见那一直凝神倾听着的两姊妹给我的离奇的讲述完全迷住了。她们恳切地请求我给她们把这个童话写下来，好让她们自己时时能复述出来和讲给别人听。我欣然答应，而且我希望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借口来再造访和与她们作较亲密的交往的机会。我们一会就要分开，我们恐怕全都会感到，那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白天之后，晚上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可是，我的朋友却替我摆脱了这种忧虑，他替我们请求主人许可我们马上告辞，因为他是一个始终一贯地钻研的用功的大学生，决定今晚在德鲁逊海姆过夜，明天就依时赶回斯特拉斯堡大学上课去。

回到斯特拉斯堡

当我们到歇宿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两人都默然无语。在我的方面，因为我觉得心坎里有一根逆钩把我钩回去；在他的方面，因为他心里想着一桩不同的事情，一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立即把他所想的告诉我："你刚才讲起这个故事，"他开始说，"真是奇怪。它引起很特别的印象，你觉得没有？"

"那当然，"我答道，"那姐姐听到有几个地方，异乎寻常地

笑起来，她的妹妹却摇摇头，你们三人还很有意思地互相瞧着，你自己差不多兴奋到失了常态，这些我怎么不觉得呢。老实说，你们这种态度几乎把我弄胡涂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在这样的纯洁的少女的面前，讲起她们不知道还好的戏谑，以及使她们对于我的传奇中的主人公一定产生关于男性的不良的概念，也许是很不适当的吧。”“绝不，”我的朋友答道，“你猜想不到，你怎么能猜想得到呢？那两个纯良的女孩不是象你所信的那样绝不熟悉这些事情，因为她们周遭的广大的社会提供她们以作种种思索的诱因，而且在莱茵河的彼岸就恰有一对夫妇，象你所描写的那样，所不同的，不过是你夸大其词和以故事的体裁出之罢了。那男的恰象你所说的那样高大健壮和粗笨的汉子，女的也够纤秀，以致男的可以把女的放在手上。这一对夫妇的其他生活状态，他们的历史也跟你所讲的如出一辙。因此，女孩们曾认真地向我打听，是否你知道这对夫妇，而把他们开玩笑地叙述出来。我矢口的说：‘没这回事！’我以为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倒好。我们如果用延宕的方法和用种种的借口，就可以卸去履行诺言之责了。”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杜撰这故事时，绝没有想及莱茵河的此岸或彼岸有这样一对夫妇，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说明我怎样会作此奇想。在我的想象中，我很喜欢杜撰这种与现实无关的笑话，因此我相信，我讲给别人听时，他们也单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无稽之谈来听。

当我回到城里，重理旧业时，我觉得它比往常更艰苦。因为生而勤勉的人，立下超出他的能力以外的计划和担任过于繁重的工作，初时虽做得还很好，但是到后来一有肉体或精神上的故障发生，力不从心便显现出来了。

我既希望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得学位，我便以达到这种目的所必需的勤勉来研究法律方面的东西，可是医学也引起我的兴味，因为它使我能够觉察自然的各个方面，纵然未能加以阐释，而我又因为社会环境和自己的习惯的关系，更与医学有缘。因为许多家庭对我表示好感和敬重，社交活动也不能不占去我一些时间和注意。不过我还是可以担负起这一切重荷和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是赫尔德尔加在我思想上的压力，使我感到无止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他从我的面前撕破了那掩盖着德国文学的贫乏的帷幕；他无情地摧毁我所抱的种种成见，这样子，在祖国的天空中便只有寥寥无几的巨星辉耀着，因为他把其余的一切文坛中人都只看作是一闪即逝的流星呢。而且，我自己所希望和幻想的事情，他却看得那样的暗淡，以至我对于自己的能力开始发生怀疑了。可是，同时，他又拉着我走上他自身所欲通行的光明大道去，使我注意他所爱读的著者——其中斯威夫特① 和哈曼② 最为他所敬重。他使我低首下心，而又激励我，使我昂头向上。我既陷在这种种的迷惑混乱之中，这时又添上新生的感情，使我有沉溺其中之势，这种感情虽一时间引我逸出这种迷惑状态之外，但究竟很难完全超脱。此外，我的身体上还得了一种病，这即是说，我每吃过饭后，便觉得喉痛如绞，得病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公寓里惯常并且很喜欢喝一种红葡萄酒，到后来我才把酒戒掉，病便很容易治好了。当我到塞逊海姆去的时候，这种难堪的苦痛幸而离开了我，因此我在

---

①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1726）。

② 参见第十卷“与赫尔德尔分手”一节的注。

那儿体验了两重的欢乐。可是，一当我回到城里吃饭，马上再感到痛苦，使我大为烦恼。因为这一切事，我为之忧闷不乐，外貌和内心同样陷于这种状态中。

因为正在食后这种病痛剧作的时候，我就要听临床讲义，我更异常难受。我所尊敬的教师①，愉快而从容地领我们从一病床到另一病床去，有重大的症候，便作精密的观察，对于疾病的一般过程作出诊断，他的处理的方法，恰象医圣希波克拉底②那样非凡。借着这种方法，他不靠理论，而通过自己的经验把病理学的种种内容解说出来，这一课的最后，他通常作出很精到的结论，——这一切吸引我到他的身边，使我对于这一种外行的学科——我仅仅窥见一斑的学科——更有兴味，更加喜欢。我越明白病理，觉得借着这理论，疾病的治疗，人的外形和精神的恢复都有可能，我对于病人的嫌恶便愈减退。在教师方面，觉得我是一个奇特的青年，象是特加青眼，我去听他的讲授那样的破格的事情，他也原谅。可是，这一天，在将下课时，他不象往常那样，作关于诊察某一病症的结论，而兴致洋洋地说道："诸君，我们将有几天的假期了，请你们利用这几天来把精神振作一下；学问的工夫不单是要认真地勤勉地来做，而且也要以愉快地从容地来对付。让身体好好地活动活动，徒步或骑马漫游这个风景美丽的郊野，本地的人将会看见惯熟的故乡的风物而色喜，外来的人会得到新的印象，留下一种愉快的记忆呢"。

---

① 指老埃克曼教授，参见第九卷"勒塞其人"一节。

②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师，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实则他这种带有忠告意味的话只为我和另一个学生两个人而发；我希望那一位学生听了这“处方”也象我那样恍然大悟吧！我觉得如闻来自九霄的纶音，赶快去雇定一匹马，打扮整齐，我叫人找韦兰来，偏巧他不在。我的决心不会因此而打消，不过，可惜我打算错了，不能象预期那样的很早出发。我虽然马加鞭的赶路，但是在途中已见黑夜袭来。路是看得清楚，不至迷失，月亮象是嘉赏我的热情的行径那样，灿然照着。晚风颇紧；夜色凄然，我为着不要待至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她，便纵马奔驰而去。

重访塞逊海姆

当我到达塞逊海姆从马上下来的时候，天已很晚。我向客店主人打听牧师家里还有没有灯，他便断言，小姐们才回到家里；他听见说，她们还等候一个客人来。我觉得这个话有点不对劲；因为我希望访问她们的单是我一个人。我连忙跑去，纵然是晚了，至少也要抢先一步看到她们。两姐妹正在门口坐着；她们象是不大显出惊诧，可是当弗里德莉克对珂梨佛凑着耳朵说道：“我不是说过吗？他真个来了！”这话给我听见，我倒惊诧起来。她们领我进屋里去，我看见，在桌子上已预备有一些晚上吃的小食。母亲把我看做老朋友那样跟我寒暄，可是当姐姐在灯光下端详我时，她哈哈的纵声大笑，因为她是不大能自制的。

这种开头有点离奇的接待过了之后，我们的谈话马上就随便和热闹起来，那一晚上我还在闷葫芦里的事情到第二朝我就明白了。弗里德莉克也曾预言我会来访，如果一个人的预言

——即便是不幸的预言——应验了，谁不觉得多少有点得意呢？一切预感在为事实证明灵验的场合，无论这是由于具有敏感而能探知远处的情况，或是藉着锐利的洞察力而能推知必然而不明确的结论，都使个人感到有可自负之处。至于珂梨佛的大笑的原因也公开出来：据她自白，她看见我这回打扮齐整，装饰漂亮而觉得好笑；可是，关于这一点，弗里德莉克的见解便不同，她以为把我这种装束看做是为了讨她欢心，而不视为出自虚荣心，这倒是较有利的解释。

第二天清早，弗里德莉克便约我一块去散步，母亲和姐姐都忙着有事，准备一切来款待几位客人。我与这个可爱的少女并肩走着，在美丽的星期日的早晨，享受象那位极可敬佩的赫贝尔①所描写的那样的田野的景色。她向我细说即将来临的客人的情况，请求我帮她的忙，以便一切娱乐都可以尽量的一块儿和井井有条地享受。她说："客人多的时候，通常各自消遣，笑谑和游戏，只消一会就兴致索然，所以到末了，除了一部分客人拿纸牌来玩，另一部分人纵情跳舞之外，便没有别的消遣方法了。"

于是，我们拟出在吃饭前后娱客的计划，两人互将所知的新的社交游戏说出来，最后，我们愉快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时教堂的钟声已招我们去礼拜，在教堂里，我坐在她的身旁，听着她的父亲的有点干燥的说教，也不觉得太长。

在爱人身边的光阴老象是箭一样的快，不过，我在教堂的时间也在深沉的考虑上消磨过去。我反复地想着她刚在我面前

① 赫贝尔(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这里指的是赫贝尔所写的《星期天清晨》一诗，歌德视为杰作。

无拘无束地展现的种种的优点：沉着的欢乐情绪，带着自觉的天真烂漫，有先见之明的乐观精神，这些特质象是两不相容而竟在她身上结合起来，并且使她的外貌也添上了优美的特征。同时我也不禁对于我自身认真地省察一下，可是这种反省却不免给我的愉快心情投下了阴影。

璐仙德的诅咒的影响

自从那一位狂热的女郎①诅咒过我的嘴唇和使它圣化（因为每一种起誓都含有这两方面）以来，迷信得够厉害的我，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任何女子接吻，因为我害怕精神上会带给她奇灾大祸。在一个动人的女郎的面前，情欲的发作常足以使青年人要向她乞求这种或多或少地可以作为爱的表示的接吻，所以我总极力遏抑这种欲念。可是，即在极规矩的交际社会中，我也须忍受一种很困难的试练。那种多少带有机智和幽默的所谓“小游戏”，青年男女借着它们而聚在一块，大伙儿欢乐——恰是大部分靠着打赌的彩头来增加兴趣，而接吻却不是不重要的彩头。我曾下决心绝不跟人接吻，可是有某一种缺陷或故障常驱使我们试作我们平常不肯干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便尽我所有的才能和机智，来使我渡过难关，而且使举座在娱乐方面也无所失，而倒有所得。当人们建议以即席吟诗来认罚的时候，人们大都向我要求。我既常准备着有这一套，而且设法在这场合以诗来赞美那家的女主人，或对自己最表示好感的女宾。如果碰着硬要我接吻的时候，我便力谋转个弯儿来脱身，

① 参阅第九卷卷末。

并且使人们也满意，我既有时间预先来作这种考虑，所以不会缺少种种色色的巧妙玩艺儿，并且在即席之间想出来的，倒常是最妙的呢。

当我们回到牧师家里，从各方面来的客人已杂沓一堂，兴高采烈地交相谈笑。不一会，弗里德莉克便让他们集合起来，领他们到那林中的清幽的广场去散步。在那儿已准备有很丰富的小点心，想以有趣的社交游戏来消磨午饭前的时间。在这种场合，我也能得到弗里德莉克的同意——纵然她没有看穿我的秘密——，准备和实行一些不须赌彩和不以接吻为赌彩的游戏。

这时我的技巧和熟练，更特别的需要，因为这一班对于我完全陌生的客人恐怕很快已经看出我跟弗里德莉克的特别关系，恶作剧地极力逼着我做我私心要避免的事。本来，在这种会集中，人们一看出男女们恋爱的苗头，或把他们弄到困窘狼狈，或促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如在后来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已经显露出来，人们这时便又想法子来把他们拆散那样，因为这些社交界中人，只求好玩有趣，对别人为利为害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

在这一个早晨，我可以相当仔细地观察弗里德莉克的为人，在整个游乐的时间，她始终保持一个样。看到附近农人们特别对她亲切的招呼，就使人知道她是对他们有恩惠和赢得他们的爱慕了。在家里，有姐姐在母亲旁边帮忙；凡是需要体力的事情都不用干，家人说她“胸弱”，所以不让她做粗重的事。

在妇女中，有些在室内时特别惹人爱，有些在户外时较为悦 ，以弗里德莉克的举止和体貌而论，她是属于后一种女性。

最动人的就是她步登高坡的时候。那时，她的体态的轻盈优美，象是与繁花处处的大地争妍，她的丰姿的爽朗象是与碧空竞丽。这种在她周围的欢畅的气氛，她也带回家里去，不消一会就使人觉得她懂得释疑去惑，排难解纷，并很容易地把一些小意外的不快印象打消。

一个人在他的爱人身上感到的最纯洁的欢悦，就是看见她也讨别人喜欢。弗里德莉克在客人间的一举一动一般上是和蔼可亲的。在几次散步的时候，她象一个分给人欢慰的仙人到处出现，这儿那儿一有漏洞露出来，她就懂得填补。她的动作的轻盈，我们前已赞美过，而最美妙的就是当她跑的时候。正如小鹿轻轻地飞越过初萌生的禾苗的场合，它象是很充分发挥它的本能那样，弗里德莉克最准确地表现她的风格和举止的场合，就是当她忙趱着步轻轻地在田埂或草地走过，去拿回忘了的东西，找寻失物，招唤远远走过的人，或办一件要紧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她从不会喘气，跟平时完全一样的安详。因此，在好些人看来，她的两亲说她"胸弱"，对她特别操心，未免是鳃鳃过虑吧。

替牧师新住所绘设计图

有时陪同我们在草地和原野间散步的牧师，常得不到适当的谈话的伴侣。因此我便陪着他走，而他总不免再提起他的老话题，对我详细地谈及他提议重建牧师宅一事。他特别抱怨的，就是他不能再得到那精细地绘成的设计图样，以便能对此细加考虑，以及研究一下如何加以改进。我听了便说，补画一个不是难事，并自告奋勇替他绘一个先成为一切的基准的平面

设计图。他听了很高兴，他说必要的尺寸的测量就要请求学校教师帮忙。说完他马上连忙跑到教师那儿去找他，以便明日早上可以拿到丈量的工具。

他去了之后，弗里德莉克便对我说："您真是亲切，能够包涵父亲的弱点，不象别人那样，早已厌烦他这种话，想避免说起这事，或打断他的话头。不过，我要向您直白地说，我们家里其余的人都不愿意盖新房子，这种新建筑对于这乡村，以至对于我们都象是过分而不相称呢。而且，新的房子就要新的家具！我们的客人既在旧房子过惯了，进了新建的房子恐怕也不会觉得舒服一点吧。在现在的房子里，我们可以充分地款待客人，在一个较宽大的房子里我们怕会感到不适合。我们所想的就是这样。可是请您不必放弃您对父亲的好意，我真是衷心感激您啊！"

有一个跟我们作伴的女人说起几本小说的名字，问弗里德莉克有没有读过。她答说没有，因为她本来读书很少；她是在一种明朗的道德上健康的人生乐趣中长大和从此得到教养的。我差不多把《威克菲牧师传》说到嘴唇边来，不过我没有勇气把这书介绍给她：小说的情节与她的家庭的状况相似的地方太显著，太刺眼了。"我很喜欢读小说，"她说道，"在小说里头我们看到种种的好人，我们希望看见真正类似的人呢。"

房子的丈量是在第二天早晨举行。这事进行得颇慢，因为对于这种技术，我跟学校教师都是一样的不熟练。到末了，才绘成一张勉强过得去的草图。善良的牧师，向我说出他的意见，当我向他告辞说要将这图带回城里去从容地画好的时候，他也高兴。弗里德莉克欣然跟我作别；她之深信我的爱，正如我深信她的一样，因此六小时的路程的距离也不再觉得是远隔

了。坐驿马车到德鲁逊海姆来，是很容易的，并且藉着这种交通工具，经过职业的信差或临时的信差之手，与她保持联系也不困难。而传递消息的信使常是请乔治充当。

回到城里去后，我一清早——因为我实无法久睡呀——就从事于设计图的绘制，力求画得整洁。在未画好以前我叫人带几种书籍给弗里德莉克，还附上一纸情词亲切的短简。我马上得到她的复信，面对她的纤秀、娟好、富于表情的手迹而感到非常高兴。信的内容和文体也是自然的，美好、款款深情的，因此我从她所得的使人愉快的印象铭刻肺腑，常活生生地保留着。我心里老是欣然反复地想象她的一切的优点，满心盼着不久就可以再见到她，而且更长久地与她欢聚。

在牧师家里过的节日

这时已不再需要那位善良的教师的督促；他那一番话恰在恰当的时机使我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因此，我不大有心思想再去看他以及作为他的教材的病人了。同弗里德莉克的通讯渐渐频繁起来。她邀我去参加一个节日活动，那时，住在莱茵河彼岸的客人也会来，这回我还可以住久一点。我答应她去，收拾了一大箱子衣服装在驿马车里，不消几个钟头，我又在她的身边了。在那儿会见了一大群的欢笑的客人，我把牧师拉到一旁，把图样递给他，他看了大为高兴，我跟他谈起我在制图时所想及的事情，他乐不可支。绘图的整洁特别得他的称赞。我本来从小时起已练习绘图，这回更用极精美的纸，特别用心的画。不过，主人的这种欢悦不一会就给人大打折扣了。因为他心里太高兴了，不听我的劝告，把这房子的设计图拿出来给客人们

看。客人们不但不对这图纸表示他所期待的称赞，而且一部分人对于这精巧的制图漠然不望一眼，一部分自命内行的人的态度更坏，他们讥诮这张图画得不内行，当老牧师一下子不留神的时候，他们竟把这个整洁的设计图当作草稿那样看待，有一个客人用一杆硬铅笔将他所拟的修正的线粗重地画在这细薄的纸上头，以致无法再恢复原来的美好修洁。

老牧师的满怀喜悦既被大泼冷水，他极感不快，我纵然对他矢口的说，我自己只把这图当作是我们所谈过的计划的草稿，还应依照着它来画新的图，但我也差不多无法安慰他。他不管我怎么说，怏怏然走开了。弗里德莉克因为我对她的父亲那样亲切，对别的客人的粗暴的态度又那样忍耐，向我表示感谢。

可是，在她的身旁的我既不知有甚么痛苦，也不知有甚么不快。那天的客人差不多全是年青好闹的人，其中有一个老绅士喧闹得比他们更厉害，所干的事更比他们做的出奇。在早餐的时候，他们已不肯把酒放过，午饭既很丰富，他们更纵情的吃喝。而且在颇热的天时闹了一下之后，他们更特别的开胃，当那上述的老官吏狼吞虎嚥时，青年的客人们也不甘落后，便风捲残云似的大吃大喝了。

我在弗里德莉克的左右感到无穷的欢悦，谈笑风生，意兴洋溢，机智百出，不过因为对她的情感、敬意和惓恋之故，仍不无矜持。她也采取同样的态度，爽朗愉快，对我关心，而同时向我吐露衷情。我们象是只为客人们而活着，实际上，我们俩单单是你为我我为你而生存。

吃完饭之后，大家都跑到树荫下，开始作社交的游戏，种种打赌的游戏轮流的拿出来玩，输了认罚时，便要答应种种的

奢求：人们要求输的人装模作样，或作种种的可笑的举动，或出个难题要他解答，这一切都表现出人们是迷醉于放肆无度的欢乐之中。我自己也诙谐百出，来增进笑谑之乐，弗里德莉克屡以想入非非的雅谑使四座生辉。我觉得她这时比平日更加可爱，一切的忧郁病的迷信的怪念头都从我心中消失，一有机会让我尽情吻我的那窈窕可爱的女郎，我就从不肯辜负过，而且以后更敢反复追求这种欢乐了。

众人对于音乐的企求终于得到满足了，他们一听见音乐，全都连忙开始跳舞。初作日尔曼的圆舞，继作"华尔兹"舞，终以慢步旋转舞结束。客人们谁都习于这种民族的舞蹈，我也施展出从那两个私人女教师所学得的本领来。弗里德莉克的跳舞象她走路，跳跃，飞跑那样轻盈自然，发见我是一个熟练的舞侣，十分高兴。我们大多时都合在一块儿起舞，可是人们还是纷纷劝她适可而止，不要跳得那样起劲，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弥补的方法就是手挽着手两人独自去散步，到了林中那块平地里，我们极热烈地拥抱，极真挚地誓言彼此倾心，相爱不渝。

客人中年龄稍长的人们避去游乐的热闹，也跑到这儿来，把我们拉走。在晚餐的时候，人们的豪兴还没有阑珊，跳舞直至深夜，人们干杯互祝健康以及互为笑乐，跟中午一样的热闹。

我就寝后，才熟睡了两三个钟头，沸腾的热血使我醒过来。在这种时分，在这种场合，忧虑和后悔常向着那毫无抵抗力的人袭来。于是我的想象中，马上描出那最活龙活现的光景；我看见璐仙德在使劲地吻我之后，狂热似地从我身边退去，双颊炽红，眼睛发射着火光，吐出那个毒咒的情状，历历

如绘。她的诅咒本来只为威吓她的妹妹，怎知无意地威胁到其他的无辜的女子了。我又看见弗里德莉克在她的面前呆呆地象化石般站着，面容惨白，感受着她自己茫然不知的毒咒的后果。我夹在她们的中间，既不能消除那怪事的精神的影响，又不能避免那预兆凶事的接吻。弗里德莉克的柔弱的身体象是更加速那祸事的临头，这时刻她对于我的爱象是要落个悲惨的下场，我真恨不得能够高飞远走呵。

但是这时潜藏我心底，比这种悔恨更痛苦的，我也不想隐瞒不说。我这种迷信是给某种自负心所支持着。我的嘴唇——无论是"圣化"也好，被诅咒也好——比往常象是更重要一点，我许多时故意避免接吻这种纯洁的欢悦，一部分为的是保持我的双唇那种富于魅力的优越性，一部分为的是免得一个无辜的女子因此受祸，我意识到自己这种自我克制的行动时，实在是怀有不少的自负心。

可是，现在一切都已完了，噬脐莫及。我已再回到平凡的状态中，我相信这位极可爱的女性已遭了殃，我给她以无法挽回的伤害，这样子，破戒后的我不独不能袚除那个毒咒，而且它反从我的嘴唇刺入我的心里了。

这一切在我的为爱和热情、酒和跳舞所激动的血管中驰骋狂舞着，使我的思想混乱，使我的感情苦恼，特别是把现在的心境比起昨日的欢畅时，我感到突陷于无限的绝望之中，幸亏晓日的光辉从窗棂的罅隙射进来，这个初升的太阳压倒了黑夜的一切威力，使我再从榻上站起来；我一直跑到户外去，心灵的创伤纵然没有痊愈，也已很快感到精神舒畅些了。

本来，迷信和其他类似的妄想，如不迎合我们的虚荣心，反成为后者的障碍，使这种微妙的东西到处碰壁，便很容易失

掉其威力。那么，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摆脱它。如果我们压抑它的每一尝试的效果都有利于我们，我们便越容易戒掉它。我再同弗里德莉克会面后，她的爱情的感受以及我的处境的愉快，一切都似责备我为甚么在极乐的时节中却在心头栖留着悲啼的夜乌，我相信已永远把它赶跑了。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日益亲近和可信赖的态度使我兴高采烈。这回跟她作别，她象对别的亲友那样公然给我一吻，我更觉得幸福不浅。

与弗里德莉克的通讯

回到城里，已有许多事务和社交娱乐的活动等着我，但我却藉着与我的爱人的经常通信，而把心思集中到她的身上。在信里头，她也老是始终如一，或谈论一些新闻，或暗示某些已知的事件，轻描淡写，流露一时的感想，她的运笔老象是她运步时的往来跳跃那样，轻快明确，兼而有之。我也很喜欢写信给她：因为我对于她的优点的想象刻画，就在远离她的时候，也增加我的爱情。所以纸上交谈的乐趣也不减于晤对之时，到后来，甚至使我感到更加愉快和更可珍视。

那种迷信不得不完全消失了。它纵然是植根于往年的印象中，但是时代的精神，青春的锐气，与冷静明达的人之交往，一切都不利于那种迷信的存在，实际上，我所来往的友好中，无论谁也好，一听见我关于那种妄想的自白，没有不捧腹绝倒的。但是，最难堪的，就是那种妄想消失之后还留下一种情境我不得不加以真实的考察。早期谈恋爱而不期待后来有甚么持久的结果的青年便往往会陷于这种情境。我既然无法摆脱这种

迷误，理智和深思熟虑在这场合只会使我更加苦恼。我越认识这个优秀的女郎的优点，我的热情越增长，我生怕那样数不清的爱和善要永远失去的时刻就快临近了。

我跟弗里德莉克继续愉快而又恬静地在一起已有一些时候，其间，我的朋友韦兰却故弄狡狯，把《威克菲牧师传》带到塞逊海姆去，恰当他们谈起关于诵读诗文的时候，他突然把这书拿出来递给我，象是再没有什么要说的样子。我也能镇静自持，诵读得尽可能的爽朗。听我的诵读的人们的面容也马上露着欢畅之色，即便他们不禁再把书中的人物与现实的作一比较，他们也不会觉得不快，他们从前既在现实中找到雷门德①和美露西娜那样的人物，那么她们在这小说中看见自己的小影，也决不是可憎的吧。人们听了这篇小说，从没有明白地自认，但是也没有否认，是置身于精神上和感情上与自身相似的人物之中。

凡是善良的人，随着自己的教养的增进，渐感到本身在世上要充当两重的角色。一是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一是理想上的角色，一切高尚的行为都可从这种感觉中寻求它们的根基。分配给我们充当的现实的角色是怎样，我们已了然于胸，但是第二种角色是怎么样，我们难得心中有数。一个人可以在世间或天上，现在或将来寻求这种高尚的使命，因此他的内心总永远不断地波动，而在外界又常为周遭的影响所干扰，他终于作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行乎心之所安就是正当合理。

拿高尚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榜样，跻身于伟大的人物之列的雄心，是最可原谅的，青年人自比于小说中人物的本能也属于

① 参见第十卷“新美露西娜”一节，雷门德就是童话中美露西娜的丈夫。

这一类的心理。这种心理是极纯洁无邪的，无论人们怎样激烈地加以反对，实际上是完全无害的。当我们无聊欲绝，要就追逐声色、口腹之乐时，这样子自比是使人兴趣盎然的。

我们听见人们板着面孔，长篇大论地数说小说的害处，不知有多少回了吧！如果娴静的少女，英俊的青年，自居于小说中的比他本身较幸福或不幸的人物，究竟有什么害处呢？是不是市民的平凡生活有那么大的价值，日常的生活需求把人吞没个干净，以致他定要拒绝任何一种高尚的激励呢？

在德国教会中，儿童受洗礼的时候（纵然施行洗礼式的僧侣也常感到不满），便命以圣徒之名，这种带有历史和诗的意味的洗礼无疑地可算作是小说的兼诗的虚构方法的别裁旁枝吧。就是替自己的儿童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使之高贵——纵然没有隐含甚么特别的意义——也是值得称赞的习俗。这样子构成的空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就已为他的儿童日后的整个生涯增添一点光彩。有一个美好的孩子，我们给他起个象“伯尔太”那样的嘉名，如有人要替他命名做“乌耳塞尔伯兰丁纳”，我们便以为那是羞辱这个孩子。的确，一个有教养的人——更不必说情人了——自不会把这样的名字说出口。固然，世人用冷酷偏颇的眼光来判断事物，把一切源于空想的事物视为可笑和不足取，我们不必对这种人加以责备。但是理解人性的有思想的人一定要懂得拿这种行为的真实价值为准而加以评价。

对于美丽的莱茵河上的情侣的我们俩，因韦兰的恶作剧而弄成的比附（与《威克菲牧师传》人物的比附）有极美妙的后果。一个人照镜的时候，他不是想及自身而只是感觉到自身，承认自身的存在。同样，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精神上的肖像，从它那儿，象是在影画里描出来那样看见自己的形态，嗜好，习

惯和特质，便不禁想以骨肉至亲那样的亲切的感情来抓住和拥抱它们。

我到弗里德莉克的家里，老是跟她在一块，日益习以为常，她家里的人也视我如一家人，恬不为怪。他们听其自然，而不问及我们这样子做会有甚么结果。实则，许多做父母的听任自己的儿女处于变幻莫测的境地中，假以相当的时日，直至他们无意中确定了自己一生的途向，这种效果，比起由深思熟虑的计划所产生的还好。

同弗里德莉克结伴出游

家人们对于弗里德莉克的情操以及我的规矩都以为可以深信，因为我连天真无邪的爱抚戏吻也不干，他们对我已有先入为主的好感了。照着当时这地方的一般习俗，他们放任我们，不加管束。我们俩跟别人（有时三个人，有时一大批人）一块作小旅行，漫步探访附近的友好。在莱茵河的两岸，哈格瑙、路易斯堡、菲利普斯堡、奥尔敦瑙等地，有我在塞逊海姆认识的人们散居着。我往访时，他们各都殷勤地款待我，欣然饷以酒食，而且还导我游览庭园，葡萄圃以至全境。那时，莱茵河的岛屿也常是我们的泛舟的目的地。在那儿，我们忍心地把澄澈的莱茵河中的冷血的住民（鱼）投进锅里，放在烤炉上，沸腾的油中烧熟。我们在这儿的舒适的渔舍中，恐怕会流连很久，如果不是可怕的莱茵河的蚊蚋，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就把我们撵出来的话。我们这样的舟游是最快活不过的，除了蚊蚋的侵扰之外，一切都很如意，我俩的爱情象是随着旅游的顺利进行而更见增长，但是，蚊蚋的扰袭却太难受了。有一天很早，

我没精打采、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竟在那善良的牧师之前冲口发出冒渎神明的话，力言单是蚊蚋一样东西便足以使我打消世界全智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信念了。这个敬虔的老人诚恳地劝诫我，并对我解说，这些蚊蚋和其他的毒虫类都是在我们最初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才出现的，倘若它们也在乐园中住过，它们只作悦耳的嗡嗡的鸣声，而不刺人。我听了这话，觉得自己马上心平气和了，因为一个动怒的人如果一旦得到别人把他逗到笑起来，怒气也容易消了。不过我还力说，有了蚊蚋在，简直不要天使挥动他的炽热的宝剑，就可以把这对犯罪的夫妇赶出乐园去了。我并说："恕我冒昧，我想象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的大蚊，就会有这样的功效。"这回我这句话又使老牧师笑起来；他是懂得谐谑的，或者至少也不以谐谑为忤。

可是，在这个优美的乡间，更真实的和使人精神焕发的享乐，还是晨夕四季的自然之美。我们只要着眼于现在，在爱人的身边或其附近，享受那儿清澄的天空的光辉，肥沃的大地的壮观，和煦的黄昏，温暖的夜。我们有幸得到连续几月的澄明清爽的晨间，其时，太空展现它的无限的壮丽，大地饱浥它所降的清露，而且为使景色不显得单调，云峰从远山突起，时浮在这儿，时浮在那儿。云虽整天的甚至整周的聚着不散，但却不会把晴朗的天空弄得阴暗，即便骤然袭来的风雨也添给田野生气，使草木呈更鲜绿之色，在雨后还未干掉时，就再浴于日光之中辉耀着。两重的彩虹，缅镶着天际的深灰而近于黑的两色的外圈，比起我在别的地方看见的，更为美艳、多彩、分明，而又更迅速地消逝。

在这种环境之中，我久已忘了的诗兴不觉油然复生。我按

着著名的曲调为弗里德莉克作许多的短歌。它们已可集成一本绮丽的短歌集了，其中有一些留下来到现在，从我的其他的诗稿中大抵还可以容易找出来吧。①

因为我的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其他种种事情，我必须时常回到城里去。由于我们的恋爱获得一种新生命，而象这样的恋爱小玩艺通常会引起的不快结果因而可以完全避免。她在离开我的时候，为我操心，想方设法在我回来的时候添加新的乐趣，我在离开她的时候，也为她而忙碌着，想通过一种新的礼物，新的妙想，使她再见到我时有一种新颖之感。那时，绘画的带子恰是新流行的饰物，我买了几条带子，自己绘上画寄送给她，附以小诗，因为我这回在城里滞留的时日之长，要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我曾答应她的父亲绘制一幅新的精细房屋设计图，为了使绘制出来的图比我所许诺的更胜一筹，我便拜托一位对建筑内行的青年代自己绘制。这位青年对我既怀好意，对于制图也有兴味，又抱有赢得这样良好的家庭的亲切款待的希望而更增兴趣。他画好了房屋的平面图，正面图和断面图，连附属的院子和庭园也添上，此外更附上一个详细而有限度的预算，根据它，一个大规模的费钱的建筑工程也可以容易地实施。

这些图和预算书既足以征见我们为友谊而尽心竭力，因此我们赢得最盛情的款待。慈祥的老牧师既看见我们极恳切地为他效劳，所以再提出一个愿望。即是希望我们替他把他的单色的小马车，画上花藻，添上装饰。我们马上答应他了。绘画的颜料，画笔，及其他的需用的东西从附近城镇的杂货店和药店

---

① 编入《歌德全集》中的这类的短歌有《欢迎与离别》，《一条绘画的带子》等。

购备。可是，这家与威克菲牧师之家的类似的地方真是到处都碰着，在那儿有过的失误在这儿也就免不了。当我们孜孜不倦地描绘上种种艳丽的花样时，才发现我们买来的是干不了的坏的假漆，无论是晒着阳光也好，当着风也好，晴朗的天气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都不会干。在其间，老牧师只得用一辆老式马车来代步。我们没有办法，只得设法把这个坏的漆画磨掉，麻烦之处，还甚于画花样的时候。而且，在做这种工作时，娘儿们还极力请求我们慢慢地小心地擦，免得把它的底色也弄坏了，我们更加不痛快。可是，经过这种手术之后，底色真的不能再恢复它原来的光泽。

不过，纵有这些不快的小事故发生，我们也象普里姆罗斯博士① 与他的可爱的好家庭那样，绝不会因此妨害我们的快适的生活。因为我们也好，朋友也好，邻近的人们也好，都碰着许多意外的喜事：结婚，产儿，新筑落成，遗产的承继，中彩等一类的事，轮番地来临，我们一块儿欢乐。我们象是享受公有物那样来共同享受，并能以智慧和相互的爱来增加乐趣。我现身于别人的家庭和社交场里，恰就是他们最热闹最高兴的时节，已不止这一次，而是屡见不鲜的了。假如许我自我吹嘘的话，我可以说我之在场对于这种场合的欢乐有一定的贡献，不过他方面，这样的欢乐的时期正因为我的缘故而更迅速地消逝，我又不能不责备自己了。

可是，这时，我与弗里德莉克的爱情还要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考验”这一个名词虽不适当，但我还是称它做“考验”吧。和我友好的乡村牧师有亲戚住在城里，他们是市中的

---

① 普里姆罗斯博士（Doktor Primrose），《威克菲牧师传》中的主角。

有名望有丰厚财产的人家。这些亲戚的晚辈常到塞逊海姆来玩。但是，老辈的人，他们的母亲、伯母、姑母等，却不轻易出门，听见儿女们说及乡村生活的种种事情，弗里德莉克姐妹们渐渐出落得美丽可人，甚至听到我对于她们的好影响，因此，他们便愿意跟我认识。我访问过他们几回，而且也受他们很好的接待，后来他们又盼望我跟弗里德莉克全家都来，一块地玩一下，况且他们认为儿女们既在塞逊海姆受牧师家人的殷勤款待，礼尚往来，也要回敬一下。

弗里德莉克到斯特拉斯堡访问

他们应邀与否，拉拉扯扯了好些时候。牧师太太很难摆脱她的家务。珂梨佛不宜于过城市生活，她对它有点厌恶，弗里德莉克也不喜欢到城里去，这个事情因此久延不决，直至后来因为我的缘故而解决了。即是，我为事所阻，在两星期内不能到乡间来。她们宁愿有点勉强，冒着不便到城里来看我，还比在那期间彼此完全不相见好一点。这样子，我一向只在乡村的场面中看到的女朋友们——一向以临风摇曳的枝柯，湍流的小溪，野花盛开的草场，广袤数里的旷野为背景而出现的她们——这时却破题儿第一遭在都会风的宽广的屋子中现身于我的眼前了。可是置身于簾帷，照身镜，座钟和瓷器玩偶等陈设之中，房屋虽宽，她们倒觉得局促起来。

对于自己所爱者的关系既已那样牢固地确定下来，所以环境变化的影响甚微。但是，置身于适当的、自然的和惯熟的环境，还是感情上所企求的。我对于眼前出现的事物既很敏感，所以我不能对一时的不对劲的地方泰然处之。母亲的娴雅大方

的风度与这个新环境完全相称，不在别的妇人之下。反之，珂梨佛却象是给海浪打上岸边的鱼那样，显出焦灼不安。一向在乡下的时候，如果她有事跟我说，她或在庭园中高声喊我，或在田野中向我招手使眼色，她在这儿也是作类似的行动，把我叫到窗下来。她尴尬地、笨拙地作这样的行动，尽管她自己也感到这样做不合适，但她还是无法自制。她对我讲的话只是我已知道的最无关紧要的话。她说，在这儿太苦了，愿意跑到莱茵河岸去，逃过莱茵河，以至到土耳其去。他方面，在这种情境中的弗里德莉克却极可注目。老实说，她本来也不适宜于这种环境，可是，她不是被动地让自己适应这个新情况，而不知不觉地把环境调整得同自己相适应，这就可征见她的性格与众不同了。她在乡间善于和同伴应酬的做法，也在这儿施展出来。每时每刻，她都能增加人的热闹高兴。她不用喧闹，就使举座活跃起来，因此，那实在无聊时才踌躇不安的座客因此倒安静起来。她这种态度使城居的姑母伯母们十分满意，她们现在也愿意有一次从自己的安乐椅上领略一下乡间游戏和娱乐的风味。当这些玩够了的时候，城里的侄女们的衣着、首饰，以及法国式打扮，珂梨佛姐妹看起来觉得特别出色，细加观察，而不露妒忌之色。弗里德莉克对待我象平日一样的泰然自若，没有什么造作。她有甚么欲求愿望，不向别人而偏向我说出来，把我看做她的忠仆，我觉得这是她赏给我的最好的恩典。

有一天，她以相信我会唯命是从的态度命我效劳，她私下向我说，太太们希望我朗诵给她们听。这一家的女儿们，到塞逊海姆来时常听见我朗诵——因为我在那儿，无论甚么时候或拿甚么书请我朗诵，我都答应——向她们替我大为鼓吹。我马上答应了，只请求她们留心静听几个钟头。她们也首肯了，我

于是在一个晚上把全部《哈姆莱特》一口气朗诵出来，我竭尽所能来表达出全剧的意义，并洋溢着年轻人的特有的活力和热情。我博得听众大大的赞美。其间，弗里德莉克不时深深的吸一口气，两颊上突泛着红云。这是她的纤柔的心深受感动时的两种征象，她外貌上虽似愉快恬宁，但我已十分明白。这也就是我所企求的唯一的报酬。听者们都说，由于她的敦促才听得到这样好的朗诵，而对她致谢。她高兴地接受这些谢意，感到她自己在我身上和藉着我而得到光彩，不免有点沾沾自喜。

这次的城中之游，本预定只作数日的逗留，但是归程却拖延下去。弗里德莉克设法使她的家人享受社交之乐，我也尽我所能予以支持。但是，在乡间看到的那样丰富多彩的自然景物，在城里既没有，没多久，可供娱乐的源泉便涸竭了。加以姐姐渐渐失去自制，情形更苦。到这家里来的妇女中作德国式的装束的只有她们姐妹两人。弗里德莉克从没有作另行打扮之想，不把自己的衣服与别人的相比，以为无论在哪儿穿德国式的衣服都合式的。但是在珂梨佛看来，插进这样的仪容华贵的太太小姐队中，而自己打扮成象婢女那样，实在太难堪了。在乡下，她差不多看不到别人穿城里人的服装，她因此也不作改装之想，到了城市来，她却不能再穿村姑的装束了。她接触到的城里娘儿们，不单是服装不同，而且命运也迥异，加上城里的事物更有许多许多与乡村悬殊之处。这种相形见绌之感在她的容易感情冲动的胸中萦回沸腾着已有好几天，我顺着她的妹妹之意，竭力以近于阿谀的体贴来安慰她，我恐怕会吵闹起来。我眼中似看见她将要投身伏在我的脚下，苦苦的恳求我把她从这个苦海里救出的光景。如果她按着她平素的生活方式来自处，她是一个天仙似的好人儿，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受拘

束，她便怏怏不乐，并且终会弄到绝望。于是，我设法促成母亲和珂梨佛所企求而弗里德莉克也不反对的事，使之早日实现。说起弗里德莉克来，我觉得她与姐姐不相同，不由得不在她面前致赞美之辞。我对她说：看见她不改平素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也象枝头的小鸟那样自由无碍，我真是高兴得很。她的答话更是喜人。她说，这只是因为我在这儿的缘故。只要我在她的身边，或去或留对她都无所谓了。

末了，我终于看见她们动身回去了，我的胸中象是落下一块大石那样：因为我兼有弗里德莉克和珂梨佛两人的心境，纵然不象后者那样的惴惴不安，但也绝不象前者那样泰然自若。

学位论文的写作

本来，我之到斯特拉斯堡来，是为考取学位，所以我把这样一桩主要的事情当作是附带的事，的确是我一生的越轨行动之一。对于我的考试，我掉以轻心，付之等闲。可是这时也得想想作论文的事了。因为我从法兰克福动身时我曾答应父亲并且自己立下决心要写出一篇论文。凡是有一些能耐，以至不少本领的人，都有自诩无所不能的通病。青年如有所成就，总要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对于法学以及它的各分支学科，已能相当不错地获知其梗概，而对于法律上的各个课题也深感兴趣。而且我既以善良的莱塞尔[①]的勤勉来做我的榜样，自信靠着自己的一点常识就可以试验及格。在那时的法学界中正开始出现重大的变革，法律上的判决应多侧重公平合理方面，一切习惯法日

① 莱塞尔（Augustin von Leyser，1683—1752），维滕贝格大学教授。

见动摇，尤其是刑法，预期将有大大的革新。以我自己而论，我要阐述我自己所选定的课题，与我极其不相称，不独我缺乏所需的知识，而且又没有内心的向往来促使我在这个课题上用工夫。外部的激励也是缺乏，另一种性质全然不同的学问反吸引了我，使我埋头其中。一般而论，对某事物我感到兴趣一定是因为我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收获，以及从中发现将有良好效果和前途。我已经选取一些材料，并且摘录蒐集起来，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子来读，再考虑一下我所主张的论点和把各细目编排成的体系，这样子工作了已有一些日子了，可是不久我的灵机一动就发觉这样子做是不成功的，我知道要论证一个专题，也需要汲汲孜孜，持之以恒。的确，做一篇这样的论文，纵然不一定需要法学宗师承担，至少也须是老手，才能顺利完成呢。

当我把我的困惑对朋友私下说起时，他们觉得可笑，据他们说，人们可以不必把它当作“学术论文”（Traktat）那样的写，而只当作是一般“论文”（Theses）来处理，甚至这样写还好一点，这样的做法在斯特拉斯堡是很流行的。我也很愿意这样子马马虎虎的干，但是，我把这事情写信告诉我的父亲时，他的复信要求我写一篇正式的象样的论文，他相信只要我下这个决心，假以时日，我就可以办得到。这时，我只好就一般的课题下工夫和挑出一些我所熟知的问题来。我关于教会史的知识差不多比世界史还好一点，而且，我对于教会、公众承认的宗教礼拜在两方面所起的冲突——老是持续下来的冲突——抱有很大的兴味。这即是说，教会一方面要同国家争夺最高权力，因而不断发生纠纷，他方面又与它所欲集拢到自己方面来的各个个人冲突。在国家方面，它不肯承认教会的支配权，而个人又反抗教会的强制权。国家要求一切事情都以公共

的普遍的目的为依据，而个人则要求以跟家庭、心情有关系的目的作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从幼小的时候起就亲见亲闻过僧侣有时与他们的上级官员有时与教区信徒发生磨擦的种种风波，结果，照着自己的稚气的见解，我确信国家——立法者——有规定宗教信仰的形式的权力，教会应以此为准来行事和宣教，而世俗中人在外表的和公开的行动上也要严格遵守这个准则。至于每个个人内心怎样思想、感觉，抱有甚么信念，是不成问题的。我深信，这样子就可以一举把所有的争执解决。因此，我选出这个问题的前半做我的论文的题目，即是说：作为立法者的国家不独有权来建立某一定形式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有这个义务。无论是僧侣也好，俗人也好都不许逸出它的范围之外。一方面我从历史的角度，他方面列举论据来阐明这个题目，指出从来一切的公认的宗教都依靠军事领袖、国王和其他有权势的人物来树立和推广，即便基督教也不是例外。新教的兴起与普及就是眼前的实例。我之写这篇论文本来只是为了使父亲满意，我更大胆的写。如果它在审查通不过，就是最好不过的事。自从与伯里施交往以来，看见自己的著作印刷出版迄今仍觉得厌恶，不能自已。而且我与赫尔德尔的亲交又使我十二分清楚地发现自己的疏才浅学，因而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的毛病更加滋长。

这篇论文既差不多完全独出心裁，而拉丁语的讲和写方面也算流畅。所以我用在论文写作的时间还过得很快适。我的论旨至少也有一些根据，以修辞而论，文笔也不坏，以整个来说，算是相当圆满。一脱稿之后，我就拿去给一个精于拉丁文的友人共同检视推敲一遍。他纵然不能把我的文章的体裁从头到尾加以改进，但是有突出的错误的地方，他熟练地加以删改，以

便全文能向别人出示。我把它誊好，马上寄给父亲。他的复示虽因为我绝不论及以前所从事研究的题材而不以为然，可是，对于我这一大胆的计划，富于新教精神的父亲甚为满意。他原谅我的标新立异，赞赏我的努力，并预期这篇小论文发表后会有良好的影响。

我把这个论文交到法学院去，幸而教授们对它采取明智而又客气的态度。精干而明达的院长① 初时大加称赞，继而指出这论文的可疑之点，渐渐他更把它说成是危险的东西，最后他的结论是认为这篇东西不宜当作学位论文那样公开发表。他说：应考学位的人已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学院当局对于我的前途有莫大的期望。为使这事不致耽误起见，他们也赞成把我的论文交付答辩。日后，我可以照现在的样子，或进一步加工，用拉丁文或其他文字把它出版。我以私人和新教徒的身分来印行，这就没有甚么困难，而且这样子广为流布，博得世人的称赏，比由学校印行更为名副其实和普遍。我听他的一番话时，心头象是有块大石在骨碌骨碌地转着那样起落不定，我差不多要将我这种心境对这位善良的院长说出来。至于院长为了使我对于他拒绝公开发表我的论文一事不致难受或生气，而说出新的理由，我越听越觉安心。而我对于他的论据，不独出人意表地不加反对，而倒觉得非常有理，并答应今后完全照他的忠告和指导办理，他最后也觉得安心了。于是我再到我的补习教师那儿，把我前后提出的论文选择数种出来付印，至于论文答辩，则由和我一同吃饭的朋友们充当论文提问者，谈笑般轻快地举行。我少年时对于罗马法记诵上的熟练这时帮了

① 院长的名字是埃伦(Johann Friedrich Ehren)教授。

我大忙，我因而能有富于法学知识之称。答辩仪式顺利结束之后，便照例殿以盛大的酒宴。

可是，我的父亲听见我这篇论文稿没有当作新博士的论文那样正式印行，大为不满，因为他希望我的论文正式发表后我回到法兰克福便可藉此荣耀一下。所以他愿自费把它印行。我却对他这样子说明，即是，这论文只是仓卒写出来的纲要，将来定要再加充实。为着这个目的，他很小心地替我保存这篇论文稿，好些年之后，我仍看见它藏在他的文件档案之中。

历史学家舍普夫林的影响

我是在一七七一年八月六日得到学位，第二天舍普夫林①以七十五岁的高龄逝世。我和他虽没有亲密的交往，但他仍给我以显著的影响。因为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可比于空中的巨星，当它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眼便不禁向它们瞻望。如果我们有幸能分享这样完美的品质，我们便感到鼓舞和受到陶冶。仁慈的造物赋予他以俊秀的外貌，身材修长，双目和蔼，嘴巴能言善辩，故到处都给人很好的印象。在精神上造物对于他的宠儿的赋予也不吝啬，他的成功不是痛下苦功所得来，而只是他的天赋才能和精心培养的产物。他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算是喜欢把过去和现在结合，懂得拿历史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上的幸福的人们中的一个。他生于巴登，在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受教育，幅员广大、位置优良、乐园似的莱茵河谷真不愧为他的故乡。他既致力于史学、考古学的钻研，藉着优

① 舍普夫林（Johann Daniel Schöpflin，1694—1771），从1720年起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和雄辩学教授。

良的想象力之助而灵活地把它们加以掌握，藉着极有用的记忆力而把它们保留下来永志不忘。好学而又好启迪人的他，无论在学术生活也好，实际生活也好，持续不断地前进。他不久便一帆风顺，在文学界和市民中间崭然露头角，享盛名。因为他的历史知识既到处可派用场，而他的谦和态度又无处不受欢迎。他历游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各地，到处与当时的知名学者结交，又为各国君侯所招请，陪其宴乐，只当他的议论风生滔滔不绝的言谈超过预定的开宴或召见的时间，作陪的随从们才感到厌倦，在他方面，他得到政治家的信任，替他们出谋划策，提供极其精辟的论断。这样子，他的才能到处都有"用武之地"了。他所到的许多地方，当地人士都极力留他住下去，但他保持对斯特拉斯堡和法兰西王家的忠诚不变。他的坚贞不渝的德国人的诚笃的品性，也为法国宫廷所称许。有权有势的执政官克灵格林（Klinglin）① 曾暗中同他作对，人们却庇护他。他天性既好交游而健谈，他的社交范围的广泛，不亚于他所拥有的知识和所从事的业务。他一辈子是一个女性的嫌恶者，如果我们不知道别人为同妇女交游愉快地浪费的许多的光阴，却成为他的余暇，我们就不明白他会有那么些富裕的时间了。

而且，他也是以一般人作为读者的著作家，以大众为听众的演说家。他的专题文章，讲演或致词，大抵是为献给有大事的日子、或即将来临的庆典而发表，以资纪念的，他的大著《阿尔萨斯志》（Alsatia illustrata）使过去重现，使腐朽的人物复活，使雕刻石像栩栩如生，使磨消破损的碑铭再度鲜

① 参阅第九卷"勒塞其人"一节的注。

明地映于读者的心目中，这可以说是属于现实生活的范畴的读物。为此，他的活动遍及阿尔萨斯州和邻近地方，在巴登和法尔茨两州，直至高龄还继续保有很大的影响。他又在曼海姆城创立学院，至逝世前还是充当该院的院长。

我从没机会接近这个卓越的学者，只有一回，那就是我们学生为他奏火炬夜乐① 的那一天晚上。那一个给苍郁的菩提树覆罩着的古教堂的中庭，与其说是为我们的火炬所照耀，毋宁说是给它们的烟所弥漫着。嘈杂的音乐奏过之后，他走下来置身于我们的中间，这儿的环境对他更加适宜。这个长身玉立的爽朗的老学者，以悠悠自在的态度，庄严可敬地站在我们的面前，饷我们以一篇语重心长的演说，演词绝无勉强及炫学的痕迹，而吐露出慈父似的蔼然可亲的口气。因此，我们听到这位常为王侯所礼聘公开讲演的老学者的一席话，当时便有身受与王侯同等待遇之感。我们大声喝采，表示我们的满足之意，三番五次地吹喇叭和打大鼓，然后这班极其可爱而有前途的大学生们满怀欢悦地散队回家。

科克与奥伯林

他的弟子科克和私淑弟子奥伯林② 两人同我早已有一种颇密切的关系。我酷爱古代遗物。他们常领我到博物馆去参观，馆

---

① 奏火炬夜乐是学生们于1770年11月24日为纪念舍普夫林教授任职五十周年而举行的。

② 科克（Christoph Wilhelm Koch，1737—1813）继续从事舍普夫林关于阿尔萨斯和巴登的研究，斯特拉斯堡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奥伯林（Jeremias Jakob Oberlin，1735—1806）也是如此。

中藏有许多足以为舍普夫林关于阿尔萨斯的名著作佐证的东西。我作阿尔萨斯的旅行，当场看到那儿的古物之后，才较认真地阅读这本大作，此后，我藉着这书之掖助每作大小的探胜旅行时，可以历历地想象出属于罗马帝国版图的莱茵河流域是怎样情景，而且象是清醒地把往代种种的梦描绘一番那样。

我刚刚对于古代的阿尔萨斯获得一些知识，奥伯林便又引起我探究中世纪念物的兴趣，介绍我认识那时还残存的废墟、遗物、印玺、文书档案，甚至引导我对于所谓"爱情诗人"和英雄诗人发生兴味。我得到这个诚笃的学者和科克先生的帮助不少，如果我依照他们的希望和期待做去，那么我的一生的幸福便要拜他们之赐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舍普夫林既一生进出于国法学那样的更崇高的学术园地中，并且知道这种学问和同类的学问在宫廷和内阁中容易给予一个有才干的人以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当时的民法学者抱有一种不能自制的(应该说是不公正的)反感，而且影响到他的弟子们也抱同样的态度。上述的两人同是萨尔兹曼①的知友，对我怀有十分的好意，寄予我以愿望。热情地把握外界的事物，以独特的技巧来描写它们的优点引起对它们的特殊的兴趣，这是我的一种特长，但他们对于它的评价比我自己还高。我的民法知识的微不足道——并且可以说是贫乏——也不会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同我熟识后，看破我是胸无定见容易受人摆布的人，而我也向他们披沥我对于学术生活的志趣。他们企图先诱导我暂时对历史、国法学与雄辩术发生兴趣，然后使我更确定地走上这条路，本来斯特拉斯堡城本身就提供这样的事业以许

① 参见第九卷"同迈耶的结识"一节。

多好机会。例如，凡尔赛有开设德意志高等法院的前景，舍普夫林这位先驱者也有前例可援。他的才能和业绩诚然不是我所能企及，但在他们看来，这纵不能引起我步其后尘的志向，但也会使我羡慕，也许因此就养成我的与之相彷佛的才能。实际上，这样的才能，对于那些以此擅长的人们固有裨助，即对于那些想利用它的人们也会有好处的。这两位掖助我的人连同萨尔兹曼，对于我的记忆力以及通晓外国语的能力评价很高，并以此为主要理由提出他们的主意和建议。

可是，后来他们的计划怎样完全不能实现，我怎样从法国方面回到德国方面去，我想在这儿细加叙述一下。不过象以前那样，让我在叙述之前先作一点一般的考察吧。

本来，传记之能够表现主人公个人的生涯的真正的、平稳的和持续的进步的，实不多见。我们个人的生涯与我们所在的宇宙同样，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由自由和必然的折衷构成的。我们的意志是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所要做的事情之预告。但是这些情况都按着它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甚至“什么”(das Was)是凭我们自己决定,“怎样”(das Wie) 却很少听由我们自己主张,我们更加没有寻问“为什么”(dasWarum)的资格,因此人们说我们“因为如此如此”(Quia)也是对的了。

法语的难点

我从少年时期起就爱好法兰西语；我在一种活泼的生活中学习法文，又从法文的学习体验一种活泼的生活。我没有学过文法，没有上过正式的课，恰象是第二种本国语言那样，从交际和练习中就把它学会了。为了想更熟习法语起见，我不进别

地的大学，特地挑中了斯特拉斯堡大学而到这里来。可是，我在这儿的经历可惜与我的期望恰恰背道而驰，不独不与法国的语言、法国的习俗接近，而且倒与之疏远起来。

一般上，法国人是以优雅的举止自励的，对于初讲法语的外国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有说错的，从不加以讲笑，即便错误不少也不加指摘。可是，把本国语说错了，他们听了究竟忍受不了，因此，他们把对方所说的事自己再以别的说法复述一遍，藉着这样的委婉的方式来示人以恰当的语法。如果对方是聪明细心的人，就可以由此学得正确无误的语法了。

诚然，如果我们外国人认真地学习法语，努力克制自己，自居于一介学生而不以为耻，我们从法国人这样的纠正自会得到裨益，有所进步，不过我们在这种场合总感到不无屈辱，而且我们谈话主要对谈话的内容有兴趣，法国人这种纠正方法使我们所谈的话常常被打断了，甚至转到题外，因不耐烦而把谈话中止了。我特别比别人多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信常是说些有点兴味的事，在他方面也常对于有意义的事留心倾听。不想老是只关心于语法方面，加之我的法语比任何别的外国人都驳杂一点，我碰上这样的事便更频繁。我的法文的语法以至发音，是我从仆人、侍役、哨兵、老幼的演员、戏迷、农夫、英雄人物，种种色色的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我这种象巴比伦语那样乱七八糟的惯用语，因为一种奇怪的成分之混入而更庞杂。即是，我喜欢听改革派的法兰西僧侣的说教，星期日往博根海姆（法兰克福城之近郊）散步时，便到他们的教会去，父亲因此不独容许我作博根海姆之行，而且还劝我去，可是，还不止此，进入了青年时代的我，对于十六世纪的德意志文艺日益倾倒，而同一的光辉时代的法兰西作品也在我的爱好范围之内。

蒙田[①]阿米奥[②]、拉伯雷[③]、马罗特[④]是我的良伴，引起我对他们的作品的共鸣和惊叹。所有这种种不同的成分在我的法语中乱七八糟地混杂起来，因此，我的异乎寻常的表达方式便使我的听者茫然于我的话中的旨趣了，以至连有教养的法国人也不再客气地委婉地加以修正，而不由得不单刀直入地指摘和改正我的错误。因此，我在这儿又碰到在来比锡城所碰到的那样的事了，但是在来比锡城的场合，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故乡也有与别的州同样说自己的方言的权利来辩解，这次既置身外国的领土，那就只有依从它的传统的规矩了。

也许我们也会甘心这样做了，如果不是有一个恶意之神老在耳边喃喃的说："一个外国人讲法国话，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徒劳无功；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学说法语总会被一个耳朵尖利的人听得出来。人们听他们的话，虽可以忍受得了，但他们绝不能被只讲法语的教堂接纳进去。"

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国人认为只有极少数是例外的。有一个人可以举出来的，就是冯·格林姆[⑤]先生，但是，连舍普夫林也不能称为十全十美。他们承认他早就看到了用绝对准确的法语表

---

①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92），伦理学家，著有这方面的论文集。

② 阿米奥（Jacques Amyot，1513—93），著有《人类的生活》附图。

③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5—1553），讽刺作家。

④ 马罗特（Clement Marot，1495—1544），讽刺作家和宫廷诗人。

⑤ 冯·格林姆（Friedrich Melchior von Grimm，1723—1807），出生于累根斯堡，德国宫廷派驻巴黎的外交官，曾主编《文学通讯》，撰写有关于最新法国文学的书面报告。

达的必要，称许他好与任何法国人谈话，特别是乐与大人物和贵显交谈一事，甚至他登台讲话时，努力以法国语言作为本国的语言，尽可能的使自己成为法兰西式的社交家和演说家，也为他们所赞扬。但是他抛弃本国的语言，而苦心致力于外国语，到底有甚么好处呢？结局谁也不满意他这样子做。在社会上，人们觉得他爱虚荣，这种情形恰象是一个没有自觉没有自负的人同别人对话那样。洞明世故、精于语言学的人断言他讲的话倒象是做文章和念对白，而不是交谈。前者是德意志人的祖传的根本缺点，而后者是周知的法兰西人的基本特长。就是在公众之前演说的时候，也不见得好一点。他曾把对国王或诸侯的讲演稿印了出来，因为他是新教徒，而向来憎恶他的耶稣会僧侣，便留心找他的岔子，指出他的不合法文语法的地方来。

我们不独不因舍普夫林之受到苛评而感到安慰，正象幼树忍受枯树所加的负担（出自《旧约》）那样，对于这种炫学的不公平态度反愤愤不以为然。我们想起舍普夫林的突出的实例，而陷于绝望，深信以文章、讲话的内容来使法国人满意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们遇事都太过拘泥于表现事物的形式了。由是，我们立下一个相反的决心，完全抛弃法语，比以前更起劲更认真地致力于德语的锻炼。

对德国人的嫌恶

即在这一点上，实际生活也给我们以机会和助力。阿尔萨斯之合并于法国为时还不久，因而在老年人中，青年人中，还保留有对德领时代的旧政制、习俗、语言、服装的依恋。当被征服者必须丧失他们的存在的一半时，他们便觉得把剩下的一

半自动地抛弃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牢牢地抱着那足以使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好时代以及助长他们对于幸福时期的复返的希望的一切事物而不放。有许多许多的斯特拉斯堡的德籍居民虽然分散，但在精神上是构成一些紧密的小集团。这些集团因为在法国主权下拥有广大的地产的德意志王侯的许多臣民之加入而日益扩大起来。这些臣民，为求学或经商起见，在斯特拉斯堡作长期或短期的勾留。

在我们的膳食小组中，也只用德语交谈。萨尔兹曼讲得一口流畅优雅的法国话，但在奋斗目标和行动方面也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勒塞可以树立为德意志青年的模范；迈耶倒喜欢随便的说一口优美的德语，而不肯聚精会神去说好的法语。其余的人中虽有不少爱慕法兰西的语言和风习，但是只要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也让德国腔压倒一切。

现在让我们从语言转到政治方面去。诚然，关于德意志帝国宪法没有多少可以称赞之处。我们承认，它是单纯由法律的滥用构成，但正因为如此，比起现行的法国宪法来，仍然高明得多。因为后者确陷于没有法律的滥用的紊乱之中，政府的权力只发挥在不当之处，因此，人们公开预言，在法国的暗淡的前途上早晚发生根本的变革。

反之，回头望北方，那儿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却象北极星那样灿然照射着我们，德国全土，欧洲以至全世界都仿佛围着他转。他在一切方面极其鲜明地显出他的优越性，就是在法国军队里头，普鲁士式的操练法，甚至普鲁士式的棍也被采用。至于他对于外国语法语的爱好，我们也加以原谅，因为他所招聘的法兰西的诗人、哲学家、文学家们始终使他讨厌，而他们也屡次宣称，只把他当做闯入者看待。

但是，最使我们疏远法国人的一桩事，就是，他们屡屡傲慢不逊地力言德国一般人以至这个热心追求法国文化的君王都不知趣味为何物。这种讥诮，正象诗歌中各节末尾的叠句那样，总出现于法国人的每一批评之后。对于这种批评，我们加以无视，以平自己之愤。可是，我们总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倒会有这样的话，因为人们言之凿凿地指出，梅纳什曾说过，“法国的作家甚么都具备了，只是缺乏趣味。”① 又如我们从现在的巴黎的文坛看来，最近的作家全体缺乏趣味，即便伏尔泰也不能完全免遭这种最严厉的指摘。我们从少年时候起就爱自然，以后习惯于自然，我们除了真理和纯真的感情以及它们的直截了当的表现之外，其他都不予以重视。

友谊，爱情，亲睦。
那不是不言自明吗？

这一句话在我们学生的小团体中成为互相辩认和互相勖勉的口号和口令，我们一切的友谊的宴集也以这个格言为依据，在许多这类晚会上，米歇尔老表（Vetter Michel，典型的德国人的绰号）的真正的德国人的本色也免不了在我们中间出现。

如果人们在上述的话中，只看到外来的偶然的诱因和个人的偏见的话，法国文学本身也有一些特点，使发奋图强的青年不为所吸引，倒是望而却步。这就是说，法国文学是老耄的，高贵的，而到处追求生之享乐与自由的青年却不会从这两种特点得到快慰。

---

① 梅纳什（Gilles Ménage，1613—92），法国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曾把当年的时代称为“恶趣味的世纪”。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法国文学从没有完全中断，国内的政治和宗教的动乱以及数次的对外战争倒象是加速它的进步。但是，一般人已断言，法国文学早在百年以前，已达于全盛状态。由于种种有利的情况，法国文学一下子就成熟起来而得到丰富的收获，以致十八世纪的最伟大的作家，也不得不恬淡地以拾落穗自足。

伏 尔 泰

可是，这期间，也有好些文学作品变得陈旧了，首先是喜剧。本来喜剧一物，纵然不够完美，也需要不断更新，才能富于新兴趣，以迎合当时的生活和风习。以悲剧而论，有许多已在舞台上绝迹，而伏尔泰不肯放过这千载一时的机会，把高乃依的戏曲编印出来①，来显出他的先辈剧作家有怎样多的缺点，但是据一般的鉴定，后者却不是他所能及呢。

这个伏尔泰，可算是他的时代的奇迹，他自身也与他主宰差不多一世纪和予以活气的文坛同样衰老了。除他以外，还有许多老作家残留着，多少搞点创作，晚年过得不坏，但他们也一个接一个消逝了。社会对于著作家的影响日益增大，因为从名门世族，贵显和富豪之家构成的上流社会选择文学做他们主要的娱乐，文学由是带有很大的社交性质和成为高贵的东西。上流人士与文学家互相陶冶，而同时又必然互相施加坏的影响，因为一切高贵的东西都是带有排他性的，而法国的文学批

---

①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84），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的重要作家之一。1764年伏尔泰编辑的高乃依戏曲集十二册出版。

评也富于排他性，尽摈斥、贬黜和吹毛求疵的能事。上流社会的人们以这样的批评施于著作家的身上，而著作家们又以更放肆的态度，讥评其同行，甚至对他们的恩主也不留情。他们既不能使读者大众感动折服，便努力赢得后者的惊异，或卑躬屈膝以博其好感。由是，除了教会与国家的内部的纷争以外，文学界也发生风潮，以至伏尔泰要竭尽他的全部活动能力，施展出他的文坛霸主全身解数来，以便不让这股普遍地互相藐视的潮流卷进去。他本已有“老顽童”之称，他的继续不倦的努力，人们视为垂死的老人的徒然的挣扎。他一生恪守并致力宣扬的某几种原则，世人已不再重视，不再尊崇了。甚至他的关于神的学说——因为他承认神的存在而继续与一切无神论者绝缘——也不再为世人所称许。因此，本属文坛祭酒的他，也不得不学当时他的年轻的后辈文学家那样，觑准当时的风色，猎取新的宠遇，对自己的友方过分奖誉，对自己的敌方，过分挖苦，在真理的热情的追求者的假面具下，弄虚作假。他的晚年渐渐失去青年时代的自由和独立性而终于随人俯仰，他不辞劳苦度过这样积极活动的伟大的一生，而落得这个下场，是值得的吗？这种情境怎样难堪，不会为他的卓越的精神和敏锐的感觉所忽略过，他许多时突然地痉挛地倾吐他的衷曲，放纵自己的脾气，发出和做出一些越轨的言行，以致惹起大多数的友和敌的反感，因为无论何人纵然不能与他相颉颃，却都自以为可以漠视他。常常只倾听老辈的判断的大众容易流于聪明过头，而一个尚未成熟的人所接受的成熟的判断却是最不足取的。

我们青年具有德意志人酷爱自然和真理的特性，认为对己对人都要诚实的准则，是处世和治学的最好的指南那样，常浮现于眼前，因此伏尔泰的带有党派性的不诚实，以及他之将许

多值得尊重的事物歪曲恶化，便为我们所嫌恶，并日益加甚，而我对于他个人的厌倦也与日俱增。他为着要惩创那些所谓僧侣起见，总不厌对宗教和作为它的基础之《圣经》加以贬黜，因此常惹起我的不快之感。可是现在我竟听见说，他为了要推翻挪亚大洪水之说，否认有化石的贝类，认为这不过是自然的作用。① 他由是完全失掉我的信仰。因为从前在巴斯特堡山所见的大堆贝壳② 十分清楚地证明，我是置身于太古的已经干涸的海底，它的原始住民的遗物之中。不错！这个山曾一度为波涛所覆盖，至于这是在洪水以前或是在洪水泛滥的当儿的事，那与我的确信无关。总而言之，莱茵河流域的低地从前是一个浩瀚的海，一个一望无际的海湾，不管人们怎样说也不能动摇我的看法。我想再进一步作地质和山岳的研究，也许这种研究多少会有些结果。

要之，法国的文学，在本身上是衰老的，高贵的，并且通过伏尔泰表现出来。让我们对于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再作详细一点考察吧！

伏尔泰从青年时代起所希求和努力的，就是从事活跃的社交的生活，投身政界，获得大量的财富，与世间的贵显人物结交，并利用这种关系使自己也成为有权有势的人。一个人把自己弄到那样不独立而想达到独立是不容易的。他又成功地使才智之士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时间全国也靡然成风。他的敌对者徒然施展他们凡庸的本事，对他抱极度的憎恶，但总不能损他的毫末。他纵然总不能与法国宫廷和解，但外国的君王却

① 见于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所撰的“大洪水”一条目。

② 参阅第十卷“扎伯尔因和布克斯韦尔”一节。

转成为他的风雅的附庸。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瑞典的古斯塔夫（Gustav）、丹麦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布朗斯威克的卡尔，都向他膜拜称臣①，甚至罗马教皇②也以为必须对他稍示宽大，来怀柔他。唯有德皇约瑟夫二世与他疏远，可是这样做决不能提高他的令名。因为，如果同象伏尔泰那样神志清晰，心性美好的人接近，他将成为一个较有才智的人和较能赏识别人的才智，对他自身，以及他的事业恐怕只有得而无失吧。

我在这儿稍有关连地简略地讲出来的当年的事，象是此时此刻的呼声，永远不能谐和的杂音，毫无连贯毫无启发地在我们的耳边响着。我们只老听见对于逝去的先辈作家的赞美。人们要求一些好的新的东西，但是最新的总不吃香，一个法国爱国主义的剧作家，才把他的富有法兰西民族意识、激励观众的戏曲，拿到久已消沉的剧场上演出，《加莱城之围》③才博得热烈的喝采，这篇戏曲即已连同其他的爱国主义的作品被目为言之无物，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应该鄙弃了。德图士的风俗描写，我在儿时常读而乐之，现在却被讥为文笔软弱，这个可尊敬的作者的名字已经湮没。还有其他不知多少的作家，我不能在人前提及，如果我在那些赶着最时髦的文学潮流的人们之前，表示对这些作家或其作品有一点同情，我便被目为“村夫子”之流的批评者，而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嘲骂了。

---

① 这些王侯给伏尔泰写的信的措词证明这一点。

② 指教皇克莱门斯（Clemens）十四世。

③ 《加莱城之围》（《Die Belagerung von Calais》）是法国爱国的剧作家兼诗人贝洛伊（Pierre Belloy，1727—75）所作的悲剧，演出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便日益为别的德意志同伴所厌恶。依照我们自己的主张和天性，我们喜欢明确地把握对象的印象，然后一步步领会它，把它加工，如果非放弃不可，也要尽可能慢慢来。我们确信，通过认真的观察，持续不断的勤劳，无论从甚么事物都会得到一点结果，而且坚持不懈继续努力，我们终必达到不独能够作出关于这事物的判断，而且可以说出判断的根据的境界。我们也不否认，伟大而光辉的法兰西世界提供我们以许多好处和教益：例如卢梭就实获我心。可是，如果我们把他的生涯和命运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一切成就的最大报酬，不外是在巴黎度着默默无闻，为人忘却的生活吧。

如果我们听见人说及百科全书派①，或打开他们所编的巨帙一看，我们便恍惚踏进大纺织工场中，无数的转动着的卷筒和织机之间，置身于响着嘎嘎嗒嗒的声音，使人目眩神迷的机械以及极其复杂而又彼此密切配合、种种色色不可思议的装置之前，亲眼看见和考虑一下要那么大的麻烦才制成一块布，因而连自己身上着的衣服也嫌弃起来。

百科全书编纂人中，狄德罗与我们十分接近，他在那些招法国人的指摘的一切方面都有纯粹德意志人之风。但是，他的观点也已过高，他的视野也已太广，我们虽欲追随他接近他也有所不能。他能够以伟大的修词的手腕描写出来和使之高尚化的“自然儿”（Naturkind），我们很喜欢。又如他所描写的勇悍的盗猎者和私枭，也使我们非常感兴趣。这种无赖汉后来

---

① 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共三十五卷，在狄德罗和达朗贝（d'Alemlert）共同领导下主编，历时二十九年（1751—80）才编成出版。“百科全书派”是指参与编辑的启蒙思想家，除上述两人外，还有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等。

在德国文艺园地上更频频的出现了。这样子，他也象卢梭那样，宣传一种对社会的反感，暗地里引导出那打破世界一切现状的巨大变革来。

可是，我们现置这点的观察而不论，转而考察一下上述两个思想家对于艺术的影响，似较为适当。他们在艺术方面也昭示我们以自然，也鞭策我们走向自然。

一切艺术的最高的使命，就是通过假象塑造一种更高的现实性幻觉物。可是，如果假象弄得过于现实化，以至末末了只剩有一种平凡的现实，作者的努力便白搭了。

舞台本是一个观念上（理想上）的场面，应用透视法顺次布置起来的侧面背景，获得最大的效果，可是现在人们竟任意放弃这种好处，关闭舞台的两侧，装上真正的房屋的墙壁。在这样的舞台场面上，连戏曲本身，演员的表演，以及一切都应与这种新布置保持一致，而新式戏剧便从此诞生。

法国演员

法国的演员演喜剧时在艺术的真实性方面已登峰造极。他们在巴黎的居留，对廷臣的一言一动的观察，男女演员们通过恋爱的勾搭跟上流社会的人们结合，这一切都有助于把现实的社会生活最机灵最恰当地移植于舞台之上，在这点，“自然爱好者”（自然主义者）没有多大的非难。但是，他们却进一步主张，如果选择较严肃的悲剧的题材写成剧本（在市民生活中也不缺乏这样的题材）上演，运用散文表达更高级的主题，这样子便可以逐渐把喜剧所用的不自然的韻文，连同不自然的科白也一起摈弃了。

有一桩极值得注意，而又不为一般人所认识的事，就是当时连古的，体裁严格的，韻文的，富于艺术性的悲剧作品，也有被革命之虞，这种革命，只有借着伟大的天才和传统的势力才可以避免。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个名唤奥弗勒斯纳（Aufresne）的演员起而与名演员勒卡因（Lecain）唱对台戏。勒卡因扮演的主角，力求恪守舞台的正规，态度庄严，精力充沛，而避免自然化和平庸化，但奥弗勒斯纳却对一切背离自然的表演宣战，力求在他表现的悲剧中保持最高的真实性。这种表演方法不免与巴黎其他演员相抵触，他因同行的连成一气而弄得孤立，但他坚执己见，宁愿离开巴黎而不肯随波逐流。他路过斯特拉斯堡。在那儿，我们看见他扮演“西那”（Cinna，高乃依的悲剧）的奥古斯特和密特里达脱（Mithridat，拉辛的悲剧的主人公）以及其他一类的角色，演起来极为自然，饶有真实性。他以英俊之姿现身于舞台之上，长身玉立而不魁梧，虽不威武，但具有高贵可亲的风度。他的表演，沉着稳重，而不流于冷漠，需要雄浑有劲的时候也十分雄赳赳。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艺术家，是能够把艺术的东西全化为自然，把自然全化为艺术的少数人中之一个。但是，这样的人的特长多被误解，错误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每由是产生。

在这儿我还想再说一说一本小小的而有开新纪元的影响的戏曲：这就是卢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这作品大有议论之余地，因为这个奇异的作品摇摆于自然与艺术之间，是想将艺术融化分解于自然之中的错误的努力的产物。在这戏剧里，我们看见一个艺术家虽已写成最完美的作品，却不以在本身之外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他的理想和赋予它以高尚的生

命为满足，不！他要把它拉下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与他自身接近，他想以最庸俗的纵欲行为把思想和行动所造就的最高尚的东西败坏。

一切这类的作品以及其他许多的作品，无论是明智的或拙劣的、真的或半真的，都给我们以影响，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混乱，我们彷徨踯躅于迷途和歧路之中，这样子，便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德国文学革命准备了条件，我们成为这革命的见证者，并且，无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愿意或不愿意，都不能自已地参加进去。

对《自然的体系》的评价

至于接受哲学方面的启迪和诱掖，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意图或倾向。关于宗教的事情，我们自信自己已经弄个明白，故对法国哲学家与僧侣的激烈论争我们只冷眼旁观，不怎样关心。被禁被焚毁的书籍在当时曾引起骚然的物议，但对我们却没有甚么影响。我可举出因为好奇心而翻阅过的《自然的体系》① 一书以例其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书会被目为危险读物。它的内容显出那样的灰色、黝暗，带着死的气味，把它浏览一下也很吃力，并且对着它就象对着幽灵那样感到发抖。著者在序言中申言，他已到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亟愿以此书对当代和后世宣扬真理，他认为这书值得特别推荐。

---

① 《自然的体系》（Systéme de la nature）为居于巴黎的德国男爵霍尔巴哈（Baron von Holbach，1723—89）所著，1770年在伦敦出版，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之唯物论的典型代表作，有“唯物论圣经”之称。

我们读了不禁失笑：因为在我们看来，世间甚么可爱的善良的东西，老年人是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的。“古教堂的玻璃是暗的！——樱桃和莓果的味道怎样，一定要问小孩和麻雀儿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口头禅。因此那本称为老年人的结晶品的书在我们看来是乏味的，甚至令人作呕的。著者说，一切都是必然而然的，因而没有神的存在。我们反问：神不可以也必然地存在吗？不消说，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昼夜的迭代，四季的往复，气候的影响，物理状态和动物性的必然存在；但是我们仍感到在自身中有一物，象意志的完全自由那样，更有一物，力求与这自由意志保持均衡。

日进于理智化以及日益不依存于外物甚至不依存于我们自身是我们的希望，不容抛弃。自由这个词那样的好听，纵然它是一种谬误的表征，我们也少不了它。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把这本书读到终卷，因为，我们觉得翻开它来读时，就使我们大失所望。这书以自然的体系的名字问世，我们因希望真个得到一点关于我们所崇拜的自然的知识。物理学和化学，天文学和地理学，博物学和解剖学，以及其他许多的科学，多年以来至于最近，不绝地促使我们注目于那个伟大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很愿得到关于日月星辰、山谷、河海以及在那儿生存和活动的一切东西的一般和特殊的知识。当然这样的把宇宙阐明，就免不了出现许多这样的情况，使普通人视为有害，僧侣阶级视为危险，国家视为不可容许，对此我们毫不为疑，并且希望这本小书象真金那样，经受得起洪炉火的试炼。可是我们开卷一读，便觉得如堕入于凄惨的无神论的深夜中，地球和它的万物，太空和它的群星都在这黑暗里消失，空虚之感便向我们袭来。据它说，物质是永远存在而且

永远运动着，因为这种四面八方的运动——单是这种运动——就产生出存在的无穷的现象。如果著者真能在我们的面前证明世界是确由他所说的动的物质构成，这种学说我们也许还觉得满意。但是，他关于自然的知识的贫弱，跟我们不相上下，因为他把一些一般的概念提出来之后，马上就无视它们，为的是要把比自然更高的东西，或现于自然中的更高的自然，化为物质的，有重量的，虽运动而没有方向、没有形状的自然，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大有所获。

如果说这书给我们一些坏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读了这书后，我们对于一切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总是从心底里不喜欢，而更积极地热烈地致力于活的知识、经验、行动和诗作。

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

这样子，我们身在法国的边区里，而一举摆脱了身边一切法国的东西的束缚。我们觉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太刻板，太高雅，他们的诗流于冷淡，他们的批评偏于否定，他们的哲学晦涩而又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有非委身——至少也当作是尝试那样——于粗犷的自然不可之势，幸而有另一种好的影响给我们以正当的指导才免于这种危险。这种影响从很早以前就提供我们以较高的，较自由的，有诗意的而同时又真实的世界观和精神的享受，初时只隐隐约约地，但后来渐渐明显地和强有力地支配我们的思想了。

我这里指的是莎士比亚，差不多不言可喻，我说出来之后，也用不着我怎样详细阐明。德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赏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恐怕连英国人也有所不及。我们德国人对

待他，极尽公正和爱护的能事。连对本国人也没有那样慷慨。优秀的学者们以极其善意的态度来努力探究、展示他的伟大的天才，我每读到他们的论评，无论是尊崇他也好，称赞他也好，以至为他护短也好，我都欣然同意。这个旷世的天才对我的影响已在少年时显示出来，我并曾把我对于他的著作的感想和评论，试写出来，颇得别人的赞许。在这儿我只想笼统地说出他的影响就算了，待到有适当的机会再把我关于那样伟大的作品的零星评论搜集来献给那些愿意读的读者。——其实，我在这儿差不多跃跃欲试，想把它们插入了。

现在我只想稍为详细地说说我通过怎样的机缘认识莎士比亚的。那是颇早以前在来比锡城读多德（Dodd）的《莎翁选粹》（《Beauties of Shakespeare》）一书开始的。这本选本把著者的作品片断而不完整地介绍出来，不管人们怎样指摘，它仍发生不少很好的影响，我们究竟不能老是冷静而明敏地把全集读遍而理解其价值。我们读书时不是在那些直接与我们有关涉的地方划线来作标志，青年人特别是如此，他们既缺乏完善的教育，而醉心于精采出色的地方。我还记得我耽读上述的《莎翁选粹》时，可算是平生一个最快乐的时期。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无不深获我心，铭刻于我的肺腑之中。

这时，威兰的译本出现了①。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拿它向朋友和认识的人介绍推荐。我们德国人有一个优点，就是首先把许多外国名著以平易明快的文体翻译过来。莎士比亚的散文

① 威兰的散文译本共八册，1762—66年出版。

译本，由威兰先开其端，接着埃申堡也这样做①。因为以散文译出，无论何人也易读好懂，所以流通很快，影响很大。我重视节奏和声韵，诗之所以成为诗，就靠着它们，但是，诗作中本来深切地影响我们的，实际上陶冶我们的，却是诗人的心血被译成散文之后而依然留下来的东西。即是，这时剩下的是纯粹的完美的成分，因为诗体是一种绚烂的外饰，当缺乏这种成分时，诗体也会假装冒充，当这种成分存在时，这种外饰只会把它遮盖住。所以，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译本比韵文较为有效。我们知道儿童生性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戏谑化，他们以声调的铿锵，音节的抑扬为快，他们爱好用游戏笔墨模仿别人诗文的坏习惯，往往使最优秀的作品的意义深远的内容为之破坏。所以我曾经建议可否首先把荷马的诗用散文翻译出来。当然，这种翻译工作，一定要够得上德国文学现在的高水平。我想把这个建议以及刚才所说的事，请我们的可尊敬的教育家考虑一下，他们的丰富的经验对于这问题当有极好的贡献。为支持我的建议起见，我只想引马丁·路德的《圣经》德文译本做例子。这个卓越的宗教家，把《圣经》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文体，它的诗的，历史的，命令的，教训的繁杂的语调，合一炉而冶之，用本国语译出来，他这种译法比起刻意模仿原本的种种特色的译法，更有助于宗教思想的宣扬。其后，《圣经》学者们努力把《约伯记》、《赞美诗》及其他诗篇，依照原文以韵文译出给我们欣赏，也是徒劳而无功。对于读《圣经》的人，散文译本总是最适当的。那种要与原本比美的

① 埃申堡（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1743—1820）的散文译本于1775—82年出版。

句斟字酌的译文，实只是对《圣经》素有研究的学者们彼此之间的娱乐品吧。

这样子，在我们的斯特拉斯堡的小社会里，莎士比亚的作品，无论是依据译本，抑或原本，片断抑或全文，若干段落还是摘要都有那么大的影响，以致我们也象世间的“圣经通”那样，渐成“莎翁通”了，在会话中模仿他所描出的当时的美德和缺陷，耽溺于他的谐谑，或翻译来应用，或依样葫芦杜撰出来。我比其他任何友人更热心地耽读他的著作一事，也有不少的影响。我对友人欣然承认，莎士比亚象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和鼓舞着我，我的朋友便受了熏染，开始步我的后尘。我们不否认这时也有对这伟大的作品加以精确的考究，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入的评论的可能，不过我们把这事留到后头去，现在我们只想欣然与他共鸣，惟妙惟肖地模仿他，并且对于这个提供我们以那么大的快慰的作者，不敢加以探索，挑剔，而觉得无条件地崇拜他倒痛快一点。

伦　　兹

如果读者中有想直接知道当时我们的生气勃勃的小社会（指共餐的人）是怎样的想、怎样的讲和怎样的讨论，那就请看收在赫尔德尔的《德意志的特性及其艺术》① 一书中的关于莎翁的论文，伦兹② 的《剧场评论》。在后一书中还附有《恋爱

① 赫尔德尔的《德意志的特性及其艺术》一书于1773年春刊行。

② 伦兹（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92）的《剧场评论》（附有莎士比亚的《恋爱的徒劳》的译文），于1774年匿名出版。他是狂飙突进时代的诗人，在斯特拉斯堡当家庭教师时同歌德认识。

的徒劳》的译文。赫尔德尔对于莎翁的性格的深处有透澈的理解，而能美妙地表达出来。伦兹对于舞台的传统采取偶像破坏者的态度，要求一切都莎翁化，我在这儿既已提起这个多才多艺而又异乎常人的朋友（指伦兹），现在也许正是试把他略加叙述的时机了。我到斯特拉斯堡的居留快将结束的时候才认识他，我们很少碰头，他的亲交是另外一些人，不过我们仍找机会来见面，我们既是同时代而又抱有同样志趣的青年，因喜欢互相倾吐衷曲。他身躯矮小而丰姿俊秀，小脑袋美好可爱，端正而微带扁平的五官完全与之相衬，蓝碧的眼睛，黄金色的头发，一句话，他是北欧青年中有时可以碰到的一个美男子。他的步武安闲而稳重，谈吐虽不大流畅而甚悦耳，举止在谨慎与羞怯之间，与青年人也很相称，他朗诵起小诗——特别是他自己作的诗——来，琅琅可听，又写得一手很美的字。象他那样的思想意趣，我只能以英语的Whimsical（“奇趣横生”或“怪诞不经”）一字来形容，照辞典所示，这个字把许多奇异的特性包括在一个概念之中。正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恐怕比任何人更能领略和模仿莎士比亚的天才的奔放和洋溢之处。上述的他的翻译就是一个好的例证。他以非常的自由的笔调来对付原作，在简洁和忠实方面最为缺乏，但是他披上原作者的异样的装束——更不如说滑稽的装束来，能够那样的合身分，那样的幽默地模拟原作的一切诰谑的手法，因此他当然能博得那些对此有兴味的人的喝采。

莎翁喜剧中的丑角的荒唐无稽的一言一动特别使我们高兴得厉害，我们认为伦兹的翻译的手腕在这方面更值得赞赏。下录他译的某公主射死的猎兽的“诔词”，就是如此。

Die schöne Prinzessin schoss und traf
Eines jungen Hirschleins Leben;
Es fiel dahin in schweren Sehlaf,
Und wird ein Brätlein geben.
Der Jagdhund boll! —Ein L zu Hirsch,
So wird es denn ein Hirschel;
Doch setzt ein römisch L zu Hirsch,
So macht es funfzig Hirschel.
Ich mache hundert Hirsche draus,
Schreib' Hirschell mit zwei LLen.
美丽的公主射猎
伤了一匹小牡鹿的性命；
牡鹿倒地长眠
堪供一小盘的烤肉。
猎犬吠了！——对牡鹿（Hirsch）吠出L一个字，
这样子便凑成一个Hirschel（小鹿，意谓把L添在Hirsch一字之后，便成Hirschel），
可是如把罗马数字的L添上去，
便变成五十匹的小鹿了。
我从此可繁殖到百匹的鹿儿，
添加两个L于Hirschell之后。

青年人放浪不羁地恬不以为异地显露出的爱好诞妄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再突出，但决不因此而完全丧失。这种倾向在我们当时正是全盛的时候，我们并且努力自出心裁写出一些打油诗来赞颂我们的最大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在朋辈

座上献出这一类的妙文，我们便引以为荣，而在社交上这种谐谑也被容许的。下录的嘲笑一个骑劣马坠下受伤的马术师的诗就是一例。

Ein Ritter wohnt in diesem Haus,
Ein Meister auch daneben;
Macht man davon einen Blumenstrauss,
So wird's einen Rittmeister geben.
Ist er nun Meister von dem Ritt
Führt er mit Recht dem Namen;
Doch nirmmt der Ritt den Meister mit,
Weh' ihm und seinem Samen!
在这家里住着一个骑士（Ritter），
在旁边还有一个名手（Meister）。
如果将这两人以花束结合起来，
便变成一个骑兵上尉（Rittmeister）。
如果他是马术的能手（Meister von dem Ritt），
那就名副其实；
可是倘若马术竟把名手弄坏，
名手和他的子孙都要遭殃！

这样的诗拿出来，我们都认真地加以讨论，看它有没有上莎翁的丑角之口的价值，是否来自纯粹真实的滑稽的源泉，抑或有一种感觉和理智，不相称地不适合地夹杂其间。可是这种怪诞的见解大大的传播起来，并赢得许多人的同情，而博得一般人信任的莱辛在他的《汉堡剧评论》中，给这种滑稽之作鸣锣开道，更特别助长这种倾向。

我与这样的耽好文学和染着莎翁热的人们常作上阿尔萨斯之游，至为愉快，然正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得到甚么特别的教益。我们在每回旅游出来的小诗，收集起来便有不少，可编成一本新鲜活泼的游记，但现在已散失了。在莫尔斯海姆(Molsheim）僧寺的十字廊下，我们叹赏玻璃窗的彩色缤纷的绘画；在科尔马（Colmar）和斯勒特施塔特（Schlettstadt）之间的富饶的地区漫步时，我们高声吟出对西利兹(Ceres罗马司农牧的女神）的颂歌，同时对各种谷物的大量消费也详细地加以探讨和赞美。连它的自由贸易或限制这一重要问题也在我们中间热烈地辩论起来。到了恩西斯海姆（Ensisheim），我们看见教堂中悬着一块巨大陨石，按照当时的怀疑精神，把人类的迷信加以嘲笑，他们料不到这样的空中的怪客如果不落在我们自己的禾田中来，至少也应在我们的珍品贮藏室中保存着。

奥提利安堡之游

有一次使我常常回忆的旅行，就是由信徒百人——甚至千人——组成的奥提利安堡（Ottilienberg,孚日山脉的绝顶）的巡礼。在那儿，围绕着古罗马堡垒的废墟还残存着，据说在这些杂陈的瓦砖和石缝中，有一个美丽的伯爵女儿曾有结庵修道之举。离那些参拜的信徒们虚构的小礼拜堂不远，导游者指点一个泉给我们看，说是那女修道士朝夕出汲之所，还谈起许多关于她的动人的逸事。她的姓名和我想象中的她的丰姿，在我心坎里深深铭刻着。我把这两者保留到很久，直至后来我在我晚年的作品中拿它们来构成一个女主

角①，虽然出现较晚，但不因此而不见得可爱，她深受心地虔诚纯洁的人们的欢迎。

从这山顶上远眺，那美丽的阿尔萨斯州再次映入眼帘，它的景色不变而常新。当我们进入圆形剧场之中，无论在何处就席，虽可遍望全体的观众，但只有身边的人看得最清楚，在这儿眺望远处近处的灌木、岩石、丘陵、森林、田野、牧场、村镇等等，恰也是如此。导游者甚至指点地平线上的一点给我们看，说是瑞士的巴塞尔。巴塞尔之入我们的眼与否，不敢矢言，但是瑞士群山的蓝色烟霭，也从远处向我们逞它的魅力，一若要招我们前去那样，可惜我们不能应邀再作快游，深以为憾。

我尽情的作这种的排遣和游乐，因为当时我对弗里德莉克的热情的关系渐已引起我的不安，而更耽溺，弄到神魂颠倒。这样的盲目地灌注的青年的爱情，可以黑夜里发射的炮弹为喻，弹丸循着一条轻柔放着光的直线上升，直进至天空的星辰之间，甚至象是在那儿停留了一会，然后循着同一的路线，只走相反的方向，落下来，到末了，破坏了它落下的场所。弗里德莉克始终如一，她象是想不到也不愿意想及，我跟她的交情那样快就完结了。至于珂梨佛方面，虽也以不见我为苦，却不象她的妹妹那样翘盼着我。因此她较有先见，对我较为公开。她许多时跟我谈起我们的预期的远别，努力为她自己的缘故和为妹妹的缘故寻求慰解。在一个青年的女子跟一个男子不讳言有爱情的场合，如果断绝了，她虽是痛苦，却没有象一个男子与一个也曾对之明白表示爱情的女子断绝关系时那样痛苦。在这

① 指歌德的作品《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女主角奥蒂利（Ottilie）。

场合，他老是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别人总期待他多少也能了解、把握自己的处境，露骨的轻薄行为与他已不相宜。使一个青年女子解除恋爱关系的理由，总被世人目为正当，但在男子的场合却总不是这样。

可是这种使人陶醉的恋情怎样会让我们预先见到，它会领我们到甚么地方去呢？就是当我们的理智促使我们断了恋爱的念头之后，我们还是藕断丝连不能完全摆脱，我们依然醉心于过去的风流韵事，尽管表现的形式已不同。我就是如此。纵然跟弗里德莉克晤面使我感到痛苦，我总感到离开她时怀念她以及想起与她共话的情趣，是比甚么都愉快的事。我到她的家里虽渐渐疏了，但我们的通信却越来越频繁。在信中，她以明快的语调叙述她的近况，以优美的文笔倾吐她的心情；而我读起来，也满心欢喜，热情洋溢地把她的种种优点细加吟味。我与她的睽隔倒使我自由，而我对她的爱情藉着长途的笔谈而才象满开的花那样达到极点。在这时节，我对于未来已经昏昏然看不清楚，而光阴的流转和种种迫切的事务的压力又使我无暇分心顾及。一向我靠着对现在和当前的事的不断地积极地参加，能够从事种种色色的工作，但是到末了，正象人们要离开一个住惯的地方时往往会有的那样，一切要做的事便纷至沓来。

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

那时，更有一桩无端插入的事情把我最后的几天也占了去。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到乡间的别墅去，从那儿可以眺见壮丽的大教堂的正面和它上面的高耸的尖塔。游侣中有一个人说："可惜得很，大寺的全体没有完成，我们

只看见一个塔。”我听了便答道：“我觉得有同样抱憾的事就是连这一个塔看来也没有完全造好，因为那四个涡旋形的饰物弄得太过扁平了，我以为它们上头应当树上四个轻的尖顶，并且在那个笨重的横桁所在的地方的中央再安上一个更高的尖顶。”

当我以平素的兴奋的语气这样断言时，一个爽快的短小的男子跟我搭话，问道：“谁对您这样说过呢？”“塔自己，”我答道。“我既对它长久地注意地观察，并对它表示那么大的兴味，以致后来它终于决定对我说出这种公开的秘密。”“塔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对于这一点最清楚，因为我是受命管理公共建筑物的职员。在我们的档案里还保存有原来的设计图，那图证实了您的推测，我可以领您去看。”因为我动身在即，极盼他这种特别的好意尽早实现。他出示那卷贵重的设计图的时候，我迅速地以蜡纸把现在的塔所缺的那些部分摹绘上，并恨没能够早点看到原图。但是，我总要经过直观和观察，费了一番心血，然后对于某种事物获得概念，已是惯常的事，不止这一桩了，而且，如果别人把这种概念先向我指出时，恐怕这种概念还不会那样明显和有裨益吧。

在这样的忙乱之中，我仍不能抛弃重见弗里德莉克一面之念，在她的家里那几天是很痛苦的，到现在已不能记忆情楚了。当我动身时，从马上伸手与她作别，她的眼泪已盈眶了，而我也感到心情沉重。我向着德鲁逊海姆的路上驰去，在途中，一种极奇异的预感向我袭来。即是，我以精神的眼——不是肉体的眼——看见我自己骑着马在同一的道上迎面而来，并且所穿的衣服是我从没有穿过的织着金丝的灰鼠色的衣服。一当我摆脱了这个幻觉，那个形象便完全消逝了。可是，更奇怪

的是，在八年之后，我恰穿着与幻觉里所见的同样的衣服，不是出自故意而是出自偶然的走在同一的道上，来重访弗里德莉克。不管这样的幻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在诀别的途上这种幻象总给我以一点安慰。我因永远离开美丽的阿尔萨斯以及我那儿获得的一切体验而感到的苦痛，稍为缓和了，终于脱离了那一曲骊歌所引起的晕眩状态，而觉得已再置身于一个宁静而愉快的小旅途中。

曼海姆的古物馆

到了曼海姆我抱着非常的热望，连忙跑到那声誉卓著的古物馆去。在来比锡城时，我从温克尔曼和莱辛的著作已听见说及关于这里所藏的贵重的美术品的许多的话，可是实物还没有看见。因为在来比锡城美术专门学院里除了“拉奥孔”①、“父亲”和“手持响板的农牧神”(der Faun mit den Krotalen）之外，便没有别的名作的模型。即使奥塞尔有时高兴起来对我们谈谈这些雕像，但他所说的还是谜一样。可是，我们那时对于艺术还是初学者，怎样能给我们以关于艺术的目的的观念呢？

古物馆的馆长维沙费尔特②和蔼地接见我。他的一个同事领我到陈列室去，他把室门打开之后，便让我随自己的喜欢参

---

① “拉奥孔”(Laokoon)，是古代特洛伊城的祭司，传说他父子三人被蛇缠住咬死。莱辛的美学代表作《拉奥孔·论绘画与诗的界限》，通过这故事在造型艺术和诗歌中的不同处理，探讨画与诗的界限及其反映现实的不同方法。

② 维沙费尔特（Peter Anton Verschaffelt，1710—93），是当时有名的雕刻家和建筑家。

观考察。在这儿，我置身于一个宽敞的，四方形的，因天花板的非常高也差不多成为立方形的室内，从檐板下的窗口射下来的光线照着的广间中，极其美妙的印象映入眼帘。古代的最优美的雕像不独沿着墙壁排列着，而且还在整块地板高低参差地摆着。可以说是一个雕像之林，观众一定要在其中左旋右绕地穿过，更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各国国民的大集会，参观者必须穿插其间。这一切的名贵的雕像，藉着帘帷的拉上拉下，而照射着最适合的光线，而且它们的台脚是回转式的，可以随意变换方向。

我聚精会神领略了好一会全体陈列品的强烈的初次印象之后，转而观赏那些最吸引我的雕像去。"观景楼的阿波罗像"①最为突出，谁能否认呢？这个立像相当的巨大。身躯修长，运动的姿势自由而轻快，目光炯炯象胜利者那样。这像魅力之大也非别的作品所能及。其次，我转而鉴赏"拉奥孔"②。拉奥孔与他的两个儿子一块儿的雕像，我是破题儿第一遭看见。我尽可能的设想关于他的一切论述和争论，而力图提出自己独有的创见。可是，我时而为这种见解所吸引，时而受别种见解的影响。那个"垂死的斗剑士"使我凝视很久。可是，使我最感到眼福不浅的，就是观赏"双子座星辰"（Kastor und Pollux）的群像之时，这个遗物的真假虽成问题，但很可贵。我当时还不知道观赏可爱的美术品时马上就把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作出评价是怎样不可能的事。我强迫自己来思索，却得不

① "观景楼的阿波罗像"（Apoll von Belvedere），是罗马教王宫城内观景楼所陈列的名作，阿波罗神的复制品。

② 这个群像是1506年在罗马发现的，原作为公元前二世纪之物。

到甚么明白的观念。不过我仍觉得，这些大量的收藏品中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可以领悟的，每一对象都是自然的，在本身上是有意义的。

可是，我最注意的还是“拉奥孔”，对于“他为甚么不号叫呢？”这个著名的疑问，我自己对自己答道：“他不能叫呵！”以为这样子可把这个谜儿解答了。在我看来，父子三位的一切举止和动作，是从这群像的最初的构想派生出来。主体之“拉奥孔”表现出那样的艺术的而又粗暴的姿势，是由于与蛇搏斗的努力和想逃避眼前的噬啮的两个诱因所致。为要减轻这时的痛苦，自然要把下腹收缩，而号叫出声便不可能。我又断言他的幼子不会被噬，此外关于这群像的艺术的优点我还试作种种的解释，我把我这些观感写在信上寄给奥塞尔，可是他对我的解说没有特别重视，而只以一般的奖励的话来回答我的好意。幸而我仍坚持这种见解，许多年后还不动摇，到后来他终于赞同我的体验和信念。其后我出版的美术杂志《普罗皮莱》①，就是以根据现在这种观点发表我的见解。

热烈地观赏了那么些的造型艺术的杰作之后，我对于古代建筑的吟味的机会也不肯放过。我看见圆形屋的柱头的模型，它的叶形雕饰既浓密而又优美，我注视时，一向对于北方建筑术的偏爱，开始为之动摇了。

我在青年时期的这种观察对于我的一生虽有很大的持久的影响，但是事后却没有马上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果我能够将参观博物馆的纪事从卷头写起，而不放在卷末，那是多么高兴的

① 《普罗皮莱》（Prapyläen），在古希腊语为神殿的入口，歌德采用作为美术杂志的名字。这个刊物由歌德与他的友人迈耶合编（1798—1800年）。

事情。那瑰丽的陈列室之门刚在我踏出之后关上了，如醉如痴的我便想把“旧我”回复过来，甚至力谋摆脱那些雕像加于我的想象力的重负。所以，后来要走一大段路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才回到这些艺术之林里。不过，它们的印象暗地里起着作用，我们只以欣赏的态度领略它们，而不加以零敲碎打的品评，其效果是不可以估量的。如果青年人不采取批判挑剔的态度，不加检视，不加剖析，让那些伟大优美的东西对自己发挥作用，他就能获得最高的享受了。

第 十 二 卷

从斯特拉斯堡毕业回家了

游子终于回家了，比前次归省时较为健康，较为愉快，但是他的举动现出有点过度紧张，不见得精神上完全健康；我一回到家里，母亲鉴于父亲的严谨和爱好有条不紊的性格与我的种种的清狂乖僻的倾向会发生冲突，便不得不想方设法来调节和解。在美因兹的途中，我曾碰见一个弹竖琴的少年，非常的喜欢他，因为那时大市集日已在目前，我便邀他到法兰克福城来，答应给他地方住和予以赞助。在这个事情中也显出我的癖性来，因为它，我一生惹出不少的麻烦。这就是说，我很欢喜年龄比我小的人慕我的名而聚拢在我的左右和追随着我，可是结果我当然要分担他们的运命。纵然有过一回又一回的不愉快的经验，我仍不能克制这种内在的冲动。即在近年，我对于这种事情虽已充分明白，但仍然不时会再犯这种失误。我的母亲比我较有先见之明，觉得把一个大市集日的卖艺人安顿在那样体面的人家里，他又要到旅馆去和酒店里弹琴赚钱，父亲一定看作怪事。她因此在附近替这少年找到适当的食宿的地方。我替这少年向友人们介绍，他在大市集期间过得也不坏。数年之后我再看到他，他已是长大粗野了，但他的技艺却没有怎样长进。可敬佩的母亲第一回试做调停和掩饰我们父子之间的分歧的事做

得很满意了，料不到在以后我居家的时节，她这套把戏还是非常必要的。父亲耽溺于他的老一套的癖好和活动，过着满足的生活，他心中象那些不顾一切的障碍和延宕而贯彻他的计划的人一样的愉快。我已考得学位了，走向仕途的第一步算是完成。我的论文获得他的称赞，使他更仔细地对它加以斟酌，作将来印行的种种准备。当我滞留在阿尔萨斯时，我写了许多小诗、小论文、游记及其他即兴的东西。父亲以编排这些文章，加上标题和要求我加以完成为业，并且欣然希望我从前不欢喜把这类东西付印的固执态度马上放弃。我的妹妹结交了一班伶俐可爱的女友，聚拢在她的身边，她并没有骄傲自大，但她们却接受她的安排、支使。这是因为她的明智使她能够看得开，她的善意可以平息种种纠纷，此外她又能使人不把她看作敌对者，而视同可以信赖的心腹。在我的旧朋侣中，霍恩依然是忠实的友人，愉快的游伴。我跟里斯①也很亲密。我有所主张，每流于独断，他却常以怀疑、否定等反对的态度相向，以考验我的机智。别的人也渐渐加入我和霍恩、里斯的行列中来，关于他们，以后将有机会再加叙述。可是我这次新回到故乡来，最使我愉快和最有助于我的友人总算是施罗塞尔兄弟。年长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是一个学有根柢的优秀的法学者，执律师业，博得人们普遍的信赖。他最爱栖迟的地方，就是书籍文件琳琅满架、陈设整然的书斋。我上那儿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以爽朗同情的态度接待我，即在大庭广众中，他亦蔼然可亲，逗人喜欢。这是因为他读书既多，脑中充满着关于往代前人的珍闻逸事之故。一有适当的机会，他不吝以拉丁语

① 里斯（Johann Jakob Riese，1746—1827），曾在马尔堡学习，1773年在法兰克福城任市贫民救济机关的管理官。

作情趣洋溢的诗，来增加满座的欢乐。我到现在还保存有他所作的种种滑稽诗，我曾把法兰克福城的有名的畸人写成漫画，他便在画上题上这些诗。我常向他请教从事法律以后我的生活和事业的途向，如果不是有无数的嗜好，种种的激情，和许多可以分心的难事，把我从法律的路上拉走，他一定会成为我的最确实可靠的指导者呢。

在年龄上与我较接近的是他的弟弟乔治，他这时已辞去符騰堡欧根公爵那儿的职务，从特雷普托回到法兰克福市来。他在洞明世情和通晓实务方面已有长进，而对于德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仍感兴趣。他依旧喜欢用各种外国语写东西，但是这已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惹起我的外国语热了。因为我这时已一心一意的专攻德语，外国语只求学到能读名著的原文就算了。他的正义感依然不变，而且，人情世故之洞达反使他更严谨地，甚至更顽强地保持他的善良的心地。

默　克

不久，藉这两兄弟的介绍，我也与默克①认识了。我在斯特拉斯堡时，从赫尔德尔的口中，已听见称道他。这个对我的生涯有极大的影响的特异的人物，出生于达姆斯塔特城。关于他少年时期的教养，我不知其详。学校生活完毕之后，他伴着一个青年到瑞士去，在那儿滞留了一些时候，结了婚才回国。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任达姆斯塔特的军队主计官。他生来本富

① 默克（Johann Heinrich Merck，1741—91），当时任军营主计官，自1774年在达姆施塔特任军政部门高级军官，1791年自杀。

于理解力和才智，学识广博，对于近代文学造诣极深，又博览各时代各国的通史与人文史。他具有准确而敏锐的判断力，在朋友中他有正直和果断的实务家以及老练的会计师之誉。他为人虽象是尖刻，但在见惯了他的人们之间，并不望而生畏，倒被目为很可亲的社交家而到处受欢迎。他身躯瘦长，突出的尖鼻惹人注目，炯炯四射的淡蓝色或灰色的两眼有点鹰瞵虎视的样子。拉瓦特尔① 在他的骨相学中曾引他的相为例。他的性格含有奇妙的不调和之处，本性上他是一个善良、高尚、可信赖的人，以愤世嫉俗之故，任由这种任性的病态的脾气支配他自己，象是为无法禁遏的倾向所驱使那样，故意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甚至恶作剧的人。在某一瞬间，他显出明达、安详、善良的性格，但在另一瞬间他突然象蜗牛之伸出它的触角那样，想做出一些事来讨人嫌，得罪人，甚至予人以损害。可是正象世人相信自己对某种危险有安全的保障而爱亲近危险那样，我既确信，他不曾以他的恶意的方面对待我，正因为他有二重性格，我更喜欢和他来往和领略他的善良的方面。他的举止既然这样的烦躁不安，又不由得不以恶意、怨毒来待人，一方面自会败坏他的社交生活，他方面，另有一种烦躁不安状态——他也很小心养成的心境——与他内心的愉快相抵触。这既是说，他感到有一种业余的创作欲。因为他能够轻快流利地以散文或韵文表现自己的感想，而实际上以他的文才也很可以跻于当时的名作家之列而无愧色，他更热心地耽于诗文的撰作。到现在我还保存有他写的韵文的信札，豪放粗犷，不同凡响，而又带有斯威夫特的辛辣之味，以对人对事的独创的见解非常见长，但同

① 关于拉瓦特尔（Lavater），歌德在第十四卷中有详细的记叙。

时他的笔锋却有那样伤人的力量，我甚至现在也不好公开发表它们，我只有或把它们毁弃，或保留于后世，作为证明德国文坛内部暗地里不和的引人注意的文献。不过，在他的一切作品中，他既从否定的破坏方面着笔，他自己也感到不愉快，他时常对我声言：他对我的描写创作的天真无邪的癖好既羡且妒，他以为这种癖好是源于对于描写对象和自己模拟出来的文艺作品之喜爱而来的。

此外，如果他不感到从事技术和商业工作也有不可遏止的冲动，他的文学的业余嗜好与其说会耽误他，不如说有益于他。因为，当他一开始诅咒自己的才能，又愤恨自己的天才不能满足自己创作的要求时，他便时而舍弃造型艺术，时而抛弃文学，而立志从事那既可赚钱又很有趣的工商业去。

此外，在达姆施塔特城还有一班很有教养的人。枢密院顾问官冯·赫西①、彼得森教授②、温克院长③等等是世居达姆斯塔特城的人，许多从邻地来的学者和旅行过境的名人，轮流地加入他们的高贵的行列中。赫西夫人和她的妹妹佛拉克斯兰（Flachsland）小姐是罕见的德才兼备的妇人，后者是赫尔德尔的未婚妻，既有优良的品德，而又跟那样卓越的人相爱，更两重地惹我注意。

这一班人物怎样鼓舞我，促进我，真是一言难尽④。他们

① 冯·赫西（Andreas Peter von Hesse，1728—1803），1770年任枢密院顾问官，其后任大臣。

② 彼得森（Georg Wilhelm Petersen），达姆施塔特某伯爵幼子的教师。

③ 温克（Helfrich Bernhard Wenck，1739—1803），达姆施塔特城师范学院的院长。

④ 歌德是于1772年3月第一次到达姆施塔特城访问的。

喜欢倾听我朗诵我的已完稿的或在执笔中的作品，当我公开地和详细地讲述我的腹稿时，他们鼓励我，当我因为新的诱因而搁笔不把以前着手过的作品写下去时，他们更责备我。《浮士德》的构思已有些进展，《葛兹·冯·伯利欣根》①的构想也渐渐完成。十五六世纪的研究仍继续着，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在我心里留下很庄严的印象，很可用来充当这样的诗作的背景。

关于德意志建筑术的论文

我关于大教堂的建筑艺术的设想和描想，曾拉杂写下来。就中我主张最力的，就是：第一，我们应当称这种建筑为德意志式，而不是哥特式，不是外来的，而是国粹的；第二，我们不应当把它来与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术相比较，因为它的形成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原理为依据。如果这个大教堂是建筑在和风丽日的天空下，以圆柱来支持屋顶，那么它自身自会为有空隙的墙壁所围了。可是，我们北国的人，既必须到处绕以厚壁来御寒，所以，天才的建筑家设法把厚大的外壁弄到有种种花样，从外表看来象是有孔眼那样子，打破全体的单调，使观众对那巨大的平面产生优美之感，那是值得我们敬服的。这个道理也可应用到塔的方面。那个塔不是象圆顶阁那样，在内部作成穹窿之形，而是要在外部向着天际高插，并且要使设在它的底层的至圣所的存在，传达给远远的周围的地方知道。至于这个可贵的大建筑的内部，我只敢以诗的观点和敬虔的心情来谈

① 《葛兹·冯·伯利欣根》于1771年开始动笔撰写。

论了。

这个见解之有相当的价值，我自己也不想否认，如果我肯以好懂的文体把它清楚地准确地写出来，那么，我后来出版的《德国的建筑术与冯·斯坦巴哈》① 一小册子在当时，就会引起更大的影响，而使祖国的爱好艺术的人早加注意了。然而，为哈曼（Hamann）和赫尔德尔的榜样所误的我，却把这样十分单纯的思想和观察埋没在异样的文字，瑰奇的词句的五里雾中，使自己接触到的光明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都受障蔽而朦胧不可见。虽然是这样，这本小册子还受人欢迎，并且再收入赫尔德尔编的《德意志的特性及其艺术》之中出版。

《圣经》的研究

这样子，我一方面出于自己的爱好，一方面为着作诗及其他的目的起见，很热烈地研究祖国的古代美术，并努力作形象的思维，可是，同时，我又因为《圣经》的研究和宗教上的共鸣，而时常分心。而且彪炳于十六世纪中的马丁·路德的生涯和事业自会不断地引导我作《圣经》的研究，以及对宗教的感情与意见进行探讨。主张圣经为汇编成书，逐渐形成，由各时代加以修订的典籍之说，很能取悦于我的幼稚的自负心，不过，这种新见解在当时还没有占优势，在我所亲交的友朋中更受怀疑。以主要的内容而论，我赞同路德的译文，以个别的细

① 《德国的建筑术与冯·斯坦巴哈》（《Von deutscher Baukunst D.M. Erwini a Steinbach》），于1772年9月出版，当时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也没有出版地点。

端论，我欣赏斯密特的直译，并且想尽可能让我的一点点的希伯来语知识在这里头派用场。《圣经》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今已没有异议。人们却试图以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是把那些最明确的部分当作基础，而设法使那些意义欠明了、和前者矛盾的部分与前者协调。反之，我自己却想加以检视，找寻出哪些地方最明白地表达事物的意义，只重视这些地方，而把其余的视为后人插进去的伪作加以摈弃。

其实，当时我已确立一种基本的见解，而不晓得这种见解是否从别人灌输给我，或由别人激励而产生，抑或源于自己的深思熟虑。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即是，凡是流传给我们的东西，特别是以文字流传下来的东西，最关重要的，就是它的基础，它的核心，它的意义和它的倾向，它之所以为本源的，神圣的，有积极作用的，不可侵犯的和不能磨灭的，正在这个地方。所以，无论甚么时代，甚么外来的影响和条件，都不能毁损这个内涵的本质之毫末，至少也不能象肉体上的疾病之能伤及美好的灵魂那样。那么，语言，方言，特性，以至著作都应视为一种精神的产物的形骸，这个形骸虽与内蕴有密切的关系，但仍不能免于被恶化，被败坏的危险。其实，无论哪一种流传下来的东西，在性质上总不能完美无疵地传下来，即使完美地传下来，无论在甚么时代也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本来的面目，前者的不可能由于流传的媒介物之不完全，后者的不可能是因为时代、地方的不同，尤其是因为人类的能力与思考的方法之相异，同一典籍，所以有许多不同的释义，它们间绝不会有一致，就是这个缘故。

因此，探讨自己所特别爱好的著作的原来的内蕴的东西，是各人自己的事，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著作对于我们自己

的内心有甚么关系，我们自己的生命力为这书的生命力激发和增进到甚么地步。反之，凡是对我们不起甚么作用或成为疑问的外表的东西，我们可委诸批评家之手。批评家纵然能够把全体条分缕析，剖解无遗，但绝不能毁损我们牢牢地把握着的本来的基础，甚至连动摇我们已抱的信心只一息间也有所不能。

这种从我的信念和直观产生的确信可以适用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切场合，并使人鼓舞，而且成为我的道德的生活和文学的生活的基础，纵然在个别的场合被引入迷途而运用错误，但可视为一种安全地投下能增殖丰富利润的“资本”。我抱着这种观念，才真的能够领会《圣经》。象受新教的宗教教育的一般人那样，我把《圣经》反复读过好些回，或从头到尾，或从尾到头，飞快地通读。《旧约》的粗犷的自然味，与《新约》的优美的单纯味使我处处都为所吸引。我虽不曾一度好好的领略它的全体，但是对于彼此相异的各书今已不再因为它们的不同的特点而迷惑了。我能够如实地依次把握和看出各书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我的感情与《圣经》拉的太紧了，它已成为我的不能或缺的东西。恰恰是在这感情的方面，我不为任何的《圣经》嘲骂者所动，马上就识破他们的卑鄙伎俩。我不独憎恶他们，而且会愤怒起来。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初读伏尔泰的《扫罗》[①]的时候，我为小孩似的狂怒所激动，心里想，如果他落在我手内，便要绞杀他。反之，对于一切的笃实的研究，我非常抱有好感，东方的地理与风俗的阐明，既愈益昭示《圣经》的真相，我更乐于接受，并进而以《圣经》所包含的有价值的传说来锻炼我自己的识别力。

---

① 《扫罗》是伏尔泰著的戏曲，它嘲笑《圣经》关于大卫王的记述。

读者已经知道，我以前怎样想阐明《摩西第一书》所描写的原始世界的状态。现在我既想顺序地一步一步的进而研究，所以，中断了很久之后，又拿起第二书来读。可是第一书第二书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呀，恰象丰富多彩的童年正从我的生命逝去那样，我也觉得那第二书与第一书之隔着很大的鸿沟。第二书中有一句不大重要的话已表达出它怎样把过去全然忘却："于是在埃及有新王即位。他一点也不知道约瑟，"不只是埃及王，就连象天空的星辰那样无量数的繁衍下来的民族也差不多忘了他们的祖先。然而人类的这样的繁殖却正是耶和华在星空之下对他们祖宗许下的诺言，到这时才实现的。我以难以名状的辛劳，不充分的工具和精力，把五书细读过，结果却突生一奇想。即是，我相信发见了，那《十诫》不是刻在石板之上，以色列族之跋涉荒漠不是经历四十年的岁月而只花费短时间。由是关于摩西的性格，我也自以为可得到一个崭新的启示。

在我的检视之下，即便《新约》也有问题，对于它，我的分析、研究的兴趣也不肯放过，但是，由于对《圣经》的爱慕和癖好，我却赞同那句有教益的话："《福音书》的著者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只要不与福音矛盾就成了。"即在《福音书》的领域内我也自信有种种的新发现。在五旬节传授的辩才的故事，本来是很丰富多彩而又生动的，我却用一种晦涩的文体加以说明，因而不能博得多数人的赞同。

认为罪恶的倾向在人类中占优势之说为路德宗的主要教条之一"兄弟派"(Brüdergemeine) 更予以强调，我也想适应这种教旨，但没有多大的成功。不过，我仍能相当熟练地运用它的用语，并曾假作乡村牧师致新任牧师的一封信，插入这种用语。这信的主题却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即"宗教上的宽容"；

在当时的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当中，这种思想靡然成风。

这些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渐积渐多，为欲公诸于世起见，我在后一年（即1773年初）自费把它们付印①，送交——或不如说赠给——爱森堡书店，让它们尽可能地在社会上零售，而自己当然得不到甚么报酬。关于这小册子，当时有些批评发表，或加赞赏，或加反对，但这些反响不久都被遗忘了。我的父亲把这小册子小心地保存在他的档案库中，否则我后来连一册也不会留存下来了。我想把它连同其他还找得到的未付印的同类的杂稿，附在新的全集之中。

哈 曼

我之以玄秘的文体来写这些小论文，并拿来出版，本是受了哈曼②的影响，因此，我以为现在正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把这个可敬重的风靡一时的学者叙述一下。他对于祖国老是一个神秘之谜，对于当时的我们也同样玄秘不可解。他所著的《苏格拉底回想录》③轰动一时，而对于眩惑人的时代精神抱反感的人特别地欢迎它，从这书可以隐约感到著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深奥的思想家，谙于世情及文学，同时又承认世界中有某种神秘的、难以探究的东西之存在，而他又以戛戛独造的文笔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固然，支配当时文坛的作家们把他看做幽玄的梦想家，但是有向上心的青年不由得不为他所吸引，即使

① 包括歌德的《东西方诗集》、《沙漠中的以色列人》等。

② 参见第十卷"与赫尔德尔分手"一节。

③ 《苏格拉底回想录》（《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1759年出版。

那些称为“国内宁静派”（die Stillen im Lande，他们半开玩笑地，半认真地得到这种称呼）、不属于任何宗派而隐然形成一个教会的敬虔的信徒们，也注意到他，在我所亲交的克勒敦堡女士（见前）以至她的朋友冯·莫塞①的眼中，这个“来自北方的波斯僧”也是一个可欢迎的人物。更有一事使人们好与哈曼接近的，就是他们听见他为贫困的家境所苦，而仍能抱持这样的崇高的人生观。他现在既得到当宰相的冯·莫塞的崇拜，仗着他的权势，这个恬淡的学者获得相当富裕的生活当不是难事。人们为此已安排好，彼此间也很好的谅解，以致哈曼不辞长途跋涉，从柯尼希堡跑到达姆施塔特来。但是他到那里的时候，冯·莫塞偏巧有事外出，这个畸人不知因为甚么缘故马上转回去，但他与冯·莫塞之间仍继续作友谊的通信。我还藏有他从柯尼希堡给他的恩主的两封信，很可以征见写信的人的异常伟大和诚挚的品性。

可是，这样的良好的关系是不会持续多久的。这些敬虔的人以为他也抱与自己同样的敬虔主义，他们把他看作“来自北方的僧侣”那样崇拜他，希望他也继续表现出可尊敬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期待是被辜负了。他所著的《云——苏格拉底回想录的结语》已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之感，后来，他竟印行《语言学者的十字军远征》，不独在这书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带角的森林牧畜之神的山羊的脸孔，而且在前头几页的木版插画中，有一个大公鸡做乐队的指挥者，在它的前面，站着许多的小鸡，爪里拿着乐谱，整个画面极为滑稽可笑，据说这画是作者来嘲笑自己不喜欢的几种教会乐。因此，在善良温和的人们的

① 关于冯·莫塞，参阅第二卷“对我有影响的法兰克福的一些人物”一节。

心中便产生一种反感。这事传给著者知道，他没有因此反省。于是他与这些人的亲交便中断了。可是，我们青年人对于他的关切，借助于赫尔德尔而总是保持着。赫尔德尔与他的未婚妻和我们继续通信，凡是这个可注意的学者有什么新的言论，他即在信里报告。有时，出现在柯尼希堡新闻的他的著作批介也录给我们看，在这些东西里可征见作者的极其奇特的性格。哈曼的著作我殆收藏无遗，其中还有他论赫尔德尔的应征论文《语言的起源》（1722年出版）的可注目的手稿。在这篇东西里头，他对于赫尔德尔的试论，以极特异的文笔和敏锐的眼光加以阐明。

我至今还希望哈曼全集之印行，或自己主编，或至少由我促进其事。只当这些重要的文稿再度提供于读者大众之前的时候，然后才可以较深切地谈论著者的本人以及他的性格和品行。不过，在这事未实现以前，我还想在这儿略加论述。况且有一些同样敬服他的卓越的名人还活着，我更喜欢由此得到他们的共鸣和指正。哈曼的一切的主张思想可以归结到下录的原则，即是："凡是一个人自己承担要做的事，无论是以行动或言论或其他手段去完成，必须拿出全部力量集中使用，凡是零敲碎打、分散割裂的行动都不足取。"这诚然是金石良言！但是要依着它去做可不容易。在生活和艺术方面也许可以适用，可是用语言文字传下来不是纯粹诗的构造的东西，很难适用这格言。因为语言文字而欲表白事物，就必须从全体分离，必须个别化。人类在说话的那一瞬间定然是偏于一面的，没有哪一种信息的传达，知识的传授是不分散割裂的。可是哈曼无论甚么时候都反对这种分割，自己总是统一集中地来感觉、想象、思考，并且也要这样子讲话，还期望别人也这样子做。因此他

必然会与自己的文章、以及他人所有的著作冲突了。为要实行这种不可能的事，他采用把握种种的因素手段：自然与精神冥冥中会合时的最深奥神秘的直观，从这种会合迸出的光辉的悟性的电火，在这样的境地浮现出的意义深远的形象，圣凡的作家的金石良言，加上偶然出现的幽默辞句——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文章的奇妙内容的全体。读者既不能在思想的深度上与他接近，不能在高处与他共步，不能把握那些浮现在他面前的异常的形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又不能找出他仅仅暗示的段落的准确意义，所以我们越研究他，便愈感到模糊昏暗，而且这种暗昧随岁月而俱增，这因为他的讽示主要与当时文学和生活中流行的某些特色有关。在我搜集的文稿中，有几篇他的已付印的文稿，他在页边亲手标明他所引用的段落的出处。如果把他所注明的原文翻查一下，便又发见意义暧昧，这种朦胧之趣虽然使我们感到很舒服，但是普通所谓“理解”一事，绝不能希望从他的著作中获得。所以，这种文章该称为神巫的语言，这因为不能从它的本身去理解它，读者必须等待到一个机会来临，在那时才乞灵于他的预言。每一回翻阅他的著作，读者每一回都似乎领会到一点新的东西，这因为寓于每一段落的多方面的意义却随场合的不同，而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触动我们，激发我们。

我从没有与他有见一面之缘，也没有跟他直接通过书信。但是在我看来，他是极瞭然于生活关系和友谊关系，并且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估价。我所看到的出自他手的信札，都很优美，比他的文章清楚的多，这因为信中对时代，对环境，对人的关系都说得清楚些。不过，从他的信，我以为很可以看出他极其率真地意识到自己的才智的优越，无时不自视

为比受信人聪明睿智一些，因而对后者的态度缺乏热情而近于讽刺。也许他只在这些信中才有这种态度，但是，这总是使我从不企求与他亲近的主要原因。

赫尔德尔的新任命

反之，在赫尔德尔与我们之间，很愉快的文艺通讯极其热烈地继续着，只可惜这种交往从不能风平浪静地、径情直遂地维持下去。赫尔德尔在信中也不免带有揶揄叱责的话。默克经不起，稍一受刺激就生气，后者又曾煽动我的不耐烦情绪，因为这时赫尔德尔在一切作家和人物中最敬服斯威夫特，所以我们替他起个诨名，唤做主任牧师①。因为这个绰号，我们中间又发生种种的误会和不快。

虽然是这样，当他任职比克堡②的消息传来，我们都非常高兴。这个职位给他两重的光荣：这因为他的新恩主③虽以畸人著称，而同时以明智果敢博得好的声名，托马斯·阿比特④曾任同一的职务而享盛名，他之逝世，举国同悼，他的恩主为他建纪念碑一事，国人又引为欣慰。现在，赫尔德尔要继早逝的阿比特之后，来实现他的前任所引起的世人的喁喁的期望了。

从那时期看来，这种任命是具有两重的光荣和价值的，因

① 因为斯威夫特自1713年以后任爱尔兰都伯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的主任牧师。

② 比克堡（Bückeburg），是利珀（Lippe）伯爵领地的首都。

③ 新恩主指利帕-绍姆堡（Lippe-Schaumburg）的威廉伯爵。

④ 阿比特（Thomas Abbt，1738—66），哲学的通俗著述家，比克堡的名誉牧师。

为德国的好几个领主已学利帕伯爵的榜样，不独任用有学问和善于经营业务的干才，而且还招聘才智横溢，大有前途的人物。其中显著的一例，就是克洛普斯托克（见前）为巴登侯爵卡尔①所聘不是让他奉职服官，而为的是使上流人士得接其风采，受他的高雅的举止的熏陶和取得裨助。卡尔侯爵平素对于一切有益的优美的事物都加注意，这回的举动更增进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同时，克洛普斯托克的声价也增加不少。出自他笔下的一切是仁爱和高贵。我们一得到他的短诗和挽歌，便仔细地抄下来。因此，一听见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大公爵夫人加罗莲娜把他的诗集印出来，我们便非常欣慰。诗集印数很少，其中一部幸而到了我们的手里，这使我们旧有的手抄的诗集增补齐全了。对于我们，克洛普斯托克最初流布于世的诗，历久还是最可珍视的，就是后来作者自己摈弃的作品，我们吟读起来还是感到快慰。这是真的，从一个美丽的灵魂迸流出来的生命，愈少受批评的影响，不受艺术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只会更自由地发挥它的感染力吧。

克洛普斯托克藉着他的性格和行为，能够替他自己以及别的多才多艺的作家赢得尊敬和荣誉，而他们的家境的维持和改善也有赖于克洛普斯托克之力。事情是这样的，向来的书商主要地以出版有价值之科学专门书和销售常备的出版物为业，对著者的报酬不多。可是诗的著作的印行视同一种神圣的事业，如著者受书肆的报酬，或请求增加，差不多被看做犯了“买卖圣职之罪”那样了。著者和出版者处于极奇异的相互关系中。

---

① 巴登侯爵卡尔（Karl Friedrich von Baden，1728—1811），于1774年聘请克洛普斯托克到其首都卡尔斯鲁厄来，其职位与宫廷顾问官相当。

两者因人们的看法的不同而互为庇护者与受庇护者。著者方面，除了著作上的才能之外，通常被目为极有道德的人物而受公众的尊敬，在知识界拥有优越地位，自觉其著述上的勤劳得到成名的报酬，出版者方面自甘居于著者之次，而赚取可观的利润。可是，富裕的资财使书贾实际上凌驾于穷诗人之上，由是，极其美满的均势关系便形成了，几方面彼此表示慷慨和感恩的佳话并不罕闻：书商布赖特科普夫和作家戈特舍德（见前）一辈子都亲切如家人。书商的吝啬和卑劣行为，特别是盗印出版物的行径，在当时还未流行呢。

然而，在德国著作者中却产生了一个运动。他们把自己的虽不是贫困也是寒素的生活景况与有名的书贾的豪富生活比较，他们想起象格勒特、拉宾纳（均见前）那样的作家，纵然享有盛名，他们的物质报酬还是那样的少。一个为全国爱读的德国作家，如果没有别方面的收入来弥补一下，便只好在穷乏的家境中挣扎。因此，就是中流以下的作家也热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脱离出版商而独立。

克洛普斯托克的《学者共和国》

这时克洛普斯托克乘机奋起，预告他的《学者共和国》①的出版，征集预约。纵然他的名著《救世主》②的后

① 《学者共和国》（《Gelehrtenrepublik》），全名为《德意志的学者共和国，它的建立，它的法律等等》，第一部于1774年在汉堡出版，1773年6月开始征集预约。应征者三千多人，歌德和他的妹妹都预约订购。

② 《救世主》的上半部1—10卷1748—49年出版，下半部的第11卷1773年开始问世。

半，因为内容和它的处理的关系，不能象本身纯洁无邪而又在纯洁无邪的时代出现的第一部那样，产生极好的影响，但是著者藉着许多的优美的小诗之出版，仍能打动许多读者的心神、思想和感情，读者对于他的崇敬依然不变。因此，他募集预约时，许多崇拜他的人——其中还有一些显宦名流——踊跃应募，缴纳预约费金“路易”一枚，这钱其实不单是支付书的代价，而实是趁此机会来报酬著者对于祖国的功绩吧。应募者争先恐后，连那些平素没有多少钱花的青年男女，也解囊预约了。男的，女的，上层的，中层的，都醵金来赞助这个神圣的出版计划，应募者之数恐怕在千名左右。他们的期待极度的紧张，他们对著者的新作的信赖，无限的大。

其后，这书的出版得到空前的异样的结果。它诚然有很大的价值，但决不是投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著者关于诗和文学的见解，以古代德卢伊得共和国① 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论区别真假文艺的原则，以极简洁的格言式的话来表达，因此，许多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却为奇特的文体所牺牲了。固然，对于著述家和文学家，这书是有不可估量的永久的价值的，然而它的积极影响的范围也只限于这些人吧。凡是自己能思考的人，会接受他的思想，凡是知道怎样去寻求和尊重真理的人会从他的严肃、真诚的态度得到启迪，不过业余爱好者，一般的读者，却从这书得不到什么教益，它仍是一本难以索解的天书。可是，这书终于到了一切预约者之手了，他们各人本来都期望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著作，但大多数人所得到的却是味同嚼蜡，对他们毫无

① 德卢伊得（Dzuide），古代日尔曼民族的克勒特（Kelte）的僧侣的名称，他们结成了自治教团，以研究学问以至医疗、占卜等。

意义的东西。一般读者都为之愕然失望了，不过，他们对著者既然十分尊敬，因此公然的不平之鸣固然没有发生，连喃喃的怨语也听不到。青年的男女们忍受着他们的损失，把这种以高价得来的书开玩笑地送给他们的朋友。我也从这一些善良的女朋友那里得到几本，可是它们全都散失了。

这种对于著者虽算成功，对于公众却是失败的计划，有坏的影响，公众对于预约的应募有一段时间已望而生畏，但是，这个愿望还是太普遍了，这种做法少不得还会重试。现在，德绍城的书贾自己进行大规模的预约募集，学者与出版商结成紧密的关系，卖得的利润由双方适当地分配。因为世人们久已迫切地感到这种需要，这种办法再受到他们的欢迎和信赖，应募者很多，可是他们的信赖不久又失掉，这因为著者和书贾努力合作了一些时候之后，又散伙了，双方都受了损失。

可是，乘着这个机运，文艺爱好者间的迅速地互通声气，互相联络已得实现。《文艺年鉴》①把一切青年诗人都结合起来，杂志又把诗人与其他的作家联系起来。我的著作发表慾非常的强，不过一旦发表出来之后，我又觉得无所谓，只当我在社交的结集中，在他人面前回忆起我的旧作时，我这种发表慾才再发动。有好些朋友对于我的大小作品起共鸣，因为我总力促那些多少喜欢创作和也有这种能耐的人试行独立地写作，自行其是，而我同时也为他们的努力所淬砺，不断从事于新的散文和诗歌的写作。这样子的互相鞭策、鼓励，有时虽逸出常轨，但给予每个人自己以兴高采烈的影响，这种激动和创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与和取，是许多青年以自由豁达的心

① 《文艺年鉴》（《Musenalmanache》），1770年创刊。

地，不须甚么理论的指导，凭着各自的天性，没有顾忌地干起来，而那个毁誉不一有名的文学时代（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译者）也由此诞生。一班青年的天才作家，象他们那样的年纪，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勇敢和自负心活跃着，藉着他们的才能的发挥，作出许多可喜的好事，他方面又因为他们的才能的滥用而引起许多不快和弊害。关于这种新机运产生出来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描写，正是本卷（十二卷）的主题。

可是，如果青年没有爱来赋予他以活力，没有热恋的情节，不管是悲欢离合，在他的心中活跃，那么，他到哪里可以寄托他的最高的情趣，他在同辈人中又怎样可以惹起情趣呢？我暗地里惆怅着已失去的爱情，这种悲哀使我温柔宽容起来，在从前我对人毫无抱疚于心的美好日子，我象野马那样奔放不羁地逞我的个性，现在比起那时来，在社交界中我较为和蔼可亲了。

浪游者的暴风雨之歌

弗里德莉克对于我的向她诀别的信①的复书使我的心碎了，在这信里头我看见那同一手笔，与从前培养起来倾注于我的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感情。我这时才第一次感觉到她所遭受

① 歌德1771年8月回到法兰克福之后才给弗里德莉克写诀别的信。到1773年10月，歌德托萨尔茨曼捎给弗里德莉克一本《葛兹·冯·伯利欣根》的样书，此外，他附言：“可怜的弗里德莉克从这书得到一些安慰，而把负心人忘掉。”1775年他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时也没有去看望她，只是到了1779年才去看她。

的损失的严重，总找不到弥补它、甚至减轻她的痛苦的办法。她始终在我的心目中出现，我老是觉得我是失去她了，最糟的，就是感到这回的不幸是由于自己的不可饶恕的薄幸。格丽琴是给别人逼走，安妮德是她自己抛开我，而这回却是我破题儿第一遭要负疚了。我创伤了那最美好的心，直刺到它的最深处，这样子，一种享受惯了的欢畅的爱情失去之后，阴郁的懊悔的日子是极苦痛的，极难堪的。可是人总得活着，我为排解自己的苦闷起见，真诚地替别人帮忙，他们有困难，代为解决，有爱侣要拆散的时候，便设法帮他们结合，不使他们也陷于与自己同样的苦恼。因此，人们惯称我为“可靠的心腹朋友”；又因为我常在附近一带踯躅、漫步，给我一个“浪游者”的绰号。其实，那时候我只有置身空旷的地方，山谷中，山岗上，田野森林之间，心境才得宁静，而法兰克福城介于达姆施塔特和霍姆堡之间的位置，更有助于我这种以漫游自遣的方法。达姆施塔特和霍姆堡是两个讨人喜欢的城市，因为双方的领主是亲戚，两地也保持亲睦的关系。我过惯了路上的生活，恰象信差那样惯往来于山岭和平原之间。我经常一人独自或偕同伴侣踏遍我的故乡法兰克福城，好象它同我极陌生的那样。有时在法尔街的大旅店吃饭，饭后又继续的蹓跶。我那时之好与广大的世界和自然为伍，为以前所未有。在途中，我随时唱出奇特的颂歌和《酒神之歌》（Dithyramben），其中有一首唤做《浪游者暴风雨之歌》①，今仍保留下来。因为在途中碰着可怕的暴风，无从躲避，我便热烈地吟咏出这首语无伦次的诗来。

---

① 《浪游者暴风雨之歌》（《Wanderers Sturmlied》），作于1772年4月。

我的心已无所动于中，也无牵挂，只为天良所驱使，极力避免与女人接近。因此纵然有一个深情欸欸的“守护神”秘密地在我的周遭飘游着，懵然不加注意的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一个温柔可爱的妇人① 暗地里对我倾心，我看不出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越显得欢畅、娴雅。过了好些年，到了她逝世之后，我才知道她这种秘密的神圣的爱，大为震悼。但是我在道德上于心无愧的，可以纯洁诚实的心来伤悼这个清白无辜的女子，而且在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幸而我正收拾一些闲情，一心为自身和精神上的追求而活着的时候，我更感到自己的哀悼是一片真诚。

但是，当我因为与弗里德莉克的诀绝而痛苦不安的时候，我又照从前的老法子，乞灵于吟咏。我继续把我的忏悔寄托于诗歌上，俾能以自责自苦的惩罚来得到内心的赦免。《葛兹·冯·伯利欣根》和《克拉维戈》（Clavigo）② 两诗剧中名唤马丽的两个女性，以及那两个做她们的情人的薄幸郎，可以说是我这种忏悔的反省的产物。

滑　冰

可是，正如少年时期的创伤和疾病之迅速痊愈，因为有机体的不健康的一部分组织为健康的部分所替代，使前者有时间来复元那样，我也幸得有许多机会从事种种的体育运动，这给我精神上很有利的影响，我便受种种刺激而再恢复元气，重尝

① 歌德在这里指的是怎样一个妇女，姓甚名谁都不详。

② 关于《克拉维戈》一诗详见第十四卷。

生的欢悦和享乐。从前我是踽踽地，怅惘地，忧郁地，而又缓缓地、无目的地随处漫步，现在却渐渐代以骑马驰骋了。乘马出游，可以比较迅速而又愉快舒适地达到目的地。比我年轻的朋友们再提倡练习击剑。特别是入了冬，一个新的天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我突然下决心去学我从未尝试的滑冰游戏。不消几天，我通过练习、思索和坚持，虽不希望滑得胜人一筹，也能够做到可以在冰场上跟欢乐的朋友们一块儿滑走如飞了。

可是，我们这种新的娱乐的享受，也是有点受克洛普斯托克之赐，他的私人书简证实他热心助人作这种有益的运动，而从他的颂歌看来也证明他自己也爱好它。我到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晴朗的霜晨，我从床上跳下来，高唱出他的诗的两节来：

健康之感使我的心喜悦，
　　在遥远岸边覆着晶莹的冰，
　　　　我使它更踏成白雪。

冬天破晓的曙光
　　照亮了温柔的湖，
　　　　夜撒满了象星辰般的璀灿的霜在它上面。

我不再迟疑犹豫，决心马上立下来了，立即飞跑到滑冰场去，在那儿，我认为一个象我那样的年纪的初学者也可以相当熟练地试行初次练习。不错！体力这样的锻炼的确很值得克洛普斯托克的称赞。到了滑冰场来，可与少年人接触，而熏染他们极清新之气，青年人的关节可以在滑冰时充分的屈伸自如，而衰老的硬化状态也可以预防。我们对于这种消遣也耽好无

度。一个晴和的星期日在冰上消磨一个白天还不满足，我们一直滑到夜深。其他剧烈的运动会使身体疲乏，可是这种运动会使我们的新劲头不断增加。圆圆的月亮从云端出现，遍照着冰冻的夜的原野，呼呼地吹来的晚风，迎着滑走中的我们，因为河水减少而崩落的冰的雷鸣似的深沉的声音，从我们的滑动发出来的异样的回响，这一切使奥西安①的诗所描写的光景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会这个朋友，一会那个朋友以朗吟的声调有节奏地唱出克洛普斯托克的颂歌来，当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聚在一块时，我们对那个最先推荐这种游戏给我们，给予我们快乐的克洛普斯托克一齐高唱真诚的颂歌：

他替我们发现健康和喜悦，
　驰骋的骏马绝不能有那样效力，
连跳舞会也比不上这种成绩，
　难道他还不是不朽不灭？

一个人能以精神的鼓舞把一桩世俗的事高尚化和使它流行和受到欢迎，是值得我们这样感谢的。

这样子，正象富于天分的儿童，很早已养成他的杰出的才能，一有机会便再致力于极单纯的小孩般的游戏那样，耽于这种运动的我们，已把我们的正经作业忘个干净。不过，这种经常独自做的运动，在茫然不定的空间飘飘然滑转，再激发了我的久已潜伏的种种内心的热望，我以前的创作的计划之所以能较迅速地实现，实在受这种体育运动之赐。

---

① 奥西安是三世纪古苏格兰的克勒特族的诗人。

高等法院的历史

我的求奇心和想象力一向为德国史的黑暗时代（十四五世纪）所吸引。把葛兹·冯·伯利欣根和它的时代环境戏曲化是我的极喜欢和珍惜的夙愿。我孜孜不倦地研读关于这时代的主要著作，而达特(Datt)的《论国内治安》(De pace publica)尤为我致力的所在，我埋头钻研它，尽可能地在脑中想象出其中的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这种苦心的研究本基于道德的和诗的意图，但也能在别的方面应用。不久我要有韦茨拉尔①之行，在历史的知识上我已有充分的准备，因为那个高等法院②的产生是《国内治安协约》③的结果，而关于它的沿革史的研究可以用作贯串德国史上的错杂纷纭的事件的重要线索，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如果对法院和军队的体制了解清楚，就能精确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性质和制度。财政虽被视为国家的重大要素，但比起法院和军队来，却远乏考究的价值。因为如果国家财政拮据，它就设法从个人征收他的辛劳地挣下来的钱，国家便经常有钱了。

我在韦茨拉尔的见闻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可是，如果读者

---

① 韦茨拉尔（Wetzlar），帝国直属市之一，帝国高等法院的所在地。

② 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是1495年凯撒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一世建立的最高司法机关，初时设在法兰克福，1693年以后设于韦茨拉尔，1806年撤销。

③ 《国内治安协约》（"Landfriede"），为维持全国的和平与公安起见，由各邦的统治者议定的法律协约，最初为1103年在美因兹议定的协约，1495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位时所定者称为永久的《国内治安协约》。

不以高等法院的历史的简略的记述为嫌，从而想象到我到达那里时情况是怎样不妙，那就会发生较大的兴趣吧。

世间的统治者之所以享有优越地位，集于自己身边的最勇敢的人，在平时却靠着最贤明正直的人网罗。在德国凯撒的宫廷中也设有一个特别的裁判所，凯撒巡幸国中时，这个裁判所也总是伴着。可是，无论这种预防设施也好，在南部德国施行的施瓦本法（Schwabenrecht，施瓦本公爵领衔颁行的法律）也好，在北部德国颁行的萨克森法（Sachsenrecht）也好，无论为维护这种法律而设置的裁判官也好，与双方敌对者同身分的人的公断也好，双方协定承认的仲裁也好，僧侣所斡旋的和解也好——这一切总不足以消除那骑士阶级的寻仇好斗乐之不疲的心理。因为德国人这种心理，由于连年的内部的纷争，国外的远征——特别是十字军之役，甚至法院的惯例，而促发培养起来变成习俗。他们这种纷扰使凯撒及其他的权贵非常烦厌，为着它，小邦们彼此间增加了麻烦，如果它们联合起来，连大的邻邦也受威胁，结果德国国内秩序紊乱，对外的战斗力也濒于瘫痪，而且，当时的秘密法庭（Femgericht，《永久国内治安协约》制定后便撤销的司法机关）为德国大部分地方之累，只要我们知道它已沦为一种秘密的警察机关，到最后甚至为少数私人所把持，我们就可明白它是怎样一个暴虐恐怖的组织了。

为要改善这种枉法不公的状态，曾作种种的尝试而没有效果，直至后来议会的各界代表亟谋以自费设置一个裁判所。他们的建议虽基于善意，但是在运用上总是有扩大他们自身的权利，削弱凯撒的权力之势。这事在弗里德里希三世时悬而未决，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即位，为外间的形势所逼，批准这个建议。裁判长由他勅任，议会派出自选的陪审官。陪审

官之数原定为二十四名，初时只有半数就认为够了。

人类计划一事时所犯的一般的过失，也就是这个高等法院最初的而又永久的根本的缺陷：这就是以不充分的人力财力来办大事。陪审官的数目太少了，以他们区区之数怎样能解决繁重和困难的问题呢！其实又有谁急急于把这个法院弄成充分有力的机构呢？这个对于凯撒象是害多而利少的机构，凯撒自不会加以赞助，把自己的裁判所，自己的枢密院充实，似更有理由。至于从领主贵族们的立场考察，他们设立这个机构的本意，只在于止血，伤口痊愈否，他们便不大理会了。而且这个机构又要一大笔的新经费！这个机构之设立曾使每个领主的臣下之数增加，他们初时不大了然，事实上却是如此，这个机构虽为一定的目的而设，可是就是为了必要的事情，谁高兴出钱呢？如果每个人需要什么，都有求必应，那就谁都满意了。

初时，陪审官要靠诉讼费生活，其后由议会给予定额的俸给，两者都是微薄得很。可是，为了满足这种明显的需要，也找到了精明勤勉的和欣然从事的人，法院便建立起来。究其竟，人们是否察知，这样做只能减轻祸害，而不能消除它，抑或他们是否象在类似的场合那样，奢望以小的人力财力来办大事，那就不能决定了。总而言之，高等法院的作用，与其说是为根本地防止坏事而存在，不如说是只是作为惩罚治安扰乱者的借口而存在吧。然而，法院才一度开庭，有一种料不到的权力就从法院自身产生出来，它感到自己的地位之高，它认识了自己具有重大的政治的权威。于是，它力谋以惊人的活动来博得更明确的威信。法院的当局把那些可以及必须从速裁断的事，即席可以裁决或容易裁决的事，敏捷地清理，因此在全国人的眼中，他们象是有效率和令人尊重。可是内容困难的案件

以及真正的诉讼案却仍然搁置着，而这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因为国家所侧重的只是所有权的确定和牢靠，至于所有权是否合法，国家便不那样关切了。因此，后来搁压的案件渐渐山积，而也无关国家的痛痒。对于使用暴力的人如何制裁，法律已有规定，关于他们的处置可以干脆地决定。至于其他的关于所有权的诉讼，就不裁断，任由原告人被告人，如果是活着，或处顺境，或处逆境，都随他们的便，或者死亡，或者堕落，或者彼此和解了，也在所不管。这些遭遇只关系到各人家族的福祸，德意志帝国却渐渐安宁起来。实际上，高等法院是赋有制裁不遵守法律者的法律的特权，如果它再能有发出逐出教会令的权力，它就会更有效吧。

可是后来因为陪审官之数时增时减，裁判权之行使有时中断，它的所在地又屡有变动，搁压的案文卷自然堆积无数。到了与法国的战争开始之时，法院的档案的一部分由施佩耶尔①迁至阿沙芬堡，有一部分迁到沃尔姆斯，其余一部分却落在法国军队之手。初时他们以为虏获了敌国的国家档案，后来发现它只是裁判所的无用的故纸堆，他们就表示，只要有人愿意运走，就乐于把它们打发掉。

其后，当威斯特伐里亚和会②开会时，与会的干练的代表认识到要什么样的杠杆来推动这个艰巨的重荷，结果，陪审官之数增设至五十名，然实际上这个定额从没有达到。人们恐怕费用太大，仍以定额的半数为限。可是，如果有关方面切实地

① 施佩耶尔（Speyer）是巴威略选帝侯的首都，1513—29年为高等法院所在地。

②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会，举行时间为1648年10月24日。

感到法院的存在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话，那是不难实行的。二十五名陪审官的俸给的金额约需十万“盾”（Gulden），照这样子算来，即使两倍之数，德国全国也很可以筹措出来。后来又有人提议没收僧侣的财产来充高等法院之用，但也不能通过。因为天主教派也好，新教派也好，谁肯答应作这样的牺牲呢？天主教徒不愿再有所丧失，而新教徒要把他们的所得用在他们本身的目的上。德国宗教上两派分立，即在这个地方，从种种方面看来，也是产生极坏的影响。议员们对他们自己所设的这个裁判机关的关心日益淡薄，有势力的人欲退出《国内治安协约》，请求凯撒签署免除隶属任何高等裁判所的特许状的日见激增。势力大的延滞不纳其应付的高等法院之费用，地位低的人相信自己在纳款上头给别人欺骗了，也尽可能地缓纳。

因此，法院所需的俸给经费的筹措弄到很困难了。由是，高等法院便产生一项新的任务和耗费时间的事。从前，为处理这事有一年一回的临场视察。诸侯自己或他们的顾问官，隔几个月或几周到高等法院所在的地方巡视，检查金库，了解滞纳之数，担任追索。同时，法律或法院的执行方面发生什么故障，法院有什么滥用职权的行为，他们有权补救、纠正。法院的设施有什么缺陷，他们负有发现和排除之责，但是法院人员等个人犯罪之查究惩罚，到后来才成为他们的任务。可是，诉讼的当事人有一线的希望也总愿把这希望延长到最后一瞬间，因此常重行控告上诉。这些巡视大员便成为上诉复审裁判员，初时，他们再审理的只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案件，其后凡是企求诉讼的拖延，缠讼不休者都到他们那里来，连向国会上诉的事，天主教会与新教会为着彼此保全均势——纵然不是为着互相压制——而作的努力，也要他们管到了。

可是如果我们设想，这个法院没有这种种的故障和这些干扰、破坏的条件时，会有什么成就，认为它会成为一个令人瞩目，十分重要的机关，也不算是过度高估的。倘若一开头就充实以人数足够的陪审官，而他们又保证有充分的俸给，那么这个备有精明能干的德意志法律家的法院就会成为非常有权威的机关。世人会尊称他们为古希腊保护神庙同盟的代表①，虽然只是溢美之词，但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其实，他们还可以一跃而成为君臣之间的一个中间势力，赢得他们两者的尊敬呢。

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大的作用，除了卡尔五世在位和三十年战争以前一个短时期以外，高等法院只苟延残喘地维持下去。世人往往不能索解，怎么也会有人做这样的吃力不讨好的苦事呢。但是人们日常所做的事情，纵然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成绩，只要他们对这事情熟手，还是甘心做下去的。德国人特别能够这样的坚忍，因此，三百年以来，最优秀的人材也委身于这个法院的工作。搜集他们的画像的画廊，至今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和鼓舞我们的勇气。

因为，恰在当时那样的无政府的时代，精明有为的人物便崭然露头角，凡是乐于做好事的人都得其所。例如弗斯顿伯格②做裁判长时的法院，便有口皆碑，流传至今。及至这个卓越的人物逝世后，法院的历史便进入滥用职权的腐败时期。

但是，初期后期的一切的缺陷都源于最初的唯一的弱点：

---

① 保护神庙同盟的代表（AmphiktYonen），古代同盟诸邦派往德尔法的定期会议，充当一种高等裁判的代表者。

② 弗斯顿伯格（Frobenius Ferdinand, Fürst von Fürstenberg）是个侯爵，从1718年任裁判长，直至1721年他逝世时止。

那就是人员名额不足。法院规定陪审官应依一定的顺序和手续出庭陈述。他们各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出庭，以及哪一桩是交自己办的案件，他能够预先为这案件做好准备工作。可是，法院难办的案件数既积压起来，法院便不得不从这些案件中挑出性质较重大的来，要陪审官在规定的轮值时间以外审理。不过，判断某一件案子比别一件重要，在重要的案件蜂涌而来的场合，殊不容易，它的挑选已有厚此薄彼的余地，偏又添上另一桩的事情。即是当审定案件的人以重大复杂的案件自苦和给予法院以困难时，就没有人肯下判决。在其间，原告被告两造或和解了，或搞清楚了，或死掉了，或他们的原意改变了。因此，法院便决定只把那些被当事人催办的案件挑出来审理。如果法院确信当事人依然坚持他们的诉讼，法院的极大的弊端便会被诱发。因为一个当事人要为自己的案件说项，一定要向人请托，而向经手办自己的案件的人请托是最好没有的了。把这种事情保密，使不致有违法的嫌疑是不可能的：因为法院内有那么些的下属共同知道，怎样瞒得住呢？即使要求案件速办，也得求陪审官的人情，因为法官把自己的案件热心的办，就显出他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也许法官自己不出面直接做这桩事，但也会先由下僚经手，而下僚定要赚得好处，因此便导致种种的不可告人的事和贿赂的勾当了。

凯撒约瑟夫① 一半由于自己的发动，一半由于前凯撒弗里德里希的示范，先注意于军队和司法的兴革。他留心高等法院的情况，本国传袭下来的不正当的事，国外来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也瞒不过他的眼睛。他认为这个机关也有予以刺激，撼动和

① 凯撒约瑟夫（Joseph，1678—1711），神圣罗马皇帝。

改革的必要，他不管这是不是对凯撒有利，会不会有良好的结果，提议“巡视”国内，平理诉讼，并赶紧实行。那时没有举行正式的“巡视”已有一百六十六年了，案卷堆积如山，与年增高，因为十七名陪审官连现行的案件也从不能办通呢。积压的案件有二万宗，每年只能清理六十件，但每年却新添了两倍之多。等待巡视大员来复审的也不少，据说有五万件之多。而且，种种的弊端阻碍裁判的进行，但是最为难的就是陪审官个人的暗中舞弊渎职的行为。

韦茨拉尔的滞留

当我要到韦茨拉尔去的时候，“巡视”已从前几年起在举行中，被控告者停职，审理进行得很快。因为这时正是德国国法学者和专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为公众的幸福尽力的千载一时的机会，所以有好些精辟的优良的法学著述出现，凡是多少有点法律入门知识的人，都可以从这些书深受教育。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溯寻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和论究它的典籍，便会觉得很出奇，为什么这个只借着奇迹来苟延残喘的高等法院的不健全的机关，纵是畸形的产物，偏成为学者研讨的最好的课题。这因为德国人的值得敬服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在各种细端末节的搜集和阐明方面多用工夫，而不计及成效，故高等法院便提供给他们以一种无尽藏的研究材料。学者可以从帝国与凯撒的对立上，小贵族与大贵族的对立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对立上加以论述，随着种种利害的不同，而必然意见纷纭，不断地引起新的论争和辩驳。

我既把这一切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尽可能地加以揣摩、想

象，我在韦茨拉尔的逗留自不能期待有多大的乐趣。那儿的景物是不动人的，城市的位置虽好，而规模小，建筑坏，在那见到两重的世界。一个是旧的因袭的本地人的世界，另一个是负有使命把前者加以严峻的检视的外来的新世界，一个任裁判的法院和被裁判的法院。居民中有许多人正提心吊胆，恐怕也会被牵入审讯处刑的法网之内，一些久著声望而受尊敬的人的极可耻的恶行却被揭发出来，且受极屈辱的处刑的宣告。这一切凑合起来使韦茨拉尔市露出极悲惨的景象，司法业务本身已是错综复杂，今因这些恶行而更弄到乱七八糟，引不起人对它作较深入的研究。

韦茨拉尔的骑士团体

我预想到韦茨拉尔来除了德国的民法和国法的研究之外，不会同其他科学有专门的接触，而与一切的信息更是绝缘。可是，略事踌躇之后，我仍然跑到这里来，与其说是知识欲的驱使，毋宁说是出自换换环境的愿望。可是，在那儿我碰到的倒不是面孔阴郁的人们，而第三次的大学生活反突然的在我面前展现，我便觉得很惊异。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饭店的大餐桌上，我碰见差不多全部的公使馆馆员在一块儿吃饭。他们全是快活的青年人，很亲切地接待我。第一天，我已经明白他们每天到这里来吃午饭，以一种浪漫的表演为乐。即是他们各以骑士自居，愉快欢畅地围着一个所谓“骑士之桌”聚餐。在首席坐着大将军一名，他的身旁为宰相，其次为高级官吏，以下是号为骑士的人，依资历的次序坐下，外来者加入这个场合，他必须甘居末座。他们的会话不只使用骑士的话，而且还有许多隐

喻暗讽，外来的人听了大多数瞠目不知所云。每人都起一个骑士的名字和加上一个绰号。他们称我做“葛兹·冯·伯利欣根”，绰号“诚实之士”。我有前者的称号是因为我对于德意志古代的刚直武士的尊敬，后者的称号是因为我对于我在这儿结识的优秀的人士之真诚的爱慕和倾倒。我在该城滞留中蒙受伯爵冯·基尔曼塞格①的恩惠不少。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君子，非常能干和可靠。冯·古埃②是一个难以说明和形容的人物，具有结实肥大的汉诺威型③的体格，沉着自持。他的才能也不失为多方面的。有人猜测他是一个私生儿。他也喜欢做一种很神秘的举动，以种种奇特的外观来隐藏他自己的愿望和意图。他本是这个奇异的骑士联盟的中心人物，而没有觊觎那大将军的席位。当骑士团中的领袖离去本城时，他就愿让别人当选而假手于他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他又能够把许多偶然的琐屑事弄成象煞有介事，并以传奇般的形式来处理它们，可是，在他这种种的举动中，都不显出有什么郑重其事的目的，他所关心的只是排遣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冗长的公务中所必然感到的无聊，以便把那空虚的地方填充一下，纵然只是拿蜘蛛网来布满也是好的。可是，他这种荒唐的滑稽戏，在表面上是极认真地演出来，当他把一个磨坊看做是城堡，把磨坊主看做城堡的领主，把《海蒙的四个孩子》称为经典，在举行某种仪式时，他从那传奇选出几节恭恭敬敬地朗读，会众决不应当作可笑。骑

---

① 冯·基尔曼塞格伯爵（Graf von Kielmannsegg），当时为了诉讼事件到韦茨拉尔来勾留，他与歌德同年辈。

② 冯·古埃（August Siegfried von Goué，1742—89），布朗斯威克使馆的秘书，曾写过几个剧本。

③ 汉诺威为普鲁士的小王国，其居民特有一种体貌。

士的封爵式的举行，是采用种种骑士团所行的传统的仪注。更有一个足资笑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把明白周知的事偏当作秘密来看待，他们公开地做某事，但禁止对他人谈及。全体骑士的人名录印出来，形式的庄严有如帝国议会的年鉴。如果有团员的家人见了这人名录胆敢加以嘲笑和把这整件事情目为荒唐可笑，团员为报复起见，便施展诡计，直至把那团员的一个笃厚的已婚的亲人，或近亲说服了拉到骑士团里来和举行晋封式，那时看见这家的家人们的窘态便感到一种幸灾乐祸似的快慰。

这个骑士团还有另一个奇特的小团体错综其间，那是一个哲学的神秘的小团体，本身没有什么名称。这团体内分为四级，第一级唤做“过渡”（übergang），第二级“过渡之过渡”（übergangs übergang），第三级“到过渡之过渡的过渡”（übergangs übergang zum übergang），第四级“过渡的过渡到过渡的过渡”（übergangs übergang zu des übergangs übergang），把这种等级的高深的意义解释是同人对于新加入者的义务，这种释义是以一本印出来的小册子做根据，在那里头，这些奇异的字眼以更奇异的文句说明，——或不如说更把它们引伸敷衍。他们做这套的把戏是一种极可乐的时间消磨方法。伯里施的傻气和伦兹的悖理，在这儿似乎是合而为一了。我只重复地说一句，这种玩艺儿的背后也看不出有甚么目的的痕迹。

我虽然很喜欢参加这种滑稽戏，并替他们出主意，而且首先从前述的《海蒙的四个孩子》一书中把几节《圣经》摘录整理出来，并提议在举行祝典和仪式的场合应当怎样把它们朗诵，而自己也能加重语气地把它们读出来，不过，我对于这种玩艺儿

已玩厌了。我到了此地来既因怀念失去的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两城的环境而惆怅，我与戈特尔① 的结交便使我非常高兴。他以诚挚的爱慕接近我，我也报以出自衷心的好意。他的性情，温和爽朗，他的才能训练有素，而锋芒不露。他醉心于法兰西人的风雅，而又爱读以伦理和健全的情节为题材的英国文学。我们一块儿消磨了许多欢乐的时间，交流彼此的知识，互相倾吐自己的志向和嗜好。我在他的督促下动笔作了许多小文章，特别是因为他与格廷根城的诗人们有关系，曾替博伊② 的《文艺年鉴》向我索寄一些诗去刊登。

对格廷根的"狂飙"运动的一些看法

因此，我与格廷根的诗人们也有多少的接触，他们年轻多才，彼此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诗人团体，到后来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斯托尔堡（Stolberg）伯爵兄弟（两者均为诗人，详见第十八卷）、伯格③ 、佛斯、赫尔提等等在信仰和思想上都以克洛普斯托克为中心而互相结纳。克洛普斯托克的影响扩展到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日益扩大的德国诗人结集中，除了种

---

① 戈特尔（Friedrich Wilhelm Gotter，1746—97），当时任萨克森-戈塔的使馆秘书，酷爱法兰西风味，改编过法国戏曲。

② 博伊（Heicnrich Christian Boie），是格廷根的《文艺年鉴》出版负责人，直至1774年。歌德恰在那年向《文艺年鉴》投稿。

③ 伯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94）、佛斯（Johann Heinrich Voss，1751—1826）、赫尔提（Ludwig Heinrich Christoph Hölty，1748—76）等人都是1772年在格廷根建立的《诗人同盟》的成员，他们以提倡道德，以爱自由和祖国为己任，在诗歌艺术方面则在精神上重行克洛普斯托克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狂飙突进运动"中人。

种色色文学贡献以外，同时还产生一种特别的精神。我不知道给予这种精神以甚么名字才适当，也许可以称做要求独立的精神（这里指的也是“狂飙突进运动”）。本来，这种欲求是在和平的时代才发生，而人之脱离非独立的状态也恰是在这时候。在战时，人们尽可能的忍受粗暴的强权，纵然感到身体和经济上受到损害，但精神和道义上却没有这种感觉，无论何人也不以被强制为耻，为时代而服役不是丢脸的事，人们从敌我两方吃苦头，已惯之若素，虽有愿望，而没有意见。反之，在和平的时代，人们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越得自由，越更要自由。人们不容忍受甚么的支配，自己不欲被束缚，认为别人也不应受束缚。这种细致、以至带点病态的感情，在善良人的心中以所谓“正义感”的形式出现。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到处都显露、发挥出来，而且正是在只有少数人被压迫的时候，但人们也要从这种偶然的压迫解放出来。由是发生一种对为政者的伦理的斗争，个人对统治权的干预；这种活动在初时虽可称道，但其后却招来非常不幸的结果。

伏尔泰曾为卡拉斯①家的冤案辩护而震动一时，博得人们的尊敬。在德国有一桩差不多更显著重大的义行，就是拉瓦特尔与地方长官格雷伯尔之抗争②。格廷根的诗人的文艺爱好与青

---

① 卡拉斯（Jean Calas）为土鲁斯的大商人，新教的信仰者，他的儿子自杀而死，卡拉斯被诬为愤儿子之改宗天主教，将之杀害，1762年法国曾宣告处卡拉斯以车磔之刑，伏尔泰因出版《信教自由论》（《Sur la Tolerance》）一书，以鸣其冤，要求再审，审议的结果，宣告无罪。

② 格吕宁根（Grüningen）的州知事格雷伯尔（Felix Grebel）压迫人民，处理不公正，拉瓦特尔于1762年向上级政府提出弹劾，要求罢免他，给被害者以赔偿。

年的锐气结合起来，勇往前进。不久以前，人们是为做官而研究学问，这时便开始以官吏的监督者自居。恰好戏曲家和小说家酷好以大臣和官吏作为歹角而描写的时代，已经临近。于是便出现一个一半儿真实，一半儿虚构的弥漫着攻击和反响的世界，后来我们在这世界中亲眼看到极酷烈的讦发和煽动，杂志和日报的记者，为狂热所驱使，以伸张正义为名大肆抨击，加以他们使公众相信他们的议论就是真正的法庭，他们的锋芒更锐不可当。其实，这是愚蠢的想法吧！因为公众没有什么执行权力，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德国中，公众舆论对任何人不会有用处，也不会有害处。

我们青年诗人中虽绝没有为这种值得非难的风潮所波及，但已为一种类似的观念所侵袭。这种概念是源于诗、道德和崇高理想的合流，虽没有害处，但也没有甚么成果。

德意志人的爱国心

当时克洛普斯托克出版《赫尔曼的战役》① 一剧，并在卷头有献给约瑟夫二世的题辞，轰动一时。在那里头，从罗马的桎梏解放出来的德意志民族的形象优美地有力地描写出来，这种描写本很可以唤起民族自尊心的觉醒，可是，在和平的时代，所谓爱国心只是各个国民各守本分，忠于所事，勤于所学，使家家户户同享幸福而已。所以那个由克洛普斯托克所唤起的爱

① 《赫尔曼的战役》（《Hermannsschlacht》）是以赫尔曼为主人公的三部曲，全名为《赫尔曼—塔西佗笔下的阿米纽斯(Arminius)击败罗马人的战役》，1769年出版。

国心情实没有发泄的余地。然而，弗里德里希大王抗拒联合来攻的外国，使一部分德意志人的荣誉得以保存，德意志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有自由，以赞叹和崇拜来分沾这个大王的胜利的光荣。可是，象那样的激起来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却发泄到哪儿去呢？它要循甚么方向和产生甚么结果呢？初时仅采用一种诗体，其后，那种常惹人讥评甚至可笑的巴尔德（Bard，古克勒特族的弹唱诗人）体的诗歌，由于这种冲动和触发，而大批的陆续发表。可是既没有外敌要反抗，人们便虚构一些暴君，各地的君侯和他们的臣僚自成为他们诋毁的对象，初时只笼统地抨击，逐渐更揭发具体的细节，结果，诗人也以激越的态度参加前述的干预司法权的运动。因此，从当时的诗看来，值得重视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排斥一切上层人物——无论是帝王或贵族——的精神。

以我当时而论，我继续用作诗来表现自己的感情和幻想。象《浪游者》①一类的短诗就是在那时期写的。它们登载在格廷根的《文艺年鉴》内。可是，那种爱国热情渗进我心中的影响，到稍后我努力以《葛兹·冯·伯利欣根》一戏曲发泄出来，在这戏曲中，我描写一个生当乱世的善良的勇士怎样决心要代替法律和行政权来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当那些公认的可崇敬的君侯把他看做怀有二心的人，甚至叛逆时，他便陷于绝望了。

因为克洛普斯托克的短诗的出现，德国诗中与其说是添加了北方的神话，不如说流布了种种的神之名。我在别的场合虽喜欢利用那些提供给我的东西，但是我却无意利用这些神名。

---

① 1774年的《文艺年鉴》刊有歌德的《浪游者》、《穆罕默德之歌》等短诗。

理由是这样的：我在很久以前，已从马利特的《丹麦史》①的绪言知道关于埃达（Edda）的故事②，并且马上把它牢记在心。我在社交的席上，为客人所敦促而讲述故事时，这个故事也是我最喜欢讲的。赫尔德尔给我一本勒逊尼阿斯（Resenius）所编写的北方神话集，使我更熟知该地的英雄故事。不过，这一切东西我纵认为值得尊重，也不能收进我的诗作的园地里。它们对于我的想象力虽有奇妙的刺激，但总缺乏真情实感，不是有血有肉，反之，在希腊的神话中，仗着世界伟大的文学家的手笔，神与英雄却绘影绘声，栩栩如生，在我们眼前仍有大量形象活现着。一般来说，在我的作品中神仙并没有登场，因为他们是存在于我所能如实描绘的自然界以外。那么，有甚么能够推动我，使我把沃登③代替朱庇特④，以托尔⑤来代替玛尔斯⑥，舍弃那些描摹得轮廓明晰的南方的形象，而采用北方朦胧不清，甚至只存字音的形象，做我的诗歌素材呢？所以，一方面我能把他们置于奥西安的同样的形体不明的英雄之列，后者只较为粗犷魁梧；在他方面，我把他们归入于快活有趣的童话之中，因为北方神话到处都洋溢着幽默的情趣，是我十分注意和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它有一个唯一的特点，就是它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把奇异的巨人，魔术师和怪物与不可思议的神的派系对立起来，前者一心只想迷惑主宰一切之诸神，愚弄他

---

① 法国人马利特（Mallet）的著作，1755年出版。

② 埃达的故事流传于九世纪至十二世纪，为歌咏神与英雄事迹的故事诗。

③ 沃登（Wodan）是受了埃达神话影响的古德意志神话的主神。

④ 朱庇特（Jupiter）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⑤ 托尔（Thor）是北方神话的雷神，又是农耕的守护者。

⑥ 玛尔斯（Mars）是罗马神话中的军神（战神）。

们，和从背后算计，陷他们于不可抗争的可耻的穷途末路。

印度寓言使我尝到一种与此相似的——纵然不是同一的——兴味。我最初从达珀①的游记知道印度寓言，同样感到很大的兴趣而收进我的童话寓言的材料库中。我最喜欢对人讲述的就是《拉姆的祭坛》②。这个故事中虽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我的听众最喜欢的还是唤做汉纳曼的猿。不过，这里头的奇形的和无形的怪物不能给予我以诗的满足。他们离开我的心所刻意追求的真实太远了。

荷马诗的欣赏

不过，这一切的非艺术的幽灵妖怪，因为我的美的感觉仗着极其高贵的力量的卫护，仍然无损于我。我以为文学的幸福的时代往往就是在过去伟大的作品重露头角，并且风靡一时的时候，因为这时候，这些不朽的杰作会产生完全崭新的影响。恰在那时，荷马的灿烂的光辉也重新映射于我们之前，并且那个时代正极其欢迎这样的作品之流行，所以它的重现恰与时代的精神相吻合；因为人们不断地面向自然的结果，终于影响到我们连古代的杰作也得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象好些旅行家之为《圣经》的阐明而尽力那样，另有一些旅行家为荷马作考证的

① 达珀（O.Dapper），荷兰的医生，著有游记，详细记叙他在亚洲各地旅行的经历，1681年译成德文。

② 《拉姆的祭坛》（《Der Altar des Ram》）即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拉马耶那》（Rama—Yana）中的一篇，以寓言的体裁记述阿利耶族的印度人侵略南印度和锡兰岛的故事，把与前者敌对的土著民族当作猿类来描写，皇子拉马率领善良的猿汉纳曼和猿军讨伐恶鬼拉哇拿，夺回被后者诱拐的妃子。

工夫。荷马的地理考证由格伊[1]开其端，接着伍德[2]又大力继续这一工作，对于当时非常罕见的荷马原著的评论在格廷根之出现，使我们知道著者意图，和明白这个意图实现到甚么程度。此后，我们在荷马的故事诗中不再看见只是紧张浮夸的英雄人物，而认出是远古社会的真相，并尽可能的努力使它同我们接近。可是，同时，有人主张，为要正确地理解荷马所描写的种种人物的性格起见，我们必须知道今日的旅行家所报道的新世界的野蛮民族与其风习，我们对此殊不敢完全赞同。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荷马诗中所描写的欧罗巴人也好，亚细亚人也好，已是达到高度的文化，恐怕比特洛伊战争期间还高一点。不过那种说法仍与当时盛行的时代精神——自然的认识——符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同意的。

这样子，我分心于种种的研究上头去，这些研究，是与在较高的意味上的人类学有关，与诗学也有极密切极惹人兴趣的关系，可是我仍无时不意识到我是在韦茨拉尔逗留。关于“巡视”的情形，它的故障的日益增加以及新的犯罪的发现的话题时时刻刻在我的耳边响着。在这儿，神圣罗马帝国的首脑们再一度聚集，但是，不单为着外表的仪式的举行，而是为着国家的根本大事的处理。我在这儿也不由得不突然想起当年加冕礼举行那天的座位半空着的宴会厅被招请的诸侯，以侍宴为有失体面而留居别室。他们虽又共聚一堂了，但显出更险恶的征象。全体的不统一，各部分的互相倾轧，不断地暴露出来，同

---

① 格伊（Guys）为法国学者，著有《希腊文学史》。

② 伍德（Robert Wood）为英国人，著有《论荷马的创作天才及其著作》，1773年译成德文。

一鼻孔出气的王侯们互相密谈，看能否利用这机会来从皇帝手里篡夺一些权力一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关于官员的荒怠职务，滥用权力，渎职受贿等行为的传说风闻，对于追求正义和为此目的来从事内心的修养的青年的印象之坏，凡是诚实的人都会有同感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能产生对法律与裁判官的尊重呢？可是，纵然有人对于“巡视”的效果极为信赖——如果它相信能够完全实现它的崇高使命的话——在一个活泼前进的青年看来，这仍然不是甚么福音。诉讼进行的繁冗的形式和手续，在本身上已会使诉讼拖延下去，倘若这时候有人想出来露头角和显一下身手，那他就只要老是为不义的方面尽力，为被告洗脱，以及长于曲解狡黠的手法就行了。

我的心既为这类事情所干扰而不能着手于文学的创作，便耽于美学的冥想中。诚然，一切理论的探讨都恰好说明创作力缺乏或停滞。以前我与默克一块，现在却常与戈特尔一道，力图发现可作为创作的准则的诗的原理。但是我也好，他们也好，都得不到甚么好成绩。默克是一个怀疑论者和折衷论者，戈特尔则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来作准则。苏尔泽[①]的理论著作的发表已有预告，但是它只适合一般文艺爱好者的口味，而不是为艺术家而设。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侧重的是道德的效果，由是便即发生作家阶层与读者阶层之间的分歧。因为，一种好的文艺作品固然能够和会有道德上的效果，但是要求作家抱着道德上的目的来创作，那就等于把他的事业破坏了。

---

① 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著有《美学的一般原理》，1771—74年在来比锡出版。

至于古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说法，我这几年来已热心加以研究，虽不是系统地阅读，也不时浏览。亚里斯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朗吉纳斯①，无一不为我所注意，但是我读了也毫无所得：因为这些学者都以一种我所缺乏的经验为前提。他们引导我进到一个无限丰富的文艺的世界，缕述卓越的诗人和演说家的功绩，而这些人的大多数只剩有名字为我们所知。不过我从他们的理论却得到一个极深切的信念，即是，第一，我们面前先要有对象的很丰富的材料，然后才能对他们加以思维考察；第二，我们先要自己试行创作一下，甚至必须经受过挫折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他人的能力。然而，我关于古代的许多杰作的知识，老只是从教室和书卷得来，缺乏生活经验。但是，古代作家——特别是最著名的演说家——是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陶冶和训练，如果我们同时不能了然于他们的个人的性情的特征，就永远谈不上他们的艺术性格上的特点。在诗人的场合，象是不尽如此；可是无论在甚么场合，自然与艺术只是通过生活然后互相接触。所以，我按照自己的夙愿从内部和外部探索自然，热心地描写它，任其支配，是我一切的考虑和努力的结果。

《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缘起

这种影响无日无夜不在我的心里萦回，在这种影响之下，

① 这里歌德所指的是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修辞学》，西塞罗的演说，昆提利安（Quintieian，古罗马演说家）的《演说术》，以及朗吉纳斯（Longinus，213—273雅典哲学家）的《论高尚》。

我碰着两桩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的——素材。这些素材极为丰富，我只须稍加重视，就可以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创作。一种素材是旧时代的，包含《葛兹·冯·伯利欣根》的生涯，一种是新时代的，它的不幸的结局却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描写出来。

关于前一作品的历史的准备，我已经在上头讲过，至于第二种作品的伦理的动机，我现在要说明一下。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以影响。这种决心把我卷入于一种异样的氛围中，《维特》一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构思和写出来的。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可是，自从我同那在塞逊海姆的家族分手，现在又与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的朋友们睽隔，我只感到内心的空虚，无法填补。因此，那时的我便陷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中，即是，只要我们的爱情恋慕稍为遮遮掩掩地露头，就可以偷偷地进行突袭，把我们一切的好的决心都打消了。

著者之自传既已写到现在的阶段，他破题儿第一遭觉得握管时心里轻松，因为从这时起，这自传才采用它本来设想的形

式。我既已声明这自传不是独立的著述，而宁是为着填充著者的生涯的空白，补足许多破碎的断片，以及保存那些消失去或忘掉的种种冒险、离奇行动的回忆。不过，已经一度做过的事情，不应也不能再度的做。到了现在，那时著者在拉因河（Lahn，莱茵河右方的支流）谷的滞留所过的那样的美妙可爱的日子，现在虽欲重新栩栩地回想一番，也是心余力绌，做不到的了。幸亏那“守护神”早已为他顾虑到这一层，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策励他把那虽已过去而还新鲜热辣的印象牢牢把握加以描写，并在适当的时机大胆地发表出来。不用详细说明，我这儿指的是《维特》这一小册子。至于其中所描述的人物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我将在下头逐渐略加阐述。

服务于韦茨拉尔的公使馆的青年人，是在预习着未来的职务，在这些人中有一个青年我们简单地惯称他做“新郎”①。他的特长处，就是安详、恬静的态度，眼光的明晰以及言行的踏实。他的朝气蓬勃的活动和坚持不懈的勤奋大得上官的激赏，许以不久即正式任用。他既有这样的资格，便决心与一个闺秀缔结婚约。这个女子同他的性情和理想完全协调。自从她的母亲去世以后，她以长姊的地位，在许多弟妹的家庭中克尽操持家务之责，独自照顾她的鳏居的父亲。所以她的未来的丈夫，也满可以希望她对自己和儿女做个贤妻良母，而家庭生活的圆满幸福也在预期之中。无论谁人，知道这个女子的，纵然不是抱有得她为终身伴侣的自私的希望，也承认她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女子。女子中有些纵不能惹起男子的热烈的爱情，但足以引

① “新郎”是指雷斯特纳(Johann Christian Restner,1741—1800)，汉诺威人，当时任不来梅大公的视察团的团员。

起人人的喜爱，她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秀丽的体貌，纯良健全的性格，以及从此派生的蓬勃的生气，对于日常事务处理稳妥的才智，兼备于这女子的一身。我对于这种优点也向来加以重视，并且很喜欢与具有这种特点的人经常来往。我虽然不能常找到机会替这类的女子忠实地效劳，但比起别的女子来也较喜欢与她们共享受少年男女不费什么工夫和财力而常极容易得到的天真烂漫的欢乐。那时的妇女大抵总是为了对女伴炫耀起见而刻意打扮，彼此不倦地斗妍竞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淡装素服，对男友或未婚夫暗中保证，她们只为他们的缘故而打扮，不须多大的麻烦和花费就可以一辈子继续作这种装扮的女子。

这样的人既不太过在自己身上做工夫，自有余暇来观察外间的世界，以及有使自己顺应它和使自己与它保持平衡的余裕，她们不须多大的奋励而自聪明贤达，不须读多少的书本而赢得自己的教养。那个公使馆员的未婚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至于“新郎”既是一个非常正直和相信人的男子，凡是他敬重的人就把他的未婚妻介绍与之相识。他自身一日的大部分时间既忙在公务上头，所以很喜欢他的未婚妻在家务停妥之后，以别的事情自娱，以及跟男女友人们一块儿在市中或郊外散步，游览。绿蒂（Lotte）——让我们这样称呼她吧——是一个淡泊不矜持的女子，我们这样子说她，是有两重的意味的：一方面，以她的天性论，与其说是追求自己特殊的爱好，不如说是追求众人共同的幸福；他方面，她已委身于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也值得她的倾心，已自矢一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她结合。在她的周遭洋溢着极愉快的气氛，诚然，看见父母们不断为儿女们费心劳神已是使人快适，如果兄弟姐妹们彼此之间也作同

样的照拂，那就更美。在前一场合，我们看出较多的自然的本能和传统的习惯，在后一场合，我们看出较多的自由选择和自发的感情的作用。

新来的我无拘无束，在这个女子的面前更无所用心。她既是已订有婚约的女子，自不会对别人的极其好意的效劳误解为求爱的表示，而更喜欢这样的殷勤，所以我行我素，任其自然了。可是我与她接近不久就那样的为她的魅力所吸引和迷醉，同时又为这一对青年爱侣当作亲密的朋友来看待和信赖，我自己也茫然堕入五里雾中了。闲散和耽于梦想的我，对于现在既得不到满足，在这个女友的身上找到我所缺的东西。她事实上虽然为未来的日子打算，而在我的眼中却象是只为现在的瞬间而生存。她很喜欢我跟她作伴，我不久也不能离开她片刻，她引导我到日常的世界去，她到她家中所经营的广大农场、耕地、牧场、菜园和花园去的时候，我总是她的不能分离的伴侣。“新郎”公务有暇的时候也跟我们一道。我们三个人虽不是故意的这样做，但彼此已这样子弄惯了，并且不知道怎样会弄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样子我们消磨了一个晴和美好的夏季，象是一首纯粹的德国风的牧歌似的丰饶的田野构成散文诗的部分，而我们间的纯洁的爱构成韵文诗的部分。在布满清露的早晨，我们悠然自得地在黄熟的玉米田间漫步，云雀的歌声和鹌鹑的鸣声象音乐似的，极为悦耳。蒸暑的季节接着来了，雷雨大作，我们因此只更加亲近，借着持续的爱，好些家庭的小小烦恼事也容易解消了。这样子，一天又一天的消磨过去，天天都象是过节日那样，我们的日历整个都要印红色的了。那时我的心情怎样，凡是还记得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思》中关于那个幸福的不幸的青年的话，就可明白了。那里说：“坐

在他所爱的女人的脚下，他想剥着大麻，他愿意今天，明天，后天，甚至一辈子这样子剥着大麻。”①

年轻的耶路撒冷

我可转述另有一个青年，他的名字我在后头常常提起，在这里我要稍稍谈一下，但只能适可而止。这个青年就是耶路撒冷②，温和而具有自由思想的神学者的儿子。他也是在某一公使馆中任事，身材中等，身体健美，英俊可亲，脸庞长中带圆，容貌柔和而静穆，其他的特征也是与一个金发的美少年相称，一双碧眼不独含情欲语，且有摄人的魅力。他的服装是与仿效英国人的北部德国人相同，穿着蓝色的常礼服，浅黄色的背心和裤子，以及褐色头的长靴。著者从没有去访问过他，他也没有到过我这里来，只常常在朋友家里碰见。这个青年人行动有节，但是谈吐洋溢着好意。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创作抱有兴味，时常参加，特别喜欢那些描写孤寂的村野景色与其幽静之趣的图画和素描。他在这种场合便把自己所藏的格斯纳（Gessner）的铜版画拿出来传观，激励同好者对它们作研究。前说的骑士团和化装游戏，他很少或绝不参加，他好独处，惓惓于自己和自己的心情。人们传说他热恋一个朋友的妻子，但绝没

---

① 《新爱洛绮思》（《Neue Heloise》）是卢梭的有名的书信体小说，它借用十二世纪青年女子爱洛绮思与她的老师阿卜略尔的恋爱故事，写十八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这里引的那几句话就是圣·普乐说的，见该小说第五部分，第七封信。

② 耶路撒冷（Wilhelm Jerusalem，1747—72），布朗斯威克公使的秘书，曾在来比锡大学与歌德同学。

有看见他跟这女人公然在一块。其实关于他的情况，人们所知极少，只知道他是致力于英国文学的。他的父亲既是一个有钱人，他不用惴惴然埋头于使馆的公务，也不必急急于谋求官职的正式任命。

那些格斯纳的版画增加我们对于郊野田舍的风物的兴趣，同时，我们在小圈子中热烈欢迎的一首短诗使我此后只有憧憬于村野的景物之一途。这诗就是戈德史密斯（即《威克菲牧师传》的作者）的荒村（Deserted Village）。无论何人，只要具有我们那样的教养程度和那样的心境，定然会对这诗感到极大的兴趣。它所描写的一切，不是当作是活生生的或现实的事物，而是当作已过去的消失的事物来描写，但是它们都是我们喜欢看的，珍视的，以及在现在热烈地追求，以便能寄托他们的青年的愉快活泼的心情的东西。乡村的节日和庆典，教堂落成纪念典礼和每年的大集市，以及在那时候先举行的菩提古树下的老人们的隆重集会，继之而起的青年男女们狂热的跳舞，（连有教养有身分的人也常参加进去）都是乡村中的风物。在其间，善良的乡村牧师，又能抑制一切放肆的行动，消弭可以招致争吵和不和的导因，使这种欢乐不致漫无节制，而恰到好处。即在这儿我们也再度看见可敬的威克菲牧师的出现，他的周遭的人物还是在《威克菲牧师传》中所惯见的那样，但是，在这诗中的他却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为作者的哀歌悲恻之音所召还的影子，如果我们明白诗人的目的是以怀古之幽情来勾起对纯朴的过去的回忆，这种构思已是极其美妙的了。而那位英国诗人欣然动笔写作的结果，真可以说是成功！我与戈特尔共同欣赏这首极可爱的诗，两人都把它翻译出来，可是他的翻译比我的成功，这因为我太过下功夫用德

文把原作的微妙的意味译出来，句斟字酌，个别地方虽还不错，但在全体上却显得不协调了。

如果正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最大的幸福在于憧憬，而真正的憧憬是以那些得不到的东西为对象，那么一切事情凑合起来，就可以使得那位青年——我们现在象是伴着他在迷途中彷徨着——成为尘世最幸福的人了。对于一个已婚的女性的爱恋，把外国文学杰作完全转化为本国文学的努力，不独以文字而且以雕刻刀、画笔不求工整地描摹自然的苦心，这种种的事情，就是其中的一样已足以使他的心情激动，忐忑不宁了。但是强使他从这样的甜蜜的苦恼离开，而投入新的环境，新的苦恼中，却因为下述的事情。

赫普夫纳教授

基森（Giessen）城有一位唤做赫普夫纳①的法律学教授。默克和施罗塞尔都称道他是一个学有专长、聪明而善良的人，对他十分尊敬。我久欲跟他结识，这时恰巧这两位朋友为着某些文学问题的商讨，有访他之约，并邀我趁这机会也到基森去，我固欣然答应，可是，我们青年人在这样的愉快、太平的时节，总是洋洋得意，做甚么事也不肯循笔直的途径，而象真正的小孩子那样，在干要紧的事情中也要杂以一点谐谑，所以，我们决定我在访他时要隐去真姓名，装作陌生人那样，于是我的改装癖好再一度施展出来。在一天晴和的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由韦茨拉尔动身，沿着拉因河步行，越过那美丽

① 赫普夫纳（Ludwig Julius Friedrich Höpfner，1743—97）。

可爱的河谷，这样的徒步漫游使我再感到无上的幸福。我在途中一路走一路寻思，构想推敲，在静默中我沾沾自喜。我把那永远矛盾着的世界笨拙地纷乱地闯进我的心目中的事物加以整理。一到了我的旅行的目的地，我即找到赫普夫纳的住所和叩他的书斋的门。当我听见“请进来”一声便拘谨地走进去站在他的面前，象是一个在归省途中的大学生慕他的鼎鼎大名而同他结识的那样。他所问关于我的境况的种种的事，我已预备好了答话；我对他陈说了一番很可置信的杜撰的故事，他听了象是满意。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应对上也敷衍得过去。因为我知道他在法学上的功绩，以及他正致力于自然法的研究。可是我们的谈话有时也停顿，他仿佛是要拿来客的题字纪念册或催促我走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施罗塞尔素来是守时间的，等待着他来，老坐着不走。果然，施罗塞尔来了，大为主人所欢迎；他横眼看见我，却装做不注意我那样。可是赫普夫纳却引我加入他们的谈话中，显出他是一个非常和蔼、近人情的人物。后来我告辞了，赶快跑到旅店去，在那儿我略与默克攀谈，安排好以后要做的事。

这两位朋友约定请赫普夫纳吃饭，另外还请一位唤施米德[①]的人。这人在当时的文坛中虽然地位很低微，然也是一个角色。本来我们在这晚餐会中暗地里要耍的把戏是以这个人为对象，他在文艺上所做的种种可非难的事，要在笑谑里受到惩罚。当客人进了食堂的时候，我叫茶房给我通报，看许我共食与否。长于扮演一本正经的角色的施罗塞尔表示不答应，不愿

① 施米德（Christian Heinrich Schmid，1746—1800），基森大学的雄辩学和诗学教授，写作多而内容肤浅，因而声名不好。

他们的亲切的谈话为第三者所打断。可是因为我叫茶房苦苦的请求，而赫普夫纳也插口断言我是一个不碍事的人，我便被请进去了。初时我的态度装作很谦逊羞涩似的。施罗塞尔和默克自由无碍地放言高论，谈到种种的问题，象是旁边没有陌生的人那样，他的谈话从重要的文学问题谈到著名的作家。这时我渐渐显出放胆一点，陈述我的意见，纵然施罗塞尔有时认真地反对我，默克开玩笑地批评我，我也不管。可是我所放的箭全都针对着施米德射去，深知道他的弱点的我每支箭都锋利地准确地射中了他。

跟施米德开玩笑

斟给我的一“奈些尔”（旧量器名）普通餐桌上所备的酒，我只稍微喝一下，但是他们却叫较好的酒，也劝我饮。当日的文坛的许多问题畅谈过一番之后，议论便转到一般的问题去。那就是谈到文学是在高潮中还是低潮中，是在前进着还是后退着的问题——只要著作家有一天存在，便一天重复提起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在什么人之间，尤其是年长者与青年间，文坛的耆宿与新进者间，很少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都畅所欲言地把它透彻地讨论，但没有打算获得大家同意的定论。到后来，我插口说道：据鄙见看来，文学也有季节的，象自然的四季那样，循环迭代，顺次出现一定的现象，周而复始。因此，我相信，我们不能赞扬或指摘某一时期文学的全体，我特别期期以为不可的，就是把一个时代的作家抬到很高，备加颂扬，而把别的作家痛加贬斥，压到很低。夜莺的喉因阳春到来而激动，同时杜鹃的啼声也是如此。美丽悦目

的蝴蝶和惹人憎恨的蝇蚋，同样是日暖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留心到这一点，我们就不用每隔十年便重复作这样的不平之鸣了，而为着要革除这种或那种的讨人嫌的作品而白费的苦心劳力就可以省掉不少了。他们大家不知道我从哪儿学来那样的智慧和宽容，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却泰然继续说下去，把文学的现象与自然的产物对比，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居然将软体动物拿来作譬，并讲出关于它们的习性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我说，这种生物也象是有一种躯体以至一种形态，我们也不能否认，可是它们既没有骨骼，初时真不知把它们当作什么好，只有看作一种活的粘液体。可是在海里总得有这类的东西。其后我继续拿水母来做比方，并张大其词以便暗指眼前的施米德以及跟他一般的无行文人，有人便批评我道："譬喻虽不错，扯得太远了，终归没有意思。"我因答道："那么，我就从海中回到陆上去，拿常春藤来说说吧。正象水母类之没有骨骼那样，常春藤是没有树干的，无论攀缘到什么地方，都喜欢出风头。最宜于它的生长的地方就是坍废的古墙，因为那儿上头没有什么好给它败坏了，但是在新的建筑物上，人们便不让它蔓生。它吸取它缠绕着的树木的养分，我最讨厌的就是它攀缠上一根柱子的时候，因为柱子为它的枝叶所包了，它便依然以有着活的树干自居

不管别人再认为我的譬喻是晦涩和不贴切，而加以非难，我越说越有劲，把一切寄生动物痛骂一顿，并把我当时所有的博物的知识尽情卖弄出来，并把我的譬喻弄到相当有分寸。最后，我对一切自主独立的人高呼万岁，高喊打倒那些强行依傍别人的作家。饭后，我执着赫普夫纳的手，使劲的握几下，称赞他是世界中最善良的人，拥抱他，到后来也与其余的人恳切

地行拥抱礼。这个善良的新朋友（指赫普夫纳）真以为是做着梦了，到末了，施罗塞尔和默克把这个闷葫芦打开了，这个玩笑弄明白了之后，大家都更兴高采烈起来，连那位施米德先生，也因为我们赞赏他的真正的长处和对他的嗜好表示同感，而释去前嫌，跟我们一道笑乐了。

《法兰克福学术通讯》

这样的饶有风趣的开场只能够使我们的“文学会谈”更有劲地更顺利地进行了。其实，我们这次的基森之行，是以这种会商为目的。默克有时大谈美术，有时大谈文学，有时又扯到生意经那里去，议论风生，促动了那位好学深思和多才博识的施罗塞尔，发起要在本年内编辑创刊《法兰克福学术通讯》（《Frankfurter Gelehrten Anzeigen》）。他们已约有赫普夫纳和基森城的别的教授，达姆施塔特城的著名教育家温克校长以及许多别的知名之士参加。他们各人对于自己的专业都有充分的历史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而当时的时代精神又使他们同心同德地干去。出版头两年（因为这个杂志到第三年便由别人接办）的这个杂志，十分明显地征见它的撰稿者的观察是怎样的高瞻远瞩，眼光是怎样明晰，意志是怎样的笃实。他们对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都加以鼓吹。凡有名副其实的干练的学者便代为尽维护之责，使不受任何干扰，并替他们尽力防备论敌的攻击，特别是防御那些滥用老师们所传授的门下生的暗箭。大抵最使人感兴趣的文章就是对于别的杂志——如柏林的《文库》（《Bibliothek》）、《德意志信使》（《Dewtscher Merkur》）等——的一些批评，这些文章对于那么多的专门学

问非常精通，观察深刻，论断公正，确值得世人的惊叹。

以我而论，他们很了解，我够不上充当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实际上我的历史的知识不够系统化，关于世界史，科学史和文学史，我只有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研究，关于各个课题，也只是探求它的部分或它的轮廓。我之能够撇开事物与它的总体的联络，栩栩如生地思索设想，尽管不知其来龙去脉，而也可以通晓一世纪的事情，或科学的某一部门。并且我具有一个理论的而又实际的头脑，对于种种事物的论述虽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样，也较能知道它们应该怎么样，虽没有进行真正的哲学的思维，但有时也意外地洞中肯綮，此外，我还有容易领悟的能力，他人的意见只要不与自己的信念正相反，我便欣然接纳。

加之那个文学团体因参加者通讯的频繁和住处相近者的时常晤谈，更呈活气。团员中读到一本书，便作书评报告，许多时别人也作补充报告，关于这桩事的意见互相交换，与有关的别的题目联系起来，最后便作成一个结论，由一个人综合编出来。因此，好些评论既精辟又泼辣，既快意，又使人满意。我常担负报告员的任务，我的朋友有时也让我在他们的写作范围内开点玩笑，而在我关于某一题目有把握或特别有兴味的场合，便让我写成文章独抒己见，在杂志上发表。当年学界的真正的精神和旨趣究竟怎样，如果不是有那两年的杂志本身提示我们以最可靠的文献，那末，我想努力通过观察和叙述，加以回忆，也是徒劳的吧！我认为是自己的手笔的文章，也许会挑选出来，跟别的类似的论文一块，在适当的机会再发表出来。

我们的知识、意见和信念那样迅速地交换，因此，不消多久，我就和赫普夫纳相知较深，并博得他的爱慕。只要我跟他在一道儿，我便与他谈论他的专长的学问——也即是我应该专

攻的学科——从他那里得到很自然地和系统地作出的说明和启迪。那时我还没有象后来那样明白，我得到的一点学识，恐怕多半是依靠看书和谈话，而不是从教室的有系统的讲授得来。读书可以任我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吟味一下，以至回顾一下，而教师口授的演讲却不能让我这样子做。许多时，在上课听讲的开头，我突起一念，只顾着思索，其后的讲授便听漏了，以致整个线索都找不着。我上法学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尽可能利用机会来向赫普夫纳请教，而他也欣然替我解答种种的疑问，为我弥补了许多知识上的空白。由是我便希望不要离去韦茨拉尔太远，就滞留在基森城，就教于赫普夫纳。可是，我那两位朋友对于我这种愿望，最初只不自觉地持反对的态度，其后却故意反对，因为他们两人不独自己决心急要离开该地，而且还盼望也能把我一同拉走。

未来的妹夫

施罗塞尔这时对我透露，他初时与我的妹妹做朋友，后来却发展为更密切的关系，他正要谋得一官半职，好来跟她结婚。纵然我在以前从妹妹给我的信中早看出这种苗头，他这样明言仍使我有点吃惊。固然，能够伤自己的自尊心的事也容易就想开，但我现在却开始觉得自己真个吃妹妹的醋了。加以我这次从斯特拉斯堡回来，我们兄妹间的情谊比以前更加亲密，我这种妒意更不能自隐。我们重新聚首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絮絮不休地共话我们别后的情况，种种的心事，恋爱以及其他如此之类的琐事啊！而且在想象力的领域内不是有一个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也要把妹妹领到那儿去吗？我自己创作的小

东西以及范围广泛的世界文学，必须逐篇给她读。例如我从荷马的诗中选出她会立即发生兴味的篇章，即席译给她听。有时我又把克拉克（Clarke）的逐字直译拉丁文本尽可能流畅地用德语朗诵出来，我的朗诵不是单象讲书那样，而常是高低抑扬，声韵铿锵，而且对于诗中的人物和情景的描写的栩栩欲活，我说出来时的语调的雄劲有力，把字句结构的一切的局限性都打破了。我意兴洋溢地讲出来时，她也心领神会地倾听着。我们俩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子愉快地消磨去了。如果她的女友也聚在一起时，她们一致要求我把大狼芬里斯（Fenris，出自北方神话的怪兽）和猿将军汉纳曼（见前）的故事讲出来，而雷神托尔（见前）和他的随从怎样为深谙魔法的巨人所骗的有名的故事也不知要详细地复述过多少回呢！这些神话故事的讲述既留给我那样愉快的印象，所以它们到现在仍算是唤起我的想象力的最可珍视的东西。我在达姆施塔特城跟朋友的关系，也把我的妹妹牵连进去，甚至我的旅游外出也只有更加深我们的友爱，因为我把我见闻的一切都用信告诉她知道，每作一首小诗，纵然只是一种感叹的标志，也马上寄给她读，并且把我所收到的一切的信和我所有的复信都首先让她看。可是，我对妹妹这种浓厚的情爱自这次离开法兰克福城以后便中断了，我在韦茨拉尔的居留没有多大的收获足供这样的通信的资料，其后我对于“绿蒂”的爱慕使我又无暇分心到妹妹身上去。总而言之，她觉得孤寂，也许感到被遗忘了，更容易接受那个笃厚的人的真诚的求爱，而爱上了他；施罗塞尔本是一个值得敬重和信赖的君子，厚重寡言，平素不肯轻易用情，现在却热烈地对她倾心。既然是这样，我只好听之任之，祝愿我的朋友的未来的幸福。不过我暗地里禁不住自负地说，如果我做

哥哥的不是外出的话，施罗塞尔的成功恐怕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吧。

我的朋友和未来的妹夫这时的确切盼我回到家里去，因为这位意外地发生恋爱的人，象是极需要我做个居间者来谋更自由的来往呢。他因此要我答应他，他一走后，我便跟着他回到法兰克福去。

那时默克恰有工夫，我希望他会在基森多逗留几天，花一些时间来准备《法兰克福学术通讯》的创刊，以便我每天能有几个钟头向赫普夫纳请益。但是他不为我所动，正如我的妹夫之为爱情所拉走那样，他因为对于此间的大学的憎恶而不愿滞留。人类常有一种生而具有的反感，有些人看见猫就受不了，有一些人对于这种或那种东西心里就感到不快，这位默克先生却极讨厌大学生，而那时基森的大学生恰好又是粗暴不堪的。我不以他们为意，我还把他们用来充当我的大斋节戏曲的假装人物的模特儿。但是在默克看来，日间瞥见他们一眼，夜里听到他们的喧闹，实败人的清兴。他少年时在瑞士的法语地区过极好的日子，其后与宫廷中人，上流社会，大商人和有学问人愉快地交往，有几个有志于精神文明的高级军人也谋求与他结交，因此，他是在很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中过日子。这样说来，他之憎恶此地大学生们的粗野胡闹，是不足怪的。不过他的反感确是太激越了，不是稳重如他的人所宜有。可是，他兴高采烈地描写学生们的怪状丑态时，我也常给他逗到大笑。赫普夫纳的邀请，我的敦劝都归无效，我一定要尽早跟他一道回到韦茨拉尔去。

我回去没有多久，便即介绍他同“绿蒂”认识。可是他来到这种人家倒没有给我什么好处。因为正如靡菲斯特（Mephi-

stopheles，即《浮士德》中之魔鬼）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大都不会为人祝福那样，他对于我所爱的人的冷淡纵然不使我的情愫动摇起来，也至少使我索然寡欢了。可是，如果我记得他不特别喜欢的正是这种修长温柔的女人，只使自己的周遭生气蓬勃和欢乐而淡泊自甘的女人，我就会预知他会对"绿蒂"持甚么态度了。可是，他不久即对"绿蒂"的女友中的一个朱诺① 型的女人加以青眼，不过他要费工夫才可同这女子接近，所以他严厉地责我为什么不追求这个美丽的女人，况且她又是没有跟人订婚，是一个自由之身。他认为我不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他极不喜欢我把时间浪费在我这个偏好上来。

如果使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所爱的女人的优点，因为他也觉得她的动人可爱之处，是一种危险，那么，如果友人对她持异议，使自己的心怀疑起来，也有同样大的危险。在我的场合却不会到这样的地步，因为她的可爱之处，已铭刻在我的心中，不容易因别人的批评就磨灭了去，不过默克之在场以及他种种的劝说，使我早下决心离开韦茨拉尔，他正想偕同他的太太和儿子作莱茵河之游，因对我细说旅程怎样的愉快动人。我本已常听见人说到莱茵河的风物而羡慕不置，这时他引起我终要目睹为快的渴望。默克先行出发，我与"夏绿蒂"作别，虽比离开弗里德莉克时较为无亏于心，但仍不免耿耿于怀，而且我与她的友谊，因为习以为常和放任之故，在我方面已弄到热情过当，不过她与那位"新郎"欢愉地契合无间，那种关系已达到最美满、最亲切的了。正是由此产生的这个保证使我忘记了一切危险；而且，我也明白地知道，这个罗曼司就要收场，

① 朱诺（Juno）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之妻，体态庄严。

因为这位青年人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结婚，视乎他预期实现在即的官职提升而定。人类只要有几分决心，就会忍受那不可避免的事，所以我也决定先自动离开此地，免到后来陷于难堪的境地而不得不走避。

第十三卷

冯·拉洛塞夫人的家庭

我与默克约定在晴和的季节到科布林士城的冯·拉洛塞夫人① 家里会齐。我已预先将我的行李寄到法兰克福去，将在旅行中所需的东西托拉因河的便船带走，因而自己可以沿着拉因河作徒步的旅行。河既曲折多趣，沿岸亦变化多端，我一路走来，在决心上是自由无碍，在情感上却为景物所吸引，置身于默默无言而饶有生趣的自然之中，而得到很大的慰藉。我的长于发现景物的图画的美和超图画的美的眼睛，耽溺于远近的景色的观赏之中，灌木丛生的岩石，浴着阳光的树梢，润湿的低地，王冠似的古堡和从天际摄引游子的心的几叠蔚蓝的远山，我都游目眺览。

我沿着河的右岸走，河流离大路颇远，河道颇低，时为茂密的杨柳丛所遮蔽，蜿蜒于阳光之中。于是，我想将这种景物好好地绘入画图的旧癖蓦地痒起来了。恰巧我的左手拿着一柄美丽的小刀子，从我的灵魂的深处突然产生一个命令似的思想："把那小刀毫不踌躇地扔到河里去吧！如果它落在水面，那么我当艺术家的愿望就可以实现；如果这小刀为临河的杨柳之丛

① 冯·拉洛塞夫人（Frau von La Roche，原名苏菲Sophie，1731—1807），富于教养，爱好文艺，与韦兰熟识，曾编有妇女小说集。

所遮挡而不能没入水里，那么，我就死了这条心，不必枉费工夫了。”我这个怪想一冒头我即照着实行。本来这柄小刀附有其他种种的工具，用处很大，我却不管了，我就用握着它的左手使劲地把它投到河里去。但古人所埋怨的占卜的启示的暧昧骗人，我这回也要体验到了。小刀之没入水中与否，为杨柳枝顶端所遮而不能分辨，但是，随着小刀的投入而激起的水花，却高溅得象猛喷的泉那样，并且很清楚地映入我的眼睛，我把这个现象作为不吉之兆解释，因此而起的自信心的动摇使我后来对于绘画比前疏懒，由是倒使我随便解释的神的启示灵验了。因为占卜的缘故，至少在这时刻外部世界使我感到扫兴，我转而醉心于自己的想象和情感之中，任由魏尔堡(Weilburg)、林堡（Limburg）、迪兹(Diez)和拿骚（Nassau）等名胜的城堡和村镇象云烟过眼那样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我大多时踽踽独行，有时与他人为伴走一短程。

这样愉快地漫游了几天之后，我便到了埃姆斯城(Ems,拉因河下游的小都会)，在那儿我曾饱尝了几次软绵绵的温泉浴的风味，然后乘着一叶轻舸顺流而下。名川老莱茵河豁然在我眼前展开了，奥伯兰施泰因（Oberlahnstein,埃姆斯附近的古城）的胜景使我心旷神怡，可是我觉得最美丽、最庄严的还是埃伦布雷特施泰因（Ehrenbreitstein,十二世纪建筑的古城）的城堡，气象雄伟，壁垒坚牢，巍然耸立着。与它形成对照的是它的脚下的称做特尔（Thal）的美丽的小镇，在那儿我很容易就找寻到枢密顾问官冯·拉洛塞① 的寓邸。因为默克已预先

① 冯·拉洛塞（Georg Michael von La Roche，1720—88），原是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子，由斯塔迪安伯爵收留抚养成人（见后）。伯爵曾任美因兹选帝侯的大臣，其后又在特里尔选帝侯那里服官。

给我介绍，这个高贵的家庭很殷勤地接待我，不消一会便把我当作亲人看待。我以自己的文艺爱好和伤感的倾向讨这家母亲的欢心，以乐观的世界观投这家父亲的所好，与小姐们之间则因同是青年而自然水乳交融。

他们的宅邸位在河谷的尽头，离河面不高，可以纵目眺望下游的风景。厅房高敞，四壁象是画廊那样密密悬着许多的画。通向四方的窗户使窗棂就构成一幅自然的图画，柔和的阳光照耀着，更添生气。我相信一辈子从没有从窗间眺望到那样灿烂的早晨和美丽的夜景。

不久，不是单我一个人在这儿作客。约定在这儿举行的会谈一半儿带有艺术的气息，一半儿仅仅带有友情的意味，勒逊林格（Leuchsenring）也被邀参加，他从杜塞尔多夫城来。这个人精通近代文学，在各地旅行的时候——特别是在瑞士居留的时候，认识了许多人，他既和蔼可亲，能迎合人意，故能十分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带了好些小箱子来，其中藏有许多朋友给他的亲密的书信。本来在那时的德国人中流行着一种开诚布公地交往的习惯，即是，他写信不单是为那个收信的人而写，同时还想收信者的朋友们也读到这信。这种通信既是互相推心置腹的，政府对于它也不加注意。邮车又按时迅速递送，途中封缄安稳，邮费不贵，故这种伦理上和文艺上的通讯很快就盛行起来。

这样的书柬——特别是从要人名流寄来的——收集珍藏起来，到日后与朋友聚会的时候，便选出其中的一部分拿来念，那时我们对政治的讨论既无多大兴趣，这样子，人们对于道德方面的问题倒是有更广泛的了解。

勒逊林格的小箱子中藏有许多在这种意味上算是贵重的宝

物。特别可珍贵的就是一个唤做朱莉·邦德尔① 女士的信，她是一个有思想有贡献的妇女，以曾为卢梭的女友著称于世。凡是与这个卓越的人只要有一点关系，便沾了光荣，在卢梭的名字之下，暗地里形成的团体遍于各国。

读这些信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旁边倾听，因为借此我象是被送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去和了解在最近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真际。当然，不是所有的书信都是内容丰富的。拉洛塞先生本是一个性情豪爽、洞明世态的实务家，虽属天主教徒，以前已在一些著作中嘲笑僧侣和修道院的制度，他听见朗读这些信时，也看出有这样的交际关系，即是有好些的人，攀上大人物与之结交，结果他们捞到好处，而所结交的人却并无所得，无足轻重。每当勒逊林格打开他的宝物箱的时候，这位干练的拉洛塞先生大抵避席他去。有时他虽在旁边听着读一两封信，也总不免加以冷嘲热讽。有一回，他这样说："看了这封信，我更深信我以前所设想的是有根据，即是，娘儿们实在可以省去封信的火漆不用，只须用夹针把信夹上就成了，因为在途中可以担保没有人把它打开来读呵！"他以同样的调子对人生的实际活动以外的一切事物嘲笑揶揄，在这方面，他以他的主人和恩师的美因兹选帝侯的大臣斯塔迪安（Stadion）伯爵作为榜样。后者的影响诚然不能使他在少年时代的洞明世故，头脑冷静的特点，以对于冥冥不可测的事物的敬畏之故，得到平衡的发展。

---

① 朱莉·邦德尔（Julie Bondeli），是瑞士伯尔尼的参议员弗里德里希·邦德尔的女儿，长期与韦兰恋爱，同卢梭、齐默尔曼、拉瓦特尔等有文艺上的交往。勒逊林格在瑞士同她结识。

拉洛塞和他的恩师

可是，关于斯塔迪安伯爵为人非常实际的逸事，让我在这儿插叙一下，倒是合适的。拉洛塞幼时就没有父母，伯爵爱怜这个孤儿，亲自教养他，在他童年的时候已要他任秘书的事务：要他答复来信，草拟急用的文书，这些文件还要他自己誊清，有时又要他作暗记，封缄以至写上地址。他这样做了许多年，由童年而进于青年的他，确能胜任他从前只自忖可以担当的职务，伯爵便领他到一张大公事台之前，那儿保存有一大堆的信和小包裹，原封不动，让拉洛塞拿来作为初任事时的练习的材料。

伯爵更给与他的弟子的另一种训练，恐怕不会那样得人赞同。即是，为免去伯爵的自己执笔之劳，拉洛塞必须练到自己的字酷肖他的主人兼恩师的笔迹。可是，拉洛塞这种技能不独应用在一般事务上，即便谈情说爱的书信，伯爵也要他代笔。伯爵与一个高贵有才的妇人热烈地恋爱着。当伯爵与这贵妇人一道儿欢聚至深夜的时候，他的秘书却留在家里埋头杜撰一封封热烈的情书，伯爵回来把他喜欢的情书挑出来，即在深夜也派人送去，那贵妇人看见她的热烈的崇拜者那样的熊熊不灭的情焰，一定会深信不疑吧。这种少年时候的经历当然会使拉洛塞对于爱情的书柬不会有很好的观感了。

曾服官于天主教僧侣方面两个选帝侯的他，对于僧侣深恶痛绝，这大概因为他察知德国的僧侣往往表现出粗暴、毫无风趣的丑态，因而妨碍和破坏德国国民的一切教养的缘故吧。他出版的《论僧院制度的书简》(《Briefe über das Mönchswesen》)

轰动一时，一切新教信徒以至许多天主教信徒极表欢迎。

可是，拉洛塞虽反对一切涉及所谓情感的事，自己又极力避免在外表上露出这种痕迹。但他对于自己的大女儿的慈爱仍不能隐瞒。事实上，大女儿确是值得人怜爱，她身材不高，体貌秀丽，仪态大方，漆黑的双瞳，柔嫩的脸色，其妍丽之处非想象所能及。她也爱他的父亲，意趣也接近父亲的那一方面。拉洛塞既是一个勤勉的实务家，差不多全部的时间给公务占去，在他家里停留的客人本来不是由他邀请，而是由他的夫人吸引来的，所以，与客人交际不会使他感到多大的乐趣。不过，共餐的时候，他也有说有笑，蔼然可亲，只极力使自己的食桌不带有感伤的气味。

凡是知道拉洛塞夫人的志趣思想的人——她是很长命的，而且留有许多著作，所以德国人对她都知道、都尊敬——恐怕会猜想他们的夫妻关系因此一定不会融洽。但是，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她是一个最可惊异的非凡的妇人，我找不到有哪一个妇女可与她相比。她的身材略高，体貌娟秀，即使上了年纪，她的丰姿和举止仍能保持有一种优雅的风度。她的仪态实介于贵妇人和上流的市民阶级的妇人之间，极可人意。她的服装多年没有改变，不逐时流。绮丽的翼状的小帽子与她的小脑袋和美好的脸庞很相配，褐色或灰色的衣裳使她的仪容显得娴静庄严。她善于辞令，无论说甚么都带有一种情感，讲起来便很动听。她对任何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上述的一切话仍不能说出她的特异之处，其实表达它不是容易的事呢。她象是对于一切事都有兴味，但什么事都不能深切地影响她。她对于什么事都持和善的态度，对一切事都能忍受，而不觉得苦。丈夫的诙谑，来客的殷勤，儿女们的亲切可爱，她都以一样的态

度对待，因此，世间的善也好，恶也好，书卷中有可称道的事也好，有可指摘的也好，她都满不在乎，什么时候都不失自己的常态。她虽遭遇着种种的可悲的，甚至凄惨的遭遇，但她到高年仍保持着她的独立性，实受她这种性情之赐。不过，为要不违背事实，还要补述一句话，即是，那时她的两个儿子，正是含苞初放似的美少年，有时诱使她不由得不露出一些与日常生活惯见的不同的表情。

默克的影响

这样子，我处在一个异常愉快的新的环境中，度过一些日子。后来默克偕他的家人同来了，于是我们之间马上产生了新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作用，即是，拉洛塞夫人与默克夫人两位太太接近起来，默克以拉洛塞为人洞明人情世务、富于学识和阅历而亲近他，男孩子们打成一伙，两个女儿则跟我在一道。就中大女儿不消多久就特别对我有吸引力，在旧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新的爱情就萌芽，使人感到非常愉快。这正象刚在落日苍茫的时候，新月从对面出现，看见日月双悬的两重光辉而欢悦不胜那样。

这时在室内也好，在户外也好，都不愁没有丰富的娱乐。我们遍游这一带地方，在这方的埃伦布雷特施泰因，在那方的卡尔陶塞（Kartause，在山上的卡尔陶塞教徒派的修道院），都曾登临过。这儿的城市，摩泽尔桥，（莱茵河支流摩泽尔河的大桥）渡过莱茵河的摆渡，给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欢乐。新的城堡那时还没有着手建筑，我们被带到它的基址去，并看到它的设计图。

但是，我们的情况纵很愉快，龃龉不和的因素已在潜滋暗长。这种龃龉在有教养的人们中也好，没有教养的朋侣中也好，通常会显示出不愉快的影响。冷淡而又不耐烦的默克，不消多久就不肯倾听那些书信的朗诵，对于信内所说到的事情、人物和人与人的关系，他恣意加以揶揄，在背后则对我揭发信中本来包藏的种种极可惊异的秘密。他所说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秘密，也不是一种与之有关联的事情，他只叫我注意某一种人。这种人虽没有特异的才能，但会机智巧妙地造成自己个人的声望地位，结交许多人，来撑自己的腰。自此以后，我便有机会多领教这种人物。这种人通常变换他的居地，象漫游者那样时东时西，因此人们视他为“新来者”不加妒忌。不加指摘，他便占了便宜。因为这是一种传统的现象，凡是旅行者都因此而享受优遇，凡是定居一地的都因此蒙受不利。

这些都不管了，总而言之，自从那时起，我们对于那些为自己打算漫游各地，一城又一城的寄泊，至少在几个家庭里受到重视的人们，抱有一种不安的，甚或嫉视的戒心了。这类的人中的柔弱和软心肠的类型，我曾在《布雷长老》（《Pater Brey》）一戏曲中描写出来，较能干和粗豪的类型见于我将来出版的一篇大斋节戏剧中，后者的名字唤做《莎蒂罗斯》（《Satyros》）或《神化的森林恶魔》（《Der vergötterte Waldteufel》），这两篇东西对于这种人物的描写纵或有欠公正之处，但至少也饶幽默的意味。

不过，在拉洛塞家作客的我们的小团体虽杂有脾气古怪的分子，但彼此还可以凑合相处。这一半儿因为我们为自己的教养和生活方式所约束之故，一半儿也因为女主人的特别的态度有微妙的缓和的作用。她不大为周围的事物所动，老是耽于某

种理想的意念，而又能亲切地好意地把它表达出来，故产生于我们之间的一切轧轹都为之缓和，一切不平都为之消除了。

对艺术的兴趣的复活

默克恰在适当的时机告辞，因此大家分手时友谊还是极好。我同他和他的妻子一道走，搭一只归航美因兹的帆船溯莱茵河而上。船本来已走得很慢，我们还叫船夫不要赶程。我们悠闲地赏玩着沿河的变幻无穷的种种风物，它们因风和日丽而象是每时每刻都更加好看。形状和喜人之处老象是变换着。可是，我只把莱茵费尔斯（Rheinfels）、圣古尔（St.Goar）、巴哈拉哈（Bacharach）、宾根(Bingen)、埃尔费尔德(Elfeld)和贝伯里斯（Biebrich）的地名讲出来，希望每一个读者都能回忆起游览过这些名胜的往事。

我们热心地描绘沿途的景色，至少借此可以使美丽的两岸变化万状的风物更牢牢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此外，因为我们同舟共处那么久，彼此对于许多事情披肝沥胆，我们的交情便亲密起来，以至我大受默克的熏陶，而我作为一个好伴侣，也成为他心情快慰所不可缺少的人。我的为自然所锻炼的审美的眼光再度投到美术品的鉴赏上头，法兰克福城的绘画和铜版画的珍藏给我以极好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也很受埃特林、埃伦赖希① 诸氏——特别是善良的诺特拿格尔② 的好意之赐。从美术

---

① 埃特林（Ettling），在法兰克福任陪审官，家中藏画不少。埃伦赖希（Johann Benjamin Ehrenreich)，是画家和铜版雕刻家，大概在1767年已离开法兰克福。

② 参见第四卷的“蜡布工场”一节。

中认识自然，已成为我的一种热情，当这种热情达到最高峰时，连热爱美术的人们看来，也一定觉得类于疯狂。想要培养这种对于自然的爱好，除了不断地鉴赏荷兰派的杰作之外，恐怕没有再好的方法吧。诺特拿格尔为使我在这方面也获得实际的知识起见，曾为我特辟一工作室；凡是油画所必需的东西都备好。我照着实物画了几幅简单的静物画，其中有一幅是画小刀的镶银的玳瑁柄，我绘画的老师在我绘这画时离开我一个钟头，后来看我画得那样好，便惊异起来，断言一定是当他不在的时候有一个他的高足弟子来帮过我的忙。

如果我有耐性地继续练习这种写生画，把实物的光线、阴影和表面的特征画出来，我便会培养成一种熟练的技巧，可以进而再求深造。但是我犯了与一切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同样的毛病，先从最难的着手，甚至想拣自己做不到的来做，没有多久，我便从事艰巨的图绘工作，以至手足无措，半途而废，这一方面因为作此种画是还超出我的技能之外，他方面因为那使初学者也能略有成就的深切的注意和沉静的勤勉心，我也不能经常一贯地、有效地保持。

同时，我又被引入比绘画更高一层的艺术部门去，那时恰有机会买到几个古代人首的石膏模型。来赶年会的意大利人常带着这样的好东西来，把它们的模型塑好后，也拿来卖。我从他们那里陆续买得“拉奥孔”，他的儿子们，“奈奥比的女儿们”①（此像的原作现藏于佛罗伦萨博物馆）等头像，构成一

① 奈奥比（Niobe），古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之妻，以有子十二人自夸于拉脱那（Latona）之前，而后者仅有二子，忌而尽杀其十二子，奈奥比大为哀痛，后得主神朱庇特之力而化为石。

个小博物室。此外，恰有一个艺术爱好者死去，从他的遗物中又买得一些最著名的古代美术的缩制品。这样子，我力图使我在曼海姆博物馆所获得的伟大印象尽可能地栩栩复活起来。

法律工作

这时，我除了培养、助长和保持自己的才能、兴趣和其他一切的癖好之外，我还顺着父亲的意愿，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律师那样的职务上头。偏巧那时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提供我作这种活动。自从我的外祖父逝世后，舅父① 任市议会的参议员，把我胜任的法律上的琐事委托我办理，施罗塞尔兄弟也帮舅父办这样的事。我努力熟习法律的文书，我的父亲也喜欢阅读它们，他因为儿子开始从事法律的业务，自己也重作荒疏已久的活动。我们共同商讨，然后我从容不费思索地拟出必须草拟的文稿。我们雇用了一个熟练的录事，怎样按照公文程式来写都可以交给他办。这种新的作业既使我更接近父亲，所以我更感愉快；父亲在这方面既对我的态度完全满意，对于我所做的其他的事，也欣然听之任之，渴望我不久也可博得一个著述家的声誉。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一切事物都是息息相关，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和思想向生活的各方面分枝发叶，所以那时的法律学也渐渐以适用于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原理为依归。在当时以青年占多数的律师之间，以及在以老年人占多数的裁判官之间，盛行

---

① 舅父的名字是约翰·约斯特·特克斯他尔（Johann Jost Textor，1739—92），是个博士。

人道主义的思想，即在法律的处理上，他们也竟以人道主义相尚。他们改良监狱，宽免微罪，减轻刑罚，公证的法律手续比前简便，怨偶的离婚得到掖助。我们的优秀的律师中有一个因经过斗争能说服医学校录取一个刽子手的儿子入学，而博得极高的声誉。当时的行会和种种团体虽起而反对这种革新运动，也归无效，障碍一重又一重地被打破。各派宗教之彼此互相宽容，不独以言词劝说，而且见于实行。有一事使公民制度受更大的影响的，就是人们明智地，敏锐地大力向善意的时代鼓吹犹太人待遇的改善。这种法律处理的新课题既在法律和传统的范围以外，只要求正当的判断和善意的同情，同时自须一种自然而有生气的文体为之表达。在这方面，便为我们少年后进辟一宽广的地盘，让我们大显身手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帝室枢密顾问官的代理人，因为我这样做，写信对我大加赞赏。在法国法庭所流行的辩护词成为我们的榜样，给我们以激励。

这样子一来，我们有成为雄辩家而不大象法律家的趋势，关于这一层，笃实的施罗塞尔曾一度加以非难，提醒我的注意。我告诉他："我曾替我的当事人很费工夫地写一辩护书，极力为他辩护，当我读给他听时，他很高兴呢。"施罗塞尔听了便答道："你的所为，显出你倒象作家而不大象律师了，我们从来不要问这样的辩护状会不会得当事人的欢心，而只问它能否动裁判官的视听。"

德国舞台的状况

一个人无论在日间致力于怎样重大和急迫的事，到了晚上决不会因而没有出去看戏的余暇的。我就有这样的闲工夫。因

为法兰克福城没有良好的剧场之故，我自己不断地对德国剧坛加以考察、思索，想寻求出一个可以大改善它的办法。前世纪后半期德国剧坛的状况，人们已很熟悉，凡欲了解当时情况的到处都可以找到整理好的研究资料。因此，我只想在这儿插叙我的一点点一般的感想。

戏剧演出的成败系于演员的技艺者多，取决于剧本的价值者少。一半或完全即兴的戏曲演出的时候特别是如此。在这场合，一切都视乎喜剧演员的幽默和技能而定。这种剧本的题材，一定要从最平凡的生活采取，必须与来看戏的国民大众的风俗习惯相适应。基于这种直接的适应性，这些戏剧便时常惹起观众的大喝采。这种情形在德国南部习以为常，到现在还是如此，只是有时由于扮演的人物的更换，滑稽角色的性格不得不稍有变化。不过，因为德国的笃厚的国民性之故，德国剧场早已转到道德伦理的题材上去，这种趋向由于一种外因而更促进。严格的基督教徒们提出一个问题，即是，究竟戏剧一物是否属于罪恶的和无论如何应该忌避的东西，抑或是无关重要的东西，善人看了还是善，恶人看了还是恶呢？严格的笃信者否认后一点，断言僧侣不应涉足剧场。所以，反驳他们的人单是说剧场无害还是说服力不够，而且还要说明它是有益的。如要有益，它就要成为道德的。由是，在德国北部，戏剧的道德化便逐渐实现，首先，一种夹生饭似的趣味，先将谐角驱逐了，虽然也有一些名作家替他们讲好话①，但是这些谐角也早从德国的粗野风的“汉斯乌斯特”②摇身一变，成为优雅温文的意

① 如莱辛和莫泽（Justus Möser）。

② “汉斯乌斯特”（“Hanswurst”），是十六世纪以后德国喜剧所描写的滑稽人物的代表。

大利风和法国风的丑角（Harlekin）了，以至终于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即使斯卡平与克利斯平①，也渐渐不上演了。我看见老伶科克②扮演克利斯平算是最后的一次。

本来，里察逊的小说③已引起市民阶级对优雅的道德风尚的注意。在他的《克拉丽莎》之中，因妇人的失足而产生的必然的悲惨的结果，被无情地剖析出来。莱辛的《萨拉·萨姆逊小姐》写同一样的题目。其后，《伦敦商人》④一剧描写一个青年怎样受女人的诱惑而陷入极可怕的境地中。法国的戏曲也有同样的目的，只是题材的处理没有那样趋于极端，并且插入和解的情节，使有较称心的结局。狄德罗的《家长》（《Hausvater》）、《正直的犯罪者》（《Der ehrliche Verbrecher》）、《醋商人》（《Der Essighändler》）、《不自觉的哲学家》（《Der Philosoph ohne es zu wissen》）、《尤金妮》（《Eugenie》）等类的戏曲，是与当时日益占优势的可敬的平民精神和家庭思想相适应的著作。在我们德国，《报恩的儿子》、《为了爱子的逃兵》⑤一类的戏曲也循同一的途轨。格布勒的

---

① 斯卡平（Scapin），是意大利喜剧中扮演狡猾的仆人的角色。克利斯平（Crispin），是法国古老喜剧扮演仆人的谐角。

② 科克（Heinrich Gottfried Koch，1703—75），是剧场经营者，戏曲家，1718年以后充当演员。

③ 里察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是英国小说家，这里指的他的小说就是《克拉丽莎·哈洛维》（《Clarissa Harlowe》）。

④ 《伦敦商人》（《Kaufmann von London》），是英国剧作家利罗（George Lillo）所作。

⑤ 《报恩的儿子》（《Der dankbare Sohn》）是恩格尔（J.J.Engel）所作的乡村喜剧，《为了爱子的逃兵》（《Der Deserteur aus Kindesliebe》）是斯台芬尼（Gottlieb Stephanie）所作。

《宰相》①、《克勒门丁》以及其他的戏剧，格明根的《德国的家长》②，都把中层以至下层阶级生活的美好的地方表现出来，博得一般民众的欢迎。埃克霍夫③更借其高洁的人格使从来为人所鄙视的俳优界获得一种尊严，使得扮演这些剧本的主角的地位得到提高。加以他本身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表演光明正大的剧情，恰到好处，取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当德国剧坛的这种新倾向中又有陷于柔弱之虞的时候，恰好有一个剧作家兼演员的施罗德④靠着汉堡市与英国间的密切的关系⑤而致力于英国喜剧的改作。可是，他在改作时只能极其一般地采用原作的材料，因为原作大多数没有戏曲的形式，开头纵很美满有条理，到末了便流于散漫。它们的原作者象是只顾搬弄出极其奇特的场面，因此，看惯了内容充实的艺术品的人便不喜欢到后来被带领到漫无边际的地方去。而且，这些戏曲的全篇充满着野蛮，不道德和粗俗的东西，达到使人不堪忍受的程度，所以要从情节与人物中去掉这一切缺点是不容易的。这些戏曲实是一种粗糙而有毛病的食物，只有半

---

① 《宰相》（《Der Minister》）和《克勒门丁》（《Clementine》）的作者是格布勒（Tobias Philipp Gebler）男爵。

② 《德国的家长》（《Der deutsche Hausvater》）的作者是男爵格明根（Otto Heinrich Gemmingen，1755—1836）。

③ 埃克霍夫（Konrad Ekhof，1720—78），是德国舞台写实的表演艺术的奠基者，有名演员之称，曾与歌德在魏玛的业余剧场同场演出。

④ 施罗德（Friedrich Ludwig Schröder，1744—1816），在汉堡的戏剧界活动，初演喜剧，后演悲剧，以演莎翁剧见长。

⑤ 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罗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移住商人的汉堡市，也欢迎英国冒险商人的到来，后者在汉堡占有牢固的地盘。

堕落的大众在某一时代才能享受和消化它们。然而，施罗德对于这些戏曲的改作，出乎常人的料想之外。他把它们根本地改变过来，力求与德意志的精神同化和尽可能地减轻它们的粗野气味。但是，这些作品常是描写（无论有无正当的理由）有些人总是受他人虐待的情节，而以谐谑出之，所以改作的戏曲仍老是带有一种辛辣之味。因此，这种改作的戏曲的上演，对于那些在道德方面过于纤弱的新戏曲隐然起平衡的作用，双方彼此互相影响，德国剧坛便幸而不致陷于单调化的危险。

先天具有善良宽大的性格的德国人，不喜欢任何人受虐待。但是，无论怎样心性善良的人，也不能担保他人不插入一些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而且喜剧一物之有趣本来往往以观众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为前提，或要唤起他们这种心理，所以德国剧坛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一种从前视为不自然的行径。这就是把上层阶级加以贬低，以至或多或少的诋毁。以前在散文上或诗歌上的讽刺总当心不施于宫廷和贵族。拉宾纳① 对这方面避免一切的嘲骂，而所揶揄的只限于较低的阶级。扎卡利埃② 好以乡村贵族为谐谑的对象，滑稽地描出他们的嗜好和特性，但不含轻蔑之意。图姆梅尔的《威廉米纳》③ 是一篇才气横溢，大胆而又快人意的小作品，大博得人的称赏，这或者有一部分因为著者自身为贵族和宫廷中人，对于自己阶级毫不留情地描写之故。不过，循着这样的方向最决然迈进者还是莱辛，

---

① 参见第七卷“讽刺作家李斯科和拉宾纳”一节。

② 参见第六卷“第二次演讲”一节。

③ 图姆梅尔（Moritz August von Thümmel，1738—1817），著述家，自1768年以后任萨克森-科堡的大臣。他著的《威廉米纳》（《Wilhelmine》）是一篇滑稽的散文长诗，另有《已婚的炫学者》。

他在《爱密里亚·迦洛蒂》（《Emilia Galloti》，悲剧，1772年）一剧中把上流社会的情欲和诈伪的勾当尖刻地、辛辣地描写出来。这一切作品都与那激昂的时代精神完全适应，思想和才能较差的人自信也可以同样的做，甚至做得更甚一点，格罗斯曼[①]在他的《六个不美味的盘》中，把他自己的厨房中的一切下贱的馔馔都献给幸灾乐祸的观众，就是一例。在这个索然无味的饭局上，一个善良的人，枢密院顾问莱因哈德（Reinhard）自任管家之役，对全座客人加以劝慰鼓舞。自从这时候起，舞台上的歹角日益从上流社会中人挑出来充当，不过，为了使这种拔擢确够得上，这种人物一定是宫廷的侍从或至少是宫中的秘书。但是，当作家描写极恶不赦的人的场合，便以缙绅录中的高官显宦做主人公，而法官们在这些高贵的阶层中却成为恶汉中的第一流人物。

《葛兹·冯·伯利欣根》

可是我这样子叙述，恐怕已越过我现在所述的时期，所以我要掉回笔锋，来谈我自己，说明我怎样感到强烈的冲动，在有工夫的时候从事于既已一度构思的剧作计划的完成吧。

因为我不断地留心莎士比亚的剧作，自己的精神的视野大为扩展之故，我便觉得向来的狭隘的舞台面和只适于一出单纯的戏的短促的时间，不足供一种重大的题材的上演。忠诚的武

---

① 格罗斯曼（Gustav Friedrich Wilhelm Grossmann，1746—96），剧作家，演员。他的代表作为《六个不美味的盘》（《Nicht mehr als sechs Schüsseln》）。

士葛兹·冯·伯利欣根的自叙传，使我决心把材料作历史的处理，同时我的想象力扩展得那么厉害，以至戏剧的形式也逾越一切舞台的限界，我极力使情节栩栩如生①，我的构思每进一步，便把它详细地讲给妹妹听，而她对于这类题材，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有兴趣。我既屡屡向她谈起这事，而从没有着笔，她终于忍不住向我好意地规劝，不要老是只说得天花乱坠，而应当把我所构思的，浮现在脑海中的，写到纸上来。我为她这话所督促，有一朝便开始拿起笔来写了，连草案计划都没有预先定好。我写好了开场的几幕，到晚上便朗诵给妹妹听。她大加赞赏，但她不是无条件，同时却说，她恐怕我不能一路这样子写下去，甚至断言不相信我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这话只会更鞭策我，第二天第三天我继续这样子写；每一回与妹妹共话，我的希望便愈增长。因为我已把一切的材料都掌握了，故每进一步，个中的情节人物也愈加活灵活现地现在我的心目中。我这样不断地，目无旁顾地，全神贯注地一直写下去，约经六个星期，我便欣然看见这篇东西脱稿，装钉成一小本了。我把这篇稿子给默克看，他以欣赏的态度和好意评议它。我又寄给赫尔德尔看，他提出不友好的苛刻的意见，而且在一些即席写成的嘲骂诗中给我起了种种的绰号。但我不因为他这种态度而迷惑，反却更严格地检视自己的题材，骰子已经掷了，成为问题的只是怎样才能稳操胜算。我很明白，在这方面恐怕没有人可以借箸代筹；到后来过了一些日子，我可以把这篇东西当作他人的作品那样客观地检视它，我便发觉，我抛弃时间与地点的统一的尝试却损坏了因此更需要的更高的统一。我这

---

① 歌德最初写《葛兹》时并不打算搬到舞台上去。

篇东西既是没有先拟好草案计划就写起来，听任我的想象力和一种内心冲动为所欲为，所以，最初的部分还颇贴切，不离本题，前几出还可以说与原定的意图相符合，但是其后的部分——特别是临到结束时的部分——我便不知不觉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所牵引。即是当我要把阿黛尔海德（Adelheid）写成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时，我自己对于她也不禁起惓恋之情，不由自主地将全副的笔墨专描写她，对于她的运命的兴味占了上风。将近结束的时候，葛兹即成为一个不活动的人物，只作为农民战争的不幸的参加者再出场，那么，要摆脱艺术上一切的拘束而另拓一新园地的作者把一个美妇人挑出来代替他的主人公的位置，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这种缺点，或不如说画蛇添足似的多余之笔，因为我的剧诗的性质逼着我要求脚色的一贯之故，我不久即已发觉。于是我不再单留心葛兹的自传和德意志的古代，而注意我自己的戏曲，并极力在其中添加历史的和国民性的内容，淘汰去虚构的成分或单是热情的成分。人间味既要对艺术的信条让步，我自不免作很多的牺牲。例如我在吉普赛人的可怕的夜间的聚会中，让阿黛尔海德出现，描写她的美貌怎样产生奇迹似的魅力，我初时很为得意，但后来细加考察，便把她去掉了。又如在第四幕和第五幕的详细地描写的弗兰兹和他的女主人的恋爱情节后来也大大压缩了，只在紧要的关头才点出来。

我不想把最初的原稿修改（这稿子现在我仍保存着，一点不失本来面目），而决心从头把它全部改写，我仍孜孜、汲汲地握管，三数星期之后，一篇面目一新的戏曲便展现在我的面前了。我之所以能更快地把它完成，正因为我这次更无心拿第二稿付印，只是看作预习的试作，想待后来以更大的勤勉和更仔

细的考虑重新写作时，拿它来做基础。

当我把心中盘算怎样着手改写的种种的方案对默克披沥时，他便嘲笑我，反问我这样子没完没了的写和改写有什么意思呢？改作的东西只与前作不同但很少比前作好一点；因此，我们应先拿自己的作品出而问世，看看什么反响，然后不断地从事新的创作。——“及时跑到篱笆去，尿布就会晾干了，”他喊出这句谚语来。“踌躇、延宕只造成缺乏信心的人吧。”我却对他答称，我对于这一篇作品那么热爱，如果把它送到书店去请求出版恐怕书店把我看作年轻、无名而又胆大的作家，不加青眼，甚或作出拒绝考虑的回答，那时我会感到怎样的不愉快呢？当我的嫌怕出版的心理渐渐消退之时，我也曾满怀希望地拿我的颇为珍视的《共犯者》一戏曲找地方出版，但是我却找不到一家书店肯接受它。

默克听了我这番话，他对于商业经营方面的兴味便激发起来。他因为《法兰克福新闻》的关系已与本市的学术界和出版商有一些交情。他以为我的戏曲既是题材新颖定然可以轰动出版界的著作，主张自费出版，由此可以赚到丰厚的收入。他象许多人那样，常常计算书贾所得的利润，他们在好些书身上赚得厚利，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在别些书或别的买卖中所赔的钱算在一块，他们的赢利更是丰厚。最后，我们决定：印刷的纸张由我提供，印刷费则由他张罗。我们开始为这事紧张地忙起来，我看见我的信笔挥成的戏曲的原稿渐渐变成整洁的校样，觉得并不坏，实际上印出来的书，齐整修洁还出乎我的预期之外。我们终于完成了出版的工作，便把书分作许多小包寄发出去。不消多久，这书到处都激起很大的反响，受到广泛的注意，可是，因为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都不足，不能十分迅速地将

书分发到各地去，突然有翻版书出现①。而且，我们发行出去的书目不能马上就有书款——尤其是现款——付回，而我还是家里一个儿子，没有当家作主，自己没有多少私财，纵在惹起全国的注目以至博得很大的称赞的时候，也因不能偿付纸张——使自己的诗才为世人所知的媒介的纸张——的价钱而极为狼狈。默克是一个无论什么事情也会办通的人，他反泰然预期一切事不久就会弄妥。后来究竟是不是这样我却不知道了。

当我以前不署名印行一些小册子时，我已以付出当时的出版费作为代价而认识了公众和批评家是怎么样的了，对于他们的或褒或贬已经多少有点思想准备，况且这几年以来，我不断注意他们对于我所敬重的作家怎样看待，我因之更觉泰然。

以这类事而论，即便在缺乏信心的时候，我已看得很清楚，公众和批评家怎样没有根据地，偏颇地，随意地乱说。现在我亲尝到这种滋味了。如果我不是有相当的自信力，有教养的人们的互相矛盾的意见，便会使我怎样迷惑呢！例如在《德意志信使》杂志上登载有一篇冗长而好意的批评，出自一个见识不少的作家之手。他所非难之点，我不能同意，他认为应怎样修改、处理之点，我更不能赞同。因此，这个批评文章刚出现之后，我看到威兰的明快的评论，大体上是为我辩护，反驳那批评，我便非常感激。但是，象头一种那样批评还刊登出来，由此可以看见当时所谓有教育有学识的人的头脑呆钝的实例了。他们尚且如此，读者大众怎样看待这戏曲就更不用说了！

我与默克一块儿谈论这种事情使我得到的乐趣只是短促

① 《葛兹》这戏曲于1773年6月出版，没有说明著者、出版地点和出版者的名称。但在同一年就发现两种翻印本，也不说明出版地点。

的，因为不久，有才识的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夫人，就请他作圣彼得堡旅行的随员。他从那儿写给我的详细的信，使我得扩展我在世界中的视野。况且那描写又出自惯熟、亲切的友人之手，俄国的情况更使我容易领会。虽然是这样，因为默克的远游，我却感到长时间的非常的寂寞，恰在我很需要他的启迪的时候，他就离开我，那是很可惜的。

我们可以立下决心去当军人，参加战争，勇敢地决定要经历危险艰难，挨受伤创苦痛，甚至死亡，但是其间决不会真正认识这种笼统空泛地预期的危害实际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是怎样极度的难受。凡是初闯世界的人，尤其是初出茅庐的作家，也有同样的情形，我就是一例。读者大众的大部分人多为题材所吸引，而不大注意到它的处理的方法，所以青年读者对于我的剧作起共鸣，大抵是涉及题材方面。他们以为在《葛兹·冯·伯利欣根》中看见一面大旗，如以这旗为先导而行进，青年所具有的一切野性、粗暴都有自由驰骋的天地，特别是以前也抱有与这戏曲的情节类似的目的的最有头脑的人，更为它所深深感动。我现在仍藏有一个优秀的读者——并且在许多方面看来可以说是罕见的市民的信。他写给谁，我已忘记了，但是从这封信很可证见这篇作品给与当时的青年人以怎样的刺激和影响。可是，在他方面，老成持重的人便责我把强有力者的特权，描写得太有声有色了，甚至硬说我怀有希望再回到乱世之意。更有一部分人相信我是一个学问湛深的人，希望我把《葛兹自传》加以注释重新印行。当然，这样的事，我知道自己是绝不能胜任的，但是，如果书店把它重印，喜欢将我的名字题在封面上，我也欣然承诺的。有人见我把王侯的豪华的生活能够那样细加描写，认为我是一个非常精细的风雅之士。但是对

于我博学多能精通史实一事致疑的人也是有的，有一天一个著名的大商人意外地来访问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尤其是因为他的谈话开头就表示对我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我的德国史知识的赞美。但是，我听了他后头的话却为之愕然。他说，他之特地来访，单纯为了指点我一点，即是葛兹·冯·伯利欣根不是弗兰兹·冯·西金根①的妹夫，我的诗上把他们这样弄成有亲戚关系便与史实抵触云云。于是我便辩解说，葛兹自己曾这样称呼过弗兰兹。但他却答我说，那时所谓Schwager(内兄弟、妹夫等等）的称呼，正如今日把邮递马车的车夫也称做Schwager那样，只是表示亲暱的朋友关系的惯用语，而不含有什么姻戚的关系于其间。我极口感谢他的指正，只可惜这个错误无法改正。他那一方面也引以为憾，并恳切地劝我以后再精研德国历史和宪法，且愿提供他的藏书给我利用。我以后真个常借阅他的藏书，得益不少。

因《葛兹》一戏曲的出版而发生的事情中最滑稽可笑的事，就是一个书商的来访，他以满不在乎的豪爽的态度约我写十几本象《葛兹》那样的作品，并答应给我丰厚的报酬。我跟默克拿这事来当作笑柄自不消说，不过这个提议也不是完全没根据的。因为我已暗中把葛兹的时代当作是德国史的转捩点，注意到它前后的时代，和把其中的主要事件也写成同样的戏曲。这虽是很可称道的意图，但是，正象别的许多相似的意图那样，因人事的倥偬，光阴的飞掠而终成泡影了。

---

① 弗兰兹·冯·西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与葛兹同时代的骑士。

新的创作计划

不过，这一篇戏曲不是作者专心致意的唯一的工作。而在构想、撰写、改作、印刷和发行它的时候，在我的脑海中，别的想象、主意也纷至沓来。那些要作成戏曲的构想特别为我所注意，思索最频，往往达到了几乎要动笔写作的地步。但是，同时我又转向别种的描写方式去，这种描写方式通常虽不能算是戏曲描写的一种，却与它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转向主要是因为作者连独白也好以对话的形式出之的特性的缘故。

作者既极喜欢在友朋的谈笑中消磨他的时间，因此连个人独自的思索也要化作交谈对话。详细的情形却是这样的。即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惯常在脑海中在想象中把所认识的某一个人邀来。我先请他坐下，在他的身边往来蹀躞着或站定在他的面前，然后跟他交换关于自己刚想起的问题的意见。他听了有时加以答复，或以他平素的表情，（每一个人各有其特别的表情姿态）表示赞成与否。然后，论主的我继续将客人所表示赞同的题材再详加论述，或将他不赞成之点补充条件，或更确切地说明其真义，甚或到末了十分客气地抛弃自己的论点。在这种想象的对谈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从不选择亲密的朋友做对手，而选择自己很少晤面的人，甚至多数是只是偶尔相逢，远在国外的人。但是这些人大多数天性上是偏于“接受”而不是偏于“授与”的，关于自己的视域所能及的事，都虚心表示他们的关切和同情的。固然，在这样带有辩证性质的练习中，我许多时也邀请好抬杠的人来。这样子，男女老少，身分不同的种种色色的人都来与我共话，因为我们所谈的都是

他们各自了然和喜欢谈的事，所以无时不现出满足愉快之色。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实际上不易答应与我这样交谈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时常被招请为我的想象中的谈话的对手，他们应会怎样惊讶呢！

对人生的厌倦

这样一种内心的对话与通讯相似，是十分明显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后一场合所看到的是向对方吐露心事，而得到回答。而在前者的场合，则是一种新颖的，每次不同的自问自答。而对方没有答复。因此，如要描写不是因为贫苦所逼而引起、而是在心情上感到的人生的厌倦，作者便不由得不即以书信体来表现他的心情。因为，一切的苦闷都是孤寂的产儿，凡是感到孤寂的人都想回避一切矛盾，而最使他反感的却是热闹愉快的社交结集。别人的生的享乐在他的眼中却是一种痛苦的讥刺，由是，生的享乐虽应从他自身之中汲引出来，却转把他抛回自己的忧郁的最深处。如果他要把这种悲哀发泄出来，那就要借助于书信的体裁。因为用文字来吐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喜也好，悲也好，仍没有人直接向自己提异议，但是，具有反对的理由的复书，使寂处的人有机会有理由来加强他自己的厌世之念，更沉溺于悲哀之中。《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带有这种意味而写成的书信，它的种种的内容本来是在这种内心的对话中跟种种人互相披沥的话，但后来在作品中却象是只向一个朋友和同情者说出来，故丰富多采，饶有魅力。关于这篇小东西已谈过不少了，再讲它的处理方法，似属赘言，但是关于它的内容让我再补充几句话吧。

这样的厌世之想，有生理的原因和道德的原因，前者的探究，我们要委诸医师，后者的研讨，要委诸伦理学者；关于这种常为人所论究的思想，我们只就这一现象最明显地呈现的要点加以考察就成了。对人生的乐观都基于外界事物的有规律性的循环往复。昼夜的轮流，四季的迭代，开花与结实，以及其他以时呈现于我们的面前的事物，使我们能够和应该享受它们，这些实是尘世生活的原动力。我们越自由自在地领略这种享乐，我们便越觉得自己幸福。可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些现象的种种交替变化，却不感兴趣，对于这些美丽可爱的现象无所动于中，最大的不幸，最难治的心病便发生了，这时我们已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重负。据说有一个英国人为要不再每天又穿衣服又脱衣服而上吊。① 我认识一个管理大公园的诚实的园艺师，他有一天厌烦地喊道："我老是这样子天天看着雨云由西飘到东吗！"又听说我们认识的一个极其优秀的人，看见春天万物再呈绿色而讨厌起来，希望变换一下，春天尽成红色。这些事本已是厌世的征象，驱人于自杀的时候也不少，爱沉思，好独处反省的人，走上这条绝路的比人们所想象的还多。

可是，引起这种哀愁的诸诱因之中，恋爱的热火再燃最有强烈的作用。常言说得好，初恋是唯一的恋爱：因为在第二次恋爱中和经过第二次恋爱，恋爱的最高的意义已失掉了，本来提高和支持恋爱的永恒性和无限性的概念便化为乌有，它与一切可以重现的东西同样，只象是暂时的、无常的。在复杂错综的文明世界中，灵与肉的分离也使爱的感情与欲望的情感分

① 歌德在他自己的剧作《爱格蒙特》（《Egmont》）第二幕就有过这样的话："人生不过是穿上衣服又脱掉，这有什么意思呢？"

裂，在这个场合，也会流于夸张，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并且，一个青年纵然不在自己身上也在他人身上，不久就会发见道德这个东西也象季节那样随时变迁的。大人物的宠锡，权威者的恩惠，活动家的掖助，大众的好感，个人的爱，这一切都起伏、消长，正象日月星辰之推移那样，不是人力所能稳住。而这一切又不单是自然的现象，由于我们自身或他人的过失，由于偶然或命运，而从我们手边溜掉。但是它们总是变的，因而我们对它们总不能掌握住。

可是敏感的青年最感到苦恼的，就是自己的过失的不断再现。因为到了后来年长一点，我们悟到在培养自己的德性的同时，自己的弱点也随之滋长。德性植根于弱点之上，后者一股劲地向四面八方潜滋暗长，正如前者之在光天化日中之开枝发叶那样。因为我们大抵凭着意志和意识立德行善，而无意识地为过失所袭，故德行很少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喜悦，而过失倒常成为我们的苦恼之源。这是自知之明的最难之点，甚至几乎不可能有自知之明。而且，如果我们再想及青年时代的沸腾的血，因为个别事物而容易麻木的想象力，以及人事的倥偬变幻，就会明白青年之亟图挣扎，摆脱这样的困境，决不是不自然的事了。

英国诗歌的影响

这样阴郁的思索使一度被迷的人走投无路，不过，如果不是有一种外来的诱因的刺激和促进，这种病态的倾向不能在德国青年的心中那样决然地发展。这是由于英国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英国诗歌的优美之处还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

凡是耽于阅读的人便受其熏染。聪明的英国人自少年的时候起便看见自己为一个伟大的世界所围绕，自己的一切能力为所刺激，他迟早总会觉得自己要集中他的才智来同这世界协调。他们中的诗人在青年时代已过着放逸不羁的生活，很早就已慨叹尘世事物的空虚，而自认为有理由，象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呵！他们中在政界找出路，碰运气，或参加国会，或服官于宫廷，或出任内阁大臣，或就国外使臣之职，因职务之不同，而扮演的角色亦有高下，或积极参加国内之骚乱，或干预政局的变动，纵不是从自己而从友人或恩主身上也获得不少可喜或更多的可悲的经验，这种人又有多少呢！更或被放逐、被监禁、被抄家，这样的人也不知多少呵！

他们虽只是这种人世大事的目击者、旁观者，但这种事也促使人产生严肃认真的思考，而这种考虑的结果除了使人把一切世间的事物视为无常无价值之外，还会怎样呢？德国人本来也是严肃的，故英国的这样的诗歌便极适合德国人的胃口，加以它们又是从一个水平较高的社会传入来，故又使人有敬畏之感。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有一种伟大的、干练的、深谙世道的智力，深沉、细致的心情，卓越的意志力和热情洋溢的行动，天才与教养兼备者值得钦佩的极其高贵的特点应有尽有，但是这一切的特性结合起来还不能构成诗人。真正的诗之所以成为真正的诗，是因为它象是现世的福音那样，借其内涵的明朗，外表的舒畅，使我们得以摆脱压在肩上的尘世重负。正象是氢气球那样，它把我们以及我们身上背着的重荷上浮于云霄之中，任下头人间的错杂纷乱的迷宫象鸟瞰图那样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最严肃的著作与最轻快的著作具有同一的目的，就是以一种灵巧机智的描写来适度调节我们的快乐和苦恼。如果我

们从这种观点来看英国的大多数的诗——特别是带道德的教训意味的诗，则它们在平均上只会显示出是一种阴郁的厌世观来。不独是杨格① 把这种悲哀特别美妙地抒写出来，其余的冥思默想的诗也出人意表地徘徊流连于这个哀愁的世界中。在这儿要给予我们的悟性以一个它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连悟性能够建立的宗教在这儿也爱莫能助呢。下录的可怕的诗句，（见于莎翁剧曲中）如要加以注释，真是可以印成几本书呢。②

于是老年和经验，手携着手，
领他到死亡之路，使他明瞭，
经过长年艰苦的追求之后，
他的一辈子还是在迷误里头。

有一事更使英国诗人成为人间的憎恶者，以及使他们的著作充满着对一切事物厌恶的不快之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四分五裂之故，他们纵然不是一辈子，也要在盛年委身于这个或那个党派。这样的一个著述家，不能赞颂自己所属的党派和他所服膺的理想，如果他这样做，即会招致他派的嫉妒和憎恶，所以，他的才能就用在对付反对党的方面，尽情诋毁反对党，竭力磨炼他的讽刺的武器，甚至把它涂上毒药。敌对的派别互相攻击，夹在其间的无党派的社会生活便被蹂躏，毁灭，结果，在一个明智地活动着的广大的民族集团中，最低限度地说，只能找到愚笨狂妄，即使他们的情诗也以悲哀的情节为题

① 杨格（Edward Young，1681—1765），诗人，牧师，其所著《夜思》（Night Thoughts）1742—43年出版于伦敦。

② 英国的讽刺作家约翰逊（Johnson）为注解这首诗写了一本书，名为《对人类的一个讽刺》（《A Satire Against Mankind》）。

材。不是一个被遗弃的女郎的情死，就是一个痴情的男子投河自尽，或是急忙地游泳，还没有追到他的爱人以前就葬身鱼腹。象格雷① 那样的一个诗人，躲在乡村教会的墓地之上，把他的著名的哀歌再唱出来，定然会有许多的哀悼的朋友环集在他的身边。弥尔顿的《阿勒格罗》② 不得不在激越的诗句中扫去那惨淡的愁云，然后才能达到很有限度的喜悦；即使那乐生的戈德史密斯也醉心于挽歌似的心情之中，他的《荒村》描写一个浪游者怎样踏遍世界来找寻一个失去的乐园，文章美妙又充满着悲哀的气氛。

无疑的，人们也可以从英国诗中找出一些明朗愉快的作品来，指给我看，作为反证，但是这种诗的大部分和最杰出的部分是较古的时代的作品，其中较近的作品也是有讽刺的倾向，带有辛辣味，特别是以轻侮妇女为快。

总而言之，上头概述的破坏人的天性的严肃的英国诗是我们德国青年的宠爱之物，我们对它们的追求比对任何作品都追切，随着自己性情的相近，或从其中寻求挽歌般的淡淡的哀愁，或从中寻求摒弃一切的沉重的绝望。我们的文学宗师莎士比亚，虽然善于散播纯洁的欢乐种子，而仍加强这种不满，更是咄咄怪事。哈姆雷特（Hamlet）和他的独白，象是一个不可见的幽灵，我们的青年的心全都为它所魇住。其中的主要的文句，哪一个青年都记得住，好拿来吟诵。纵然谁也没有看见他的父亲的亡灵，没有父王的仇要报，但也相信应该象那个丹

① 格雷（Thomas Gray，1716—71），抒情诗人。《乡村教会墓地的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hurchyard》）是他1751年写的名诗。

② 《阿勒格罗》（《Allegro》）是十七世纪英国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43年写的牧歌。

麦的王子那样的悲哀。

而且，连为这一切的悲哀而设的适当的环境也不缺乏，奥西安①把我们引到图勒(Thule，古代罗马人相信在欧洲北端之岛）之滨去，在那儿，我们置身于无穹无际的灰色的荒野之中，漫步于长满青苔的矗立的墓碑之间，环顾尽是怪风吹动的荒草，仰望阴沉的弥漫着黑云的太空。在月明的时候，这个北地的夜才变成白昼，战死的英雄，凋谢的少女的亡灵在我们的周遭漂浮着，直至最后，我们相信，连罗达（Loda，见于奥西安的歌）那样形状可怕的鬼也活生生地出现于我们的眼中。

我们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处在这样的环境，爱好和钻研这种诗文，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我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我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无论如何，随着自己高兴，脱离尘世，倒为得计，我们耽于这种思想，并以此才能把每日的无聊不快熬过去。这种思想既那样普遍地流行，把青年的病态的痴心妄想赤裸裸地贴切地描写出来的《维特》才能到处引起同感的反响，收到大的效果。英国怎样准确地理解这种悲哀，下录的刚在《维特》出版以前写的几行有意义的诗句②可以证明：

倾心于这种哀愁的他
自知创伤还甚于自然所赐，
悲惨的形象是自己的空想所虚拟，
幽暗的理想的可怕的色彩不是本来的样子。

① 参阅第十二卷“德国人的爱国心”一节。

② 这几句诗出自英人沃尔顿斯（Th. Wartons）的题为《自杀》的诗。

自　杀

自杀是本于人类天性的一种事变，关于自杀虽早已有许多许多议论，但仍唤起一切人的同情，在每一个时代必会重新加以论议。孟德斯鸠承认英雄和大人物应有任意死的权利，他说，我们应听任各个人自由地随意结束他的悲剧的第五幕①。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积极地度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为着一个大的国家的捍卫或自由的斗争而利用其时光的伟大人物的自杀，如果这样的人因他的视为性命的理想在尘世间消失了，而想在死后的世界寻求，这样的死我们是不会非议的。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本因为自己的行动的缺乏，置身于极其宁静的生活状态中，为对自身的过当的要求所误，而厌世的人。我自身既有这样的处境，极了然于自己所尝的痛苦，以及为摆脱它而作的努力，所以，我不敢自秘，想将我关于人们会选择的种种自杀的方式的考察发表出来。

一个人之轻生，不独把自己伤害，而且要毁灭自己，这是那么不自然的行为，因此，自杀的实行大抵是采取机械的手段。当阿贾克斯②陷身自己的剑锋的时候，为他效最后之劳的，是他自己的身体的重量。又如古代的战士向他的持盾的从

---

① 孟德斯鸠这话的出处，见于他的著作《罗马人的伟大与其没落的原因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et de leur décadence》)第十二章。

② 阿贾克斯（Ajax），荷马史诗中所述的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方面的勇将，艾基里斯（Achilles）死后与阿加米农（Agammenon）相争，后发狂自杀。

者暂言不让自己落在敌人的手内为俘虏，而宁愿自刎，这也是仗着一种外部的力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力量。妇人以投身水中来消除她的绝望，用枪自杀是一种最机械的手段，借它能够以最小的努力而得到最迅速的死亡。上吊是一种不高尚的死法，故人们不喜欢提它。英国最常见这种死法，这因为英国人自年幼时起就见惯了绞刑，而恬然不以这种刑罚为污辱。更有以服毒，割开动脉来自杀的，不过是想慢慢的与人世诀绝。至于毒蛇缠身那样的死法是最美妙的，最迅速的，最无苦痛的，与一个在欢乐荣华中度过一生的女王① 最相宜。但是，这一切手段都是靠外头的助力，是人类为着仇视自己而与之结盟的敌人。

当我将一切的自杀手段加以考虑和把历史上所载的种种自杀行动加以详细的考究时，我便发见在轻生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够象奥索皇帝② 一样以那种精神的伟大和自由来实现这种行动。他在战争中任统帅，虽陷于不利的形势，但仍未到绝境，为了差点就已归属于他的帝国的利益起见，为了免无数生灵于涂炭起见，决心以自杀离去人世。他招请友人作欢乐的夜宴，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见他已用利刃自刺心胸而死了。他这种奇特的死法我觉得是值得模仿的，我确信，凡是不能做到象奥索大帝那样自杀的人，是没有随便辞去人世的权利的。借着这种确信，我把自己从自杀的意图和妄想中救出来。自杀实是在升平时代的闲散的青年暗藏着的念头。我搜集有不少的刀剑，其中有一柄磨得很快的名贵的短剑。我常把它放在床边，在每

① 指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

② 奥索（Otho），是指神圣罗马皇帝奥索四世（1182—1218）。

晚熄灯以前，我自己每以剑抵胸看我有没有决心把它的锐利的剑锋向心头刺二三寸的深，可是我总没有一回这样子做出来，我终于自嘲愚不可及，此后我便抛去一切忧郁病的妄念，决心活下去。但是为了能以明快的心情来实行这种决心起见，我就非把一篇文艺作品完成不可。在这作品之中，我要把自己关于这个重大问题所感觉的，所思索的和所妄想的写出来。于是我把这几年来萦回于我心中的素材搜集起来，追忆自己最苦恼最悲伤的情境，但是这种构想还不能具体化，因为我还缺乏一件实事，一个小说的情节来充实它们呢。

耶路撒冷的自杀

突然间，我听见耶路撒冷① 的自杀的噩耗，刚传来这消息的概略之后，便有人详细地精确地报告这事的经过，就在这当儿，我找到《维特》的情节了。它的全体是从各方凝聚来的，却构成一结实的晶体，正如壶中快将结冰的水，因极轻微的摇动而即化为坚硬的冰那样。当时有一事更使我能够把这种稀有的收获拿得稳稳，把含有那样重要和繁复的内容的作品在胸中构想，和把所有各部分完成，这就是说我恰又陷于一种比前更少希望的痛苦处境，纵不致引起我的厌世之思，也使我非常懊恼了。

无端的置身于不习惯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总会成为一种不幸；我们常常违反自己的意志，被诱惑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同情，这种半半拉拉的情境使我们痛苦，但我们却找不到方法来弥补它或干脆摆脱它。

① 参见第十二卷“年轻的耶路撒冷”一节。

拉洛塞夫人的长女嫁到法兰克福城的某家来，夫人因常来探望她，可是嫁后的情形却不能象她自己以前选婿时所期待的那样。夫人每次来访总感到不快，也不讲求改善的方策，只一味悲叹，所以听见这事的朋友们，虽明知她的长女不欠缺甚么，她的丈夫也没有什么不依顺她，不明白她的不幸究在甚么地方，但也不得不认为夫人的长女的新婚生活是不如意的了。那时我常到这一家来，受到亲切的款待，与常来的宾客们亦渐熟识，他们或是为他俩的婚事撮合过的人，或是愿望他们俩前途幸福的人。其中，圣·里昂赫德（St. Leonhard）的牧师长杜迈兹（Dumeiz）信任我，且跟我结成朋友的关系。我与天主教的僧侣亲近，他算是第一个人。他的头脑非常明敏，给我解释原始的教会信条，惯例，内外诸关系，繁证博引，津津有味。其次，一个虽已不是年轻而风姿仍佳唤做塞维爱尔（Serviere）的妇女，我也记得很清楚。我又与阿勒新那-施韦策等家族和别的家族有来往。跟他们的儿子们友善，我与他们的友好关系到后来还继续着。这时我又突然在新认识的人家中交际出入，被邀甚至不得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游乐以至宗教仪式。我与少女时代的新夫人的情谊本来只是兄妹似的，这种关系到她结婚后还继续着。我的年龄与她的相当，在她的夫家的来往亲朋中能够理解她从幼时起就习惯了的心声的只是我一个。我们象孩子们那样互相信赖地继续来往，纵然我们的友谊没有甚么爱情的成分掺进去，但也够使人苦恼。因为她觉得也不能使自己与新的境遇相适应，物质上的处境虽然丰裕，但是，从风光明媚的埃伦布雷特施泰因的山谷，迁入城里的阴沉的商人之家，从愉快的少女时代，变为主妇，而且又要做几个儿女的继母，自然会感到不如意。我虽与许许多多的家庭发生关

系，但没有真正的关心和协作，如果人们彼此相处得愉快，一切自然过得不错，可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发生，当事者多请求我帮忙，不过我的积极的参与调处，通常不会把事情改善，而倒使它恶化。不消多久，我便觉得这种境况不能忍受下去，一切从半生不熟似的对人关系而起的不快之感，象是二重三重地压着我，我再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新决心来摆脱这种事情。

《少年维特的烦恼》脱稿

因与友人的妻的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路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致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我特使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连朋友的探访也谢绝，在内心上也把一切与这作品无直接关系的思念搁在一旁。在他方面我把一切与我这个意图有多少关系的思绪搜集起来，把还没有运用作为诗的材料的新近的生活经验加以追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那么多的暗中准备，在四周间握管疾书，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或一部分的处理方法预先打下草稿，《维特》这部作品就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了①。

在我面前堆着的原稿只略加订正改动便完成了。我即把它装钉起来，因为稿子的装订仿佛是画的配上框子那样，作品是否名副其实，装订以后象是更看得清楚一点。我象一个梦游病

① 《维特》于1774年2月初开始动笔，3月就完成。

者那样，差不多无意识地写成这本小东西，所以，当我自己把它校阅，想要加以润色删改时，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奇怪。可是我相信经过一些日子之后，从相当远的距离来看它，当会发见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因先拿它给那些比我年轻的朋友们读。这回我一反从前的老习惯，没有预先把这事说起，连写这书的计划也没有泄漏出来，故他们读了产生更大的反应。诚然，给予他们以影响的，这回还是题材，所以读了后的他们的心情正与写了后的我的心情相反；即是，我借着这篇作品，比起其他任何的创作的尝试来，最能把我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我因为自己和他人的过失，偶然和故意选择的生活状态，决心和躁急，执拗和让步等种种的原因而陷入这种心境之中，极其猛烈地被拖来抛去，这篇东西写完了我觉得象是在神父之前把一切忏悔了之后那样复归于愉快自由，该会从头再过新的生活。这一贴古老的家传药，这回特别灵验。可是，我这一方面因把实际化为诗而心境轻快明朗，我的朋友们却因而迷惑颠倒了，他们相信定要把诗化为实际，拿这小说作为模仿的榜样，甚至自杀，初时只有少数的青年是这样的想，后来却普及于大众，由是这本对于我自己那样有用的小册子，倒被目为极度危险而遭非议了。

不过，在它脱稿以后不久，它有为我毁掉的危险，如果我真个这样做了，则它会引起的一切的祸害和不幸都会偶然地预先防止了。这事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时默克才由圣彼得堡归来不久，因为他老是事忙，我不能与他详谈，只将我很关心的《维特》的梗概粗略地告诉他。有一天，他来访我，象是不大爱说话的样子继续了一些时之后，总博不到他一句的赞赏，我便悱恻激昂地读起来，可是，我稍一停顿的时候，他却极冷淡

地下一断语道："唔，很好，"不再加甚么解说，悄然起身走了。这给我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我完全呆了；因为我自己无论怎样欢喜自己的作品，一起头就听见人不加批评，我便确凿地相信，我已将原来本可怀疑的主题，情调，体裁都弄坏了，写成的只是要不得的东西。如果身旁有壁炉的话，我真会立即把它抛在里头烧掉了。可是，不一会我便再振奋起来，过了几天很苦恼的日子，终于再碰到默克了，他才对我说明白，他那天正陷在人类所不能忍受的极恶的情境中，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茫然不知我的稿子是讲些什么。其间，他的事情总算尽可能的弄妥了，正当年富力强的他会顺应难局，他的性子也恢复原状，只比从前更辛辣一点。他严厉地责我不应抢着改写《维特》的念头，劝我即照原来的样子拿它去出版。我把原稿誊好，不消多久就脱手。恰巧在我的妹妹与乔治·施罗塞尔结婚，家中正在开筵设席，热闹欢乐的那一天，来比锡城的韦干德（Weygand）书店便有信来，请求我写稿。这样的巧合我认为是一个吉兆，便把《维特》的稿子寄出去。我收到的稿费，除了偿还我为了《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出版而要背的债之外，还有多余，我因感到非常满意。

《维特》的影响

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这主要地因为它恰在适当的时刻出版，正如只须一点的火药线来爆炸一个埋藏着猛烈的炸药的地雷坑那样，当时的青年界已埋藏有厌世观的炸药，故这本小册子在读者大众前所引起的爆炸更为猛烈，而各个青年既已有着满怀的过奢的要求，不能满足的热情

和虚拟的苦恼，一触即发，故这小说所引起的激动更大。我们不能希望公众把一种精神上的作品，从艺术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正象我已从我的朋友们所体验到的那样，人们本来只注意情节题材。同时，对一本出版书籍的价值的传统的成见，认为它一定要具有教诲意义，也会助长这种误解。但是，真实的生活描写决不含有这种目的，它没有赞许什么，也没有非难什么，只把情感与行动顺其自然地展开，以此来启迪读者而已。

我对于种种的批评全不介意。对于我自己，这事算是完全结束了，那些好心的先生们，也可以看见他们是无所施其技的。但是我的朋友偏要把发表了的批评文章搜集起来，因为他们对于我的作品的见解比较内行，故把这些批评当作是滑稽可笑的资料。例如尼古拉[①]的拿来出风头的《少年维特的喜悦》(《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5年出版）的出现提供我们种种开玩笑的机会，从别的方面看来，尼克拉是一个见多识广、在文坛著有功绩的善良的人物，可惜他器量狭小，认为自己的见解才是纯真的唯一的，早已存心把一切与自己志趣不一致的东西加以贬低排斥。我的《维特》出版后，他也一定要对我一试身手，他的小册子很快就到了我们的手。科多威基[②]替他画的插画非常优美，因我极度赞赏这位艺术家之故，使我非常高兴地看。可是从这书的内容看来，象是由家制粗麻布裁成的笨拙的东西，仗着人类的常识费了一番工夫为自己家属

① 尼古拉（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1733—1811），启蒙主义的哲学家、文学家，与莱辛、门德尔松友善，但对歌德、席勒的新兴文学不理解。

② 科多威基（Chodowiecki，1726—1801），画家，生于但泽，曾任柏林美术学校校长，以铜版画见长。

造出来的粗品。尼古拉照搬我的《维特》的处理方法至二百十四页，感觉不到维特的烦恼已到了无可解救之境，维特的青春之花早已象是为致命的毒虫所啮食，当时精神错乱的他准备自杀的时候，一个洞明心理的名医却识得偷偷以一根装着鸡血的手枪来调换他的实弹的枪，结果虽然发生一个肮脏不堪的场面，但幸而自杀便不成功了。绿蒂终于成为维特的太太，整个故事，便以大团圆结束，皆大欢喜了。

关于尼古拉的小说我记得的只有这么些，我读过一回后再没有过目。插画我已经把它剪了出来，收归我的最珍爱的铜版画的收藏中。其后，我暗地里打算作无恶意的报复，写了一首短的嘲笑诗，唤做《维特的墓前的尼古拉》(《Nicolai auf Werthers Grabe》)，但不想将它发表在这里。我要将一切戏曲化的癖性在这个场合又激发起来。我写了一段绿蒂与维特的散文对话，颇谑而虐。维特认为以鸡血替代火药而得救一事，结局太坏，而大诉其苦。他虽然保得一条性命，但两眼却给鸡血弄瞎了。他做了绿蒂的丈夫而看不见她，觉得非常绝望，因为在他看来，单是触觉所能及的个别地方虽也给他一些快感，但总不如能够把他的爱人的整个体貌看个饱那样幸福。我们可以设想，绿蒂也不会认为嫁给瞎子有什么特别好处。这就可以趁机把尼古拉的做法痛加斥责，说他擅自干预别人的事。这诗全部都以充分的幽默写成，并以毫不掩饰的预感来刻画尼古拉的自负而失败的尝试。他插手自己所不能胜任的事，结果弄到后来自己和他人都不痛快，纵然他在文坛上有不少的功绩，到末了也丧失了自己的作家的声望。这篇开玩笑的作品的草稿从没有抄下来，已经散佚许多年了。我对于那小小的对话特别喜欢。青年的维特与绿蒂的纯洁热烈的爱情并不因为陷于这种悲

剧兼喜剧的境遇而减弱，反更加强，全篇都充满着柔情，就是对我的敌人尼古拉也不是加以辛辣的刺骂，而只滑稽地嘲弄。但是当我借维特那小册子作为自己的口吻说时，便没有这样的客气，那是仿效古的押韵法，这样子表达的：

任那骄慢的人
称我做危险的作家；
不能游泳的笨伯，
便要对水破口大骂！
柏林的放逐令难道我怕？
低级趣味的道学家！
凡是不懂得我的人，
不如好好的读书吧。

我既对于别人指摘《维特》的一切，有充分的预见和准备，虽听见许许多多的非难也绝不生气，但是我却没料到，与我共鸣的好意的人偏带给我受不了的苦恼。这些人，对于这篇小作品的本身没有恳切地说过称赞的话，而想寻根究底，了解我所写的究竟有多少是真事。我听了这种诘问很不高兴，通常总给以极不客气的答复，因为，如果解答这个诘问我就会把我构思那么久而使许多素材获得诗的统一的作品再瓦解了，而它的外形也不得不被破坏，由是，连那真实的诗的要素纵不消失，也至少支离破碎了。不过，再细加考察，我仍不能认为公众的这种要求是恶意的。耶路撒冷的惨剧曾轰动一时，他本是第一流的神学家、著作家① 的儿子，有学问的，无瑕的，可爱的青年，身体健全，家境丰裕，却突然间，由于不明不白的原因，辞去人

① 这里指的是约翰·弗里德里希·耶路撒冷（1709—1789）。

世（1772年10月29日）。这等事怎样会有呢？无论何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后来人们知道了那是由于不幸的恋爱的原因，这就在青年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同时，他在上流交际社会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快的小事又传出来，整个中层社会的听闻也为之耸动，结果，谁都想知道这事较详细的真相。现在，在《维特》中有详细的描写出现了，人们以为在《维特》中就可再找出耶路撒冷的平素生活和思想。所描写的地点和人物恰与实际的相符合，而叙述又非常自然，人们因相信从这小说可以完全知道事情的原原本本而感到满足了。可是，再把这书精细地检视一下，便发现许多与实际相抵触之点，分析的批评必然引起无数的疑窦，想寻求真相的人便觉得不能忍耐而要知道究竟了。不过他们想寻求根底也是枉费心机；因为我虽把我自己的生活和苦恼，掺入那小说的构想之中，但我既是一个不受人们注意的青年，纵不是秘密地也是在幽晦中过日子，故不愿把这个哑谜儿剖明。

从事这一著作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来从许多美妇人中撷取精华，造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可庆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把许多美丽的女郎们的容颜和特性合一炉而冶之，铸成那女主人公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却是从我最爱的女郎处撷采来。好查究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大家闺秀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人。这样子，好几个自以为是绿蒂的人却使我不胜其烦，因为逢人都想确知真正的个中人是属于谁。我想师纳旦（Nathan）的故技，乞灵于三个指环①。这种解说诚然会为较有头脑的人所

① 见莱辛作的《智者纳旦》。有人问纳旦世界上三种宗教之中哪种才是真正的宗教，他便以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中的三个指环的故事为喻，说得很巧妙。

接受，但是轻信的人和读者大众却不肯就此满意。我希望过一些时候就可以摆脱这种寻根究底的苦恼，可是我一辈子却为这种诘问所苦。在旅行的时候，我想隐姓埋名来避免这种烦扰，不过连这种办法不料也归于无用。这样子，这小册子的作者，就算是为此做了一些不对和有害的事，他的罪过也从这种无可逃避的诘问包围阵中受到充分的，甚至过分的惩罚了。

我既为这种情形所困苦，只越发明白作者与公众之间是为一条鸿沟所隔，两方如都不知道这点，那就是他们之幸。因此，一切象序言那样的东西之徒劳无功，我早已看清楚。作者越想将自己的意向说明白，他的序言越发惹起人的迷惑。而且不管作者把序言写得多么精辟，读者大众仍老是要向作者追问他本来就力图谢绝不说的事。关于读者——特别是把自己的批评发表的人们——的共通的偏见，我也早已熟知，在我们作者看来，那是很滑稽的。即是，他们抱有一种妄想，以为作者有什么创作，就象是欠了他们的债似的，纵然到书快要出版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的作品，茫然不知象这样的情节也会出现或竟有此可能，但总以为这作品是远落于他们本来所企求和所期待者之后。即便把这样的事完全不放在心里，现在人们都想认识、接近我这个突然大胆地出现的异样的青年作家，却变成我的无上的幸福或最大的不幸了。人们希望见我，跟我谈话，甚至在远方也希望听到关于我的消息，因此，我便被迫尝到门庭若市的滋味。来访的客人有时是讨人欢心的，有时是讨人嫌的，但总是使我费时失事。因为我身边还有许多许多开了头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以一向的热心继续来干，那就够我两三年的工作。本来宁静、幽晦的境界是大有利于完美的创作的，但是我却从这种境界中被拉出来而置身于白昼的嘈杂之中，为他人

而消失了自己，因为他人的冷淡、同情、赞赏、非难而茫然无所适从。因为世人对我们的表态论议都是隔靴搔痒，总不与我们自己内心修养达到的阶段相适应，所以不能掖助我们，而必然有损于我们。

戏曲化的倾向

不过，有一事比起日常的纷扰来更足以妨阻我去从事和完成较卓越的创作，就是流行于我们青年作家间，把实际生活中一切略可注目的事情戏曲化的好尚。“一切戏曲化”是我们青年作家间专用的术语，它的意义究何所指，让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在极快乐的日子里聚在一块，谈笑风生，兴高采烈，便惯把通常应该搜集起来写成较大的作品的题材零敲碎打分裂为短篇的速写。一桩单纯的事件，无心说出来的天真的警句，甚至带有憨气的话，误解误会，似非而是之论、聪明的隽语、个人的特点与习性，甚至一点可注目的表情，——总而言之，在一个五花八门、嘈杂的生活中常会发生的一切现象，都以对话，问答，激动的刻画或演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用散文的体裁，但用诗的形式的时候更多。

当时认为真正的诗的思想方法，是以这种天才的而又热情的写作的实践表现出来。即是，我们描写时任我们的对象、事件、人物照着原来的样子，原来的种种关系，我们只努力准确地把握它们和生动地摹绘它们。一切批判，无论是赞同或反对，应在观众的眼前以活生生的形式发挥。我们可以称这种创作为生动的机智的短诗（Sinngedicht），它不具有什么棱角锋芒，而能洞中肯綮，饶有明确的特征。我所写的一年一度的

大庙会（大集市）① 就是这一类的作品，或不如说这类的诗的汇集。在那儿出现的化装的人物，实有所指，或是我们朋友间实际上活着的人，或是至少与他们有关系和略认识的人。但是实在的人大多数对于这个哑谜还是猜不出，看了只笑，却不晓得他们自己的特性成了笑柄。其次，巴尔特的《新默示录的序曲》② 是另一例子。还有同类性质的极短的诗夹在杂诗之中，但很多已散逸无存了，还保存在手上的有许多又不想发表。当时将这类的诗印行，只增加对读者大众的激动和他们对作者的好奇心。将手写的这些诗稿给亲交的朋友们读，那就使他们高兴起来。我们亲交的一伙人后来愈加扩充。巴尔特博士那时正在基森，有一天来访我，表面上很殷勤亲切，拿我的序曲来说笑，并希望跟我结交。但是，我们青年人在聚在一块的时候继续做这种的恶作剧，总要把从别人观察得来和巧妙地加以刻画的特性拿来作为暗地里恶意地笑谑的资料，才感到痛快。

莫泽其人

我这个青年作家，被目为文学界的流星，博得人们的惊叹，我诚然不会不高兴，但我仍以带着喜悦的谦逊的态度敬重那些真正的第一流的前辈作家。其中最杰出的为尤斯图斯·莫

① 原诗的全名为《旧货摊的大集市·一个化装跳舞会》，1772年12月草拟，第二年2、3月续写，1774年印行。

② 巴尔特的《新默示录的序曲》（《Prolog zu Bahrdts neuesten Offenbarungen》），1774年出版，巴尔特（Karl Bahrdt，1741—92）为新教主义理性主义的神学者，1773年所著的《关于神的最近的默示的书翰和故事》（《Neuesten Offenbarungen Gottes in Briefen und Erzählungen》），歌德因作此小戏曲讽刺他。

泽①这个卓绝的人的小论文，论及政治问题，曾在数年前刊载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城的《知识界周刊》（Intelligenzblätter），由赫尔德尔介绍给我阅读。赫尔德尔对于当时稍有价值的著作，特别是印出来的东西，无不过目。莫泽的女儿沃伊特斯夫人（Frau von Voigts）正从事这些散见的论文的搜集。我们等不了这论文集刊行，我直接与夫人通信，我在信里保证我的诚恳的共鸣，称道莫泽氏为特定的读者阶层而写的有力的文章，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到处可供人利用而产生功效。她和她的父亲得到一个象我这样的也颇知名之士的称许，甚为满意，他们关于论文出版的销路所抱的杞忧因此为之暂时扫除了。

莫泽这种小论文，全部都是以同一的动机写成，因而构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在其中，关于公民政治生活的极其深刻的认识可惊叹地可钦佩地发表出来。我们在其中看见政治制度怎样以过去为根据而又怎样活生生地持续。一方面我们看见人们怎样墨守传统，他方面，又看见文物制度的变迁进展无法阻止。在某个场合，世人连有利的革新也怀恐惧之心，在另一场合，对于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新事物也感兴趣和表示庆幸。著者论述阶级间的关系，城市与乡镇的相互关系毫无偏执之见。我们由是知道它们的权利是怎样，以及有什么法律上的根据，我们又明白国家的基本资金是投放在哪儿，它会产生出什么利息。至于所有权与其利益怎样，赋税及其他种种的损耗又怎样，关

① 尤斯图斯·莫泽（Justus Möser，1720—94），奥斯纳布吕克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著述有《爱国者的空想》，对歌德、赫尔德尔有很深的影响。

于种种色色的产业、企业都详加阐明。此外，过去时代和现代的有关情况，这些论文也加以对照比较。

奥斯纳布吕克城本是汉撒同盟的一员，在中世纪时期商业非常繁盛。从那时的情势看来，这城占优越的地位；一方面能吸收内陆的产物，他方面与海距离不远，能进行海上的活动。但是，到了晚近，它已成为内地的都市，渐渐与海上贸易的舞台疏远，甚至被排除在外。关于这种推移的由来，莫泽从许多方面加以说明。他论及英国与欧陆沿岸诸地，海港与内地间的冲突，指出滨海的居民所占的优势，恳切地建议内地的住民以怎样的方法也来取得这样优势。其次，我们从论文中还知道许多关于旧式商业、手工业的事，它们怎样为大工场所压倒，为零售商所破坏；我们看见这种衰落是种种原因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新的衰落的起因，因果相生，循环无尽。不过这位善良的公民把这种事实阐述得那样明晰，使人看来仍以为有避免这种必然的趋势的可能。就是关于最特殊的事态，著者也无不表现出他的彻底的深刻的见解。他所提出的方案、建议都不是向壁虚构，不过仍往往难于实行，故他把出版的论文集名为《爱国者的空想》（《Patriotische Phantasien》）其实，其中所论的一切都还没有离开现实和可能的范围呢。

可是，一切公共生活都以家族生活为基础，故作者也主要地对此加以注意。他在这方面的观察亦庄亦谐，道德、习惯、衣服、饮食、家常生活、教育的变迁成为他考察的对象。如果我们要将他所论述的事项列举无遗，我们就要将一切与公民生活和文教有关的事分门别类地标出来。他的这种处理方法确值得人敬服。他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务家，在周刊的论坛中对民众说法，使任何人对于一个明智和善意的政府应计划和实行

的事有正确的了解，可是，他的笔调绝不是说教式的，而是以繁复多趣的形式出之，可以称为诗的形式而无愧，在最高的意味上且确可以称为修辞的模范。他总不为题材所拘束，而超出题材之上，说到最严肃的事情也使人有明快的观感。有时借用这人那人的口吻，有时自己现身说法，但无不完美和淋漓尽致，而且常带着愉快的口气，杂有一些讽刺的意味，精干、公正、善意到处流露，有时虽不免横肆激越，但总有节制，所以我们读了，不能不同时钦佩著者的精神、智力、轻妙、熟练、趣味和性格。以著者之选择带有公益性质的题材，深锐的观察力，广阔的视野，优秀的论述的手腕，轻妙而又透辟的谐谑而论，以我所知，只有美国的富兰克林可以比美吧。

这样一个著述家使我们极其感动和敬佩，对于一个欲有所作为，着手要做大事的青年有极大的影响。以他的论文而论，我们相信自己写起来也可以得其形似，但是，谁敢希望掌握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和能够以那样轻快灵活的手腕来处理极其别扭的题材呢？

然而，我们企望把自己所尊重敬服的东西尽可能地化为已有，以致能由自己把它创作出来，表现出来，是我们一种极美极甜蜜的妄想，它纵然在我们生涯中惹起许多痛苦，我们仍不应放弃。

第 十 四 卷

《维特》的发表除了在读者大众中激起上述的波澜之外，还引起另一种波动，对于著者也许较有意义，这因为它是在我的身边发生的。我的老朋友中已读过那轰动一时的《维特》的原稿的人，因此差不多认为自己也有一分功劳，因他们以前大胆预言的大成功终于得到实现，而感到胜利的愉快。除了他们之外更添有新的同情者，而自觉具有创作的才能，或希望激发或育成这种才能的人更特别兴奋起来。

再谈伦兹

在前一种人中，伦兹① 最活跃、最突出。这个值得注意的青年的外貌，以前已略有描述，他幽默的天才亦已有称道，现在让我谈谈他的性格，着重叙出造成它的结果，而不细加刻画，因为要紧紧伴随着他的一生所走过的纡回曲折的道路，逐一把他的特性加以描写，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呢。

我们知道当时的青年虽没有从外界吃过什么苦头，或从别

① 伦兹的简历参见第十一卷“伦兹”一节，在斯特拉斯堡与歌德结识后，出版有诗集、喜剧《家庭教师》、《军人》和《剧坛述评》等著作。1777年一度发狂，1781年以后在莫斯科任家庭教师。

人受过委屈，而偏要自苦，这种现象很为流行，恰恰使极优秀的人们的心情抑郁不安。凡是不会内省、不会自我剖析的普通人只引为一时的痛苦、旋即置之脑后的事，却为这些优秀的青年敏锐地看出来加以注意，以及在文稿、信札、日记之中留下痕迹。但是，对己对人的最严格的道德的要求，却伴着在实践上的极大的疏忽、怠慢，由是，从这一种半吊子的自我认识发生的自负心，造成最奇怪的癖性以至恶习。可是那时兴起的经验心理学又承认这样的过偏的自我分析，它认为使我们内心不安的一切东西不全是坏的，可非难的，但仍不能无条件赞同。因此关于自苦的心理解释便发生永远的无可调和的论争。现在，作这种论争的先导和支持者，伦兹比起一切在内心上搞垮自己的闲人或半闲人都超过。因此，他在这一般情况下为那种本应由于《维特》的描写而告终结的时代精神所苦恼，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个性，与那些应视为坦白诚实的人有别，即是，他有一种施诡计弄玄虚的坚牢的倾向，而施诡计只是为了施诡计而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目的——合理的、利己的、可以达到的目的；他倒惯常企图做些奇怪荒诞的事，并以此来不断寻笑取乐。这样子，他一辈子是一个虚构的无赖汉，他的爱和憎都是想象的，他任性地支使他的思想感情，以便能常有事干，以慰无聊。他谋以极离奇古怪的方法来使他的爱和憎有现实性，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常由自己把它毁灭。因此对于他自己所爱的人们他从没有给以利益，他所憎恨的人也从没有受他的损害。究其竟，他象是只为自惩而试作罪恶的事，只为着常能把旧花样翻新而弄阴谋。

他的才能是源于真实的心灵深处和用之不竭的创作力，在其中，纤柔、灵活和细致，互相竞赛，然而他的才能虽有种种的

美，同时却病态毕露。最难评价的正是这种才能。他的作品中之有某种伟大之处，是不容无视的。一种款款的深情隐约地流露于最稚气和最怪诞的恶谑之间，即使他有很彻底、质朴的幽默味和真正的喜剧的手腕，也难原谅他这种缺点。他的日常生活是由微不足道的事物构成，他藉着无事忙来使它有特殊的意义，加以他赋有过人的记忆力，他花在读书的时间总给他以丰富的收获，他的独创的思考方法提供他以种种色色的材料，因而他更可以消磨掉他的时间。

他被派随同利夫兰（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到斯特拉斯堡来，选他那样的人做家庭教师实大为失策。上年长的男爵有一些日子回到故国去，留下一个他爱宠甚深的情妇①在德国。与男爵一道来的第二个弟弟也垂涎于这个女人，此外还有一些人对她醉心，伦兹为了杜绝撵去这些爱的篡夺者，替他的远出的朋友保存他的珍爱的心头一块肉，决心装作是跟她恋爱的样子，或不如说，真个与她发生恋爱。于是，他把那个女人的优点构成他的理想，以极顽强的态度，来实行他自己的方案，追求他的理想，可不知道他自己也是象别的求爱的人那样是拿这女性来开玩笑供娱乐吧。可是，对于他这正是最好不过的事呵！因为在他看来，这也不过是游戏一类的事。况且那女的方面也以游戏的态度来报他，时迎，时拒，一会儿逗惹他，一会儿又把他冷落在一旁，所以这个游戏更闹得长久。当他清醒过来时（许多时确是如此），我们相信，他恐怕会洋洋得意地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意外收获的幸福吧。

① 名唤苏珊娜·克莉奥菲·费比希（Sussana Cleoph Fibich），一个珠宝商的女儿。

此外，他与他的生徒小男爵们同样，大多时与卫戍军的将校们往来，由于这种交际，他得到一种奇特的观感，后来他把它在喜剧《军人》中发表出来。他既早就习于军旅，因产生一种奇异的结果，即是他自命为娴于军事，而实际上也渐渐在这方面作专门的研究，以致数年之后，他上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条陈给法国陆军大臣，自期从此可以得到极大的成功。在这条陈中，关于军务的种种缺陷虽然扬陈得颇为得当，但他的改革方案却幼稚可笑，不能实行。可是他自己确信藉着这个条陈他定会给予法国王室以很大影响。因此，当他的朋友们或提出反对的论据，或以反对的行动，阻止他把已经誊好，附着书简封入信封和照着正式手续准备呈递的空想的条陈送达，并终于迫使他把它烧掉时，他大为抱怨。

他与那女人的曲折迷乱的恋爱故事的整个原委，他曾向我初时用口头后来用信剖白过。他能够以最平凡的事入诗，常使我惊叹，因此我激励他把这桩纡回漫长的艳史的中心部分巧妙地加以润色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但是他对于这事毫不在意，一若他只不着边际地沉溺于个别的琐事之中，没有目的地纺着一缕无尽的丝那才得其所。我现在已将他的生涯作了初步的叙述，至于以后直到他发狂时的一生历史，也许将来有一天可设法再作一些补充的说明。因此在这里我只提到与本书这部分有关的事实。

《葛兹·冯·伯利欣根》出版不久，伦兹即寄给我一篇长文章。他的文章是写在他常用的粗劣的稿纸上，写得满满的，上下左右都没有空白，它的题目唤做《关于我们的结婚》(《Über unsere Ehe》)。如果这篇东西现在还在手头的话，我相信读起它来，可以使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比当时更加明瞭。因为我当

时关于他和他的为人还是茫然搞不清楚呢。这篇长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把我的才能与他的才能对比，时或屈我居于其下，时或使我与他并肩，但是全篇却充满着幽默和纤巧的词句，因此我欣然接受他谈及我的见解。加之我实际上非常敬佩他的才能，只不绝地劝勉他不要那样东拉西扯地信笔漫谈，而聚精会神以艺术的体裁来善用他的天赋的想象力，我之接纳他的意见，更是当然的了。我诚恳地写信回答他的信赖和好意，而且他的文章既要求与我作心腹的朋友（由那奇怪的题目就可察见了），我便把我已写成的东西和在打腹稿的东西，和盘告诉他知道。而他也陆续把他的原稿寄给我看，其中有《家庭教师》（《Hofmeister》）、《新曼诺察》（《Neuer Menoza》）、《军人》、《普劳塔斯[1]作品的拟作》以及作为《剧坛述评》（《Anmerkungen über das Theater》）附录的英文戏曲的译文。

对于这本《剧坛述评》，我觉得有点诧异的地方，就是他在那简单的绪言中说，此书的内容是对那些正常的戏剧加以剧烈的攻击，这是数年前在文学家的集会中讲演过的，那时我的《葛兹》还没有着笔。伦兹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有什么我不认识的文学团体，似是一件成为问题的事，不过，我不管这疑问了，不久就替他这篇论文和别的著作找到出版的书店，他好挑我做他假想的憎恶的绝好对象，冒险的和异想天开的迫害的目标我也绝不以为意。

依着叙述的次序，我想把一位好朋友略叙一下，他虽不是

---

① 普劳塔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公元前254？—184），罗马的喜剧作家，莎士比亚和莫里哀都受他的影响。

具有非常的天才，但也算是我们中人之一。他的名字唤做瓦格纳①，初在斯特拉斯堡后在法兰克福城都加入我们的队伍里，也有相当的智慧、才情、教养。他显出是一个勤奋有作为的人，故为我们所欢迎。他也跟我很要好，我心里想什么都不瞒他人，所以我也象对别人那样把我的《浮士德》的腹稿——特别是关于格丽琴的悲惨的结局——告诉他知道。他于是采取这个题材，写成一篇名叫《杀孩子的女人》(Kindesmörderin)的悲剧，他人掠取我自己的构想，这实是破题儿第一遭，这虽使我感到不快，但没有把他怀恨在心。我后来还常碰见这样的腹稿的剽窃，不过我本性狐疑不决，有了什么计划、设想便好喋喋地对人诉说，我也无权责怪别人呢。

克　林　格

演说家和著述家为了要使自己的论述产生大的效果，好应用对照法，而对照的事物却先要特加寻找然后获致，但是当我以从伦兹说到克林格②这两个人物恰恰背道而驰，我顺手牵羊，得到对照，因感到很愉快。两人是同时现身文坛，在青年时代彼此并驾齐驱。然而，伦兹象是一颗飘忽的陨星那样，在德国文学的地平线上只出现一瞬间，就突然消逝，在世间不留下

---

① 瓦格纳（Heinrich Leopold Wagner，1747—79），出生于斯特拉斯堡，与歌德同在那里学习，1774年移居法兰克福，初从事著述，后任律师。

② 克林格（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生于日内瓦城，出身微贱，后在基森城考入大学学法律，继成为有名的著述家。1773年与歌德结识，1775年模仿《葛兹》而发表《奥托》一戏曲，其后续作一些戏曲、小说行世。1780年以后，他投入俄国军籍，曾任中将，多尔巴特大学校长等职。

一些痕迹。反之，克林格是一个富有影响的作者，勤勉的实务家，至今仍脍炙人口。两人相异之处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不再作比较，况且后者在著作和实务两方面的活动都已公诸于世。他的功绩遐迩皆知，至今仍为人所怀念和仰望，因此，关于他的生平，我只拣必要的地方讲出来。

克林格的外貌——我描写人老是好从外貌开始——有过人之处。自然赋予他以长身玉立的俊伟的体格，和端正的五官。他是一个讲究外表的人，打扮得整齐，可以称为我们一小伙朋友中最美的男子。他的举止态度，既不是殷勤，也不是冷淡，在内心没有什么激动的时候，是安详的。

我们之爱慕一个女子是爱她现在的样子，我们爱慕一个青年男子，是着眼于他未来的前途，我就是这样子一认识了克林格就成为他的挚友。他以一种纯洁的温厚的性情吸引人爱慕，他的一见就判然分明的坚定的性格博得人的信赖。他从幼小的时候起就度着严格认真的生活，与一个同样美好善良的姊妹一道侍奉母亲，他们的母亲是守寡的，正靠她的儿女来扶养。他所具有的一切成就全是靠自力获得来，所以在他的举动中流露出来的独立不挠的自负心，谁也不以为忤。凡是天资好的人共有的确定的素质，如敏捷的理解力，非凡的记忆力，能言善辩，他都兼备而且达于高度。但是他自己对于这一切优点象是没有对于刚毅、坚忍的性格那样重视，后一种优点也是先天的，经过种种境遇而充分地坚定下来。

对于一个这样的青年，卢梭的著作一定很合脾胃。《爱弥儿》（Emil）是他的最看重最爱读的书，这名著所表现的思想见解既倾动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对他的影响更是富有成效。真的，他恐怕比任何人都能得到《爱弥儿》的好处吧。因为他本

身也是“自然之儿”，出身社会的下层，而卓然自立，别人要抛弃的东西，他本身从来没有过，别人要摆脱的社会关系也从不曾束缚他；因此，他可以称为“自然福音”的最纯真的弟子中的一个，再以他的真挚的努力 作为人类一员和人子的行为而论，真可以高喊：“凡是来自自然之手的一切都是善良的！”但是，连这口号的后半截“经过人类的手的一切就变成丑恶！”① 也使他不得不熬受恶劣的处境。他没有对自己本身斗争，而是与自身以外的因袭的世界搏斗。而这个日内瓦的市民（见前注）想把我们从旧世界解放出来。处于青年的地位，这种斗争常是艰难惨淡的，他觉得为了能够受到一种十分愉快畅适的教养、陶冶，就需要更坚强地返于自我。他不得不边斗边冲，自己杀开一条血路。因此他的举止隐然有一种严峻之色。其后，他自己也有点助长这种特性，但矫正和克服它的努力还是占了上风。

就我记忆所及，他的创作显出一种严密的理解，真诚的胸怀，活泼的构想，关于复杂的人性的确当的观察，关于种属的差别相的各具特色的描绘，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女孩、男孩都是爽直而可爱，青年充满着热情，壮年以上的人物素朴而明达，所贬抑的人物也描写得不流于夸张。明朗快活的心情，机智妙想也常流露：譬喻和象征供他自由驱使。他懂得如何给读者以欢乐，如果他不是不时以一种辛辣的愤恨来冲淡他自己和读者对于那些明快而有深刻意义的谐谑的高兴，则那种欢乐就会更为完美。不过，这正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地方，正因为这个缘故，各种类型的人和作家才存在着千差万别，以致各个人在理

① 这两句话都是卢梭的名言。

论上徘徊于迷与悟之间，在实践上彷徨于创造与毁灭的歧路。

克林格是凭着自力，以自己的心性和智力教养自己而入世途的人的一例。可是，这样的情况在多数人身上同样出现过，他们在交往中彼此所用的语言是源于一般的人性和国民的特性的平易通俗的语言，他们用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既有力量而又有效果，因此，象克林格那样的人，对于一切学究似的典雅的语文形式，都始终极度憎恶，如果这些形式是同本来的活生生的现实源泉隔断，堕入舞文弄墨的邪门歪道，完全失去它们的最初的新鲜活泼的意味，他们更特别讨厌。象反对新的主张见解和制度那样，他们对于新发生的事件，新露头角的人物，因其预报或促进大的革新，也力加反对。他们所以持这种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革新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存在与教养的基础，故绝不应责备他们。

但是，一个人具有卓绝的性格，坚持到底，纵历经人世和事业的变化，而仍不改初衷，他应付当前的事物的态度，在许多人看来纵是生硬甚至横暴，但能看准机会最确实地达到他的目的，则这种坚毅更可敬。克林格就是如此。他没有温顺性（固然德国自由市出生的人之具有这种德性者实未见过），然正因此更能干练地、坚强地、诚实地努力致身于显达的地位，保持勿失，继续博得那些宠遇他的王侯的赞赏和恩惠，但仍绝没有忘掉他的故人，忘掉他从前走过的人生之路。还不止此，克林格极力保持他对于过去的追忆，不管往事、故人怎样疏隔，他总念念不忘。例如他仿效威利基斯①，在他的饰以勋章的纹章

① 威利基斯（Willigis，975—1011），是美因兹的世袭僧正，原是车匠之子，为了不忘本，在他的纹章上也采用车轮的形象。

中，保存往时的标志，使不湮灭，这种做法确是值得一提的。

拉瓦特尔的为人

不消多久，我也与拉瓦特尔结识①。我所写的乡村牧师致其同道的信有些地方给他不小的启发，因为有许多点同他的见解完全一致。他既是一个活动个不停的人，我们的通信不久便频繁起来。他当时正热心准备他的相面术大著，其中的序论早已公开发表。他请求一切人送给他肖像画，剪影头像，特别是基督像。纵然我对于肖像画一道几乎一窍不通，他也希望我照自己所想象的，画一个救世主的像出来。他这一类的不可能的要求，每给予我以种种的笑谑的资料，为对付他这种奇怪的癖好，我只有把自己的癖性也端出来。

不相信相面术的人，或至少认为不确和骗人的人为数很多，即使对拉瓦特尔不怀恶意的人，也喜欢考考他和设法戏弄他。他也曾向法兰克福城一个有相当的艺术手腕的画家，定绘几个当地知名人士的侧面画。这画家要跟他开玩笑，先把巴尔特（见第十三卷“戏曲化的倾向”一节的注）的像，当作是我的相寄去。他接得后即覆回一封虽然谈笑风生而大发雷霆的短信，极力断言那不是我的肖像，以及说了一大篇他在这种绝好机会可以拿来证实相面术的话。后来寄给他的我的真正肖像，他比较认为满足了，但是，他跟任何画家也好，跟任何个人也好，不能完全融洽之处在这里也表现出来。即是，无论哪

① 拉瓦特尔1741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1769年以后任该地的基督教会的执事，1773年8月14日第一次写信给歌德。参见第五卷“拉瓦特尔”一节。

一个画家替他绘画，总不能真实和准确到使他满意；一个个人无论有多少的优点，总远比他对于人性和人类所抱的理想为劣，以至一个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的特性总引起他的一些反感。

他依据自己的意识和人性培养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概念与他心中对于基督所抱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完全打成一片，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同时成为基督徒，而仍能生活呼吸于天地之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我对于基督教的关系，只在精神感情方面接近，而对于拉瓦特尔所倾向的在肉体方面存在亲缘关系之说，我绝没有一点概念。因此，象他那样的聪明、诚恳的人，而以激烈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向我和门德尔松（见第七卷“神学的状况”一节）以及他人扑过来，强要我们接受他的意见——即是我们要么跟他一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象他那样的基督徒，要么把他拉到我们自己身边来，在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说服他，使他改宗——使我感到不快。我已渐渐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他这种强求既直接与这种世界观相抵触，对于我不起什么大作用。本来，劝人改宗的企图，如不成功，就使那些挑来做改宗说教的对象的人倔强固执起来，我便是如此，加以拉瓦特尔最后竟把“不为基督徒即为无神论者！”那样严酷的两难论法端出来，我更忍不住，而回答他说：如果他不容许我一向所保持的基督教观，我也未尝不可以改信无神论，因为我觉得两者真正的意义究竟是甚么，谁也搞不清楚。

我们这样子往还的书信措辞虽很激烈，却没有妨碍我们的敦睦的友谊。拉瓦特尔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忍耐，固执和坚毅的品性，他确信自己的学说，他既抱有宣扬自己的确信的坚定决心，用强为做不到，他却甘心以温和、耐性等待的方法来贯彻

它。要之，有少数人的外部的职业与内面的使命完全一致，最初的教养与后来的教养有不绝的联系，自然地一贯地发展其能力，这种人是很幸福的，而拉瓦特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既生而具有极精微敏感的道德的素质，故他决定以牧师为业。他受过这种职业所必需的训练并显出异常的才能，但无意进一步接受真可以称为“学术的”那种教育。他虽比我们长许多年，也为当时的自由和自然主义的时代精神所感动，这种时代精神在任何人听来都很动听，根据它，人类不用外界怎样的助力，在自己本身中就备有充分的材料和内容，成为问题的就是怎样适当地开发它们。牧师的职责在普通的意味上是对别人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在较高的意味上是发挥宗教的感化作用，这种职责与他的思想倾向完全吻合。即在青年时代，他的最有力的内心冲动，就是把自己所抱的诚实敬虔的思想传与别人，并唤起他们这种思想，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象留神自己那样留神他人；对自己的注意，靠着细密的内心，对他人的注意靠着锐利的眼光，从而予以推动，减去困难。不过，他本性不宜于作哲学的观照，真正的写作手腕，他也缺乏，他倒觉得自己的一切力量是要倾注在行动方面，实际方面，所以，象他那样孜孜汲汲地力行不倦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可是我们的内部的道德生活是体现于种种外部的条件中，我们总要属于一个家庭，阀阅，行会，城市或国家，因此，他如果要以活动收实际的效果的话，同时必须接触这一切外部的条件，必须使它们动起来，由是定会酿成许多冲突和纠纷。特别是因为他生长所在的瑞士共和国社会在一种极严密、明确的制度里，享受一种值得称赞的传统的自由，他更会如此。他自幼小的时候起，留心政治，与人讨论公共问题已成习惯。在正当青春的时代，他已为同业

公会的会员，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如果他想作出公正独立的判断，他就首先要确知他的同城的市民的价值观，认识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探求他们的思想和能力，这样，他既努力考察他人，同时也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的内心了。

拉瓦特尔很早就在这种情境中锻炼他自己，而正是这种活动象是占去他很多时间，使他不能多致力于语言的研究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成为它的基础和目的之分析的批评法方面。到后来，他的知识和理解日益比前广博得多，他仍常常郑重地或以戏谈的口吻表白自己不是学者。他之所以停留在《圣经》的字面，以至《圣经》的翻译上面，以为在这上头就可以找寻到他所需求的，所企盼的充分的食粮和助力，我们不能不说是正由于这种深入的研究的缺乏。

但是，没有多久，那根据行会制度慢慢地活动的地盘，对于生性蓬勃活泼的他，已嫌过窄了。守正不阿，在青年的他看来是不难的，一个心情纯洁的青年对于自己未尝犯过的奸邪行为，深恶痛绝。当时有一个地方长官暴虐不道，市民有目共睹，所难的就是向法庭告发他。拉瓦特尔便与一个朋友联合，两人匿名威吓那个应该懲罚的长官（见第十二卷“韦茨拉尔”一节的注)。这事洩漏出来了，当局必须查办这事。结果那长官被判为有罪而处刑，而导致正义伸张的人，虽没有遭谴责，也受非难。因为在一个秩序整然的国家内，正义本身也不应以不正当的手段来实施呢。

拉瓦特尔后来遍游德国，到处与学者和思想家接触，可是他因此更加强他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回到故乡之后，他日益放胆自由地依靠自己来活动。他既是一个高贵善良的人，对于人性一向抱有一个美好的观念，一切在实际经验上与这观念矛盾

的地方，一切与完美的人性相乖离、不容否认的人类的缺陷，应由神的观念来弥缝。即是他心中的神是降临于现世的正中，体现为人性，来使最初与神相似的形象完全恢复。

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的初期的叙述就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首先愉快地讲我们与他的面晤和欢叙的经过。我们与他通讯没有多久，他就写信通知我和别的法兰克福友人，说他快就实行他的旅行莱茵河的计划，顺道到法兰克福来。马上本城的社会大为轰动，无论何人都抱着好奇心想来见见这个名噪一时的人物的风采；有许多人希望从他那儿获得在道德和宗教的修养上的教益；怀疑他的学说的人等着要拿出有力的反对意见来，其中自负的人以为一定可以拿出自己所确信的论据来难倒他，羞辱他，其他一切的愉快与不快的事都等待着这位要与这样五花八门的社会打交道的知名人士了。

我们初次见面是很恳挚的，我们极亲切地拥抱，我马上认出他就是我在许多幅肖像上见过的同一的人。一个风貌非常特异、卓越，从前没有见过，将来也不会再找到那样的人物，生气蓬勃地活跃地现在我的面前。反之，他骤然看到我的一瞬间，从他异样的惊喊声就泄露出他心目中的我不是这个样子，我则按照着我先天和后天养成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他断言："神和自然既已把我造成这样的人了，我们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们随即谈论到我们在信中彼此最难一致的极关重要之点，不过详尽的讨论却没有余裕。那时我体验到我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的事。

向来我们要谈论到关于精神和感情的事的时候，我们惯常离开一般人，离开自己平常交往的朋友，静心讨论，因为人多，思想方法繁杂，教养程度参差，即便想要与极少数人取得

意见一致也不容易。但是，拉瓦特尔关于这一点的设想却全然不同，他想要使他的学说的影响广为传播，最好是与普通群众交谈，他既有那种神妙的相面术为助，启发这一种人和逗引他们笑乐是他的特殊的长才。他一见就能把人的人格人心正确地辨别出来，所以任何人给他看了一眼，他就能看出他究是怎样心性的人。再加之以对方的诚实的自白，恳挚的诘问，他就能凭他的丰富的内外经验，予人以适当的解答，使任何人都觉得满意。他的深湛的温柔的眼光，他的十分可爱的嘴唇，甚至他的带有德国南部高地音调的响亮而纯朴的瑞士方言，以及他的其他许多特征，使听见他讲话的人，都感到心神宁贴，极其愉快。甚至他的因胸部平凹而微向前弯的上半身，也使人见了他得到一种谦逊的印象，而不致在他面前有受威压之感。对于傲慢自大的人，他会很冷静地巧妙地应付，初时他象是避人的词锋那样，后来突然拿出一个象金刚石做的盾那样的、见识短浅的论敌从不会想到的精辟见解出来，而又仍把这见解所放的光芒加以适当的调节，以致他的论敌至少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受了启迪，被说服了。恐怕有很多人还继续留有这种的印象，因为唯我主义的人同时也不失为善良的人呢。成为问题的，只是这个坚硬的壳要花点工夫，轻轻敲破，才发见它所含的可以多产的核呢。

但是，有些人因自己外貌丑陋之故，对于拉瓦特尔所主张的外形与内心有密切的关系之说，自视为不共戴天之仇，碰着这种人倒使他感到莫大的痛苦。他们既把相面术当作是侮辱他们的人格的学说，因而常应用相当丰富的常识，以至其他的才智，带着强烈的反感和小心眼的怀疑，来打破这学说。在他们看来，象苏格拉底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是不容易找到的，而他的

象半人半羊的外貌有裨于德性之修习的事实偏显现出来。拉瓦特尔很怕他们这种执迷顽固的态度，他的应战也不免带着激情，正如熔炉之火要吁吁地熊熊地烧熔那顽强抵抗的矿石那样。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进行有关我们两人本身亲密的会谈是没有指望的了，固然，我自己从他的待人接物的方法的观察而得到许多教训，但仍不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由此有所改进。因为我的处境跟他的毕竟全不相同呢。凡是在道德方面从事工作的人，决不会徒劳而无功。他们可期待的收获比《新约·圣经》对播种者所明白保证的还大得多。反之，在艺术方面活动的人的作品如不被公认为艺术品，则他花在这作品上的辛劳便是白费的了。我在上头已经讲过，对我同情的可爱读者的诘问怎样使我不耐烦，因为甚么的理由我极不喜欢跟他们通款曲。由是我觉得我的影响与拉瓦特尔的影响之间有莫大的差距。他的影响是在会面的时间内发生的，而我的影响却发生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凡在远处对他不满的人，一在他身边便和他要好，读我的作品而认我为可爱的人，一接触到我这个顽固不可亲的人便感到非常失望。

默克即从达姆斯塔特城到法兰克福来，在以拉瓦特尔为中心的朋友们中，扮演靡菲斯特（恶魔）的脚色，特别嘲笑那些登门定欲一见拉瓦特尔的妇女们。她们中有些很注意地检视那些为这位“先知”而设的屋子，尤其是他的寝室，这个滑稽家便说道：“写信的女人也想知道人们把主安置在甚么地方”（《新约·圣经》中的一句话），虽然是这样，他也不得不象别人那样给拉瓦特尔驯服了，因为随同拉瓦特尔来的利普斯（Lips，画家，长于铜版肖像画）也替他画了一幅侧面画，甚为精妙，与其他的有名无名的人们的肖像画一起，汇集起来，成为将要出版

的大著《人相学》的资料。

与拉瓦特尔的晤谈对于我是极重要而有裨益的，因为他的督促、激励使耽于安静和艺术观照的我奋发起来，固然在目前是不见得于我有利，我的本已放纵如野马的心神因此只更涣散，但是我跟他谈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便发生继续与他谈话的渴望。所以，当他要到埃姆士城去时，我决心陪他走一遭，好在道上，蛰居马车之中，与世间隔绝，把两人的心事倾箱倒箧地互相披沥。

可是，拉瓦特尔留居法兰克福城时，与克勒敦堡女士（见前）的对谈，对我甚饶兴味，且多所启迪。这时，两个彻底的基督教徒面面相对了，听他们的话，可以极明白地看到同是一样的信仰，随着各人的气质心性的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高唱信教自由的当日，人们常常说，各人各有自己的宗教，各有自己的特别的拜神的方式。我自己纵然不露骨地这样主张，但是我在他们两人的交谈中，却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所需要的救世主各有不同。克勒敦堡女士对自己的救世主的态度象是对爱人那样，无条件地委身于他，自己一切的欢乐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毫不怀疑，不稍顾虑，将一生的运命交付给他。反之，拉瓦特尔视自己的救世主如一友人，不嫉妒，以满腔的爱师法他，承认和称颂他的功绩，而正因为这个缘故努力要成为类似他，甚至与他同样的人。两者的倾向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呵！两性的精神上的需求一般地从这里显现出来。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明白，性情温婉的男子倾向于圣母的崇拜，象桑纳扎罗① 在

① 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1458—1530），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著名诗人，完全献身于圣母崇拜。

他的诗上所做的那样，奉圣母为女性美和女性的德性的典型，将自己的一生和才能奉献给她，而对于神之子之基督，却只有时顺带应付一下。

我这两个朋友彼此间的关系怎样，彼此间的感想怎样，在他们身边的我不独从他们的谈话知道，而且还从他们后来暗中对我泄露的话知道。不过，两人中哪一个的意见，我都不能完全赞同。因为我所信的基督也按着我的观点、也以他的独自的形态出现，可是他们既绝不肯承认我的救世主，我便拿出种种的似是而非的怪论，极端的意见来折磨他们，当他们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常乱以一些谐谑的话就跑开了。

信仰与知识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知识和信仰之争还未提上日程，只有时这两个词以及与之联系的概念也为人所谈论，而真正的玩世不恭者却认为知识和信仰两者都靠不住。因此，我喜欢把两者都加称许，而不博得拉瓦特尔与克勒敦堡女士的赞同。我说，以信仰而论，最关紧要的只是信仰之念，至于所信仰的是什么完全无关紧要。所谓信仰就是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深挚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源于对某一个无限大的、全能的、而又不可探究的实体的信赖。只要这种信赖坚定不渝，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绝对的实体怎样设想，是视乎各人自己的信仰以外的能力如何而定，以至视乎各人的环境如何而定，但这问题无关轻重。信仰正象一个神圣的器皿那样，各人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感情、悟性、想象献纳其中作为祭品。但以知识而论，恰恰相反，最关紧要的不是知的自身，而是所

知为何、所知到甚么程度和所知有多少。所以我们关于知识可以论争，因为知识可以修正，可以增进，可以缩窄。知识从各个的事物开始，无限无形，从不能总括起来——极其量也不过是梦想似的总括起来——所以与信仰恰恰相反。

这类的半拉子的真理和从此而生的迷惑，如以诗描写出来，也许会惹人兴奋和使人感兴趣，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这只妨碍和搅乱人的交谈。因此，在拉瓦特尔跟那些想要得到他的感化和与他同受感化的人们谈话时，我不插进去，这对我固然是一种损失，但我以为我们约定的同作埃姆士之游总可以补偿而有余了。沿途受风和日丽的夏季天气之赐，拉瓦特尔心情舒畅，极为可亲。他的精神倾向于宗教和道德方面，但并不是沉闷不安，当人们的心情为人生的种种事物所刺激而畅适愉快时，他也不能无所动于中。他是富于同情、聪明、机智的人，也喜欢他人也有这样的特性，他只希望他人的言行不超过他的敏感的信念所规定的范围。如果别人敢越过这限度，他就拍拍那人的肩膊，恳挚地说道："喂，放规矩些！"忠告那个冒失的人再回到正道上去。这回埃姆士的旅行给予我种种的教训和鼓励，但是这对于我自己的性格的培养和矫正上的作用，还没有对理解他的性情上的作用那样大。到了埃姆士城，他又即为种种的团体所围绕，那时我恰有一点小事要办，不容延滞，只得与拉瓦特尔作别，回到法兰克福去。

与教育家巴西多结识

但是，我仍不能很快就再恢复以前的安静的生活。因为巴

西多① 又到法兰克福来从别一方面吸引我影响我了。象拉瓦特尔和巴西多两人那样截然相反的，真是再找不到，就是一瞥见巴西多的外貌就觉得与拉瓦特尔大不相同。后者的面貌朗朗如玉山照人，任人瞻望，而前者的脸部紧凑在一起，象是向内紧缩那样。拉瓦特尔的眼睛明澈虔诚，与双眉相隔很阔，可是巴西多的眼小而深凹，黑而锐利，在散乱的眉毛之下炯炯射出来；反之拉瓦特尔的额象是覆着两股弯弯的极其柔软的褐色头发。巴西多的声音洪壮粗犷，说话急而刺耳，伴着一种嘲弄人的冷笑，话题飘忽无定。这些特点以及巴西多其他的独有的特性，都与我们见惯了的拉瓦特尔的特征全然相反。巴西多到了法兰克福城来也有许多人访问他，他的卓越的天资也为人所敬服，不过他不是在精神上适于教诲和指导人的人物。他所致力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好好地开拓他为自己划定的广大的领域，以便将来的人类得较自然地较舒适地在其中度人间的生活，他一往无前地朝着这个目的冲去，其他都不管了。

我不能赞同他的计划，而且对于他的目的也从没有搞清楚。他希望一切教授方法都是活的，自然的，这一点我也同意。古代语应活用于现代一项主张，我觉得也值得赞许，其他以鼓舞人类的活动性和促进新颖的人生观为目的的教育方针，我也欣然承认其价值。我不喜欢的就是他所著的《教育学入门》②

---

① 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1723—90），汉堡人，教育学者，受卢梭的影响，提倡博爱主义的教育法，主张学校与教会分离，教授方法的改善，祖国语言的尊重等。1771年受弗兰兹侯爵之邀赴德绍，在后者的赞助下，设立博爱主义的教育学院，使教育史上有一个新的转机。1774年7月赴法兰克福。

② 《教育学入门》（《Elementarwerk》），列举教育的基础事项，共四卷，插有百幅铜版画，1774年出版。

的内容。该书插图之散漫，比所论述的题目更甚。本来，在现实的世界之中，总不过是能相容的事物一块儿共存着，因此，这些事物纵然形形色色，甚至表面上呈现混乱，但在它们的一切部分中仍常保持整然的秩序。可是他的书却简直支离破裂，同时，绝无当于世界观的理论，单为着概念上类似的理由列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科梅纽斯①所看到的具体的、有系统的长处，在巴西多的书中也找不到。

可是，比他的学说更奇怪的，更难索解的，就是他的行为。这次的旅行，他志在以他的人格来感化一般民众，使赞同他的博爱主义的计划，但是他着眼的倒不是人的思想启发，而是直接打开人的腰包。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计划鼓吹得很动听，谁听了都认可他的主张。然而，他不独对人陈述其教育上的所信，连自己关于宗教方面的意见和奇谈怪论也抑制不住而和盘说出，由是他极不可思议地伤及那些他请求捐助的人的感情，甚至侮辱他们了。在这地方也显出巴西多与拉瓦特尔相反的地方。后者从字面上领略《圣经》，认为全部的内容，甚至一字一句到今日仍然是有效的，并可以应用，而前者却极其焦急地急于革新一切，要依着自己的一时的心血来潮，把向来的教条以至教会的仪式重新改变过来。他最不容情地最轻率地攻击的，是那些不直接源于《圣经》而基于它的释义的种种的说法，即是教父们或宗教会议用来说明那些“难以名状的教义”，或驳倒异教徒的词句，哲学名词，普遍感性的比喻等。他又在一切人之

① 科梅纽斯（Amos Comenius，1592—1670），摩拉维亚的教育学者。著有《图画的世界》（《Orbis sensualium pictus》），1658年出版。参见第一卷“通俗的著作”一节。

前以刻薄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公然宣称自己极力反对“三位一体”之说，对于这个普遍承认的奥理玄义不断加以论难。连我在与他的私人谈话中听了他这样谈论，也受不了，必须听他老把“位”(Hypostasis)、“实体”(Ousia)、“身” (Prosopon)等教会哲学术语引用出来。我这方面拿逆说法那样的武器来对付他，压倒他的言论，试以更大胆的话来反驳他的大胆的话。这种论争使我的思想得到新的刺激。因为巴西多读书比我为多，在论争的战术上也比我这个自然主义者精练一些，所以所讨论的问题越重要，我越不能不奋力应战。

跟他谈话纵然不能启发我，也总是锻炼我的头脑的绝好机会，故我不能让它匆匆地滑过。我设法将最重要的事务交给父亲和朋友办，再陪着巴西多离开法兰克福。但是，当我记起跟拉瓦特尔一道旅行时他的蕴藉、娴雅之处，我感到巴西多的举止是多么不同。拉瓦特尔既是一个纯洁的人，他的环境也要纯洁化，跟他接近的人，为要不使他感到不快，在他的身边也温文纯洁象处女那样。巴西多便不然，他过于专心于自己的思想，而顾不到自己的外观。他不绝地吸食恶劣的烟草，已讨人嫌，加以他用一种肮脏粗劣、容易引火而冒臭烟的火绒，烟斗一空便即再装上，以致刚吸两三口，四周的空气便恶浊不堪。我替这种火绒起一个“学名”，唤做“巴西多氏臭绒”，希望他在博物学书上采用这个“学名”。他听了很开心，怪可厌地详细地把火绒的制法说明，看见我那样嫌忌而反引以为快。这实是这个那样具有卓越的天才的人的根深蒂固的恶癖之一，他好揶揄人，并恶意地呕那些极天真正直的人的气。他总不肯让那些在他的面前的人安静。他或露齿冷笑并作嗄声来嘲弄人，或以没头没脑的话发问来困惑人，如果他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格

格大笑，如果对方很快就镇定起来，用话来反攻他，他却也很满意。

巴西多与拉瓦特尔

我与巴西多一道的旅行，使我对拉瓦特尔的思慕之忱更深。再见到我的时候，后者象也很高兴，对我诉说别后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讲到他的同住的客人的种种的性格。他在这些人中已得到不少的友人和信奉者。我在他们中也发见有好些是旧识，但已多年不见了。见了他们，我开始想起我在青年时代慢慢才懂的“男老女变”一熟语了。温泉客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跳舞无度，而且两个大温泉旅馆相隔不远，两处客人渐渐厮混熟，便闹种种的玩笑和游戏。有一回，我化装乡村牧师，一个著名的朋友扮作他的夫人，我们在上流阶级的客人面前出现，做成太好礼的样子来讨他们的嫌，因而大家都快乐起来。傍晚，深夜和晨间少不得有音乐的弹奏，我们比较年轻的人连睡也没时间多睡。

我虽然为这样的游乐而心散，但每晚总有一部分时间跟巴西多一块的过。巴西多从不早睡，别人睡的时候他也不断地口授。有时他也躺在床上假寐而他的书记提罗（Tiro）握着笔，静静地坐在一旁等待他的半睡半想的主人思潮再涌出来时就马上继续的写。这都是在一间给恶劣的烟草和火绒的烟雾弥漫着的屋子里干的事，我在跳舞中止的时候常即飞跑到他的屋子去，他见了我便马上要把种种问题提出来跟我辩论。过了一会，我仍匆匆赶回舞场去，我还没有把门掩好，他就象是没有跟我作过辩论那一回事那样，重新拾掇他的思绪，继续泰然口

授他的论文。

我们在附近的地方也一块儿作过好几次的小旅行，游览古邸——特别是访问女贵族的宅邸。她们比起男人们来更要热心地探求、领略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事情。当我们往拿骚(Nassau)访问斯太因夫人①时，客人毕集。夫人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女性，得全国人的敬仰。拉洛塞夫人恰也在那儿，女青年和小孩子也夹杂其间。跟我们一块儿往访的拉瓦特尔被邀给客人们看相，不过大多数人的用意只想愚弄他，以偶然获得的特征让他作为先天的特征来判断；可是，他的眼睛却够精明，不为他们所骗。我这回也象从前那样被人纠缠诘问《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不是事实，绿蒂住在哪儿。我不大客气地摆脱这种无理的要求，倒纠集了一班小孩子，跟他们讲述很珍奇的童话。这些童话是从一些谁也知道的故事撷集来，因此，听我讲的人中没有一个会龂龂地寻根究底，问我是真事还是虚构，这样子，我讲时便很方便了。

巴西多提出一件他认为最要紧的唯一的事，就是青年教育的改善。因此，他请求上层人士和富裕的人踊跃解囊相助。可是，他才藉着他言之成理的论据和热烈的雄辩使他们的心纵然不动也准备对他表示好意的时候，他即为那“反三位一体”的恶魔所抓住，全然忘记自己是在甚么场合讲话，冒出极奇怪的议论。照他自己看来，所讲的是极其虔敬的，从听众的信念看来，那是非常渎神的话。拉瓦特尔试作委婉的忠言，我乱以笑谑，妇人们离席散步，都是设法来挽救这个僵局，可是

---

① 斯太因夫人(Frau von Stein)为著名政治家冯·斯太因男爵的夫人，他们的儿子后来任普鲁士王国的大臣。

这次“乱弹琴”闹出的乱子仍不能挽回。人们预期从拉瓦特尔领略的关于宗教的谈话，从巴西多聆听的教育的新说，以及我打算要讲诉诸情感的话，都突然间给搅乱了，打断了。在归途中，拉瓦特尔责备他，我却以一种奇怪有趣的方法惩罚他。那天天气很热，烟草的气味使巴西多的口越发干起来，他渴望喝一杯啤酒。他在大路上远远已看见一家酒铺子，极其迫切地命令马车夫在酒铺子前面停下来。恰当马车要在酒店前停下的时节，我即严命马车夫继续前进。出乎意外的巴西多，以嗄声下反对的命令，我更使劲地逼令马车夫前行，马车夫便听从我的话了。巴西多骂我，差点就要向我挥拳，我却泰然答他道：“老先生，安静一点吧！您应当大大的多谢我。幸亏您没有看见那啤酒的商标！那商标是两个交叉的三角形。您平素因为一个三角形（即三位一体之意）已要发疯了，倘若那招牌的两个三角形也给您看见，您一定会发疯到要给人捆了才成呢！”他听了这一个滑稽的解释，不禁纵声大笑，一边笑一边咒我骂我，而拉瓦特尔在一老一少的傻瓜之前仍神色自若地忍耐着。

到了七月中旬的时候，拉瓦特尔准备动身到别的地方去，巴西多也趁这机会与他联袂起程。我跟他们两人已经厮混惯了，总舍不得离开他们。我又陪同他们一道乘船沿拉因河而下，这次舟行非常愉快，心为之旷，神为之怡。当我眺望到一个著名的城堡的废址时，我在利普斯（见本卷“拉瓦特尔的为人”一节）所携的画册之中写了一首唤做《高高地站在古塔之上》（《Hoch auf dem alten Turme steht》）的诗。因为这诗大得他们的赞赏，我的坏习惯又发作了，在画册的另页中写下了不少的打油诗、歪诗，再次败坏了他们的好印象。我重靓美丽的莱茵河而神飞色舞，看见他们破题儿第一遭欣赏这景色的惊

异的神态，而觉得有趣。后来，我们在科布伦茨上岸。我们所行经的地方人很拥挤，我们三人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引起市民的好感和好奇心。巴西多和我象是要比赛谁淘气一点那样子；拉瓦特尔的举止却谨慎明智，不过也不能保持沉默，而将他心中所想的吐露出来，他的话具有极纯洁的意图，使凡庸的听众听了觉得非常惊异。

我们在科布伦茨一个酒店里吃饭时发生的异样的事，我曾把它写成打油诗，留为纪念，这诗跟别的同类的诗一道将收录于我的新全集中。当时，我坐在拉瓦特尔和巴西多之间：前者对一个乡村牧师讲授约翰默示录的秘义，后者向一个顽固的跳舞教师论证洗礼仪式的陈腐和不合现代之用，结果却白费他的唇舌。当我们再向科隆出发时，我在某一个纪念册中写有这样的几句：

于是，我们象往埃美阿斯①那样继续赶路，
迈着暴风烈火似的脚步：
右也是先知，左也是先知，
中间却是俗界之子。

雅各比兄弟

幸亏这个俗界之子也有向着天上的一面，不消多久这一面便很特异地接触到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埃姆士已听见说在科

① 埃美阿斯（Emmaus）是耶路撒冷一个村名，相传复活的耶稣与两个旅客在那里歇宿过。

隆将可以会见雅各比两兄弟① 而很高兴。他们两兄弟偕同其他的知名人士为欢迎拉瓦特尔和巴西多这两个有名的游客而到科隆来。在我方面，因为我们从前对他们的恶作剧——特别是因赫尔德尔的辛辣谐谑而起的恶作剧——我希望获得他们的宽恕。格莱姆② 和乔治·雅各比，公开地互相标榜互相称赞的信和诗，常给我们拿来做笑谑的资料③。我们却没想到，给予那些自得其乐的人以难堪，正象是抬高自己或自己的朋友一样沾沾自喜的举动。因为这事，上莱茵和下莱茵的文艺家间便发生不和，不过这只是小嫌，无关重要，很容易调停和解，而妇女们特别适宜于做这种居间者。苏菲·拉洛塞（即拉洛塞夫人的长女，出嫁于法兰克福城）已对我们盛称雅各比两兄弟，使我们对他们有极好的印象，继之，与雅各比等一班人有密切的交谊，从杜塞尔多夫移住法兰克福的法尔麦（Fahlmer）④ 女士，以其温柔的性情非常优美的修养，证明她生长所在的社会和朋侣是怎样值得敬重。她对于我们的南部高地德国式粗野的习性的容忍，使我渐渐感到羞耻。她劝导我们行恕道，而我们也因之觉得我们确需要这个。其次，来过法兰克福城的雅各

---

① 雅各比两兄弟生于杜塞尔多夫。兄名约翰·乔治·雅各比（Johann Georg Jacobi，1740—1814），曾任哈雷大学的哲学和雄辩学教授。作为诗人，他属于"潇洒派"（Anakreontiker，专写恋爱和享乐的诗人）。弟名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哲学家和小说家，主张信仰哲学。

② 参见第七卷"在来比锡一道吃饭的人"与"诗人格莱姆和兰姆勒"两节以及第十卷"克洛普斯托克与格莱姆"一节。

③ 歌德曾写过一篇讽刺雅各比的喜剧《雅各比的不幸》。

④ 法尔麦（Johann Fahlmer，1744—1821），是雅各比兄弟的姨母。自1773年以后与歌德过从甚密。其后成为歌德的妹夫施罗塞尔的继室。

比兄弟的妹子[①]的光明磊落，弗里德里希·雅各比夫人（名唤海伦·伊利莎白）的豪爽之气，使我们的思想感情日益向往下莱茵区的人物。雅各比夫人特别使我敬慕，她感情没有露出一点伤感的痕迹，谈吐轻快活泼。她是一个美丽的荷兰女子，但显出官能的美，其壮健干练之处使人记起鲁宾斯（Rubens，十六世纪的荷兰派画家）所画的妇人来。这两个闺秀到法兰克福来或小住或久滞，跟我的妹妹来往极密，使妹妹的过于认真呆板有点缺乏情爱的心开朗舒畅起来。因此，从精神和心情上说，我们在法兰克福也分得一点杜塞尔多夫（雅各比兄弟一家所住地）和彭柏尔福特（Pempelfort，杜塞尔多夫的市街区域）的风光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科隆城与雅各比兄弟的初次会面便马上坦白和诚挚。上述的女人们回到家里也将她们对于我们的好感说得很动听。这时雅各比兄弟和同来的人们不象我一向在旅行中所经验的那样只把我当作是那两大“彗星”的尾巴，倒也特别接待我，表示种种好意，并且象是想从我那儿受到熏陶那样。我一路来所作的痴狂淘气的举动，这时也厌倦了，其实我这种举动是因为这次旅行一路来我的心情和意趣都不大为人理会而感到气愤的缘故。这时自己既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内心的一切便猛然涌出来，我关于当时一桩一件的事不能记清楚，也许就因为我高兴得太厉害了的缘故。我们所想的事，所见的形象，可以在理智中或想象力中再现出来；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那样听使唤，美好的感情很不容易再唤起，要重忆起兴奋狂热时的事更是戛戛乎其难。在那瞬间，我们是出其不意地被掩

① 雅各比的妹妹名洛洛（Lolo），歌德常把她称为“汉诺威的绿蒂”。

袭，无意识地听任这种事情的摆弄。在这时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我一路来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宗教方面的谈话，回答一切通情达理的询问也很少以谦逊的态度出之，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比起我所要探求的来，都似乎太狭隘浅薄。当有人要强我听他讲他对于我的作品的感想和意见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以平凡的常识的立场来折磨我，象煞有介事地忠告我那儿应当怎么写那儿应删去的时候，我的性儿便忍不住了，谈话便破裂中断了。因此，跟我谈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抱有特别的好感回去的。本来，殷勤地温文地与人应对，在我应当是较自然的事，但是我性情的不愿受人板着面孔的教诲，而只能为爽直的好意所启发，以及为真挚的同情所感动而俯首听从。而且，还有一种强烈地支配我，无法充分和恰当地表达的感情，那就是“过去”与“现在”融合为一之感：这样一种观感使“现在”中也带有一种幽灵般的气味。在我许多的大小作品里头，都表现出来，在诗的场合虽常会提高诗的效果，但是当诗是直接地讲及实际生活的事或表现于实际生活之中的时节，在别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奇怪、难解、甚或感到不快。

科隆之游

在科隆这个地方，古代的建筑艺术等等给我以难名的影响和印象。大教堂① 的废址——我所以称为废址，是因为未完成

① 大教堂是个雄伟无伦的哥特式建筑物，1248年动工建造，迄于十五世纪仍未见全部的竣工，后工事中止，任其颓废，到十九世纪（1823—80）才依照十四世纪的构图完成它的建筑。

的建筑与崩坏者无异——引起我从斯特拉斯堡以来惯抱的感情。要想试作艺术的观察却有所不能，给予我观察的对象我感到太多而同时又太少了。关于大教堂的已完成的部分，要想完成的部分，实物与设计，建筑出来的东西，及其所暗示者等等的迷宫似的关系的指点和说明，没有人能象现在我们的笃学不倦的朋友们准备做的那么好了。跟别人一道游览的时候，我神迷目眩于殿堂柱拱的鬼斧神工，但是，一个人独游的时候，我对着这个正在建筑的半途远未完成而工事即已停顿的世界大建筑物而常黯然魂销。这儿又是一个伟大的构想未能实现的实例了，我觉得这个大建筑物矗立在那儿仿佛只为的是使我们确信许多的人费了迢迢的岁月到底也成就不出甚么东西来，在艺术和实践方面，恰象密涅瓦（Mintrva希腊神话中的智慧的女神）那样，只有从造物主的头脑中产生成长和装备出来的东西才能存在。

在瞻礼大教堂的时候，我的心情不感到振奋，而倒感到抑郁不欢，却绝没料到在那时刻极温柔极美的感受已经近在眼前。人们领我到雅巴哈[①]的旧宅去，在那儿，我平素只凭想象向自己描摹的，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呈现于面前了。雅巴哈这一族恐怕早已死绝，但是我们看见那通往花园的一层楼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用褐红色的菱形砖整齐地铺装成的地板，带有刺绣的垫子和背靠的雕花高椅子，镶工精巧的桌面承以沉重的枱脚，金属制的吊烛台，一个巨大的火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一切全都与那时代的情形相协调，在整个宽敞的屋子中，除了我

① 雅巴哈（Everhard Jabach）是科隆的富商，1597年购得这个住宅。自1761年以后，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也死掉了，这个住宅便空无人居。

们以外没有甚么新的、现代的东西。可是有一物更使我们由此激起的不可思议的情感大大的昂扬和臻于完美的就是挂在火炉上头的大幅的“全家福的肖像画”。在画中，当日这个邸宅的富豪的主人和他的夫人一块坐着，儿女们围绕着他们。他们全都象是现实的，新鲜的，活生生的，看来仿佛他们是昨日的人，甚至今日的人，然而他们实早已逝去了。即是那些两颊丰圆的鲜嫩的孩子们也已变成老人了，如果没有这幅精美的画，恐怕谁也记忆、追想不起他们。我既为这种印象所深深感动，当时我的行为举止怎样，我自己也说不上了。我的人类的禀赋和诗人的才能的最深奥的门，却为无限的感动所敲开，藏在我心中的一切的善良和可爱的倾向都流露无遗：即是，从那时候起，我不细加审察就对那些优秀的人表示爱慕和信赖，一辈子倾心了。

在科隆所经验的这种的心灵与才智的契合中，各人都把内心所感受的一切披沥出来，结果，我也自告奋勇在众人之前朗诵我的最近作品中得意的两首短诗。《图尔王》（《Der König von Thule》）和《不老实的孩子》（《Es war ein Buhle frech genug》），给人很好的印象，加以这两首诗仍萦回在我的心里，极少挂在口唇边，所以我朗诵时更感快适。固然，在朗诵时，有些不以我的过于温柔细腻的情感为然的人容易会搅乱我的调子，因此许多时我在朗诵的半途中心乱起来，不能继续好好的念。为着这个缘故，我便屡屡招人非难，说我任性怪僻，狂妄不羁了。

斯宾诺莎与弗里德里希·雅各比

这时，诗的吟咏虽是我所致力的地方，对于我的天性本也适

宜，但同时对于种种色色的问题的深入考究也不忽略，而雅各比关于神秘的事物的独创的和与他的天性相宜的研究方向，我也极表欢迎和感到亲切。关于这个问题，我与他之间不曾发生争论，象我与拉瓦特尔在讨论基督教时，与巴西多在讨论教育学问题时所发生的那样。雅各比向我披沥的思想是直接地源于他的感情，当他以绝对的信赖把他灵魂所抱的最深的要求和盘向我倾吐时，我是多么深受感动呢！他的所说是心灵的要求、热情与理念的奇异的结合，我听起来在我的心中只起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所预感的是甚么，恐怕到将来才会较明瞭吧。幸亏我以前在这方面，虽没有深受陶冶，然也用过一些工夫，并且曾将一个卓越人物的存在和思想纳入我的精神生活之中，纵使不完不备，生吞活剥，但我从此已意识到受了很有力的感染。这个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的整个思想有那么大的作用的伟人，就是斯宾诺莎（Spinoza，荷兰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1632—77）①，我找遍天下，想找寻一种足以教育自己的特异的个性的教材，而仍是徒劳之后，我终于得到他的《伦理学》了。我从这本书中“读出”甚么来，在它里头又“读进”甚么东西，我实在详细说不上来；总而言之，我从这书得到一服我的热情的镇静剂，我觉得一个感觉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的广大无际的远景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不过，特别使我醉心的就是从每句命题中都发射出来的彻底的无私的光辉。那句可惊叹的话“真正爱神的人不要希望神也爱自己”，以及它所依据的一切的前提和从它而出的一切的结论，萦回于我的脑海中，

① 关于斯宾诺莎对歌德的深刻影响，详见第十六卷的第一节“斯宾诺莎的影响”。

使我作深切的省察。对于甚么事都不自私，而在爱方面，友谊方面特别极不自私，是我的最大的喜悦，我的格言，我的实践。所以在日后我大胆地写的那句话“我纵然是爱你，这对你有甚么相干？”实是衷心喊出来的。此外，说到这儿，还要特别留意一点，即是，最亲密的结合本是对立物的结果。斯宾诺莎的调和一切的宁静的意境，与我的兴奋激昂的努力相对比，他的数学的方法是我的诗的思考和创作方法的对照。他的整然有序的处理方法，虽有人认为施于道德上的问题的论究便不适宜，而我却正以此而成为他的热心的门徒和最信服的崇拜者。思想与心情，知性与感觉，以不可抗的亲和力来互相探求，藉此，极相异的性质的结合也可以实现了。

但是，上述的一切还是在最初的作用和反作用、发酵和沸腾的状态中。最先听我沥陈这种混沌的状态的就是弗里德里希·雅各比。他在本性上既也是潜心于最深刻的问题，因而恳挚地倾听我的剖白，答复我和力图引导我去接受他自己的意见。他也感到有种难以表达的精神欲求，也不欲靠他人之助来抚慰它，而靠自己的努力来陶冶自己，启发自己。他对我说的关于他自己的心情意趣的话，我殊不了了，何况连我自己的心境怎样自己还没有明白的概念呢。不过，他在哲学的思维上——即便在斯宾诺莎的研究上——的造诣既比我深得多，他便设法充当我的暗中摸索的向导，指点我以光明之路。这样一种精神的契合，是我所未曾经验的事，使我热烈地希求与他进一步深谈。晚上，我们分手各自就寝之后我还再度到他那里去。月光在广阔的莱茵河面荡漾着，我们站在窗前，沉醉于精神的此来彼往的交流之中，在那美好的时刻彼此都披肝沥胆，这种交流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

荷兰派画家威尼克斯的画

可是，到了现在，我已无法细述当时这种难以名状的经历，我比较还记得清楚的，就是坐船往访本斯贝格（Bensberg，科隆的村名）的猎舍一事。猎舍位于莱茵河的右岸，所凭临的风景绝佳。在这猎舍中，使我感到无限欢喜的，就是出自威尼克斯[1]手笔的壁画。在画中，凡是可以猎得的一切动物，象是在圆柱大堂的柱台上那样整然有序地陈列着，在它们的上方，望过去呈现辽阔的远景。这个非凡的画师施展他的才能来把这些射死的动物画得虎虎有生气，在动物的千态万状的表皮——毛呀，硬毛呀，羽呀，角呀，爪呀等等——的描写上酷肖自然物，而在效果方面且凌驾自然。我们把这个艺术品的全体鉴赏够之后，就必须进而考察那能够把这些画象那样精妙地而又机械地描出来的手法。我们不明白它们怎样出自人类之手和以甚么工具绘成。单有画笔还是不够，一定要有一种很特殊的设备装置，才能绘出这样的五光十色、繁异多趣的画。无论近看也好，远看也好，都感到一样的惊异：其产生的效果和导致的原因都同样值得惊服。

我们沿着莱茵河下游继续作舟行，感到很愉快欢畅。河面广阔得使人心神舒畅，而悠然向远处眺望。我们到达杜塞尔多夫，由那儿再到彭柏尔福特。那是一处极畅适可爱的居地，一幢宏大的住宅与一所宽敞而收拾得精致的花园相连，是一群优

---

① 威尼克斯（Jan Weenix，1640—1719），荷兰的动物画家，长于鸟类与死的猎兽的描绘。

雅有教养的人的聚首的地方。雅各比氏的家族大而人多，喜欢在这个富裕舒适的家庭作客的外地人也终年不绝。

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廊中所见，使我对于荷兰画派的爱好得到充分满足。整个画廊满悬着扎实、精致、闪耀着丰满的自然之美的绘画，我对于美术的鉴别力从不曾因此而进步，我的美术上的知识确因而增广了，我对于荷兰画派的偏好加强了。

泰然自若，畅适和坚毅，是雅各比这一家的主要特色，在我这个新来的客人的眼前，这些特色马上就显现出来。同时，我也看出，广泛的影响从这一家起，并以它为中心而传播到别处去。附近的城市乡镇的繁荣富裕，也是使到这儿的人感到内心的满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往游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以机械业著名）镇，看见那么些设备良好的工场的活动忙碌而感到愉快。在这个镇里，我们又再会见那位笔名斯蒂灵格①的荣格，这位旧朋友当我们到科布伦茨时已来迎接我们，到现在，他对神的信仰，对人的忠实，依然是他身上饶有吸引力的德性。在这儿，我们在他所交往的人们中碰见他，看见镇中人对他的信赖尊敬而感到很高兴。镇中人虽以俗世的营利为事，但仍不忽略于天上的幸福的寻求。这个繁忙的地方倒给观光客以闲静的观感，因为这儿的有用的物品是秩序整然和清洁的设备中造出来的。我们参观游览的几天过得很愉快。

我再回到我的朋友雅各比的家里时，我们的内心的契合更加亲密，我感到无量的欢欣。我们俩热切地期望以后彼此互相切磋，我又激励他将萦回激荡于他心中的一切，以一种形式强

---

① 斯蒂灵格其人，参见第九卷“荣格—斯蒂灵格”一节。这时他在埃尔伯费尔德当医生。

烈地表现出来。这是我摆脱那么些精神上的困惑烦恼的途径，我希望这种方法他也用得着。他毫不踌躇地要毅然实行我的劝告，结果，他成就了多少善良，美好，快人意的事呵！这样子，我们俩感到永久结合的无限幸福，终于互相作别了，完全不曾预想到我们的努力将会选择一种相反的方向，这到了日后便渐渐非常明显地现出来了。

拟写的歌颂穆罕默德的戏曲

在莱茵河归途上的其他见闻，已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所以如此，一部分因为第二回看见的事物，留在脑子里的印象往往与第一回的混在一起，一部分也因为这回我心不外务，而致力将我已经收集到的许多见闻加以整理，将已经领略到的种种印象加以消化。这就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要我发表为作品，所以有一个时候费我不少的工夫。现在我想把这结果讲一下。

我的思想意趣，虽然过于自由不羁，我的生活和行为虽然完全没有目的和计划，但有一事实总难长久瞒过我的，就是，拉瓦特尔和巴西多用精神的甚至宗教上的手段来达到尘世上的目的。把自己的才能和光明没有目的地浪费着的我，很快不由得不看出：尽管这两个人各以其特有的方法，努力教导人，启迪人，和说服人，而在其背后仍隐有某种目的，这种目的的达到对于他们却是很关切的事。拉瓦特尔行事小心明智，巴西多却以急激、放肆甚至粗笨的手段出之；但是两人对于自己的癖好、事业和所作所为的优越之处有那么大的确信，所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为诚实的人，表示爱敬。特别是拉瓦特尔，更不

能不举出他的优点；即是，他确有高尚的目的，纵然他老于世故，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目的也使他的手段神圣化了。在我观察了这两个人，并把上述的意见对他们直陈和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结果我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即是，卓越的人物定然会将他心中具有神性的东西向外传播。然而一当他与粗野的世界接触，为着在这尘世起作用起见，便不得不把自己放在与它同等的水准上，可是，这样子一来，他们的高贵的特性便须作很大的让步，随俗浮沉，而终于全然丧失掉。天上的东西，永生的东西埋没于俗世意图的泥土之中，与尘世其他的事物一同听任无常的运命的摆布。现在我从这样的见地来观察这两个人的生涯，觉得他们的生涯又可尊敬，又可痛惜。因为我敢预料他们俩结局都会为卑下的事物而牺牲高尚的事物。可是，我既把这一类的观察引伸至极端，越过我自己的狭隘的经验范围而在历史中找寻类似的事件，由是便萌生把穆罕默德的传记演成戏曲的意图。我从没有把穆罕默德看做一个欺骗者，在这戏曲中我想将我在现实世界中看得那样瞭然的人生途径——即伟大的人物为了高尚的目的而选择的途径不一定会造福，反而导致沉沦一事——加以描写。我刚在不久以前，兴致盎然地浏览研究东方先知者的传记，故这个想法出现时，我已有了相当的准备。戏曲的全体较近于正常的体裁。我纵然也稍稍利用新获得的剧作上的自由，随意地处理时间和地点的关系，但那时已再倾向于正规的剧作的形式 这戏曲以一首颂歌开场，穆罕默德独自一人在明朗的夜空之下唱着它。他初时赞颂无数的星辰，当作是无数之神那样，继而和善的“加德”星(Gad，即我们的木星)升起了，于是他把它当作是众星之王，特别崇拜。不消多久，月亮也上升了，博得膜拜者的眼和心的

专注，最后太阳的雄姿的出现，使膜拜者更加欢欣兴奋而作新的赞颂。但是这种推移转变，虽然很可喜，但仍引起他的不安，心中感觉到一定会再有更伟大者出现。于是他便抬出上帝，唯一的，永恒的，无极的神明出来，认为一切这些有限的壮丽的天体都由这绝对者获得它们的存在。我很得意地写成这首颂歌，它今已散佚无存。如果用来作为教会声乐曲，它恐怕可以再整理出来，它的措词繁异多趣也值得推荐给音乐家。可是，我们必须想及当时这个颂歌是由游牧队的领队与其家属及全族唱出来的（我当初作诗时也是这个意思），故歌声必须有变化，只有靠合唱之力才能把问题解决。

这样子，穆罕默德自己改宗之后，把这个信念和思想传给他的亲人，他的妻子和阿里① 绝对信服他。在第二幕中，穆罕默德拿这个信仰向族中广为宣传，阿里的传教更为热烈。同族中人随着各人性格的不同而有赞同的，有反抗的。龃龉开始发生了，斗争激烈起来，穆罕默德不得不逃亡。在第三幕中，他征服他的反对者，立自己的宗教为全族的宗教，荡除“加巴”庙② 中的偶像。但是，不是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单凭仗武力的，他必然也乞灵于机谋。这样子，世俗的东西逐渐发展增大，神性的东西渐渐后退隐晦。在第四幕中，穆罕默德继续进行武力的征服，他的教义不大象是他的目的，而倒成为他的口实，一切可以设想的手段都不惜应用，甚至不免于残暴之行。他曾下令处死一个人，这个人的妻子用毒药谋害他。在第五幕中，他

① 阿里（Ali）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幼女法蒂玛（Fatima）的丈夫。阿里是伊斯兰教最初的信奉者，从事宣教，自656年至661年任教主。

② “加巴”庙（Kaaba），麦加的大祈祷场中的四方形的建筑物，为古代阿拉伯人的神庙。

已知中毒。他的泰然自若的心境，本身大澈大悟的复归，又使他确值得人的敬仰。他净化自己的教义，巩固他自己的邦家，便溘逝了。

这就是我的作品的梗概，费我构思的时间很久。因为我在执笔之先，常要在脑中萦回寻味。天才的人怎样能藉着性格和精神之助来支配世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得与失都在这戏曲中表现出来。有好些插入其中的歌词是以前准备的，其中只有题名穆罕默德的礼赞歌（Mahomets Gesang）一诗仍留存在我的已刊的诗集中。在戏曲中，是阿里为礼赞他的教主，在穆罕默德达到成功的顶峰，毒杀所造成的大转变快发生之前，把这歌唱出来的。我还记得几个场面的构思，不过在这儿把这事再说下去，便会离题太远了。

第十五卷

这样子，我为种种的人和事而分神散心，——固然，大多时会促起我作郑重的甚至宗教的考察——但仍常回到我的高尚的女友克勒敦堡女士那儿去。我一同她会面，至少在那瞬间，我的向四方八面突进努力，暴风似的冲动和热情便镇静下来。我心中所计划企图的事，除了妹妹之外，我喜欢最先向她披沥。我本来可以看得出她的健康已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我故意瞒着自己，这是不难的，因为她的愉快的心情却随病势的加剧而增加。她通常穿着整洁的服装，坐在窗前的大椅子上，欣然倾听我讲述我的旅游的经过，以及我所朗诵的诗文。许多时，我画一些图，来说明我自己所游过的地方。有一天傍晚，我的脑海中正浮出种种的形象，恰在落日的余晖中她和她的周遭却象神光离合那样现出来。我不禁竭尽我的拙劣的手腕画出她的本人和她的屋子的陈设来。如果我是克尔斯廷①，这幅画恐怕极其美妙可观了。我把这画寄给一个在外地的女朋友，并系以一首短诗，作为注释和补充。诗如下：

看啊，在这魔镜之中的一梦，

① 克尔斯廷（Georg Friedrich Kersting，1783—1847），擅长室内画的德国画家。

我们的女友愀然歇着不动，
多么仁慈可爱呀，
为她的神的翼包容。

看啊，她拨开现世的波涛，
怎样向着彼岸奋身，
比照她和你自己的容颜，
看看为你们而受难的神。

我以难抑的心的冲动，
苦心涂成这幅图画，
在天国灵气的吹拂中，
我所感受到的，你也感受吧。

我在这些诗句中——也象在其他许多诗作那样——虽采取旁观者、局外人甚至异教徒的态度，但克勒敦堡女士并不反感，倒对我力言，我这样子比从前应用基督教的术语而从不会善用的场合好一点。当我把“传道报告”读给她听时，我已惯于站在异教徒的方面，与传道师相对立，盛称他们从前的生活状态，而贬黜我们的新时代生活。她觉得爱听。她每一回见我总对我很亲切和蔼，象是对我和我之得救绝不露出一点忧虑。

基督教联合兄弟会

然而我渐渐与她的信仰疏远了，这是因为我以过于认真的态度和高度的热情来接受她的信仰。自从我接近她的“联合兄

弟会”以来，我对于这个集合于基督的胜利的旗帜之下的团体的好感日增。凡是既成宗教，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接近它时，就有极大的魔力。因此，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想起使徒时代来，最是愉快，那时一切的事物还是清新的，直接带着灵的色彩。克勒敦堡女士们的宗教团体象是继承这种原始的状态，甚至欲使之永久化，在这一点上是有一种魔力的。他们把自己的宗教团体的渊源与基督教的最初期相连接，认为到现在还从没有达到完成的状态，只在粗野的世界中若隐若现地伸展它的卷须而已，但现在却在一个卓越的敬虔之士的庇护之下（指津曾多夫伯爵，见第八卷“冯·克勒敦堡女士”一节），一个幼芽也长起根来，要从看来象是偶然的和无关重要的发轫，再蔓延于全世界去。他们的新活动的最重要之点，就是宗教制度与公民生活之不可分离，合为一体，宣教者同时又是发号施令者，教父同时又是裁判官。甚至他们认为对于主宰的神，不独在宗教上的事情要表示无条件的信仰，而且还要奉为世俗事务的指导者，从国家管理的大事到一桩一桩的小事的处置，也要藉抓阄抽签的启示，虔敬地听神的裁决。这派的信徒的酣美的宁静——至少在他们的外貌上现出是这样——是极其惹人喜欢的，而在他方面，他们为着传道的使命，尽人类能够尽的极大限度的努力。我曾由伊森堡（Isenburg）伯爵的事务代办人，公使馆的参事官莫里茨（Moritz）陪同参观过马利安波尔因（Marienborn）的宗教会议，认识了不少优秀的人，他们博得我高度的尊敬。因此，我会不会即加入他们里头去，从事同样的宗教生活，那就完全取决于他们。我致力于他们所信奉的教派的历史、教义、由来和发展的研究，结果我能够作有关这一教派的报告和与志趣相同的人共同谈论。可是，我到后来不能不觉

得，同派的教友以至克勒敦堡女士都不肯把我看作基督的信仰者，这事初时使我感到不安，不久使我的热诚有点冷下去了。我与这些教友们究竟有什么差异之点，虽然颇为明了，但很久我还不能找出它的真正的根据来。后来我明白过来，倒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事。即是说，使我与这些教友和其他可敬重的基督教信徒分离的恰就是已使教会一再陷于分裂的状态的原因。教会的一部分人主张人性因“原罪”而堕落恶化，以至深入骨髓，没有一点的善良，因而人类凭自力得救是绝对无望，一切都要仰赖神的慈悲和施恩。另一部分人虽也承认人类有因袭的罪孽，但同时却认人性中也存在一种善的胚芽，藉着神的恩宠的吹拂，培养，可以开枝发叶起来，蔚成精神的福祉的欢喜之树。我自己为后一说所浸润，确信出自衷心，而不自觉，尽管有时我嘴里笔下倒发表出相反的议论。但是，我在这方面继续作暗中的摸索，自己从未认识到实际已陷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我有一回竟从这个迷梦醒过来了。那就是当我与他人作宗教上的谈话，把自己的宗教观——自以为极天真纯洁的宗教观——和盘倾吐，因而受他们的一顿严厉的训诫时的事。人们向我说：“您所说的恰就是真正的佩雷吉阿斯主义①这种有害的神学说在近代的复活流行，实为近代的不幸。”我听了不独惊异，而且吓了一跳，试回溯教会的历史，把佩雷吉阿斯的教理与生涯作精密的考察，我就清楚地看见，这两种互相冰炭的见解，历千百年，怎样象波涛

① 佩雷吉阿斯主义（Pelagianismus），是指五世纪初英国修道士佩雷吉阿斯（Pelagius）提倡的神学说。他否认奥古斯丁（Augustinus，四世纪基督教会的领袖）的“原罪”说，重视道德意志之力，主张人类靠自己的自然的能力得救。431年被宣告为“异端”。

那样互为起伏，随着世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多少不同，而分别为人所采纳信奉。

过去的岁月不断引导我锻炼发挥自己的能力，我的内心活动个不停，以最大的诚意致力于道德的修养。外界环境要求把这种活动加以调整，为造福他人而应用，而我便顺应这种伟大要求，身体力行。无论哪一方面都把我引导到自然去，自然以壮丽的状态展现于我的面前。此外，我又认识了那么些的善良的人，他们在尽义务的时候，和为着尽义务起见，虽受任何艰苦也在所不辞。抛弃他们，以至抛弃自己那样的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使我与那种教义分隔的鸿沟，我既了然，我就不得不与那个信仰团体脱离。可是，我对于《圣经》的爱好，对基督与早期的圣徒的爱慕既不能因此丧失，我便为自己形成一个供自己专用的基督教，谋以历史的热心研究，及关于与自己抱同一样见解的人的精细的考察，来建设我自己的基督教和为它打下基础。

然而，凡属我心里欣然采纳的事，我总马上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我因发生一奇想，即是把俗本久已流传对我有很深的印象的永远流浪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亦可译为“万劫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写成史事诗，藉着这线索，以便能按照着自己的意见把宗教史和教会史中的突出之点加以表明。但是，我怎样把这故事改作，和附加什么意义进去，我想在这儿讲一下。

“永远流浪的犹太人”

据传说，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唤阿哈随鲁（Ahasverus）的

鞋匠①。我在德累斯顿认识的鞋匠供给我以他的主要的特征，我又赋予他以后者的伙伴汉斯·萨克森（Hans Sachsen）那样的精神和幽默感，同时又对基督敬爱，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但是他的作坊是露天的，他喜欢与过路的人交谈，跟他们开玩笑，象苏格拉底那样，随着过往的人的不同，而予以恰如其份的鼓励。因此，邻近的人及别处的人喜欢在他那儿流连，连走过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跟他搭讪，甚至救世主的耶稣大概也有时与他的弟子们一道在他的作坊里逗留过。这个鞋匠的心目中虽只顾着俗世的事，但对于我主也抱特别的爱慕。不过，他既不懂得这个伟大的人物的思想便想说服他，使他改信自己的思想和处世方法，他对基督的爱慕，主要地从这儿表现出来。他因此很恳切地敦劝忠告基督，摆脱这种静观冥想的生活，不要带着那些游手好闲的弟子在乡间跋涉，不要引诱人民抛弃他们的工作而到荒野去，聚集在一起的民众，总会骚然易动，不会干出什么好事。

听了他的话，主耶稣极力把他的更高尚的见地和目的向他譬解，但象他那样的粗朴的头脑，只会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因此，当基督的名气日大，成为一个公众拥戴的人物的时候，这个对基督有好意的工人便日益严厉地和激烈地对基督忠告，说这样的事态必然会引起骚乱和暴动，基督纵然不是出自本心，也必须自居于一个党派的首领。可是，事情是象大家所周知的那样发生了，基督被捕和被判刑了，当那表面上象是叛卖了主

① 鞋匠阿哈随鲁是象征流浪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传说的人物。基督背着十字架，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他的店里歇息，阿哈随鲁却恶狠狠地赶他走。因此，在基督复活之日以前，罚他在世界中彷徨流浪。歌德这一史事诗剧只有草案，没有完成。

的犹大抱着绝望走到他的作坊来，对他凄然诉说自己的计划的失败时，鞋匠越发愤激。犹大也象其他最聪明的弟子那样，确信应推戴基督为执政者和人民的元首，拟以武力强迫至今仍冷静地不肯听从他们的基督当机立断，并鼓动至今仍不敢公然用暴力的僧侣，也采用这种手段。当时的弟子们大概也准备了武器，如果基督不自挺身受缚，使弟子们陷于无可挽救的窘境，也许事情会成功呢。阿哈随鲁听了犹大这一番话，毫不留情的斥责他，倒使这个可怜的旧使徒更加难受，走投无路，只有仓皇自缢身亡。

可是当耶稣被押赴刑场，道经阿哈随鲁的作坊之前时，那传说上著名的事件便发生了。即是，背着十字架的基督不胜其重而倒下地来，施勒尼（Cyrene）人的西门（Simon）必须替他背着走。这时，阿哈随鲁便出现了，象一切偏执的自以为是的人那样，看见别人因自己的过失而遭祸不寄予同情，反而不合时宜地发泄其正义感，以叱责非难增加那人的痛苦，于是阿哈随鲁站在基督的面前，复述从前他一切的警告，更由警告而进于痛骂，自以为他对于受难者的爱惜之情使他有权力这样的做。基督一言也不答，那时，可爱的女信徒味纶尼卡（Veronica）恰拿一块布遮着主的脸庞。可是当她把这块布除去，高高举起时，主的容颜映在阿哈随鲁的眼中，但绝不是押赴刑场的受难者的容颜，而庄严地改变为天国的生命灿然照射的容颜。他为这种异象所迷眩，回转头去，他便听见主的严命：“你一直在世界上流浪，直至再见我现在这样的容颜为止。”愕然惊骇的阿哈随鲁经过了一些时候才回复过来，看见所有的人都挤到刑场去，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如荒野，他为不安和憧憬所驱使，便离去耶路撒冷，开始流浪的生涯了。

关于他的流浪以及这诗随之终止而不随之全部结束的事件，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讲。诗的起头，散见于中间的一些段落及最后的部分已经写下来，但是我不能聚精会神，也没有充分的时间，使我能够作必需的研究，以便这诗的内容能符合我的要求。加以那时我的作品正朝向一个新时期发展——当我写《维特》的时候以及后来看见它引起的反响，必然会酿成这个倾向，——我只写下来的几张纸，更不得不就这样子束诸高阁了。

我们无论何人都要共负人类的共通的命运，智力比常人有较早和较广的发展的人，总得肩负最重的担子。我们虽可以靠父母和亲戚的庇荫而成长，倚仗兄弟和好友，藉交游的扶助，因爱人而得到幸福，但是无论怎样，归根结底人类还是倚赖自己。并且，连神也罢，也不是常能有求必应，报答人类的尊崇、信赖和敬爱，至少在紧急的场合做不到。我从幼小的时候起常常地听到，在最需要他人帮助的瞬间，有这样的警告："医生啊，自己救你自己吧！"①我不得不握腕叹息，喊着"我自己独自榨着葡萄呵！"②的时候，是多么惯常的事呢。当我寻求自己的独立的保证时，我觉得我的创作的才能是自立的最稳固的基础。好多年以来，这才能没有给我以一瞬间的休息。在白昼醒着所遭遇、体验的事，甚至在夜里形于梦寐，当我把眼睛张开时，在眼前映现着的不是一个新的奇异的现象的全体，便是往事的一部分。我通常在清晨把这一切写下来，但是到了晚上，甚至夜深，酒和社交使我精神的活动异常兴奋

① 这话出自路加（Luka）《福音》。

② 这话出自《旧约·以赛亚》。

时，别人出题目要我作文章，我也能挥笔立就；只要是一桩具有多少特色的偶然发生的事件，我就可以拿它来写成文章了。我既把自己这样的天分加以省察，觉得它完全是我自己独具的东西，而不是外力所能助长或妨碍，于是我便想把自己的一生建筑在这种才能之上。这个念头化成一种形象，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便惹起我的注目。据传普罗米修斯与众神绝缘，从他自己的作坊，造出人类。我也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重大意义的创作只在孤独之中完成。我的曾博得那样大的赞赏的作品也都是“孤寂”的产儿。自从我在世间交游渐广，关系渐繁杂之后，我虽仍有充分的创作的才力和兴味，但是创作却停滞了，因为我在散文方面也好，诗的方面也好，本没有自成一家的文体，每有新的创作，视乎题材如何，必须从新着手尝试。然而我在这一点既谢绝他人的助力，甚至完全排除，所以我也弄到象普罗米修斯那样与众神隔绝了。加之，依我的性格和思想的方法，一出现一个主意便沉湎其中，其他的思想都被埋没摈弃了，所以，保持这种孤独的倾向更是自然的事。

普罗米修斯

在我的脑中，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活龙活现出来了。我照着自己的身材来裁剪这个古代的巨人之天衣，不假思索就写出一篇戏曲来。这戏曲表现出普罗米修斯与主神宙斯（Zeus）及其他新生诸神所发生的龃龉。这即是：他以自己的手造成人类，藉智慧女神密涅瓦之助，使人类得有生命，建立了第三王朝。那时统治着世界的神感到苦恼，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

人们可把他们视为巨人与人类间的一些错误的闯入者。我所发表的普罗米修斯的独白诗①是属于这种珍奇的构想的一部分，在德国文学上起显著的影响，莱辛趁着评论这诗的机会与雅各比论战，阐明关于思维和感觉的重要之点。而且，揭破当时的著名人士们的最隐蔽的相互关系的爆炸性事件是以这诗为导火线。这种关系在一个本来极开明的社会中潜伏着，连他们自身也茫然不知。那次的破裂非常的猛烈，加上偶然发生的其他事故，我们便因而失掉最可敬佩的一个朋友——门德尔松（参见第十四卷“拉瓦特尔的为人”一节）了。

关于这篇普罗米修斯的独白诗的题材虽也可象一些人所做的那样作哲学的观察，以至宗教的观察，但它毕竟完全属于诗的领域。巨人之为多神教的陪衬，正如我们之可以把魔鬼视为一神教的陪衬那样。可是魔鬼和与他对立的唯一的神决不是诗的人物。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撒但虽描写得极好，但因为他力谋破坏较高级的存在者的美丽的创造物，而总要屈居于从属的位置。反之，普罗米修斯与神那样的较高的存在者对抗，能够自己创造、建设，便立于有利的地位。其次，人类不由宇宙的最高的主宰者造出来，而出自位于他们与人类之间的巨人之手，而这中间人物也是最古王朝的后裔，也够得上这个造物主的资格，所以这个故事也是美丽的适宜于作为诗的题材。总而言之，关于神与人类的象征的解释，希腊的神话是个取之不竭的宝藏。

然而，巨人普罗米修斯扰乱天庭的反抗精神对于我的诗的

① 这篇诗是1774年脱稿的，到1830年，歌德将它收入《戏曲片断》的三幕剧中的第一幕。

描写并没有供给什么素材。我觉得适宜于我的描写的，是巨人一方面承认比自己更高的威力的存在，但同时又想与之比肩，以平和的，忍耐的努力同他对抗一事。不过，巨人族中的三个勇士坦塔卢斯（Tantalus）、伊克西翁（Ixion）和西息弗斯（Sisyphus）也是我的圣者。他们虽然也被接纳，参与诸神之列，但不甘屈居于末席，为从属的存在者，自视如傲慢不逊的来客，因而激起了他们的真实的庇护者的主神之怒，而受可悲的放逐的惩罚。我对他们抱有同情，而古代的诗人也早已把他们的遭遇当作是悲剧那样描写。后来我在我的《伊菲格尼》(《Iphigenie》)一诗中，拿他们当作是诸神的勇敢伟大的对抗者，作为这诗的背景，这诗幸而收到良好的效果，一部分是拜他们之赐。

可是，在那时候，我作诗和绘画的兴致同时勃发，不能自已。我在灰色的纸上，以黑和白的粉笔描绘我的朋友的侧面像。当我口授别人书写，或听人朗诵的时候，我把那在写着字或念着的人和他们的周围的景物素描出来。我画得既逼肖其人，这种画很受人的欢迎。因为业余画家白替人家绘画，不取报酬，他自然常得人这种赞赏。不过，我自己仍觉得这种人物素描不够味，还是再向我可以较自由挥洒的诗文方面致力。我执笔时怎样兴致勃勃、愉快和敏捷，有许多诗可以为证。这些诗把艺术的自然和自然的艺术热烈地加以鼓吹，在这些诗作出的时候，总给予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以新的勇气。

在这个时期，我坐在我的遮着光的屋子中，正忙于工作，至少从那屋子的外观看来象是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此外，周围的墙壁上又钉着挂着半完成的画，给人以有什么大杰作在产生中的错觉。有一天一个瘦长的男子走进我这个屋子来，在黄

昏中，我认不清楚，以为是弗里德里希·雅各比，但是一会我就知道错认了，向我招呼的是一个陌生的客人。从他的阔达、庄重的态度看来，可以认出他是具有军人的特征。他自道他的名字唤做冯·克内贝尔①，经过简略的介绍，我知道他是普鲁士的军人，服务于柏林和波茨坦（勃兰登堡州之省会）颇久，与当地的文人结有亲密的关系，对于德国文学一般也熟识。他特别爱读兰姆勒（参见第七卷《在来比锡一道吃饭的人》）的作品，并且学会了兰姆勒朗诵诗的方法。他又熟知格兹②所有的著作，那时格兹还没有什么藉藉之名呢。仗着他的帮忙，格兹的《少女岛》能在波茨坦出版，并且达于国王之手，得到他的好评。

魏玛的情况

我们刚把德国文坛的一般情形纵谈一番，他即告诉我，他现在魏玛任职，随侍君士但丁小公爵。我听了非常高兴，关于魏玛的许多好处，我早有所闻：因为有许多从那儿到法兰克福城来的人证明公爵夫人阿马利亚怎样礼聘卓越的人物来教育小公爵，耶拿大学怎么派遣名教授，来助成她的美好的目的，夫人

---

① 冯·克内贝尔(Karl Ludwig von Knebel，1744—1834)，曾任普鲁士军官，当时任宫廷的侍从长，随侍魏玛的小公爵君士但丁。这次他陪同小公爵和储君奥古斯特（Karl August）作巴黎之游，到法兰克福访问歌德。

② 格兹（Johann Nikolaus Götz，1721—81），自1761年以后在温特贝格（Winterberg）任宗教顾问，神学者兼诗人，曾得到赫尔德尔的好评。他所著的哀歌《少女岛》(Mädcheninsel)于1773年出版。

怎样不独掖护艺术，而且自己也热心地透辟地精研艺术。我又听见威兰特别受她的优渥待遇，许多外地学者协力编辑的文学杂志《德意志的信使》（主编是威兰）既以魏玛为出版地，对于该城的光荣也有不少贡献。而且，德国最完美的剧场之一是设于魏玛，在那儿工作的演员和剧作家都蜚声全国。不幸那年五月从魏玛城堡烧起的可怕的大火，却把这个剧场的美好设备和建筑物破坏了，剧场有长期停顿之虞。但是，人民对于储君的信赖那么的大，他们都确信，这些损坏不独不日可以修复，而且其他一切的希望也可以圆满地实现。我听了这些话之后，恰如魏玛城的老相识那样，向他打听那里的种种人物和事情，并说出想要更详细地知道那儿的情形的愿望时，那新来访问的客人便亲切地答道，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今回储君和他的兄弟君士但丁殿下恰好一块儿到法兰克福来，想认识我和跟我谈话。我马上表示以得晋谒储君兄弟为无上的荣幸。我的新朋友接着便说，那就事不宜迟，因为他们在此不会有多久的逗留的。为准备这次谒见，我领着他到我的父母那儿去。他们听见他的来访和所负的使命，非常惊诧，很愉快地跟他交谈。其后我连忙跟着他到小公爵那儿去，他们以亲切和爽朗的态度接待我，即便那任储君的辅导官的格尔兹（Goertz）伯爵，也象是对我表示好感。我们交谈虽不乏文学上的话题，但是一桩偶然的事的出现，使我们有极好的话柄，谈话便渐渐有意思和有成效起来。

宫廷生活的前景

事情是这样的，恰恰在桌子上放有一本莫泽（见前）所著

的《爱国者的空想》的上卷，刚装订起来，书边还没有切齐。我既充分知道这书的内容，而储君们却所知极少，因此我占得便宜，可以作关于它的详细解说。而且储君抱有最良好的意愿和最坚强的决心，利用自己的地位，断然来施行仁政，与储君论及这书正是最适当的话题。莫泽的书，无论从其内容来说，还是从其旨趣来说，一定会引起每一个德意志人的极大的兴趣。世人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分裂、无政府状态和政府的软弱无能，虽加以非议，但依照莫泽的见地，许多小邦之并立，是极其可取的，这样正可以随着源于各邦的非常相异的地理的位置、人文的特色而起的不同的需要，实行不同的设施，极便于各地文化的发展。莫泽又以奥斯、纳布吕克一城作为出发点，推而论及威斯特伐里亚地区，然后详说其与全德意志帝国的关系，在论述其情势时，把过去的历史和现况结合来观察，从前者溯寻后者的演变的过程，从而说明那些变革之是是非非，可行与否，因此，各个执政者只要在他的地区，采取同样的方法，就可获得关于本地区的情势，以及与邻邦和全帝国的关系的最精到的知识，以至能把现在和将来加以正确的判断了。

从这个话题我们便谈到许多问题去：例如上萨克森与下萨克森诸邦的情况有什么相异的地方，礼教、法律、习惯以至天然物产怎样从以往的时代到今天变成别的样子，以及怎样随着政体和宗教之不同，而指导方法也有所不同，都为我们论及。座中有人想把两个地区相异之点更精确地列举出来，这时，眼前有一个好样板（指莫泽之书）之怎样有裨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管这书的细节而考察它所依据的方法，这书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场合，有助于我们作有效验的判断。

在用餐时，我们继续进行这种谈话，储君们因这一席话对

我产生一个很好的印象——恐怕超过我自己应得到的好印象。因为，我没有把自己所著的作品拿出来做谈话的对象，不求他们对于自己的戏曲小说起共鸣，我倒将莫泽那样的作家特别推许，指出这种作家的才能是源于实际生活，而又复归于这种生活中，直接产生出有益的效果。在他方面，属于诗的范畴的作品飘浮于道德和感性的世界之上，要绕一个大弯，仿佛要碰上偶然机会才发生有益的作用。我们这回的谈话有点象《天方夜谈》那样的情形：由一个重要的话题扯到别个去，有许多题目只是开了个头，不能继续发挥下去。两位殿下在法兰克福只能作很短促的逗留，因约我随往美因兹多谈几天，我便欣然承诺，连忙把这个可喜的消息带回家里去，禀告两亲知道。

可是我的父亲听了这个消息倒一点也不高兴，因为他自负为帝国直属市的市民，一向总与贵显疏远，他纵然与附近的王侯贵人的代理人打交道，但跟他们自身却绝没有私人的接触。甚至所谓宫廷一物成为他的诰谑的资料，他人对宫廷加以攻击，他也觉得高兴，不过，在这场合，一定要以适合他的胃口的机智隽妙的话出之才行。当他引用“离开主神远也就是离开电击”(Procul a Jove procul a fulmine)一句谚语对我们说时，我们虽承认为真理，但又补充一点，即是，关于电击一事，到何处去比从何处来更成问题。于是他又把“与大人物共食樱桃，也是败胃口”一句古格言引用出来。我们便答道：“跟馋嘴的贱民从一个篮子取来吃更糟。”他虽也承认这话，但他又马上拿出另一个使我们不知所对的格言出来。谚语和格言诗是来源于老百姓方面的东西，他们虽必须对上服从，但是，至少他们的嘴巴可以说他们所要说的话，但是为民长上者，却能以行为来弥补这个缺憾。此外，十六世纪的诗差不多

全是教训的，修养的，所以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少不了戏弄的成分和严肃的格言，并且矛头从下面指向上面。而我们青年既自期为大人物，也好站在那大人物那一边，使用矛头从上而下的警句。现在让我在这儿插入几句这些一正一反的话做例子吧。

老百姓与大人物的对歌

甲：久居宫廷久禁地狱！
乙：地狱的火煖着不少的好男儿！
甲：我行我素，
　　不要邀任何人的恩赐。
乙：为什么你以恩宠为耻？
　　你想予人恩惠，就要先受人的宠赐。
甲：如果你想瞧瞧宫廷的苦恼：
　　那就是，有痒也不许你搔！
乙：当演说家对老百姓讲话的时候，
　　就是没有痒也要搔。
甲：如果一个人甘为人下，
　　他的半辈子就要完掉；
　　若更俯仰随人，
　　剩下的一半也糟蹋了。
乙：谁识得迎合王侯的意旨，
　　今明天就会腾达飞黄；
　　谁要买得贱民的欢心，
　　他的一辈子都会遭殃。

甲：就使麦子在宫廷中开着花，
你要知，那也终成虚话；
如果你以为已储在谷仓，
那儿也不是车载斗量。
乙：麦子开花自也会结实累累，
那是从古以来的老规矩；
如果收成给雹子打坏，
明年大地又会长出来。
甲：谁愿意完全自由自在，
还是蛰居小屋之内，
妻儿共同度日，
喝着清淡的葡萄酒，
添上粗茶糙饭，
一生中没有甚么麻烦。
乙：你是不是要避去王侯？
试问你往哪儿逃跑？
看世事不要那么认真；
因为黄脸婆就是君临你的主人，
她又受着呆儿子的统治，
到头来你也是家中的奴隶。

恰当我从书的备忘录中捡出上录的诗句的时候，我又在其中找到与这个类似的有趣的习作。这些诗是我们把过去时代德意志的警句铺陈一下，加上其他一些在经验上有同等的现实性的谚语而写成的。从这些诗里头挑选一些好的出来，可以作为傀儡戏的收场诗，可以使观剧者的心神为之一爽。

可是，我的父亲却不因为我这种种的答辩而改变他的意见。他惯常把自己最有力的论据留到谈话的末了才拿出来，于是他详细地讲述伏尔泰失宠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始末，那过度的宠遇亲狎，相互的殷勤亲切，怎样突然消失。我们还听到他历历如绘地描写这个非凡的诗人兼著作家怎样因驻外外交代表弗赖塔格（Freitag）的控告，市长菲莎德（Fichard）的命令而遭到法兰克福民兵的逮捕，在闹市的"蔷薇"旅馆中拘留颇久的一幕。对于这个话，我们虽拿出许多的反驳的议论，并指出伏尔泰本身也应负其咎，然以小孩尊重父亲之故，结局总为他所折服。

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他也举出这个和别的相似的例子来警戒我，所以我差不多不知怎样做才好。因为他直白地警告我，并且说，他们的招请只是一种圈套，旨在替他们的宠幸者威兰报我的戏弄侮辱的前仇（见后一节），纵然我的确信恰与父亲的相反，而且看的很清楚，父亲的疑虑不过是他的先入之见为一种忧郁病的妄想所煽动之故，但我仍不肯断然违背他的确信而作美因兹之行，又找不到一个借口来取消我对储君的前约，而不致有辜恩失礼之诮。在类似这样进退两难的场合，我惯常跟克勒敦堡女士商量，可惜她又卧病。她和母亲本是我两位卓越的参谋，我常只称她们两人为"言"和"行"，因为克勒敦堡女士对于尘世的事情，投以明朗慈祥的眼光，所以我们尘世的儿女觉得迷惑的事，拿到她的面前去便很易解决。加之，她从高处下望人生的迷宫，而自己不陷身其中，因而又常能指出正当途径。可是事情一决定之后，就可以倚仗母亲的热心和实行的能力了。前者借观察之助，后者则借信仰之助，而且母亲在什么场合都保持明朗爽快的心情，故从不至想不出方法来实现

所计划和所希求的事。这回，美因兹之行的问题发生后，我请母亲替我去走访卧病的克勒敦堡女士，请教她的高见，女士既表示赞成我的美因兹之邀，母亲便极力恳求父亲的允许。父亲虽还怀疑和不高兴，但也让步了。

《神、英雄和威兰》

于是，我在很冷的季节，按约定的时日到了美因兹，两殿下和他们的侍从对我的接待，象他们的邀请一样的殷勤。那在法兰克福城提起过的谈话，我们再记起来，并从中断的地方继续讲下去，及至谈到最近德意志的文学及其大胆的倾向时，极其自然地说起我所作的《神、英雄和威兰》（《Götter, Helden und Wieland》）这一篇有趣的诗曲了，一开头，我就觉得，他们轻松、愉快地看待这事情，而很宽慰。但是，这个轰动一时的戏作，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却要我讲个明白。于是我不能不首先承认，我们道地的上莱茵河的住民有一种通病，就是，无论爱也好，憎也好，都容易过度。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尊敬，达到崇拜的地步。反之，威兰在他的莎翁译本的注释中，说了许多非难原作者的话，而且他的攻击，引起我们极度的愤慨，在我们的眼中，简直是把这译作的劳绩都抹杀了。总之，威兰是为他自己的顽固的特性所误，败坏了自己和读者对于原作的兴趣和热爱。以诗作而论，威兰是我们所推崇的诗人，以翻译而论，从他的译本我们得益不少，但现在作为批评家，我们觉得他任性随意，片面而不公正。此外，他对于我们所膜拜的古希腊人也故意贬抑，更增加我们的反感。众所周知，希腊的神和英雄之所以卓越，不是基于他们道德上的特性，而是基于他

们的光辉灿烂的肉体上的特征。因此，他们对美术家也提供很美好的题材和模型。然而威兰在他的歌剧《阿尔塞斯特》①中，把英雄和半神用近代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诚然不能加以非难，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可以把古来的诗的传说依照自己的目的和思想方法来改作。但是，从他在《德意志信使》杂志中所写关于这一歌剧的书信体的评论看来，他太过不公正地以这种处理的方法自夸，不负责任地冒渎那些卓越的古代希腊人和他们的崇高的风格，同时又绝不肯承认这些神话传说所根据的素朴、健全的自然价值。我们的青年诗人团体才把威兰这种可疵议的地方热烈地讨论过，我的好把一切事物戏曲化的癖性又冒出来了。有一个星期日午后，我跟他们一道儿喝了一瓶勃艮地的美酒，乘着酒兴，即席把那戏曲一口气写出来，不加润色。我把它读给同座的人听，他们大为赞赏，我便即寄给斯特拉斯堡的伦兹。伦兹也象是很感兴趣，劝我马上付印发表。经过几次的书信的商量之后，我答应他了，他于是赶紧拿它在斯特拉斯堡付印。到后来很久我才知道，这种劝告是伦兹故意要损害我和使我在公众面前败坏我的名声的阴谋的第一步。但是在当时我却茫然，绝料不到会有这样的事。

这样子，我在我的新的爱护者之前，尽我所知，极坦白地，把那不含恶意的戏曲的缘起源源本本讲出来，使他们完全相信我在这篇作品中绝没含有对个人攻击及其他的目的，我还告诉他们知道，我们青年诗人之间怎样谑而虐地互相戏弄嘲笑，习以为常。我作这种辩明之后，我觉得小公爵们为之开颜，差不多使我们惊讶的，就是他们还这样说：我们大概很担心文

① 《阿尔塞斯特》(《Alceste》)，五幕的小歌剧，1773年出版。

坛中会有任何一个人戴着他的桂冠而睡懵懂了，所以有这样的事。他们还把我们的小团体来跟十七世纪袭击西印度群岛的海贼帮相比，后者无时无刻不担心因为安逸无事之故而弄到柔懦了，因此他们的首领在没有什么敌人袭击或没有什么好劫掠的时候，也从宴饮的桌子底下，开短枪乱射，让大家在平日无事之时也不免有创伤和痛苦。关于这问题，他们与我交换过几回意见之后，我终于接受他们的劝告写一封恳切的信给威兰。我很高兴获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威兰在《信使》杂志中对于我的稚气的恶作剧已作了很宽大的表示，并象他平时在文学的论战中所做的那样，以机智巧妙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纷争。

普罗米修斯与其批评者

我在美因兹的滞留虽只几天，但过得很愉快。当我的新爱护者因拜客或赴宴而外出时，我便跟他们的侍从一块儿留在旅馆里，替他们画肖像，那时城壕已结冰，我又正好往那儿作滑冰的游戏，使我的心轻松下来。但是家人却以惊慌失措的面容迎我，不消一会我就听见我们的女友克勒敦堡逝世的噩耗。我听了很受打击，因为，正在这个场合，我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她。家人为安慰我而向我讲述她死时的情形，她的极乐的生涯以敬虔的死亡而善终，她的信仰的诚笃证明到弥留时还保持纯净无瑕。更有一件事情阻碍我，使我不能尽情详述美因兹之游的经过。即是父亲不独不以我这次小冒险的好结果为喜，而且坚持他自己的见解，认为这一切只是他们的伪装欺瞒，以后恐怕对我还要施出更坏的手段来。因此，我必须将我要说的话对青年朋友们讲述，当然我不能很详细地说。可是，我这样做也很失

策，就从他们对我的友爱和好意之中产生出一个极不愉快的结果来。因为不久，一本也用戏曲体写的小册子《普罗米修斯与其批评者们》（《Prometheus und seine Rezensenten》）出现了。在那里头，作者恶作剧到妙想天开，对话的开头不点出人名，而用种种的小的木板画来代替，把那些对于我的作品或与之有关的东西发表过意见的批评家，用讽刺画表现出来。有一个地方画着一个没有头的阿尔托纳（Altona）的驾驭马车的车夫（象征在阿尔托纳市发行的评论杂志）吹着角，有一个地方一个熊喃喃念着，另一个地方一个鹅咯咯叫着，神使也没有被忘记不画进去，还有许多的野兽和家畜象是要在雕刻家的工作室中干扰他，但是他却满不在乎，热心地继续他的工作，但并不因此就缄默而不表示他自己应为何事的意见。我见了这个出人意外的开玩笑的作品，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恶谑在文体和笔调上都象是一定出于我们中人之手，甚至人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手笔。但是，我最感到不快的就是在普罗米修斯所讲的事中还有涉及我在美因兹的居留，在那儿所讲的话，以及本来只有我才知道的事情。由此却可以推断，作者定是与我很接近的少数人中之一个，曾经听我详细地讲及美因兹之行和那里情况的人。我的朋友们彼此互以猜疑之眼相看，但那个匿名的作者很知道装假。我把这个作者骂的很厉害，因为我才在美因兹受了那样优厚的待遇，发表过那样有意思的谈话，以及给威兰写过那样恳挚的信之后，现在又出现会引起别人对我抱新的怀疑和不快的导因，我因极度气忿。可是这闷葫芦不久就打破了。即是，有一天，当我在屋子里往来蹀躞着，朗诵那本子书的时候，我很清楚地听得出那书的设想和用语是瓦格纳（见第十四卷“再谈伦兹”一节）的口气，而实际上写这书的也是

他。我马上下楼飞跑到母亲那儿去，告诉她我的推测，她却明说，她早已知道是他了。作者瓦格纳自信是抱着可称道的善意来写这书，不料却有那样坏的结果，害怕起来，因来见我的母亲，自己承认是该书的作者，因为我曾声言与那个滥用我的信赖的作者绝交，他便向我的母亲求情，希望我饶过他。有一事恰巧帮了他的忙，就是我自己发现了他是作者一事，一个人如果能够看穿一件秘密就感到洋洋得意，这种喜悦便使我有饶过他的意思了。瓦格纳的过失既足以证明我的洞察的能力，我终于宽恕了他。但是读者大众却不会那样容易确信瓦格纳是真正的作者，而我自己没有插手其中。人们不相信他这样多才多艺，因为人们以为他非具有卓越的才能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伙机智纵横的诗人许久以来所作的种种诣谑谈论，记在心里，并用这样高明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样子，我不单因为自己的愚戆，而且还因为朋友们的轻浮急躁而吃苦头，这个场合是如此，以后还屡有发生。

再谈克洛普斯托克

随着种种同时发生的情况的联想，我还忆起几个名人，而想在这儿叙述一下。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道经法兰克福，或下榻于我们的家里，或受我们的亲切款待。在这些人中，克洛普斯托克再度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人物。我与他早已通过好几回书信，有一回他通知我，受了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城某家的邀请，不日动程并将在那儿滞留，某日某时便会抵弗里德贝格（Friedberg），盼望我在那儿会见他。我届时果然到了那个地方，可是他在途中给偶然的事情耽误，不能依时来。我白等了

好几天，便回到家里去。过了一些时候，他才到我的家里来，请我原宥他的爽约之罪和郑重感谢我的迎接他的好意。他的身材短小，但体格长得很好，举止严谨而不拘泥，谈话明确悦耳。从整个人看来，他的丰采有点象外交官的样子。外交官那样的人挺身担当艰巨的事业，同时保持他自己的尊严和他所要负责维护的更高的人物的尊严，既要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同时又促进王侯以至全国的更重要的利益，他站在这种极关重要的地位，故先要博得世人的好感。从克洛普斯托克的举止看来，他也象是自居于有价值的人和具更高的意义的事物——宗教，伦理和自由——的代表者，他还具有深于世故的人的一种特性，即是，他不轻于谈论别人正特别等着要听他的意见的事情。他很少谈及诗和文学。但他既知道我和我的朋友热爱滑冰，便跟我们详细地谈这种优美的游戏，说明自己关于这种技术怎样细加思索，有甚么应该着眼，甚么应该避免。可是，我们在倾听他的亲切的讲解之先，不能不让他把我们所用的名词加以订正。即是，我们使用南部德意志语“Schlittschuh”（滑冰鞋）一字，他认为我们对语源的解释全然不当。这字不是从Schlitten（橇）一字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以橇的小弯形木架（Kufe）来滑行了，实际上它是源于Schreiten（阔步）一字，滑冰的人象荷马诗中的神那样穿上这双翼一般的鞋，在化为大地的海上迈足阔步。其次，说到工具问题，照他的意见，高跟中间凹的滑冰鞋没有甚么好处，他倒推荐矮跟，宽身，平底和流行于佛里斯兰（Friesland）的钢制的鞋，认为最宜于快速的滑走。人们在滑冰时惯玩的花样，他也不赞成。我照他的吩咐做了一双平底而尖端长的鞋，滑起来虽不很舒适，但使用了好几年。关于骑术和马的训练，他也能讲得头

头是道，并且喜欢讲。他象是故意避开关于自己本行的谈话，以便能更自由无碍地谈论他当作业余的嗜好那样从事的别的专门技术。关于这个非凡的人物的种种奇癖，如果不是跟他相处久一点的人已有充分的报告的话，我还可以举出许多来。但是有一个感想我不由得不说出来，即是，某些非凡的天资而用之于狭小的范围内或至少用之于不相称的范围内的人，往往流于狂狷怪僻，他们既没有机会直接地利用其天资，便想拿来在奇奇怪怪的途径中施展。

齐默尔曼的为人

齐默尔曼医师[①]有一个时候也在我们家里作客。他的身材魁梧，体格坚实，在天性上是个刚烈、爽直的人，但他却能完全抑制自己的外表和举止，所以在友朋间他被目为深于世故的熟练的医师，他的内在的刚直的性格只在著作之中和在极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不加抑制地暴露出来，他的谈话涉及多方面，富于教育的意义。如果我们可以原谅他对于自己的人格和功绩的非常的敏感，那么，与他交往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可是我对于世人称为虚荣心之一物总不曾一度起反感，而且还容许自己也有虚荣之念——这即是说，自己觉得是沾沾可喜的事，就坦然表露出来的癖性——所以我跟他意气很相投。我们听任我们自己各行其是，为所欲为，因为他对我表示极坦白和同感的态

① 齐默尔曼是瑞士医师、著述家，1768年以后在汉诺威任英皇御医。弗里德里希大王病重时也聘他诊治（参见第七卷"神学的状况"一节）。歌德于1775年7月在斯特拉斯堡同他结识，同年9月他带同女儿到歌德家中访问。

度，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但是如果让我对于这个非凡的人物，感激地，好意地而又深刻地提出批评，我绝不能说，他是个虚荣的人。我们德国人太惯常滥用“虚荣”（eitel）这个字了；本来这个字带有“空虚”（Leerheit）的概念，所以正当地使用这个字，就只应该用来指那些以自己的脑袋里空空如也为喜，或以自己的空虚的生存为满足而不能自隐其喜悦之情的人。然而齐默尔曼的情况恰相反，他是有伟大的劳绩而没有内心的满足的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够对自己的天才暗地里沾沾自喜，在应用其天才时又不能自己得到它的报酬，而等待着希望着别人会承认他的成就和加以适当的尊重，这样的人便会陷入很苦的境界中。因为我们谁都知道，世人吝予别人以赞赏，即有称道，也打个折扣，而且只要有隙可乘，便转誉为毁。昧于这个事实而出来处世的人只能有不快和失望的预期吧。因为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纵不作过高的评价，然也无条件地自认为有价值，而世人所给予的一切的承认都是附有条件的。其次，对于赞赏和喝采，也象对于一切快乐那样，需要有某种的感受性。如果我们把这种考察应用到齐默尔曼的身上，我们在这儿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他本身所不备有的东西。

我替齐默尔曼作这样的辩白，如果是说不过去的话，那么，这个名人更有一桩过失，足以妨害以至毁掉别人的幸福，更难为之护短。那就是他对于自己儿女的态度。他有一个女儿跟他一道旅行，当他在附近的地方游览时，把她留在我们家里。她大约有十六岁了，身材瘦长而长得不错，不作什么打扮；她的五官端正的面孔，如果有一点温柔的表情便很能动人。但是，她老是象画像那样冷静，很少言笑，在她的父亲的面前，

更没有一回说过话。可是，她跟我的母亲两个人住了没有几天，在这个富于同情的妇女的身边，深受她的明朗的慈爱的风度的影响，她便投身母亲的脚下，把自己的心事尽情披沥出来，并且不断地流着泪哀求母亲收留她在我们那儿。她以极其热情的口吻诉说道：“无论是使女也好，女奴也好，我愿意一辈子留在你们家里，只要不回到父亲那儿去，父亲的冷酷、暴虐真是谁也不能想象出来。”据说她的兄弟就因为齐默尔曼的虐待而发了疯，她含辛茹苦地忍耐了那么久，因为她相信无论在哪一家里，父亲都是这样严酷，不会好多少；但是现在她既受过我家里那样慈爱、舒适、自由的待遇，她自己的境地便变成真正的地狱了。我的母亲听了大为感动，当她向我讲述那女孩的悲痛的倾诉时，对她的同情更深，以致对我明白地示意，如果我决定娶这个女孩做媳妇，把她留在家里，她就快慰。我听了答道：“假如她是一个没父母的孤儿，这事情还可以考虑商量，但是，岳父是一个这样做父亲的人，那就太糟了！”我的母亲还为这女孩子尽了许多力，她倒因此更为不幸。到后来靠着母亲等的帮忙，她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了一所寄宿学校。不过，她还是寿命不长，不久就死去了。

象齐默尔曼那样的劳绩昭著的人却有这样的可非难的坏癖性，如果这事不早已人言啧啧，并且，在他死后，他临终时的狂暴性的忧郁病使自己和在身边的别人都受磨折一事不为人所知，我恐怕不会把它说出来。因为他对待儿女们的残酷也是由于忧郁病之故，这种病是一种部分的精神错乱，慢性的精神杀人，因为它，他先把儿女们牺牲了，最后便回头杀害自己。可是，我们试想一想，这个外表象是强壮的人在壮年时代便为这种病所苦，本是一个老练的医师，曾治愈了和治疗着许多病

人，而自己偏罹了这种不治之症。的确，这个卓越的名人尽管在外表上享受着尊荣、名誉和富贵，而实际上度着极悲惨的生涯，如我们再从他所印行的数种著作中更详加考察，我们不会责备他而倒会怜惜他呢。

可是，如果读者期望我更详细地讲出这个杰出的人物对于我的影响，那么，我就必要再把当时的时代加以一般的说明。我们生当的时期可以称为“要求的时期”，即是，当时的人，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提出一些从前还没有人实现过的要求。有思想有情感的卓越的人觉悟到，人类最希望和决不难达到的事就是关于自然的直接独创的见解和基于这种见解而产生的实践的行动。于是经验再成为普遍的口号，每个人都尽量扩拓自己的眼界。但是，最有理由提倡这种新方式，并且有最好的机会把它付诸实施的本是医师。从古代以来便有一颗巨星投射他们以璀璨的光芒，可以奉为一切值得企求的东西的范例。据说是希波克拉底①传下来的著作，提供一个榜样，指出人类应怎样观察世界，和把他所见的，不掺杂主观的见解，传给别人。可是当时没有人相信，我们不能象古希腊人那样观察事物，也总不能象他们那样作诗和雕刻以及治病。纵然承认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但我们从那时代起积累了无限多的经验，又总不能那样纯粹，并且常为先入之见所左右。正确地知道这一点，加以鉴别选择，也是必要的。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要求了。其次，我们为了亲自审察和处理起见，自己还应当把健全的自然搞清楚，一若自然是破题儿第一遭被观察和实验那样，在其间只容许得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名医，有“医圣”之称。

到真实的和正确的结果。不过，言学识而没有万事通和炫学的倾向，言实践而没有光靠经验和江湖郎中似的夸示，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要区别滥用和利用，做到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的时候，一种激烈的冲突便发生了。可是在这场合，一进于实行，我们便觉得借助于天才是最后摆脱难局的捷径，有天才的人藉其魔术般的才能调停争端，而种种要求也得到实现。在这场合，理智也出而参与其间，一切都应赋以明晰的概念，和用论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便一切的先入之见都能摒除，一切迷信都能摧毁。实际上既确有象荷兰医生博尔哈夫①和瑞士的医生和诗人哈勒②那样的几个非凡的人，成就了难以置信的大业，世人便以为有理由要求他们的门徒和后进者有更大的成就。人们断言，道路已开辟出来了，可不知道，在一切尘世的事物中，很少谈得上所谓道路，因为正象为船所挤开的水，船一过，水马上便再合了那样，人类的迷惑错误，虽一度为卓越的人们所排除并可以乘胜前进，但在他们之后，便马上极其自然地再现了。

但是，杰出的齐默尔曼却总想不到这一层，他不肯承认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不合理的现象。自己觉得和认为不正当的事他就不能忍耐，极力加以攻击，甚至有类于狂暴。无论与他吵闹的对手是护士也好，是名医师帕拉塞尔苏斯③也好，是庸医也好，是化学家也好，他都视同一律。他每一次都同样狠狠地砍下去，当他弄到力竭气喘的时候，他以为可以用脚踩掉的九头

① 参见第八卷“炼丹术的尝试”一节。

② 参见第六卷“少年诗作的焚毁”一节。

③ 参见第八卷“炼丹术的尝试”一节。

蛇[1] 的所有的头依然活生生的，从无数的头中张着利齿向着他，他就极为惊骇了。

凡是读过他的著作，特别是《论经验》一名著的人，就会更明确地知道这个优秀的人物与我所讨论的事了。他的年纪比我长二十岁，所以，他的谈话更予我以强烈的影响。他既是一个名医，求他诊治的病人主要是上流社会中人，每次与我会面，他总滔滔不绝地谈到当时的社会因颓唐和过度的享乐的生活而堕落的情形。他谈到医术上的事情时，也象哲学者和我的诗人的朋友那样，力促我再回到自然去。对于他的狂热似的改革癖，我不能完全赞同。我跟他分手之后，我即回到我自己固有的专业去，谋以适当的努力来运用自然所赋与的才能，一方面光明磊落地反对我认为不对的事情，而同时为自己开拓一些园地，不管我的影响能达到多远和把我引到哪儿去。

在马尔施林斯（Marschlins）创建大寄宿学校的萨里斯[2]，也是在旅行中道经法兰克福城而访问过我们家。他是一个笃实而明达的人，对于我们青年诗人小团体的天才而兼狂人的生活，暗地里曾作过一些使人惊异的批评。在往法国南部旅行的途中，来访问我们的苏尔泽[3] 恐怕也有同样的印象。至少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与我会见的段落，含有这样的意思。

---

① 九头蛇（Hydra），是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立斯（Heicules，宙斯主神之子）所斩的怪物。

② 萨里斯（Karl Ulysses von Salis，1728—1800），瑞士的军人、政治家、诗人和教育家。

③ 苏尔泽（Johann Georg Sulzer，1720—79），哲学家和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有《美术的理论》等著作。

安身立命的计划

可是，在这些有益而愉快的晤访中也掺杂有我们宁愿避面的怪客。真正贫穷的人和厚脸皮的撞骗者每向容易相信别人的年轻的我求助，借着种种的真正的或伪造的亲戚关系或不幸事件做口实，来达到他们的迫切的要求。他们向我借了钱，使我不得不向有钱的和好意的朋友转借，由是我跟后者的友谊常弄到极不痛快。因此，我但愿这些强索的人，都变成乌鸦的食饵吧。而父亲也象童话中的魔术师的弟子那样的情形，虽然喜欢把自己的房子洗得干净，但看见大水滚滚涌来，流进门槛和楼梯时便惊骇起来。这就是说，因为做了太多的好事，我的父亲为我预定的适度的谋生计划，一步步的被妨害了，延宕了，一天天的被改变得与原来的期望相反了。在累根斯堡和维也纳居留的计划已不啻抛弃，但是将来在意大利旅行的途中仍应在那两城过境，以便至少能游览个大概。可是，有些朋友却不赞成这个计划，认为绕一大弯才走到实际生活去，不是办法。他们的意见以为我应该利用眼前那么有利的机会，而留居家乡为永久的安身立命之计。虽然，那时因为外祖父曾任市长，其后舅父又任市议会议员而杜绝了我出任市议会议员之路，不过还有许多的市府官职，可以求谋，先立稳脚跟，然后徐图将来的发展。市中有许多种代理人的位置，大有用武之地，而驻外外交代表之职更是很荣誉的。亲友们这样的鼓吹，我认为颇听得进去，自己也相信适宜于做这样的事，却不省察一下，代理人和驻外外交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业务方式是要忙于社交，最好以应酬游乐来做办事的手段，这种职位是否真个与我的性情相宜。同

时这种建议和意图之外还添上涉及爱情的事，这象是使我不得不作成家立室之想，从而促进那种决定。

假夫妻的游戏

前头讲及的法兰克福的青年男女的游乐会，虽不是由我的妹妹发起，但它的持续却仰仗妹妹之力，自从她出嫁和离开家乡以后，仍然存在。因为会中人彼此已厮混惯了，每周一个晚上，在友好的小圈子里一块儿玩总是最有意思的。前在第六卷叙述过的那位奇特的雄辩家①，历经种种的变故之后，又更伶俐地更别扭地回到我们那伙人中来，再任这小国家的立法者。他继承着以前的滑稽游戏而想出类似的办法来。还是每周拈阄一次，但是这回拈阄不是决定哪一对应做爱侣，而是那一对应做假夫妇。他说，彼此对爱人怎样应付，我们知之已熟了，但是，夫和妻在社交场上的举止应该怎样，我们却是不了了，年纪既已一天比一天长大，那就是最先应该学的事。于是他便定出一些一般的规律来，这些规律就是普通人知道的，例如在他人之前夫妻彼此间要装作不象是夫妻那样，不应同坐在一块，彼此谈话不要很多，更不可多作亲爱温存的举动；但是，在其间，不独是要避免一切可以惹起互相猜疑、互感不快的事，反之，一个人如能以一种自然而丝毫不勉强的方法来博得他的太太的恩爱，便是最值得称赞的。

决定假夫妻的阄便实行拈了，结果有几对奇怪不相配的夫妇被撮合出来，大众都笑他们，戏弄他们。这样子，这个大结

① 指格雷斯佩尔，详见第六卷“妹妹的爱人”一节的注。

婚的喜剧谐笑百出地开场了，每隔一周便重新拈阄。

真是怪凑巧的，我在第二回拈得的假妻也是第一回拈得的那个女子①。她是一个可称为理想的妻子的品性贤良的女子。她的体态美丽而匀称，面貌可爱，她的一切举动都安详娴静，显见她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全。无论哪一天，无论哪一时刻，她的举止都保持不变。她的持家的才干，已极得人的称赞。她虽少说话，但从她的谈吐中可以看出她是具有很好的理解力和自然的教养。对这样的人以友爱和尊敬相待是自然的事；我在拈阄以前，出自一般的好感，已对她作这样的表示，现在既成了假夫妻，习惯地对她表示的深情好意更成为社会的义务。可是到了第三回拈阄，恰巧又是抽着她，于是那个滑稽的立法者庄严地宣布道："天意已定了，你们今后不能再拆散了。"我们双方听了都情愿，彼此在公众中克尽夫妇的责任，真够得上模范夫妻的资格。照一般的规矩，在晚上的聚会里，假作夫妇的男女在那几个钟头，彼此要以"你"（Du即第二身的昵称）相称呼，我们既有好几个星期用这样的亲密的称谓，就使在我们相遇的时候，这个"你"字也从口边惬意地滑出来。但是，习惯是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双方渐渐都觉得，这样的关系是最自然不过的，我日益敬爱她，而她对我的信赖也达到了美满、安心的境界。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我们一伙人中有一个僧侣的话，我们恐怕真会毫不踌躇就请他当场替我们主持婚礼吧。

---

① 这个女子名唤安娜·西比拉·明奇(Anna Sibylla Münch)，商人的女儿，当时十六岁。

博马舍的《备忘录》与《克拉维哥》

在我们每周会集的时候，必须有一些新的诗文当众朗诵出来。有一晚我带了一篇极新颖的东西——博马舍的诉讼备忘录① 的这一部分的原文到会来朗读。大家大为喝彩，人们纷纷吐露各自的观感，大家谈论了一番之后，我的假夫人这样子说道："如果我不是你的妻子而是你的女统治者的话，我就请你替我把这诉讼备忘录改作戏曲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恰好的题材呢。"我听了便答道："我亲爱的，你知道，妻和女统治者也可合为一人呢，那么，我答应你，下一个星期的这一天，我把这本书的情节，编成戏曲在你们的面前象这次朗诵这个本子一样的朗读。"座中的人听了我这样的大胆的承诺，觉得诧异，而我却毫不踌躇地来谋它的实现。因为，在这样场合，世人所谓"构思"一事，在我是即兴的，当我伴送我的名义上的夫人回家的时候，我便沉默不作声。"你怎么一回事呢？"她问道。"我已在想那篇戏曲怎样写，"我答道，"现在正在构思的当中呢；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乐意做一些事情博你的欢心呵！"她便紧握着我的手，当我热烈地吻她时，她说道："你不要忘记了你扮的是丈夫的角色呵！人们说，这样的温存不宜于夫妇

① 博马舍（Pierre 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99），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喜剧作家。1773年，他与一个企业家进行的一场诉讼中，被法官控告为污蔑和贿赂法官。他出于自卫，先后发表了四部《备忘录》，向巴黎公众控告西班牙的官吏克拉维哥（Clavigo），揭露法院的黑暗内幕，矛头直指封建制的国家机器，并在《备忘录》中显示出他的卓越文学才能。

间做的呢。”“随他们说去，”我答道，“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呢。”

其后，我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家里，在入门以前，那戏曲的构思已有头绪了。但是为使人不说我太过吹牛起见，我要承认，在第一次第二次读这《备忘录》的时候，其中的情节已经象戏曲似的，舞台剧似的展现在我的心目之中。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劝诱，这篇戏曲也象其他许多的尝试那样，单成为一种腹稿而埋没了。至于我改编为戏曲的方法，已尽人都知了（见歌德的戏曲《克拉维哥》《Clavigo》）。我既厌倦那种出于复仇、憎恨或其他卑劣的动机而与高尚的人为敌，并把他害死的歹角，我便构成卡罗斯（Carlos）那样一个角色，表现出健全的常识和真实的友谊对于热情、爱好和外界的压迫发生的作用，并试想以这种方法来作为悲剧的依据。有我们的大宗师莎士比亚做前例，我毫不迟疑地，把《备忘录》中的主要场面及本来已有戏剧性的描写的部分逐字翻译过来。最后，在结束的地方，我借用某一首英国的民歌（Ballade）的尾声，在会期的星期五那天，全篇早已脱稿了。我朗读它时所博得的好印象，自己很容易察知。命令我做这篇戏曲的假太太，也很喜欢，我们两人的关系恍惚是为了这作品，为了这种精神的产物，而更接近巩固起来。

但是，对于这篇戏曲，那个靡菲斯特（魔鬼）似的默克第一次给我难堪。当我把这篇东西寄给他看时，他复信说：“这样的不成东西的作品，请你以后不要再写了，谁也会写呢。”其实，他的话是不对的。不是一切的东西都要独出心裁，机杼一新的，有许多作品仍不脱旧套，也是不俗的。如果我当时编著有十来本这样的戏曲，——这种戏曲只要有多少兴奋刺激就

容易写成——就恐怕有三本或四本在舞台上演了。知道脚本创作的劳苦的舞台监督才会说出这种戏曲有什么好处呢。

结婚的预期

我们的小团体的这种奇特的结婚游戏，因为上述的和其他的妙趣横生的诙谑笑乐，纵不喧传全市，也已成一些家庭的话柄，我们的女伴们的母亲听了倒不觉得不愉快。我的母亲也不反对这种偶一为之的事。她在以前已经喜欢那个与我发生那样巧合的关系的女子，象是相信，她会成为一个贤妻，同时也可做孝顺的媳妇。她看见我从许久以来，闹的无目的的奔波忙乱，觉得不安，而事实上也给她添加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说，我有许多文友川流不息地到我家里来，她必须殷勤款待，供应食宿，饷以盛馔，而所得的报酬，只是客人们对于她的儿子的文才的推重。而且她预见到，这许多青年既然全都不是有钱的人，不单是为学问、文艺而聚首，而且还为着游乐的目的，故结果必然会互相牵累损害，而对于轻于厚施和好庇护他人的我，终归更会有这样的坏结果。

因此，当父亲再度提出那久已计划的意大利旅行一事时，母亲便认为这是一举断绝我与这些青年人的关系的最切实的手段。但是，为要使我在旅中的广大的世界里不陷于新的危险，她便想在动身之前把我跟那位女友的婚事确定下来，这样，我就会急于返回家乡，我的最后的安排才可以确定。母亲这种计划，是否只出自我的推测，抑或她明白地——也许跟她的信仰上的女友商量之后——盘算过，我不能断言。总而言之，她的做法是有一个考虑好了的方针作为依据。因为，我屡听见说，

自从妹妹出嫁以后，我们的家庭象是太寂寞了，我们觉得，我少了一个妹妹，母亲少了一个家政的帮手。父亲少了一个学生。而且我听见的还不止这个话。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父母在散步的途中碰见了那个女子，请她到附近的花园去，跟她作颇长时间的谈话。两亲归来，在晚餐的席上便戏谈起这件事情来。他们得意洋洋地说，那个女子很合父亲的意，因为自负能鉴别人的父亲对妇女所要求的主要的品性，她恰全部具备呢。

这事发生以后，我们的家突然间象是要接待许多客人那样忙乱起来，二楼作种种新的布置，对亚麻布做的各种家具加以检查。一向忽略的其他几种家具也想起来。有一回，母亲在房顶的贮物室内检视旧摇篮时，我突然出现，这些摇篮中有一个格外大的，用胡桃木制成，镶着象牙和黑檀，特别惹人注目，那就是摇过在婴孩时代的我的旧物。我在旁边对她说，这样的摇篮，现在已完全不时髦了，现在的婴孩是四肢舒畅地放在齐整的小篮子里，用绳子跨过肩膊把篮子吊起来，象是别的用器吊起来给客人看那样。母亲听了却不大赞成。

总而言之，暗示家庭生活将有新变化的这样的先兆频频呈现出来，我对于这事则不声不响，因此，对于我的终身大事的预想，使我们家和家中各人都沉浸于久已不享受的一片宁静氛围之中。

第 四 部

“除了神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抗神。”

序　言

现在我们担任写的是一部变化多端、头绪纷繁的个人传记，在执笔时，为了使某些情节易于理解和清楚可读起见，我就要这样子叙述，即是，有些部分的事情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的必须分开来讲，更有一些只靠后来的结果才明白的事情，必须凑合在一块来讲，这样子，全体便分为各个部分，读者读起来可以一目了然，而加以判断，并从中获得许多可供自己借鉴之处。

我们以这样的考察来作为第四部的卷头语，以便向读者说明我们的题材的处理方法是对头的。更有一事要请读者注意的，就是下头继续的叙述不是刚好与前一部的末尾相衔接，而是企图将全编的主要线索逐一再集拢起来，把人物及其思想和行动，严密地按照基本的顺序叙述出来。

第十六卷

正如世人惯说的那样："祸不单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幸福也差不多有类似的情形；还有另一些情况，在我们的周围保持和谐的状态。这或许是命运给我们这样子安排，或许是人类具有把一连串互相关联的事物都拉到自己身边来的力量。

至少，在这回，我经验到一切的事情都谐和一致来构成外部和内部的宁静。外部的宁静因为我耐心等待着他人替我设想和安排的事的结果而获得；内部的宁静的获得则有待于自己的重新学习。我久已不再想斯宾诺莎了①，这时却因看到反对他的文章而再向他请益。在我们的市图书馆中，我找到一本小册子②，著者对这个有创见的思想家猛加抨击。为要使他的攻击更有力起见，在书名的签题之下登载有斯宾诺莎的肖像，并题有这样的字：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连面貌也印着受天罚的标记）。诚然，只要拿这个肖像一看，题字所说的的确不容否认，因为铜版的雕刻坏到不堪，完全是一幅讽刺漫画。因此，我不能不想起那些论争家来，他们先把他们所憎恶的论敌歪曲丑化了，然后当作是丑类怪物那样来攻击。

---

① 参见第十四卷"斯宾诺莎与弗里德里希·雅各比"一节。

② 这本小册是荷兰马丁·路德派传教士科勒（Johann Coler）所编写的斯宾诺莎的传记，1705年在荷兰出版，德文译本于173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

不过，这本小册子没有给我什么印象，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论争的东西，我老爱听见人家说他自己怎样思想，而不愿意听见他说别人应该怎样思想。但是，我为好奇心所驱使，仍翻阅了一下贝尔[①]的辞书《历史与批评词典》所载"斯宾诺莎"一条，我就发现，这本书，一方面以学识渊博和眼光敏锐之故而算是可珍视和有益之作，但同时从它的诽谤、饶舌的口吻看来又很可笑而有害。

读了这篇论斯宾诺莎的文章，我心中感到不快和疑惑。开头，贝尔称斯宾诺莎为无神论者，认为他的学说极可非难，但是，其后却承认他是一个深思笃学的学者，善良的市民，向别人推心置腹的人，以及静居潜修之士。这样看起来，著者象是忘记了《圣经》中"从果实而认知树木！"那句话了。因为一个为人和神所满意的生涯怎样可以从腐化堕落的准则产生出来呢？

斯宾诺莎的影响

我还记得很清楚，自己翻阅这个卓越的思想家的遗著[②]时，我的精神感到怎样一种宁静和明澄。它的影响，我虽然无法一一缕举，但仍很明确。我连忙把他的书再拿起来读。从前我已受益不浅，现在开卷，我感到有阵阵和风再向我吹拂。我聚精会神来把这书读一下，同时省察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世界

① 贝尔（Piere Bayle，1647—1706）所编的有名的《历史与批评词典》于1695和1697年出版。

② 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本书连同几篇短论文于1677年斯宾诺莎死后出版。

了然于我的胸中，为从前所未有。

关于斯宾诺莎的论述，到今天仍有许多争论①，所以我不愿给他人误会了自己的立场，而不由得不在这儿插入我关于这个为世人所惊怖憎恶的思想体系的一点意见。

我们的肉体的生活，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世故人情，哲学，宗教，以至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一切都号召我们要克己。有许多我们内部固有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向外部发展，我们需要从外部取来以补足自己的本性的东西又靳而不与，而我们觉得是陌生和烦累的事物却纷纷进迫。我们辛苦得来的东西，天惠的好处，为人所剥夺，在我们还没有对之了然以前，我们就必须——初时部分地，后来全般地——抛弃自己的个性。可是，因为这样做而埋怨的人，通常为人所蔑视，运命的杯越苦涩，我们倒应该越张着笑脸向人，以便那些泰然旁观的人不致因我们的苦脸而感到不快。

这个课题诚然很难，但自然已赋予人类以丰富的力量，活动性和坚韧性来解决它了。我们生而具有的毁灭不了的轻率性（适应性）特别足为此事之助，靠着这种天性，一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舍弃一桩事物，只要他在别时有新的事物可以移情就成了。因此，我们无意识地不断地更新和恢复自己整个的生涯。我们以一种热情来替代别种热情；事业，爱情，嗜好，玩艺，我们都一一尝试过，为的是到头要喊出"一切都是空虚"的叹声。这句话虽是错误的，甚至渎神的，但没有人觉得它可怕。甚至人们还相信这句话还含有智慧和不容否认的真理呢。可是这种难堪的绝望之感只有少数人预想到，他们为避免零敲

---

① 如门德尔松、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赫尔德尔等。

碎打地逐渐地断念，便索性看破一切了。

这种人确信事物的永恒性，必然性和规律性，而在心中养成一种不能磨灭的观念——不因无常的事物的观察而扬弃、反因之加强的观念。但是，这样的确信实含有一种超人的努力，所以这种人便常被目为非人，不承认神与世界的怪物，世人甚至还不知应当怎样尽情捏造虚构，给他添油加醋呢！

我对于斯宾诺莎的信赖，是基于他给我的宁静的影响，当我听见我的可敬的神秘思想家们被斥为斯宾诺莎主义的信徒，连莱布尼茨①也不免受这样的攻击，博尔哈夫（见第八卷“炼丹术的尝试”一节）因为被疑抱有同样的思想，而不得不由神学转到医学去时，我对斯宾诺莎的信赖只加强起来。

可是，读者不要以为我同意斯宾诺莎的全部著作以至逐字逐句都视为金科玉律。因为我早已了然明白，一个人总不能了解别人，同样的文字，一个人从其中所理解的跟别人不同，一次谈话，一篇文章所引起的思想反应视人而异。而且读者可以相信，写过《维特》和《浮士德》的我，是深知人类这种隔膜的存在的，更不敢抱完全理解斯宾诺莎这个人的妄想。斯宾诺莎本来宗法笛卡儿，藉着数学和犹太神学的教养，而登思想的最高峰，到了今天，这个峰顶象是仍然成为一切思辨的努力向往的目标。

至于我从斯宾诺莎所摄取的是什么，如果我在《永远流浪的犹太人》一曲中把主人公访问斯宾诺莎一节——我当作是全

---

①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对于斯宾诺莎有过深入的研究，从1676到1679年，对后者的学说还不是抱有反感，可是后来却认为他的泛神论与自己的哲学思想背道而驰。

曲中的重要部分而细加思索的一节——写下来，就会很明白表现。可惜我太喜欢自己的构思，只在心里老是咀嚼寻味它，以致总不能把它写了出来，因此，这个腹稿——如果当作是偶尔出现的非非之想来看，不无价值——渐渐膨胀起来，以致失去它的隽永之味，我终于视同赘疣而不再加以思索。可是，我的思想的主要点与斯宾诺莎的关系，仍不能磨灭地保持着，给予我以后的生活很大的影响，至于我的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想尽可能简单扼要地加以说明。

自然循着永恒的必然的规律而运行，而起作用，这种规律是那样神圣的，以至连神也不能怎样变更它。关于这一点，一切人都无意识地一致承认。人类想到自然现象怎么暗示它的背后有悟性、理性甚至任意性的潜在，使我们起惊异以至惊骇之心。

当我们看见动物也显示一种类于理性的行动时，我们为之惊异不置，因为动物虽与我们人类这样接近，但它们与我们间象是仍隔有一条无边的鸿沟，它们仍是局限于必然的王国内。所以，有一种思想家认为动物的机构行动虽有时极其巧妙，而仍严密地被规定，是完全机械的，我们对于这种学说不能加以非议。

再进而把植物加以观察，我们的主张便更明显地被证实。当我们以手触到含羞草时，它那羽毛一般的叶子便一对一对地合起来，终于那叶柄也象是关节的转动那样卸垂下来。我们看见这样的现象而唤起的莫名其妙之感，有人加以记述。更或把鸡头草① 来观察，我们这种感觉就更加强。即是，这种植物的叶，没有可以见得到的外来的诱因，就上下舞动，象是自己玩自己

① 鸡头草（Hedysarum gyrans）是鸡冠花的一种，半灌木，叶能舞动。

似的，同时又向我们的理解开玩笑那样。试想象一下，如果芭蕉也具有这样的本领，它把庞大的罗伞似的叶子自行上下舞动起来，第一回看见的人恐怕总会骤吃一惊而倒退几步吧。我们自信人类特具有优越性的意识既深植于我们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们绝不肯承认人类以外的万物也多少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办得到，甚至连同我们类似的东西，我们也喜欢加以抹杀。

可是，当我们看见别人的行为不合理地违反普遍承认的道德法，愚昧地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我们也为同样的惊异之感所袭。为了摆脱在这种场合所感到的惊骇，我们就把它化成非难、憎恶，我们想实际上或想象上摆脱这样的人。

这种对立，斯宾诺莎很使劲地表达出来，并加以强调，我则很巧妙地把这种对照论应用到我自己的身上，不过上头所讲的本来只是用来使下述的情况较容易明白一点。

即是，我可以把包括自己内在的诗人的才能完全当作是自然来看。加以我习于把外部的自然视为它的对象，我更作如是观了。这种诗才的运用，虽可为外部的诱因所引起和规定，但是，最欢畅地最丰富地表现出来，却是它无意地甚至违反自己的意志地流露的时候。

漫步于田野森林之中，
信口哼出我的短歌，
这样子一天又过了。

这样的即兴的诗作，即在晚上醒来时，也会在脑海中涌起，因此我学某一个先辈①那样常常喜欢叫人替我做一件轻皮的短

① 指意大利诗人皮特拉尔卡（Petrarca）。

衣，练惯在黑暗中起床把我的蓦然涌起的诗意写下。我惯常冲口吟出一小诗，而马上就不能把它照原来的样子再凑起来，因此有几回我一个劲儿直跑到一张斜面的书桌上，连斜置之纸也无暇放好，身体动也不动地打斜把诗从头到尾写下来。正因为同一的缘故，我觉得铅笔远比羽毛笔为便利，用铅笔写字较听使唤，有几回羽毛笔的澌澌作声和溅墨水，使我从作诗的梦游状态中醒过来，分了我的心，那小小的作品便流产了。我对于这样子写成的诗特别尊重，因为我对于这种诗的态度，恰象母鸡之孵出雏鸡来听它们在自己身边啾啾地叫那样。我从前以朗诵这种诗来与少数亲友共赏之癖，今又复活。但是拿这些诗来换钱，我却觉得是可憎的事。

盗窃著作权的书商希姆堡

说到这儿，我想提起一件后来才发生的事情。即是，我的著作日益为人所搜求，甚至有人央求我编成集子出版，但是刚才说过的心理阻止我自作这样的尝试。于是柏林书商希姆堡（Himburg）便利用我的犹豫，随便替我编成一本诗文集出版（这套诗文集共四册，出版于1775—1779年，第四册为诗集）。我意外地从他那里收到几册。这个胆大妄为的出版家在一封给我的信上，还自夸他这种举动是为公众服务，一若我应该感谢他那样，并自愿给我添寄一些柏林的瓷器来，假如我要的话。我读了这信，不由得不想起柏林犹太人的事，即是法律规定他们结婚必须买进几套瓷器，以便王室经营的瓷器工场有确实的销路。我对于这个厚颜无耻的书贾的鄙视，倒使我不对于这种侵害著作权的行为生气，我连信也不答复他，当他利用

我的所有物大赚其钱时我暗地里以这样的咒骂的诗来报复。

梦一般逝去的甜蜜年华的可爱标记，
萎残的花，女人脱落的一撮青丝，
微破的面纱，还有褪色的带儿，
都是消褪的欢爱拿哀愁换来的东西，
早应丢进火中，好化成灰，
却给那个无耻的苏西亚斯①搜集起来，
一若诗人的著作和名誉
他有权利来承袭，
有血有肉的我，怎能容忍他这样的丑态，
还啜着茶或咖啡而愉快？
茶碗也好，点心也好，给我滚开，
在希姆堡辈的眼中我已是一具尸骸。

可是，常引起我自发地写出这样的大小作品的自然，有时很长久不给我灵感，我在这时间内，就是有意创作也不能写出什么来，因此常感到无聊。于是上头说过的强烈对照之感，使我萌生一种思想，即是，看我应否从别一方面，把自己所具有的人性的，理性的和悟性的东西为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应用，把我的作诗的馀暇拿来致力于世俗的事——我本来已这样做过，而别人更日益热切地敦促我这样子做——好让我的能力不致投闲置散。我觉得从这样一般的考察而产生的决心与我的天性和处境又很谐洽，我便决定这样子干，以这样的方法来解消

① 苏西亚斯（Sosias），是纪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贺拉斯时代的书商。

我迄今还存在的摇摆迟疑的心理。当我想到今后我一方面可以业务上的劳绩来向世人要求物质上的报酬，他方面我的可珍视的天赋才能仍可继续当作是神圣的东西不为自私的目的而应用，我便感到很愉快。我这样子对于前途的瞻望又使我能免除一种痛苦的想法，即是，当我看到这种值得敬慕和赞叹的才能在德国恰是置于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的保护时，我便不禁悲愤填膺。因为随便翻印之为人所容许，甚至被目为有趣之事，不独在柏林是这样，而且那位以施行善政见称的可敬的巴登方伯也庇护麦克罗特(Macklot,巴登的书贾)的不道德的行为；事事满足世人的期望的约瑟夫大帝也偏袒冯·特拉特纳(von Trattner,维也纳的书贾)，并封为贵族，因此，天才的权利和所有物之无条件地任由书店和印刷店随便处置，便成为公然无忌的事了。

当我们有一回对着一个从巴登来访的人诉说这种不平的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即是，方伯夫人是一个好活动的女性，也出资设立一个造纸工场，它的出品很粗劣，以致找不到销路。于是书贾麦克罗特便向她建议，用这种纸来翻印德国的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以便稍稍增高这种纸的价值。这个建议便被她欣然采用了。

我们虽把这种背后闲话当作无稽之谈，但听了觉得很可笑。同时麦克罗特这名字却被当作是一个臭名，有坏的事情发生时，便屡用这个名字来骂人(参见下头第十八卷“汉斯乌斯特的婚礼”一节)。这样子，卑鄙的书商借着我的天才来发财，而时常被逼要借钱的轻率年轻的我，却靠着一两首妙想天开的滑稽诗来得到充分的补偿了。

犹太人街大火的场面

幸福的儿童和青年在一种沉醉的状态中向前漫步，这种状态有一个特别可注目之点，就是这些善良纯洁的人忽视了当时的环境的情况，更说不上认识。在他们的眼中，外部的世界是他们应塑造的素材，他们应领有享受的库藏。一切东西都属于他们，都象是归他们的意志自由支配。因此他们常陷于一种粗野放肆的生活状态。但是，在少数优秀的青年的场合，这种倾向便发展为一种道德的狂热，机会来时，每由于自身的冲动，向着真实的善或外表上的善前进，但也往往受别人的诱导指挥，或错误的诱惑。

现在我们所谈论的青年（指歌德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在一般人的眼中，他虽象是奇态异样，但仍为许多人所欢迎。凡是初次跟我会面的人，便马上发现我在谈话中的无条件的自由思想和明朗坦白的态度，以及不假思索随机立即行动的特性。现在让我把后者的事例举几桩出来吧。

有一天，房屋很挤的犹太街忽然发生大火。我的博爱之心和由此而起的助人为乐的特性驱使我就穿着平时外出的齐整的衣服飞跑去。人们已从至圣街那儿开出一条路来。我就从这个入口走去。那儿已聚着许多人在运着水来施救，有些提着满桶的水挤上前，有些拿着空桶返转来。我马上想出一个方法，即是，如果救火的人一行一行的列在街上，把水桶传递，便事半而功倍，于是我自己装满了两桶的水，站着不动，叫从后边运水来的人站在我的后头，叫前边的人接转水桶，一路传递下去，那把水倒了回来的人便排站在街的另一边。这种办法博得

人们的喝采，我的劝告和亲身参与救火工作也得人的称赞。由取水处直至火场，马上排成一行列传递水桶的队伍。可是，当这样的安排带来的希望刚在这个有条有理地运行的活机械中唤起一种喜悦、甚至可以说是乐趣的时候，恶作剧就闹了出来，幸灾乐祸之心就引起了。狼狈的逃难者，背负着他们的仅能保存的包袱，一跑到这条人丛拦成的街来，就得左挤右突、备受阻挠，才能通过。顽皮的孩子，少年，还用水泼溅他们，这些避难的犹太人既遭了火灾又要忍受别人的欺负作践。但是，我一作温和的劝告和有说服力的谴责，这种淘气的举动马上停止，也许是他们看见我身上穿的整齐的衣服——我看作等闲的衣服——恐怕给水溅污了的缘故吧。

我的朋友中有好奇心的人也走来观火灾，见到他们同伴的我穿着短靴和丝袜子——当时外出一定作这样的装束——在这儿做这样湿水淋漓的工作，吓了一跳。我叫他们帮忙，但答应的极少，更有一些人只笑一笑，摇摇头。可是我们在那儿站了很久，有许多拿水的人累了退出去，但又有许多新手补充进来，看热闹的人，也此往彼来。这样子，我的纯洁的见义勇为的行动轰动全城，而我所发明的传桶救火的妙法也成为当日城中的佳话。

我这种轻举妄动是基于一种善意的愉快的奇想，也是源于一种容易被人认为虚荣心的沾沾自喜之感，因此之故，我还演出种种的奇行，动人的视听。

有一个冬天，非常寒冷，美因河满为冰所盖，而且化成坚硬的地了。在冰上熙来攘往着车马行人和为游乐而来的人。无尽的大滑冰场，滑滑的冰冻的广阔的水面，有无数的群众動个不停。我清早便跑到那儿去，后来我的母亲坐着马车来看热

冽，我穿的衣服既单薄，浑身都要冻僵了。母亲坐在马车上，披着紫红色天鹅绒面的裘，裘在前胸上系着灿然的金丝的带和缨，穿起来很是华贵庄严。“亲爱的娘，把您的皮衣服给我穿！”我不假思索，即顺口喊出来，“我冷的很厉害呢！”她也毫不踌躇，即把皮衣脱了给我穿。这件镶着黑貂皮，饰以黄金线的紫红色长过膝的上衣，与我原来带的褐色的皮帽，不见得不相配。我穿着它坦然在冰上滑来滑去。那天的行人游人也很拥挤，没有特别留意我的异样的服装，不过其中也有人注意到了，因为日后别人亦庄亦谐地再数说我的狂行时，也把这事算作一桩呢。

我把这种天真烂漫、毫无思虑的行动再提起之后，现在言归正传吧。

有一个有风趣的法国人曾说：“如果一个有才的人曾经以一种有价值的著作惹起公众的注意，人们便尽力妨害他，不让他第二回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这是实际的情形。一个孤独静居的青年写出一些优美天才的作品，虽博得人们的称赏，但失去他的独立自主了，人们为了从他的人格中吸收撷取一些东西，向这青年提出种种要求，他集中于创作的才能，便因而涣散了。

我便是这样子受人的招请款待，其实还不能说是招请，一个朋友或认识的人约我，或不如说拉我，到这儿或那儿去。

有一个象是从别个世界来的怪客，因为时常拒人于门外，初时自称为“熊”①，再自称为伏尔泰著作中的“休伦族人”②

① 歌德在早期作的诗《丽莉的公园》（《Lilis Park》）中这样的自称。

② 休伦族人（Hurone）是伏尔泰的作品《天真汉》（《L'ingénu》，1767）中的人物。这个族是北美易洛魁人之一族。

或坎伯兰①的著作中的“西印度人”，多才多艺的“自然儿”，惹起许多人的好奇心，种种的人家要想方设法跟他结识，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我了。

同丽莉的初会

这样子拉我去跟别人晤面的事情很多了。有一个晚上，一个朋友来约我去参加一个小音乐会，会是在一个属于加尔文派的豪商住宅②内开的。时间已经晚了，但我既喜欢不假思索，乘兴立断，便穿着平常外出的整齐衣服，跟他一道去。我们踏进楼下一个宽敞的客厅去。与会的客人很不少，在正中放着一个大钢琴，这家主人的独生女儿正坐在那儿很熟练优美地弹奏着。我站到钢琴的下手去，以便更真切地瞧她的容貌和举动。她的容态带有一点孩子气，她弹奏时的举动，轻快而自然。

奏鸣乐弹完了之后，她站到琴边来，正对着我，我们只互相点首招呼而不发一言，因为那时四部合奏已开始了。到了奏完之后，我已走近她一点，向她这样称赞：“我第一次跟您会面，便又同时欣赏您的音乐的天才，我深感荣幸。”她懂得很有礼貌地答我，她就站在那儿不动，我也没有他去。我可以看出，她很留心打量我，我自己简直给她看个饱了，但是我随它去，因为我也可以饱餐秀色呢。我们的视线交射，我当时感到

---

① 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1732—1811），是英国的诗人，戏曲家，《西印度人》是他的喜剧的名称。

② 这个住宅的主人是银行家舍恩纳曼（Schönemann）的遗孀，她的独生女儿名唤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歌德是于1775年元旦上她们家参加音乐会的。

某种极温柔的吸引力，实不容否认。但是听众们的挤来挤去，和当时种种的演奏，使我们在那晚无从作进一步的接近。到了散会告别的时候，她的母亲向我表示，希望我不久再来访，而那女郎也以一种殷勤亲切的口气帮她母亲的腔。我听了心中的愉快，实不容讳言。过了相当的日子，我再到那家访问，当日我们的谈话愉快而有分寸，象是没有预示我们将来会发生爱情的关系。

可是，同时，我们家里的已经开了头的喜客之风，使双亲和我尝到种种不快的结果。我本来不断地努力追求崇高的理想，要理解它，促进它，如有可能还创作类于这样的理想的作品，但是我这种志向因来客的不绝而无所成就了。来访的如果是善良的人，那就是虔诚的信徒，如果是活动家，那便是欠聪明甚至笨拙的人。前者对于我毫无补助，后者倒会引起我的迷惑。关于这种情况，有一桩很值得注目的事，我曾详细地记下来。

眼科医生荣格的失败

在一七七五年的春初，荣格——后来以斯蒂灵格知名（见第九卷“荣格一斯蒂灵格”一节）——从下莱茵州写信通知我们，说他应法兰克福城某大户的招请，要到这儿来治眼疾。我和两亲听了都很高兴，复信请他住到我们家里来。

请荣格治疗的人就是冯·勒尔斯纳（von Lersner）。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知名之士，以曾为公侯子弟的师保及任职宫廷和游历四方时的方正谨慎的言行，到处受人尊敬。他双目失明已久，但他仍不抛弃求医疗治的希望。这几年以来，荣格靠

着十足的勇气和从信仰得来的果敢，在下莱茵州以手术医好了许多白内障病的患者。眼科名医的声誉远近都知。他的心地的正直，性格的和蔼可亲和对神的至纯的信仰，使人们对他更为信赖。由是，他的名声溯莱茵河而上，藉着商业上的种种的来往做媒介，便传到这里来。冯·勒尔斯纳和他的家人们听了一个有见识的医生之劝，决心请这个走红运的医生来医治。虽有一个本城的商人曾受荣格的治疗而不见效，郑重地劝阻他，他也不听。治好的实例不可胜数，一个例外自然不算甚么一回事呀！荣格终于来了。一向他治病都只得很少的报酬，这回却给人以重礼请来了。他以为此行名声将会更高一点，得意洋洋地到了法兰克福城，我们也预祝这个善良、爽朗的曾共食桌的故人成功。

荣格作过一些开刀前的准备工作以后，便终于要向两眼施行除去白内障的手术了。我们在旁边都极度紧张，因为施了手术，患者就希望可以马上看见东西，只在拴上绷带时才再不见天日。可是我们觉得荣格的面色有点不高兴，象是心情沉重，我后来再向他寻究时他便承认他是担心这回治疗的效果。眼疾的治疗通常象是最容易不过的，我在斯特拉斯堡也好几回亲眼看见过，而实际上荣格也有上百回这样奏功的。把那没感觉的角膜毫无痛苦地切开之后，只轻轻一压，那溷浊的水晶体便立即自动跳出来，患者马上看见眼前的东西，然后不得不忍受几天绷带的障蔽，到了完全痊复之后才能随意地舒适地使用这个重要珍贵的器官。好些受荣格之赐而得见天日的贫人，恐怕会为他们的大恩人向神祈福，这种祈求应会通过这个富有的患者的厚谢而实现吧。

荣格对我们自认这回的手术不会那样容易、顺利，眼珠不

会自己跑出来，他要把它取出，而且它已长到跟眼窝连在一起，必须把它与眼窝的联系割断才行，这就要用点力气了。他又自责同时治疗两只眼为失策。但是事前患者和他们亲友已决定两眼同时动手术，因为他们不曾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意外既然发生了，人们也不会马上平心静气重新考虑怎么办才好。总而言之，第二只眼睛的水晶体也不是自己跑出来，也要很麻烦才能挖出来。

象荣格这样一个善良、正直、敬神的人，陷于这样的难局，他的苦恼真无法详述和形容。也许关于他的心情作一般的说明，在这儿是适当的吧。

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努力，是人类可能从事的最简单而又最容易实行的事。他生来本已具有这种的冲动，及至置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常识和爱又引导他甚至强迫他致力于此。

荣格生活于一种道德的宗教的爱的气氛之中，没有他人的同情好意，他就不能生存。他要相互的爱。在不知自己的人的面前，他默不作声，在仅知道但不喜爱自己的人的面前，他愀然不乐。因此，他最亲爱的人，就是安于一种狭隘而宁静的职业圈内抱着一种愉悦的心情来努力于自我改造的善良的人。

这种人自能摆脱虚荣的引诱，不作外面的荣誉的追求，慎言寡语，对于同事和邻人采取同样对待的亲爱的态度。

这样的人在根本上又常具一种朦胧的特殊的精神状态，随各人的个性之不同而略有参差。这种人偶然受了刺激，就很重视他们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生涯，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深信神直接地干预人间的事。

此外，人类中又有一种惰性倾向，要继续停留于自己的现状之中，而同时又让自己为他人推进和领导，自己却踌躇不肯

去实行。这种倾向，因为自己充分考虑过的计划的失败，或偶然巧合的有利情形的出现，获意外的成功而更加增强。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一切警觉和勇敢的行动都有妨害，所以人们怎样会陷于这种境地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重大问题。

抱这样心情的人们，彼此间最喜欢谈的就是所谓“觉醒”（Erweckung）和“回心转意”（Sinnesveränderung），它们的心理的价值，我们不能否认。这实即是我们在科学和文艺领域称为“省悟”（Aperçu）的东西，——对于某一伟大准则的省识，常是一种天才的精神的作用。在这场合，只有直观可以奏效，思索，学习，传授都无所施其技。在这场合，是一种精神力的发见，这种力在信仰中抛下锚，在现世生活的惊涛巨浪里也屹然不动，有稳如泰山之感。

这样的省悟给予发见者以无上的欢喜，这因为它以独创的方式暗示“无限”，它不需要时间的过程就达到确信，一刹那间便出现和完成了。所以风趣的法国古老韵语说得好：

En peu d'heure
Dieu labeure
转瞬之间
神就造出奇迹

从外部来的激动，时常惹起这种心的转变的剧烈的发作，人们相信会看到征兆和奇迹。

信赖和爱使我与荣格结成极亲密的朋友，我对于他的生涯也给予很好的很有利的影响，而他对于人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感铭在心，念念不忘，也是出自他的天性。但是，在那个时

期，我的处境，我觉得与他交际晤谈既不感到愉快，也得不到什么益处。无论甚么人都好，他喜欢怎样解释和设想出他自己的生活之谜，我随他的便。但是，度一种冒险的生涯，把一切通过理性而成就的善事归于神的直接干预，我觉得确太过分了。更或因为我们轻浮骄慢之故而孟浪从事或漫不经心，从而产生难堪的坏结果，而也认为这是神的训诫，这种思想方法，我也不理解。所以，我的善良的朋友（荣格）对我讲他的意见时，我只能倾听，而不能给予使他欢欣鼓舞的回答。但是，我对他也象对其他许多人那样，随他喜欢怎样讲就讲出来，如果思想太过庸俗的人不惜以恶语中伤他的善良的人格，我无时不尽力为之辩护。因此，有一回，一个谑而虐的人很郑重的呼道："不！真的，如果我对神的关系有荣格那样的亲密，那么我就不祈求上帝赐给我金钱，而祈求他赐我以智慧和忠言，以便我不做那么些蠢事，以致花钱而债台高筑。"我听了这个俏皮话，就觉得不能入耳。

况且，当时确不是开玩笑说俏皮话的时候。好几天是在恐惧和希望之间过了。恐惧渐渐增长，希望减少，终于完全消失了。这个善良而能忍耐的患者的眼发起炎来，治疗的失败象是无可置疑的了。

我们的朋友当时的处境之苦，真非笔墨所能尽述。他要抵受潜在于心底的极深的绝望的苦闷。因为这回失败，他所受的损失是再大没有了！第一，重见天日的患者的极大的感谢——医生所能享受的最美好的报酬；第二，许多别的同病者的信赖；第三，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信用，如果他的手术从此中断，他全家就陷于无依无靠的窘境。总而言之，我们从头到尾是演着那约伯（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的悲剧，而荣格这个

诚实的人却自己担当那骂约伯的朋友们的角色。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以前几次过失的天谴，他随便以为他自己偶然想出的治疗法就是神召唤他做眼科医生。他自责不曾彻底地研究这种重要的专门学问，而只轻率地靠着运气来治疗人。一时间，恶意的人在他背后说的闲话也突现在他的心中，他怀疑这种非议也许是说对了，加之，对于笃信的人很危险的轻浮，甚至自负和虚荣心等毛病，在他的生涯中也免不了犯着，所以他的愧恼更深。在这个苦闷的时节，他完全嗒然若丧了，我们纵彼此互相开解，但是到末了只能达到这样的理性的必然的结论，即是"天意难测"罢了。

那时的我，正是抱着愉快地迈进的心，如果我不把荣格的访问所造成的我的苦闷，按照我习惯的方法，以认真的友好的态度，加以考察并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则我更会痛苦，可是我看到，自荣格住进我家后，我的仁慈的母亲为家务这样操心忙碌，而所得到的报酬却是这样坏的结果，我心里很难过。幸而我的母亲无时不平心静气，不感到自己是白劳苦一场。我最可怜的就是父亲，为着我的缘故，他殷勤地开放了他一向严格封闭的家庭。因为有外地人来下榻的缘故，本地的朋友和过路的客人也常闻风而来，我们在吃饭时便特别热闹。席上的谈话兴高采烈，怪话连篇，父亲听了特别高兴。我又拿出正面反面种种色色的论辩来迎合他，使父亲乐趣横生，笑声不绝。因为我有好辩的怪癖，无论甚么都要抬一下杠，但是只当对手方有正当的理由，而故意跟他抗辩便会变成滑稽可笑时，我才执拗。可是到了荣格医眼失败那几周间，这样的欢乐是抛向九霄云外了。荣格在医治勒尔斯纳的同时也替另外几个人治眼而见效，固然是极可庆幸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治疗失败了，

小的成功也于事无补，更不能使他的烦闷的心情有好转之望了。

荣格的犹太病人

有一事使我们乐起来的，就是一个年老失明的犹太乞丐的治疗。他是从伊森堡（Isenburg侯国）到法兰克福城来，极端贫苦，差不多连恶劣的食宿之所都找不到。但是，东方民族的坚强耐苦的特性帮助了他，因此他受治疗时，竟不感到手术的痛苦，便霍然痊愈，喜见天日。有人问他："受手术时痛不痛？"他便以一种夸张的口吻答道："如果我有百万双的眼睛，我便愿意每回花十个铜钱，一双一双的把全数都受手术呢。"在他离开法兰克福城时，他在大街上的行动也同样的离奇。他象《旧约》时代的善良的人那样感谢上帝，称赞荣格先生为上帝派来的创造奇迹的名医。他这样子穿过繁华的长街踅到桥边，店员和客人从商店奔出来，看见他这样奇特而虔诚，激昂地向全世界表白他的信仰热情而大为惊异。一切人都动起同情之心，以致他不须开口求乞，人们即纷纷解囊相助，结果他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路费。

可是，在我们交往的人们的中间，这样的称心的事却不能说得出口。因为当那个赤贫的叫化子，过了美因河回到沙漠的故乡，纵然短于衣食，而双目已明，自喜无上幸福的时候，在美因河的北岸，那个富裕的名士，却失掉他最热切地期待着的极其宝贵的慰藉了。

当初，慷慨的勒尔斯纳曾约过不管治疗见效与否，以一千金厚礼为酬，所以当荣格受了这酬金时，他心痛如割。这笔现

金他要在归途中还清一部分旧债，为了这笔债务，他本来悲惨的处境更加难堪。

这样子，他怏怏然跟我们分别。他预想到归来的时候，妻子会以焦灼的脸孔迎接他，亲切的岳父母会改变对待他的态度。他的岳父母认为他是个极可信赖的人而充当他的债务的担保人，现在恐怕会说替他们的女儿错选了终身的伴侣了。在他运气好的时候还对他怀恶意的人们的冷嘲热讽，恐怕现在家家户户都可以听见了。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医业因这次外出而丢掉许多生意，替勒尔斯纳治疗的失败，当会使他的业务从根本上受到打击，他预想及此，更加非常忧虑。

但是，我们离开了他以后，我们看来，他仍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因为他的能干有为的性格，辅之以对于超自然的助力的信仰，必然会使他的朋友们暗默里保持对他一定程度的信赖。

第十七卷

丽莉爱情的吐露

当我要在这卷再述到我与丽莉（Lili 即弹琴之女）的关系时，我不禁记起我那时过的极快乐的时刻，有一部分是跟她的母亲三个人一块儿过的，有一部分是单跟她两个人过的。她们从我的著作中知道我是一个“通达人情”（这是当时的用语）的人而信赖我，因为她们这样的想，所以我们的谈话，从道德上的观点看来总是有意思的。

可是，人们怎能彼此互话关于内心的事，而不互相披沥胸怀呢？所以，不消多久，丽莉在悄然相对的时候，便向我讲述她少年时的故事。她是在享受社交上的种种好处与世俗的娱乐之中长大的。她对我细说她的兄弟，亲戚和其他身边的事情，只有他的母亲没有在她的口里提过，依然是在不大分明的状态中受人尊敬。

她也谈到自己的细微的弱点，她不能否认自己天生有一种吸引别人的魅力，自己也意识到，而同时又与一种确又把他们甩掉的特性相结合。我们于是彼此互相倾谈，而终于触到一个重要之点。即是，她要施展她的魅力来吸引我，而她象是受罚那样，也为我所吸引。

这种自白，是从那样一个纯洁天真的心坎吐露出来，所以，我听了感到她是把我完完全全看做她的意中人了。

我们间的晤谈，已成为双方的需求，成为一种习惯。可是如果不能决心在有亲友在她身旁的时候也去访她，我恐怕有许多天许多晚寂寞得很难受了。因此我的心头便长出许多烦恼来。

我跟她的关系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对于一个美丽，可爱，有教养的闺女的关系，虽与我从前跟别的异性的关系相似，但带有更高的性质。至于个人以外的关系，混入和错综于她的社交生活的关系，我从没有考虑到。一种不能抗拒的企求支配着我们，我少了她不行，她少了我也不行。但是她的周遭和与她来往的人们的言动常妨碍着我们，因此我纵然特别去看望她，却不知有多少日子虚掷掉，多少钟头浪费掉！

例如我们约过作郊游，而结果却不欢而散。她有一个兄弟迟迟不动身，而我又不能不等他一块走，他却极泰然地慢吞吞地——我不知道他是否故意跟我为难——做完他的事，因此定得很好的郊游计划便给他败坏了。此外我与她之间还有其他的巧合的事，爽约不遇的事，熬不住性儿的事，故意克制着自己的事，这一切的苦恼如果在一节小说中详细描写出来，定然会获得读者同情的，在这书里却不得不割爱了。可是，为着使刚才所讲的我与丽莉的关系添点栩栩欲活的光景，和引起读者的青春般的同感起见，我想在这儿附录两首短诗。这些诗虽已发表过，为读者所知，但插在这儿恐怕印象会更深吧。

献给丽莉的两首情诗

(一)

心呵，我的心呵，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受甚么强烈的压制？
这是多么陌生的新的生涯。
我已不再认得你。
你所爱的一切都已消失，
你的忧伤也都逝去，
你的精进，你的安宁都已不再——
呵！你怎样会弄成这个样子！

缚你的是不是这青春之花，
这可爱的美丽的容颜，
这双充满着真和善的眼，
个中魅力无限？
我才欲迅速地摆脱她，
鼓起勇气从她身边逃亡，
呀！只在一刹那之间，
你又牵我回到她的身旁。

这个魔术的地网天罗
怎样也不能冲破，
这个美好风流的少女
牢牢地强把我捆锁：
在她的魔力圈里，
一举一动都要听她的话。
呵，这是多大的变化！
爱呵，爱呵，饶过我吧！

呵，

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

到那繁华之场？

难道年轻善良的我没有欢乐，

在这孤寂的晚上？

（二）

悄然蛰居斗室之内，

正是月光满地，

卧在这凄清的光辉的怀抱里，

我便颓然入寐。

我梦见那黄金的良宵，

尝到那纯洁无邪的欢娱

我已感到你的艳姿的慰抚

在我的心坎的深处。

我还是在高烧的银烛之下

跟你斗牌赌胜的我吗？

生憎有种种的外客插进来，

常使人不耐。

春天的媚人的野花，

在我的眼中今已鲜妍不再：

安琪儿呵，只有你在的时候，

才有自然才有善和爱。

如果读者留心朗诵这些短诗，更或带着感情来吟唱它们，我相信，我所体验的极乐的良宵的微风，一定也会向着他们吹拂呢。

但是，我还不欲匆匆就撇开跟丽莉一起过的繁华的社交生活而不谈，我想先补足几桩事体，对于第二首诗的结语特别想加以说明。

我跟丽莉会面时，她惯穿着素朴的家常便服，很少替换，这时她作时髦的华丽的装束，容光四射地站在我的面前，不过她还是完全跟从前一样的女子。她的仪态娴雅温柔依然如故，只她的动人之处更显露出来就是了。因为她这时要接待许多客人，要逐个逐个的分别应酬，所以她的谈笑应对需要比平时更加灵活，更是仪态万方。总而言之，我不能否认，这些生客一方面虽引起我不快之感，但是同时，我之得享有许多欢乐也是受他们之赐。即是说，有他们在，我才识得丽莉是交际的能手，在广大的社交界中也毫无逊色。

她的胸现在虽已装饰上，但还不是向我披沥过，使我了然洞见象是自己的胸那样的胸么？她的朱唇还不是从前向我辗然微启，细述她的身世和闺中的往事的嘴唇吗？每一回互送的眼波，每一次伴着的嫣然微笑都透露出我们俩的高尚的默契，即在稠人广众之中，我想起我们那样天真纯洁地暗通情愫，那样的极近人情、极自然的友谊，自己也惊叹起来。

可是，到了春天来临的时候，乡村风味的舒适自由，使我们的交谊更为亲密一点。美因河畔的奥芬巴哈① 在那时已俨然有开始成为都市的气象。在当时豪华夺目的建筑物已现头角。

---

① 奥芬巴哈（Offenbach）大公爵领黑森的首府，离法兰克福城不远。

伯纳德① 姨父（丽莉的姨父，我也这样称呼他）住的是那里最大的房子，宽敞的工场与它相连，对面住的是一个唤做多维尔（d'Orville）的人，年纪较姨父为小，举止活泼，性情可爱。贴近的园圃，草坪绵亘至美因河岸，到处都可通至美丽的郊外，凡是踏进来的人或在这儿流连的人都觉得心情舒畅。在恋爱中的我，在这儿找到最可容自己的感情驰骋的地方了。

安德烈和埃瓦尔德

我是租住在安德烈② 的家里。这个人日后相当出名，我在这儿提起他之前，不得不插入一段题外的话，叫读者略明白当时的歌剧的情形。

那时，法兰克福城的剧场是由马钱德③ 主办，他想靠自己在舞台上的演出尽量使剧场发展。他是一个面貌漂亮，身材高大，体格良好，正在盛年的人。快适温柔是他的性格的突出的特点。所以他登台表演很得观众的欢迎。他又具有当时歌剧演出所需要的好嗓子，因此他努力要把法国的大大小小的歌剧移植过来演出。

在演格雷特里④ 的《美女与怪兽》（《Die schöne bei dem

---

① 伯纳德（Nikolaus Bernard），是奥芬巴哈一家制造鼻烟的大工场的创办人，他的太太是舍恩纳曼夫人的姊妹。

② 安德烈（Johann André，1741—99），原是丝织厂主，后开办一个音乐出版社和乐谱印刷厂，他曾为歌德一些歌词作曲。1777年以后他曾任柏林一个剧院的音乐队指挥。

③ 马钱德（Theobald Marchand），曾任法尔兹选帝侯的宫廷剧院的经理。

④ 格雷特里（Grétry），法国作曲家，《美女与怪兽》是他作的喜剧舞蹈曲。

Ungeheuer》）一歌剧时，马钱德扮演父亲一角色，特别拿手，他在纱帷的后面看见幻影那一场的表情十分动人。

这一歌剧在同类的歌剧中算是成功之作，与高超的风格还接近，也适宜于唤起极纤细柔美的感情。在他方面，写实主义的恶魔在那时也占领了歌剧剧场，种种的生活状态和职工生活也编成歌剧而演出。猎人，箍桶匠，以及其他一切人物都应有尽有地出现于舞台之上。安德烈挑陶器匠做他的角色。他自己把脚本写出来，倾注他的音乐的天才于他的自作的曲本之上。

我是住在他家里，关于这个快手诗人兼作曲家，我只想在这儿拣有必要讲的才说。

他是一个天生就活泼的有才能的人，本来是以技术家和工业家为业，住在奥芬巴哈。他时而想充当弦乐队的指挥，时而想做业余的艺人，他希望做一个良好的乐队的指挥，认真地努力，在音乐上打下牢固的基础。他把自己当作业余艺术家时，他好将自己作的曲子不断地重复弹奏。

在当时我们交往的那伙人中，有些人尽一切力量给我们增添生气和热闹，埃瓦尔德①牧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交场中，他是一个有风趣、很豪爽的人，独居时他又能致力于他的任务和职业的研究，因此在日后也著名于神学界。在当时我们一班人中，他以富于理解力，善于应对之故，总算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丽莉的钢琴的弹奏完全吸住了安德烈，使他加入我们的行列中来。他有时指导人，有时教人，有时自己弹奏，白天也

① 埃瓦尔德（Johann Ludwig Ewald，1747—1822），奥芬巴哈革新教会的牧师。

好，晚上也好，他没有几个钟头不跟我们象一家人那样厮混在一起或参加我们的社交活动。

伯格①的《伦诺尔》那时刚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受德国人的热烈的欢迎，替这诗作曲的人就是安德烈，他自己很喜欢把它三番五次地唱出来。

我常在席中兴高采烈地朗吟，也准备朗吟这诗。当时的人还不以反复地吟唱同一样的东西为无聊。如果我们两人叫大家挑选，看要谁来朗吟，挑选我的时候倒多。

可是，这一切的雅集宴游，无论是怎样的，只令那两个恋人更想藉此延长其聚首的时间，我和她都不愿这种欢聚的散场，我们俩更番劝诱安德烈帮忙，不费多大的唇舌，他就不断地忙着奏这个，唱那个，直至夜深，他还反复地奏他的音乐。我们俩藉此便十拿九稳地得到珍贵的不可或缺的聚首之欢了。

当我们绝早起来，步出户外，我们置身于空气清新的空旷的地方，但实际还不算是乡村的环境。壮丽的房屋，在那时足以使一个城市引以自豪，家家的庭园从楼下可以展望砌平的花坛和其他装饰用的花床，草坪，美因河横在眼前，远眺一直达到对岸，即便在清早的时候，已常有木筏、小舟和轻快的市场船往来上下；河上的世界是一个轻柔地飘悠而有生气的世界，与恋人的似水柔情正相谐洽。即使河上有时有一点微浪，岸边的芦苇簌簌作响起来，倒给那缓缓地流动着的川流添点情致，不免使那些漫步前来的人，受一种恬静的陶醉。在晴和的季节，明澄的太空俯临着这一切，一对爱侣，在这样的风光的怀

① 伯格（Bürger，1747—94），格廷根的诗人。《伦诺尔》（《Lenor》）是他写的一首抒情诗，1774年完成，安德烈在第二年为它作曲。

抱里，晨间又经常一同散步，是多么愉快的事呵！

可是，如果谨严的读者觉得这样一种生活是太过轻浮放纵的话，读者却要知道，这儿所记的游乐一类的事，只是凑合在一起来记述出来，其实在一次游乐与下一次游乐之间却隔有几天以至几周的时间，插有别的性质的安排和活动，甚至难堪的干燥无味的事。

法律事务的处理

男人们和女人们各自热心地做他们职务上的事。我为现在和将来起见，也决不忽略做我所应做的工作。此外仍有充分的余暇来完成我的才能和热情不可抗拒地驱使我致力的事情。

每天清早的时间，我埋头从事诗的研究，创作，稍晏我就致力于世俗的事务——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处理的事务。我的父亲本是一个造诣极深的典雅的法律学者，为着自己的财产的管理，以及名门大家的朋友的委托，而办理法律上的事务。因为他有帝室顾问官的头衔，不能公然执行律师的业务，但是有许多亲友仍请他做法律顾问，他所作成的法律文书交由一个普通的律师署名，而给予后者以相当的酬金。

他这种事务上的活动，因为我参加进去帮忙而更添活气。可是，我觉得父亲认为我的诗才胜于我的办事能力，所以他想设法让我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做诗的研究和创作。他象是一个非正式的陪审官那样，彻底地精到地考究种种法律上的文书，但构思下笔却比较慢。当我们会面时，他便把案件的内容告诉我，我便一挥而就，他见我有那样的捷才，亲心为之大悦，有一回他禁不住对我那样说道："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的话，我

恐怕要妒忌你了。”

为了减轻我们的工作，父亲还雇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的性格，为人，如果好好地描写出来，不难构成或装点成一篇小说。在学校的时候，他很用功，对于拉丁语造诣很深，对于其他学科也有充分的知识。毕业后的生活以游荡无度之故，没有着落，郁郁地虚度了几年贫病交迫的日子，到后来才藉他的一手好字和会计之才而获得较好的境遇。他受过几名律师的雇用熏陶之后，他便熟识法律上的手续、程式，由于他正直和办事一丝不苟，博得雇用他的一切人的好感。我们家里也请他帮忙，凡是法律上会计上的事他都帮同办理。

实际上，我们的事务渐见繁剧，不单是纯粹法律的事务，而且一切种类的委托，如定货运送等代理业务我们也要兼顾，所以这个书记的助力很大。他精通市政府的一切门路和内幕，新旧两市的市长接见时，参加者中也有他的一份。加以新选出的市议员中有许多个在他们初任职时，甚至办理公事还没有把握时，他同他们就很熟识，其中有几个不久就要由普通议员而升为陪审官，所以他在市府内获得人们的信用，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势力了。他懂得利用他这种地位来为他的雇主谋利益。因为他的健康不容许他作过度的活动，所以对每一项委托每一项订购任务他总很小心地办理完成。

他的丰貌不致招人不快之感，身体瘦长，五官端正，他的举止不显出唐突，不过，在他深信自己能胜任愉快时他却喜形于色。在扫除阻碍的场合，他又神色自若，手腕熟落。他大概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了，但是我还后悔(让我重述上头那一句话)不曾把他当作一个主角插入我的小说情节之中。

上头所讲的，为的是想使谨严的读者得到一点满意，现在

让我掉转笔头续讲那友情与恋爱交辉着的美景良辰吧。

在我们交往的一班人中，各人生日的认真和热烈庆祝，并轮流举行，是这种社交结合当然要做的事。为了祝贺牧师埃瓦尔德的寿辰，我写了这样一首短诗：

　在一切欢乐的辰光
爱和酒使我们意气扬扬，
让我们齐声合口，
把这支寿歌高唱！
我们是神所结合，
他领我们到这儿来，
他重拨起我们的火焰，
那本是他点起来。

这个短歌到现在还留存着，每当宴会的席上，来客意兴渐豪时，大家便喜气洋洋地合唱这诗。我们也想把这诗推荐给我们的后辈，并愿唱这歌的一切人都象我们当时那样，从内心里笑乐起来，而不想到外头有更广阔的世界，只闭居在自己的狭小团体中，觉得自成一个天地。

庆祝丽莉诞辰的一个插曲

不久，一七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丽莉的十七岁诞辰也快来临，我们预定特别庆祝一番。她答应在那天的正午到奥芬巴哈来。关于这事，我不得不申明一下，即是，我们大家商量的结果，一致主张废除陈旧的祝贺俗套，准备只以同她这样一个人相适应的真心诚意的方式来款待客人和欢叙。

我忙着尽这样乐意承担的义务，抬头看见赤红的太阳落下去了，心想这是明日天气晴和的预告，我们的祝寿客人和欢叙会将有可喜的、灿烂的阳光照临。恰在那时候，丽莉的弟弟乔治走来了。他是不识得装假的，一进屋子来便露出冒失卤莽的神态，不客气地对我报讯，说明天的祝寿会有点糟糕了。他不知道是甚么缘故，但他的姐姐嘱他带口信说，她在明天正午绝对不能到奥芬巴哈来参加我们的庆祝会，希望最早也要傍晚才能到场。她自己也很感到，很明白，这消息一定会使我和其他的朋友很不高兴，所以她万分恳切地求我想出一个妙策来，使得她叫我通知的消息引起的不快之感减轻一点，甚至完全解消。如果我这样子做，她就感激不尽了。

我沉默了一会，马上聚精会神的想了一下，象是上天启示那样，即想出一个应急的手段来了。"乔治，"我说道："赶快回去吧，教丽莉安心，尽可能地在傍晚来；我敢誓言，这件遗憾事正可做庆祝会的一个节目呢。"他的小兄弟听见我的话，好奇心起，想知道是怎样一个妙法，纵然他出尽了爱人的弟弟敢施展的种种手段以至用强，我也绝不肯说出来。

他才回去，我即带着特殊的洋洋自得之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到这回是自己效忠于她的绝好机会，而欢欣鼓舞，我随用十几张纸订做一小册，而以美丽的缎子做封面，装成送礼诗的稿本那样，连忙在上头题上这样的标题：

《她不来了！》

"一幕家庭的悲剧——也许是天道不仁罢——将于一七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因河畔的奥芬巴哈极自然地演出，由早上起至傍晚为止。"

这一篇开玩笑的作品，既没留有原稿，也没有抄本，我虽屡次搜寻，但连它的断片也找不到。所以我只有重新再做过，这在大体上不是怎样难的事。

演这戏曲的舞台是奥芬巴哈多维尔的住宅和庭园。开场时，婢仆们出来，各自小心地尽其职责，而寿辰庆祝的准备便很清楚地表露出来。孩子们也参杂在里头，出出进进，按照实际的生活那样的表演。然后主人与主妇出场，表现其应有的举动和作用。当一切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各做各的事时，邻居那个孜孜不倦的作曲家安德烈便进来了。他坐在大钢琴的前面，叫大众聚在那儿倾听他练唱才作成的祝寿之歌。一屋子的人都给他叫来了，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又走开，继续做刚才做开的急迫的事。一个人给别一个人叫走了，后者需要前者的帮忙，园丁的出现使人注意到园子里花木和喷水的装饰，花环，绣有题词的美丽的彩旗，真是万事俱备，应有尽有。

当大家正聚集在这些引人欢乐的东西的周围的时候，一个信差进来了。这一类的居间人大概是一个富于幽默的人物，也理应可以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他看见自己这回得到意外多的酒钱，大概猜到主人家是发生甚么事了。他便象煞有介事地捧着他的邮包，仿佛里头有甚么很重要的东西带来那样，希望主人会赏给他一杯葡萄酒和一些面包，故意开玩笑地延宕了一下之后，那专程送来的信便递给主人家了。主人看了一遍之后，手垂下来，信落在地上，他喊道："让我到饭桌去，让我到五斗橱去，待我好'扫'（streichen）一下。"

本来，愉快活泼的人的饶有风趣的聚会交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用一种象征的语词或手势。于是在同伴间产生一种隐语，个中人听了觉得极有趣，但局外人或觉察不到，

或觉察得到而生不快之感。

由所谓“扫”（Streichen）这种语词和举动表现出的特性是丽莉的最可爱的癖性之一，当有人在她的面前说出或谈及粗鄙的话时——尤其是当她坐在饭桌前，或在平面的东西的附近时——她这种癖性就发作了。

她这种癖性的起源是极其有趣的，当她的家里请吃饭时，如果她身旁的生客说一些粗鄙失礼的话，她就来一下这种极可爱的淘气。那时，她听了脸色一点不变，只伸出右手在桌布上很巧妙地一扫，便把她这种轻轻的动作所能及的一切扫落地上了。刀呵，叉呵，面包呵，盐瓶呵，以致他邻座所用的一些东西都落在地上，座上的人都吓了一跳，用人也跑来，人们都不知道她的这种举动是甚么意思，只有老练的人懂得她的用意，并认为她以这样的美妙的方法来“回敬”和制止那人的非礼的言谈而感到高兴。

我们这一伙人也仿效她的“一扫”的玩艺儿，发现有甚么不快的事要摈斥的，便常作这种象征的手势。因为我们的社交团体虽是由干练、优秀、可敬和善良的人物构成，而仍不是温文尔雅无可訾议，这类的刺耳碍眼的事总不免有发生的。用右手横扫以表示抵制的姿势．我们都依样画葫芦了，但是，实际上把用具从桌上扫落，连丽莉自已在后来也不敢为之，只有很谨慎地、带有风趣地重演出来。

这篇滑稽戏曲的作者既让主人作“一扫”那样的打诨，而“一扫”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似的习惯，所以一演出来，大家都感到很有意思，甚为激动。一切桌上，几上的东西都有为他扫光之虞，因此，大家都阻挡着他，设法使他安静，到后来他才精疲力尽，倒身椅子上。

“怎么一回事呢？”人们问道。“是不是她病了？是不是有人病故呢？”“你们读信呀！你们读呀！”多维尔叫道，“那信就在地上呢。”大家捡起那快信来念，一齐喊道：“她不来了！”

大家的惊骇使他们预期可能有更可惊骇的事发生——但是她的身体是没有甚么病的呀！——她的身边没有甚么事故发生呀！她的家中也没有甚么人遭意外之变；大家还把希望寄托到傍晚时分。

安德烈在当时老忙着弹奏他的音乐，到末了也走过来了，设法安慰别人和自己。埃瓦尔德牧师和他的夫人恰也走进来，既表示不快，但又故作冷静，既痛感失望，但又自慰自解，各自显出特别的个性来。但是大家还是议论纷纷、失望慰安并起交集的时候，冷静的好榜样伯纳德姨父来了。他本是为等着吃一顿好的早餐，丰盛的午饭来的，但只有他才能从正确的观点看出丽莉爽约迟来的原因，说出有道理的安慰的话，使大家都安静如前，正象是在希腊的悲剧中，稀世的英雄们的困惑得到神的片言譬解便涣然冰释那样。

以上所讲的即兴剧的情节是我在夜里花一部分时间走笔写下来的，并交给一个信差，叫他在明朝准十点钟送快信到奥芬巴哈去。

第二天我早上醒来一看，正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准备好，准十二时自己也到奥芬巴哈。

一到了那儿，大家一片喧闹，纷纷跟我打招呼说话，贺寿的被耽误，大家差不多没有提及，他们带笑地骂我，说我在小戏曲中把他们描写得那样淋漓尽致。用人们看见自己也跟主人们同登舞台，做舞台上的角色而洋洋自得。只有那些最坚决

的，最纯正的现实主义者的孩子们顽固地断言，说他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戏曲中所描写的简直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我答应分给他们一点饭后的点心来哄他们才象一向那样又跟我很要好了。午宴很欢乐，祝贺虽没有预定那样豪华，但我们却因之更加亲热，不以繁缛的俗套而也许更以一片真情来迎接丽莉。到了傍晚，她来了，大众都愉快地以至笑逐颜开地迎她，她看见自己的爽约迟来倒会有那样的欢乐，而不胜诧异。后来人们把这事情的始末告诉她知和把那戏曲送给她看，她拿出平素单独同我见面时的可爱的甜蜜的态度向我道谢。

我们为她特别准备祝寿会而她迟到，这事的理由即便不是特别具有洞察力的人也容易猜出来。这就是说，不是因为甚么偶然的事故，而是由于我与她的关系已成为人们闲谈的话题之故。可是，这事对于我们当时的感情和态度绝没有一点影响。

同丽莉的热恋

在那个季节从法兰克福城到这儿来游览访问各种各样的人很不少，我通常是在日暮很晚的时候才来，参加那里的社交活动，看见丽莉只是表面上参与。我既不能在那儿有很久的逗留，所以我总想对她献一点殷勤，不论大事小事替她效劳。这种服务是人生最可乐的事，古代的骑士小说对这类事的描写虽隐约其词，但能很有影响地流传给我们。她之支配我是不容为讳的，她大可以以此自豪，但是，在这场合，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同得到胜利，彼此都以同样的骄傲怡然自得。

这样的会晤虽为时很短，但次数倒不少，它对于我的影响因日益加强。约翰·安德烈有无尽藏的乐曲，我也献出一些自

己和别人的新作来。诗和音乐之花片，象雨那样洒下来。那时正是一个黄金时代，我们一班人中都喜气洋溢，会面时从不感到枯燥无聊。无疑的，我们这种愉快的意趣渐渐熏染到他人去。因为，当恋爱和热情按照其本性大胆地流露出来的场合，羞怯的人也因而心胆一壮，他们才知道自己也有同样的用情的权利，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由是，从前多少也避人耳目的种种恋爱关系现在却露了面，并毫不羞怯地发展下去，有些还怕人知的恋爱关系也暗地里自得其乐。

我因为事务繁冗的缘故不能在白天到奥芬巴哈那儿与她一道的过，但晴和的晚上也给我们以在户外久聚的机会。下述一事，有恋爱经验的读者读起来大概会很高兴吧。

我与她的交情，正所谓"我虽睡着，但是我的心醒呢"那样的情形。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

我们在灿烂的星空之下，在野外往来漫步直至夜深。我把同行的人一个一个的伴送到家，最后才送她到门口，与她作别，我那时绝无睡意，重新开始独自散步。我沿着大路向法兰克福城的方向走去，一路走，一路耽溺于种种的沉思和希望之中。然后我倒身坐在道旁一张椅子上，在极寥廓澄澈的深夜的静寂之中，闪烁炫目的星空之下，一心只想着自己和丽莉的事。

我觉得可注意的，就是听到身边的一种难以辨认出来的声音，那不是木叶的扑簌摇曳，也不是小溪的潺潺，我留心听了一会，才发觉那声音是从泥土中发出来的，大概是地底的小动物干活的声音。也许是刺猬或鼬鼠或其他的在这样深夜活动的小动物。

我站起来继续向法兰克福前行，到了勒德尔堡，拾级而

登，走到葡萄园去，认得它的灰白色的外表，我走上去，倒地就睡着了。

当我再醒来时，黎明的曙光已满布了，我看见自己的面前有高墙矗立，这堵墙是在古时建筑来对着向此方迫来的群山而作为护墙用的。萨克森豪逊横在我的面前，薄雾飘起，指出美因河的所在，早晨的清新的景色使我感到愉快。

我留坐在那儿，直到太阳渐渐从背后的天空升高，把对面都照得通亮了。这一带地方恰就是我约过与我的爱人再见的地方，她这时正为这个乐园似的环境所拥抱着，还睡着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沿着归途缓步回去。

我为着爱她的一念，努力把法律的事务推广和弄好，因此我的余暇就很少，到奥芬巴哈去的时候渐稀疏了，因此我不由得不产生一种苦恼不安之感。这样子，我觉察到，人类毕竟是为着将来的缘故而忽略和牺牲了现在。

我的前景既渐渐改善，在我的想象中我认为它比实在的情形更好，我越觉得尽早正式订婚的必要，因为我们的关系已尽人皆知，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总会招来尴尬的事情。正如在这种场合的少年男女所惯为的那样，我们彼此不明白地谈及这事，但是彼此间无条件地满意的感情，分离已不可能的确信，彼此同样的推心置腹——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事。我从前虽已立下决心不再与异性结成难舍难分的关系，我与她的恋爱将来的结果是幸福与否，虽不能确知，但我再陷入情网之中，的确是为自己的痴呆所牵累，现在挽救之法就是日益埋头于无关紧要的世俗之事，我只能希望由此得到利益和满足而与爱人共享。

德尔佛小姐

这样奇异的处境，恐怕读者中也有许多人会尝过它的苦头，幸而当时有一个家里熟悉的女友出现，把我从这种窘境救了出来。她是对于周遭的人情世态十分了解，人们称她做德尔佛小姐①。她在海德尔堡跟她的姐姐一块经营一个小商店，以前有好几回经济上发生困难，常得法兰克福城的大银号帮忙，十分感激。从丽莉小时起，德尔佛就认识和喜爱丽莉。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面貌严肃而带有男性，走起路来，步武稳重均匀而急速，她之所以特地跑到社会来，随遇而安，是有相当的理由的。在某种意味上她洞明人世的真相。但她决不是好弄权谋之辈，她常惯把事物的关系、演变作长时间的观察，悄悄地由自己打好主意。但是她有见机立断的才能，当她看见别人的思想正在怀疑与决定之间动摇，一切都系于能决断与否的时刻，她就能发挥她这种性格的力量，以断然的态度临事，因此她常能实现她的计划而不易失败。实际上，她没有甚么自私自利的目的，做一件事，完成一件事，特别是撮合一桩婚事，本身对于她就是一种报酬。我跟丽莉的情况，她已看透很久了，因屡来法兰克福之故，又有很透彻的观察，到后来她终于决心玉成我们的好事，深信我们两人的用意虽是真诚，但没有充分地贯彻和抓紧，她得助我们一臂之力，使这一个小罗曼司尽早圆满收场。

---

① 德尔佛（Helena Dorothea Delph，1728—1808）小姐是一个经营商业的独身女子，住在海德尔堡。

她从许多年以前已博得丽莉的母亲的信赖，由我的介绍，她到我们的家里，又赢得我的父母的好感①。因为在这个皇帝直辖的自由市中，象她那样粗豪的女人不会讨人嫌，而且因为她又聪明能干而更受到欢迎。她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希望，以助人为乐的她觉得应以玉成此事自任了。结果，她跟我的父母谈了。她怎样开口，怎样扫除她会碰到的困难，我不甚了了，总而言之，有一晚上她走来会见我和丽莉，把两亲同意我们的婚约的好消息带来。"你们握手吧！"她热烈地用命令的口吻对我们喊道；我站在丽莉的前面，伸出手来，她虽不踌躇但慢慢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们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后，便猛然相拥抱了。

这样子，在我的奇特的一生之中，竟也尝到世间的未婚夫所尝到的滋味，这确是高高在上支配我们的神明的不可思议的意旨吧。

我敢说，这种滋味是有教养的人一切记忆中最愉快的。这种感觉真是难以用话来表达，甚至是不可能解释的，回想起来总是可乐。婚约成立以后，以前的情况为之变了，最严酷的对立排除了，最顽强的分歧也协调了，天性的驱使，理性的不断警告，逞威肆虐的本能冲动，明智的法律——这一切从前不绝与我们作对，与我们闹别扭，现在这一切都对我们融洽无间，只等待庄严虔诚的婚礼公开举行，从前的要制止的事倒得到奖掖，从前要严禁的事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义务了。

---

① 1776年歌德的母亲把丽莉当作与其他子女儿一般看待，并且常常称德尔佛做"策略家德尔佛"。

生活的现实迫人而来

可是，从婚约缔结的瞬间起，我的心情便起一种变化，读者听了也许会表示道德的赞意吧。即是说，以前我把丽莉当作爱人看时，我觉得她是美丽、娴雅、动人，现在我却觉得她是一个庄重、杰出的女人。对于我，她是有两重人格的：她的妩媚可爱之处是我的所有物，我象从前一样的觉得到；但是，她的性格的优点，如她的自信和绝对可靠，仍是她自己所有。我把她的所有物静观审视，觉得它象是一种资本那样，我可以一辈子跟她一块来享受它所生的利息，我想到这儿便高兴得很。

古谚有说："盛极必衰"，这话是有很深的根据和意义的。我们的婚约本来完全仗着德尔佛小姐斡旋而获得的双方父母的同意，已为人所承认，但只是默认，而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可是，一当一种理想的事情——我们确可以如此称这种婚约——成为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事已完全告一段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危机了。外部的世界总是冷酷无情的，它是有道理的，因为要断然贯彻它的主张。爱情的信赖心是很大的，但是它碰上与它作对的现实的礁石而被摧毁，是屡见不鲜的事。青年的未婚夫妇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财，而作新婚之梦，恐怕连蜜月的滋味也不能尝吧。这种情形在近年更是常见。世界直接向他们提出吃不消的要求，来威胁他们，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满足的话，青年的新夫妇生活便弄到可怜又可笑了。

我为结婚而认真地准备的资财之不足，到了某种地步才算充分，初时我还不大清楚。可是，目的之实现已渐逼近了，这儿那儿都有点棘手。

在热恋中的人随便作出的虚妄的结论，今已日益显出它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方来。我的家和家境，这时要冷静地加以缜密的考察。我们的全家人的心中虽已准备好新媳妇入门，但是究竟要哪样的女子才符合新媳妇的条件呢？

在本书第三部之末，我已把那个贤淑、端庄而有才，美丽、可爱、深情而有分寸的女子①介绍出来。她之于我们的家庭，正象一块枢石之于已经砌叠好的拱门那样。但是，在我与丽莉结婚的场合，如加以冷静的考察，我们不能不承认，为要使这个新嫁娘也有同样的作用，我们就逼得要再建一个新的拱门。

不过，在这时候，我不明白这点，她也茫然。可是，如果把我在家中的地位观察一下，和想想娶她进门的情形，我就觉得她与我不相配。我记起我在她的家出入的时候，为要使自己也与她所往来的时髦的朋友不致相形见绌，我必须时时更换我的服装，甚至换过又换。但是，一个家和家风却与衣物服装不同，不能随便的更改。我们的家是一个新建立的堂皇的市民之家，却把古代的豪华的装饰保存着，一切都象是带有复古的意味那样。

因此，即在我们的两亲已同意这婚约以后，他们彼此还没有来往过，没有发生什么亲家的关系②。宗教的习惯不同③，家教家规也相异，如果可爱的丽莉要稍为继续她在家时的生活方式，她便会在我们的不大宽敞的家里感到局促不安，没有施展的机会和余地。

---

① 指商人的女儿安娜·西比拉·明奇。参见第十五卷“安身立命的计划”一节。

② 所以谈到婚约时，丽莉的母亲舍恩纳曼夫人从没有提及，并不是偶然。

③ 舍恩纳曼一家是革新派教徒。

如果我一向不考虑到这一切，那是因为自以为在外地有大好前程，有任贵显的官职的希望，可以安心和奋发图强。一个活动的人到处都可以立足，能力和天资易博人的信赖，谁都认为，最重要的只是方向的转变。要求迫切的青年会得人的好感，尽管天才也只能完成某一项特定任务，人们相信天才是无所不能。

当时德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园地真可以视为新开辟的那样。在实业家中有些聪明的人期望有能干的开拓者和精明的管理人来耕耘这块新垦地。即使那受人敬重，基础很好的秘密共济会（Freimauerloge）也想以巧妙的手段拉我接近它。我因为与丽莉的亲交得认识它的重要的社员，但以我当时的独立不羁的性情——后来我觉得这实是一种傻气——我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较密切的关系，却没想到他们既以高尚的互助精神相结合，若加入他们里头，他们对于我的目的——与他们的也很接近的目的——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让我现在掉笔再回到同我个人较有关系的事去。

在象法兰克福那样的城市中，有一种综理多种事务的职业，即是驻外代表、代理人之类，视任职者的活动能力怎样，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我有任这种官职的机会，骤看起来象是名利兼收。亲友们预料我一定胜任愉快，实际上，如果以上述的三人（歌德，他的父亲和书记）合作的办事所来担任，也许会可行。人们把怀疑之点瞒着不说，而把有利之点列举出来，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地强干就可以把孤疑、动摇克服过来。因此我的处境弄到有点渺茫虚假的因素在其中，而我的热情却不因而稍冷。

在和平的时期，一般民众最喜欢读的就是新闻报刊之类，

它们很神速地提供我们以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消息。过着安静富裕的生活的市民在读新闻时也天真地露出他们的派性来，其实，我们的眼光有限，这种党派心是无法摆脱，也不必避免的。快活地度日的人，象是打赌投注的那样，各自随意地站在某一方面，把本来对于自己没有实际影响的得失利害算作自己的事；象是看戏的那样，对于陌生人的幸与不幸，寄予虽是想象的而很热切的同感。这种态度，常象是任意专断的，但也有道义上的根据。即是，我们有时对于可称道的意图表示应得的赞美，但是，有时又为某人的显赫的成就所吸引，他的意图本可非难，我们也转而讴歌他了。当时的德国和国外有许多这样的事件，提供我们以这类的材料。

当时的世界政局

弗里德里希二世靠他的强大的武力做基础，象是老握着欧洲和世界各国的运命。俄罗斯女王凯瑟琳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在位以治国贤明自命，而又提供她的干练有为的老臣以充分的用武之地，替女主日益扩大她的威权。这种扩张活动正向土耳其人下手，向来给土耳其人蔑视的我们，惯于以对他们大施报复为痛快。所以听见这些异教国家人民死伤盈千，也觉得不是牺牲甚么人命。捷斯麦军港土耳其舰队爆炸的消息传来①，文明世界大喜若狂。为使这个大的战绩永远留下活生生的印象，便在里窝那（Livorno）的军舰停泊所，特地把一艘军舰爆炸，

① 1770年7月7日，俄军把土耳其全部舰队在捷斯麦（Tschesme，属亚洲土耳其）烧毁掉。

好使画家①照着实景来绘画，这时，一切人都为了战胜而兴高采烈。这事发生后没有多久，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青年君主（瑞典的君王古斯塔夫三世）靠着自己的威力从贵族的手上夺回国家的统治权。贵族之被他压迫，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一般民众对于贵族绝无好感，贵族阶级在本性上是秘密行事的，他们的行动越没有人晓得，他们的权力便越巩固。加以这个青年的君主为要与贵族对抗，向较下层的民众施恩，引为己助，所以他更得大众的同情。

但是，使世界更为轰动的，还是一个民族全体解放自己的运动的出现。固然，在许久以前，这种运动已以小规模发生，动人听闻。科西嘉（Corsica）的解放运动久已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那儿的志士保利②既不能贯彻自己的爱国的志愿，便取道德国赴英，沿途大受人的衷心欢迎。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白皙英俊的人，举止娴雅，和蔼可亲。我曾在柏特曼（Bethmann）的家里会过他，在这儿他只作短暂的逗留，以豪爽殷勤的态度接见那些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来的访客。但是，这回在地球上遥远的大陆又重见同样的运动（指美国独立运动）的爆发了。人们祝愿阿美利加人完全胜利，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名字开始在政治界和军界放射灿然的光芒。许多有助于人类的解放和改善的事件连续发生，最近，法国的新王（指1774年即位的

---

① 这画家名唤菲利普·哈克特（Philipp Hackert），歌德在其作品《菲利普·哈克特》中有一节“捷斯麦之战”，对这一战役有详细描写。

② 保利（Pasquale Paoli，1726—1807），领导科西嘉人从热内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及至科西嘉岛于1768年转让给法国，他又领导反法的斗争达一年之久，然后赴英。1769年途经德国时，歌德在法兰克福见到过他。

路易十六世）又显出极善的意图，自动地废弃向来许多滥用的王权，而把王权限制在最高尚的目的的实现方面，他又实施整然有序、收支相抵的财政制度，抛弃一切专恣的行动，只按照着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政。这个消息传出后，欧洲全境都充满着极乐观的希望，轻信的青年便相信自己和他的时代都可以有美好灿烂的前途了。

这种种事件，只当广大社会对它们都感兴味时，我才注意。我自己和我的常与来往的朋友对于报纸、新事件殊不关心，我们所关心的是人类的认识，至于一般人类的行动，我们听其自便，不闻不问。

德意志的情况

我们的祖国德意志（我们的故乡法兰克福城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已有百余年）的宁静状态，虽历经多次的战乱，但仍屹然不动，保持它的原状。从最高位的人到最下层的人，从皇帝到犹太人，等级身分虽极其复杂参差，但这象是没有导致民族分裂，而使之团结，这种等级制度的存在倒是一桩可喜的事。诸侯虽是皇帝的下属，但皇帝却给予他们以选帝权，以及由此取得和维持的种种特权，使皇帝与诸侯间保持确定的均势。可是，高级的贵族既自以为跻于第一流的王族之列，以他们的特权而论，且可自视为与皇帝比肩，而有世袭大僧正的位阶的选帝侯，既高出其他选帝侯之上，又是僧侣政治的派生物，保有不容争辩的荣誉地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且有高出皇帝之上之概。

如果我们想起这些源远流长的旧贵族在世袭的封地上享有绝对的特权，同时在各种慈善事业、骑士团、牧师团、行会、

修道团体等也享有特权，我们就容易想象得到，这一大群的贵族，自觉同时是居于皇帝之下而又与之同等的人，在极大的满足和正常的世俗事务的活动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无需特别的辛劳，就把自己这样的享受传给后裔。这一阶级也不是缺乏精神文明，因为百数十年来，军事和商业方面的教育有了重大发展，整个贵族和外交界都受到影响。同时，他们又能通过文学和哲学的研究，来培养人才，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虽对现状不太有利而高超的立场上。

在德国差不多还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享有特权的巨大集团既羡且妒，也没有人对他们幸福的世俗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中产阶级专心从事商业和学术，他们藉此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技术，提高自己的地位，确得到与贵族相颉颃的力量。完全自由或半自由的城市掖助中产阶级这种活动，因而那儿的市民可以安居乐业。凡是积有资产的人，或在精神的活动上——特别是在法律界和政界——有所提高的人，到处都显出他们的权势和影响。在帝国高等法院中及其他场所，贵族席的对面还设有法律专家席，前者比较自由的概略性的见解，为后者的较深的洞察力所补充，互相协调。在实际生活上，两者没有露出敌对的痕迹。贵族安然拥有他们的久经岁月而神圣化的独占的特权，而市民阶级以为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加上一个“冯”字（“von”贵族的姓的前面通常是这样写）力谋在表面上跻于贵族之列，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工商业家为要与进步很快的外国的实业家竞争，正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把惯见的动荡现象置而不论，我们真可以说，那时大体上是一心一意努力奋发的时代，为从前所未有，其后随着外部和内部的发展，这种状态也不能持久。

在这个时候的我，对上层阶级的态度是满怀好意的。在《维特》中，尽管我曾将存于上层中层两阶级之间的不快的事情激昂地说了出来，但是，谁都觉得这不是别有用心。鉴于该书的其他地方的爱情的描写，读者当容许我这样做吧。

可是后来出版的《葛兹·冯·伯利欣根》使我与上层阶级的关系非常良好；它纵然不拘囿于向来的文学所奉的绳墨，但是它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优秀的技巧，把古代德意志的情况描写出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立于顶峰，以下在种种等级的人中点出一个骑士葛兹，他鉴于当时的纲纪废弛、法律荡然的国情，决心以一个私人的资格，纵不依照法律的手续，但也依据正义来打抱不平，结果他自己就陷于十分困苦的境地。这种复杂的内容绝不是向壁虚构，而是把史实化为栩栩欲活的描写，因此，从这点看来，它有些地方是带有近代的风格的，但是它又同时力求不丧失这个善良的豪杰自己执笔以相当的文学手段写下来的自传的精神，这就不免于有袒护自己之处。

现在，葛兹的子孙，还是昌盛，他的一家还保留法兰克骑士的爵位，但是这种爵位也跟中世纪的其他位阶那样，今已名存实亡了。

我这个戏曲出版以后，雅克斯特（Jaxt）小河（尼加尔河之右方支流）、雅克斯特豪森① 便骤然获得诗的意义，有好些人特地到来游览凭吊，海尔布隆② 的市公所也有游人的足迹。

世人又知道我有意欲就当时的历史的其他情节着笔，有许

---

① 雅克斯特豪森（Jaxthausen）是符腾堡王国的村落，葛兹的生地。

② 海尔布隆（Heilbronn）市公所是十六世纪的建筑物，葛兹曾被监禁在那儿的一个塔中，该塔今称为“葛兹塔”而被保存着。

多从那时到现在还繁衍的名门贵族，盼望自己的祖先也靠着我的一枝笔而扬名于世。

本来，以巧妙的手腕把史实文艺化，使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有新的回忆，是引起他们的特别的兴趣的快事。他们看见祖先的种种的优点而自鸣得意，看见祖先的缺点，则自以为早已克服而不禁微笑。所以这样的描写总会博得人的同情和赞赏，而我在这种意味上，从《葛兹》收到许多可喜的效果。

可是，说到这儿，有一事很可注意的，即是，在为此著作所感动而与我接近的人中，附随我的青年之群中，却没有一个贵族。在他方面，三十岁过外的人来探访我的倒不少，他们立志和努力认真地教养自己，使成为祖国有用的一员和有用的人，跟他们接触使人充满愉快的希望。

冯·赫顿公爵的自白

在那个时候，一般地关于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那一时期的研究正在开始且甚热烈。冯·赫顿①的著作给我搜罗到了，从那里我看见在那时代出现的事在近代也同样的再演出来，而觉得非常奇怪。

冯·赫顿致比里巴尔德·皮尔克海姆尔(Willibald Pirkheimer)的信的一节，在下头录出来，大概还是合适的吧。

"幸运给予我们的东西，通常它再取回，不单是如此，而且我们看见，来自外部而归人类所有的其他东西，也受偶然的支配。可是，现在我为追求荣誉而努力，希望不管采用什么手

① 冯·赫顿(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是符腾堡的公爵。

段，不为人所嫉妒而得到。因为我求名心切，但愿置身贵显，尽可能地高升。亲爱的比里巴尔德，纵然我是出身这种等级和家庭，生我的父母是贵族，如果我不藉着自己的努力致身贵显，而自以为现在已是贵族中的一员，我自己觉得是没出息的，我是有志于伟大的事业，想着更高尚的事！我绝不是只想升官晋爵，地位更加显赫，而是想不藉先人之荫，独力从他处寻求梯阶，进身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贵族，不与那些冒牌的贵族为伍，以先人之荫为满足，我还想在祖先的遗产之外由自己更添上一些东西，以便可以由我直接传给我的子孙。

“因此，我朝着这个目标而钻研学问和奋发努力，与那些以一切现状为满足的人的意见相反。因为，正如我曾对你说过，我是有这种名誉欲的，我绝不会以现状为满足，我不瞒你，我对于那些出身最下层阶级，而致身显贵，凌驾我个人之上的人，并不羡妒；我在这一点与我的同身分的人的思想相反。他们常诋毁那些出身寒微，仗着自己的才干而崭露头角的人。因为这些人用我们所忽略的手段获致荣誉和加以掌握，纵使他们是晒布匠或染革匠的子弟，他们当然比我们强；他们的经历远比我们的遭遇困难，而竟能获得这样的地位。那些妒忌他人以才学致身通显的不学无术之徒，不独是笨伯，而且算是可怜的人，甚至最可怜的人中之一。这种愚蠢的行为尤其是我们贵族的通病，他们面对别人的光荣的成就却侧目斜视。天呀！我们妒忌那些备有我们自己所忽视的事物的人，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用功研究法律呢？精湛的学问和出色的艺术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钻研呢？当我们疏懒不上进时，晒布匠、鞋匠、车匠等等便赶在我们前头，为什么我们放弃我们的阵地，为什么我们将最自由的学问研究委诸我们的仆役——

多可耻呵！——交给他们肮脏的手呢？我们所鄙视的承袭的特权给那些机灵而勤勉的人占有，以积极行动来利用它，是很公平的。我们可怜的贵族，忽略了那足以使下层的人高出我们之上的学问技术。因此，我们不要再妒忌他们，让我们也努力获得他人力求享有的东西（说来这真是我们的耻辱呵）。

“求名的欲望总是可尊重的，好胜争强总是值得称赞的。怎能各个等级都保留着它的独自的荣誉，而又添上一种可以增加光彩的东西呢！我对于祖先的画像和装潢很好的世代谱系图都不藐视；但是，如果它们的价值，我们不以自己的功绩化为己有，它们的价值纵怎样高，也不是我们所得而有之。如果我们的生活作风同贵族不相称，这种价值也不能永久存在，贵族社会的脑满肠肥的家长，指着其先人的遗像向人夸耀，而他本身过着饱食终日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他无宁是一个木偶似的东西，他的自夸也是枉然的。

“以上的就是我想关于我的名誉和它的性质向你详细而又坦白地披沥的话。”

我从我的一些贵显的朋友和熟人中也听见过与此相似的精辟有力的见解——纵然不是说得那样的连贯和头头是道——，他们的这种看法的成果在他们的扎扎实实的活动中显现出来。“每个人一定要以自力成为贵族！”一语已成为他们的信条。如果在那美好的时代，已出现一种竞争对抗的活动，那就是自上而下的互相较量的努力。

法兰克福的情况

然而，在贵族社会以外的我们却能得到我们所欲求的东

西，我们的天赋的才能，只要是在我们的公民身分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便能自由无碍地施展出来。

尤其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城在这方面保持一种很特殊的地位——不为人充分注意的特点。即是说，北方的帝国直属自由市是以日益扩展的贸易为基础，而南方诸市以商业衰退之故，以美术和工艺为活动的地盘，至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则显出一种混合的状态，一方面看到商业、资本、地产和房产的发展，他方面又看到知识慾与艺术品搜集等精神活动之盛行，彼此交织在一起。

在这个城中，路德派的新教占支配地位。具有古代共同继承人的资格（Ganerbschaft）而得名的林普格（Limpurg）家、本以“俱乐部”起家的弗劳因斯太因[①]家（在下层市民掀起暴动的时候，曾忠诚地站在有识之士的一边）、法律家以及其他的有产者、有见识的人都有参与市政府的机会。即使那些在乱时尽力维持秩序的职工阶级也可以任市参事会议员，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提升不易就是了。此外，宪法上所规定的有牵制作用的其他机关，办理例行公事的机关，以及其他自由市的宪法所需要的机关，给予许多人以充分活动的地盘；他方面，以法兰克福市的地理位置优越之故，工商业也日益发展，毫无障碍。

上层贵族自行其是，没有人忌妒，他们甚至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第二个等级，为了赶上他们，不能不努力上进，以先世的丰厚的家业为基础，力谋在法律学及政治学方面出人头地。

---

① 关于林普格和弗劳因斯太因两家贵族，参见第四卷“反叛者弗特密尔兹”一节。

所谓宗教革新派（Reformierte，加尔文派的基督教徒）及在其他各地的宗教亡命者（南特勅令撤回[1]后，亡命于德国的法国新教徒）自成一个惹人注目的阶级。当星期天他们在博根海姆举行礼拜，各自乘华丽的车马经行街上时，也象是对其他的市民夸示其胜利那样。后者无论在天气好的时候也好，坏的时候也好，依照教规，只能徒步到教会去。

天主教徒差不多不为一般市民所注目，但是其他两派所享的权利，他们也看在眼里。

① "南特敕令"是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仍为法国国教，恢复天主教派原有的特权，胡格诺派（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的称呼）获得信仰自由和担任官职的权利。这个敕令于1685年为路易十四废除。

第十八卷

回头讲文学上的问题，我先要提起那对当时德意志的诗歌有很大影响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影响我们的诗歌艺术的整个进程，直至今日，即在将来也不会消失，故特别值得注意。

关于诗的形式

德意志人从古时起已惯于押韻，因为它有一种便利之处，即是可以很简单地处理，差不多只须数数音节就行了。可是，随着文化的进展，人们多少本能地注意到音节的意味和重要性。这是值得赞许的，许多诗人精于此道，便获得世人的赞赏。韻是表示诗句的终结，行较短时，即便是较小的韻节，句读也可以看出来，生来炼就的灵敏的耳朵还听得出变化和韻味来。可是，在我们那时代有些诗人一股脑儿把韻废去，而不计及关于音节的价值仍然没有决定，而且很难决定。克洛普斯托克一马当先。他怎样努力和他有什么成就，已为世人所共知。谁都觉得这事不怎么稳妥，人们不敢冒这个险，他们倒给返于自然的倾向所鼓舞，便从事散文诗的尝试。格斯纳的极其动人的牧歌已为散文诗开辟无限的前途。克洛普斯托克用散文写了《赫尔曼战役》的对话和《亚当之死》。在戏剧方面，在所谓“市民悲剧”和一般戏曲的影响之下，一种富于感情的高雅的

风格在舞台上流行起来，反之，由于英国诗人的影响而流行于我国的五脚韻的抑扬格（Jambus）又使诗散文化① 。不过，一般的诗人还不能完全放弃韻与音律的要求。兰姆勒虽信奉不确定的原理，但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要求甚为严格，对于别人的作品，也免不了同样严格。他把散文改变成诗，把别人的作品加以修改润色，因此，他不独不获得人的感谢，而且使问题更加混乱了。诗人中最有成就的就是那些多少也承认音节之价值而应用因袭的押韻法，为自然的趣味所引导，遵守不成文不确定的格律的人，例如威兰就是这样，威兰的天才虽非他人所能模仿，但他的作品可提供中才以下的诗人作模范。

但是，创作的实践无论如何总是拿不稳的，无论何人总有一个时候迷误起来，即第一流的诗人也免不了。所以，那时德国的诗坛虽说是真正的天才辈出的时期，但可以称为得体的诗作却寥寥无几。因为当时在诗坛上的时代精神也是动荡的、挑战的和活跃的，而没有静观沉思的余裕和满足它本身的要求。

当时的人为要找出可容诗歌立足的地盘，为要发现可供诗人自由呼吸的环境，就回到前几个世纪去。在那个时期，许多郑重写成的优异的作品从周围的纷乱状态中放出光彩，故人们喜欢当时的诗艺术。可是中世纪的爱情诗人（十二、三世纪的爱情诗人，大部分为当时的骑士）离我们太远了，如要师法他们，一定先要研究语言，这种事却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想要的是过活而不是学习。

① 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戏曲方面采用无韵诗的形式的有米尔顿的史诗，在德国首先由威兰、韦塞、莱辛等诗人提倡。莱辛的悲剧《智者纳旦》则不断采用无韵诗的形式。

跟我们最接近的是那真正堪称为大师的诗人汉斯·萨克斯①，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与骑士和廷臣有异，而是象我们那样可以自豪的质朴的市民。他的有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的诗，很合我们的胃口，我们在许多场合利用他所用的那样轻快的节奏和很听人挥洒的韵律。他的诗的风格象是与我们随时都需要写的日常生活的诗很相宜。

可是，如果本来需要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注意和辛劳才能写出来的重要著作，却出自轻率的动机，或多或少地卤莽从事，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其他的即兴急就的作品是怎样胆大妄为的了。例如我们以之向自己内部挑战和向外部寻衅的一切形式的书翰诗，寓言诗，就是如此。

当时我这些作品，除了已出版的之外，只有很少存留着，纵然它们是保存起来，这些作品如果加以简短的注释，对于深思的读者也许会颇明确地透露出它们的起源和用意来。在将来，卓识锐眼的人见了这些诗，将会看出这些逸出常轨的作品也暗含有诚实的意图做它们的基础。即是在这些诗中诚意与骄慢战，自然与因袭战，才能与俗套战，天才与它自己战，强健与柔弱战，刚冒尖的卓越与已形成的凡庸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尝试看作一种前哨冲突，它是正式宣战的先声和大决战的前奏。因为如果精确地加以观察，这种斗争在这五十年来还没有终结，它还是作为样板一直继续下去，所不同的，就是进于较高的阶段吧。

---

① 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在纽伦堡城生卒的诗人，本业为靴匠。

《汉斯乌斯特的婚礼》

我曾拿一本古代德国的街头木偶戏①构思，编成一本滑稽剧，它的名字唤做《汉斯乌斯特②的婚礼》(《Hanswurts Hochzeit》)，剧本的情节是这样的：汉斯乌斯特是一个父母双亡的有钱的农家子，正在成年的时候，他想跟一个名唤厄塞尔·布兰丁纳（Ursel Blandine）的富家女结婚。他的监护人基利恩·布鲁士特弗莱克（Kilian Brustfleck）和她的母亲厄塞尔都很同意这个婚事。他们的多年的计划，他们的最大的愿望由是终于实现了。这事情没有一点障碍，唯一的关键问题只是：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合因婚礼的准备及其他种种的不可缺的繁文缛节而延宕了。在序曲开场时，婚礼招待人出现，讲他的老一套的陈旧的演词，最后以如下的韵语③结束：

"金虱酒馆"设席开筵，
举行婚礼的盛宴。

为使这剧的地点的统一性不致有被破坏之讥，金虱酒馆和它的华丽的酒帘在舞台的后部出现，但是，这酒馆却弄成可以旋转的那样，朝着东西南北方向都行，不过，舞台前方的配景，却须加以适当的变更。

在第一幕，前景是向着街，现出金色的、给太阳显微镜放大的酒帘，第二幕的前景是庭园，在第三幕，面对小森林的部

---

① 这本老的木偶戏名唤《哈尔莱金斯的婚礼》(《Harlekins Hochzeit》)。

② 汉斯乌斯特（Hanswurt）是古代德国戏剧有名的小丑。

③ 这两句韵语录自上述老木偶戏的原文。

分，在第四幕，附近的一个湖的景色现出来。由此可以预言，对于后世的舞台布景师，在整个舞台上布置波面的景，直至后台“提白员”的藏身处之前，也不是困难的。

但是，该剧的本来的趣味还不是由这一切舞台上的装置表现出来，因为达到疯狂田地的滑稽透的特色，表现于一切登场的人物都是用德意志人惯用的绰号和骂人讥诮人的字眼做名字。因此，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彼此间的关系，一听见名字就可以马上明了。

我们希望现在写的自传将为上流的社交界以至规规矩矩的家庭所朗诵，所以，我们绝不用象剧场广告那样，在这儿将登场的人物顺序列出来，也不必在这儿把他们最明白地最突出地表演自己的地方再叙出来。不过，极其简括地表达出他们的愉快的、俏皮的、天真无邪的关系和风趣巧妙的诙谐，是必要的。兹附上一纸这样的试作的说明书，至于插入本书与否，听凭出版者的酌夺。

老表舒夫特（Schuft，字义为坏蛋）以亲戚的关系，有被请参加婚礼的资格，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因此，他在人世上纵然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但是他确是人世中的人物，他既在那儿，就不好给他吃闭门羹。而且在这样大喜的日子，也不好提起从前曾有过对他不满的事。

舒尔克（Schurke，字义为无赖汉）老爷的赴席却是一桩难决的事。当事情对他自己有利时，他就对新郎新娘家做些有用的事。可是他又会给予他们的家以损害，这或者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也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做是合适的。有些多少有点聪明的人赞成接待他，倡议拒绝他的人占少数而没有通过。

可是，还有第三个宾客，他的接待与否比舒尔克更难决

定。在社会上，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物，与别人无异，他的为人是随和的，惹人喜欢的，也可以派种种的用场，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不能听见人家说出他的名字，他一听见它，就霎时间动起象北欧的疯狂英雄故事所说的那样“三尺无名火”来，把前后左右的人都要打个落花流水，在这样的暴怒中，他把他人打伤，自己也被打伤，本剧第二幕就因为他的狂暴而在一片纷乱之中落幕。

在这剧中，我不能放过绝好的机会，来惩诫那盗印我的诗集的麦克罗特（见第十六卷“盗窃著作权的书商希姆堡”一节）。他带着麦克罗特书店盗版的书沿门求售，当他听说这家举行婚礼宴会时，他遏不住他的劣根性，要进来打秋风，让别人花钱来饱他的饿肚子。他登门求见，布鲁士特弗莱克便出来问他的来意，但是把他拒绝了，因为今日一切的来客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而麦克罗特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麦克罗特再鼓其如簧之舌，证明他自己也象别的客人那样声名藉藉。但是布鲁士特弗莱克是一个严峻的婚礼主持人，不为他所动，这时，那无名氏出来了，他在第二幕末所发作的暴怒已平息，看见这位同他接近的翻印商人麦克罗特是自己的“翻版”，极力替他关说，终于他也被列为宾客之一而受主人家的招待了。

斯托尔堡伯爵兄弟

恰在那个时候，斯托尔堡伯爵兄弟① 在瑞士旅行的途中，

① 两伯爵中的兄名唤克里斯蒂安·斯托尔堡（Christian Stolberg，1748—1821）；弟名唤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斯托尔堡（Friedrich Leopold Stolberg，1750—1819）。

顺道来访。我在以前很早寄稿给格廷根的《文艺年鉴》，显露出我的诗才的时候，就与他们兄弟以及气味相同的青年诗人结了很亲密的友谊，他们的人品和著作，我知道的甚深。当时的人关于友谊和爱情抱有相当奇妙的观念。即是在两者的场合，人们以一种青年活泼的意气相结合，双方互相倾吐出自己内心的才气横溢而未经琢磨的思想感情来。这样的相互的关系，在外观上确是一种相互的信赖，世人便称为爱，看作是真实的情爱。我也象别人那样对此抱有幻想，这种幻想多年来使我尝到了种种的苦果。伯格① 当时写给我的一封信，今还留存，由这信可以看见当时的文人的朋侣间没什么道德和美的观念。各人都觉得热情沸腾，自信可按这个样子随便的行动，随便的作诗。

斯托尔堡兄弟跟豪格威茨伯爵② 一道来了。我极其真挚和殷勤地款待他们。他们安顿在旅馆内，吃饭却大多时在我们家里吃。最初的愉快的晤谈是极可喜的，不过，不消多久，清狂不羁的谈吐便涌出来了。

这三个宾客的来临，使我的母亲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境中。她的精明爽直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使她可与中世纪的贤母相比美，可比于伦巴底或拜占庭宫中的王妃的女傅阿雅③ 夫人。他们

---

① 伯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94），他在《葛兹》刚出版后给它的作者的一封信，提出很尖锐的意见，象是批评家所写的那样。关于这封信，参见第十三卷“葛兹·冯·伯利欣根”一节。

② 豪格威茨伯爵（Graf Christian August von Haugwitz，1752—1831），后任普鲁士大臣。

③ 阿雅（Aja），这个名字出自意大利传说《海蒙的四个孩子》，她是孩子的母亲。德文原本编者的注解认为歌德把这个名字安在中世纪王妃女傅的身上是欠正确的。

三人也只以“阿雅夫人”称呼她，而她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戏呼，自己也跟着青年人作这样的空幻之想。其实，她看见我的《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写的主妇，已相信是自己的影子了。

可是，这样的情况不能继续多久，只一同吃过二三回饭之后，当酒已喝干了一两瓶的时节，诗人的使酒骂座的脾气便发作起来，我们滔滔喋喋地把暴君攻击，甚至慷慨激昂到要饮暴君之血。我的父亲看见，摇头微笑。我的母亲一辈子差不多还没有听见过暴君那一回事，只记得在哥特夫里的编年史中看见过这种可怕的人物的铜版照片：在这铜版画中，波斯的坎比塞斯王（Kambyses）当着他的仇人一个幼儿的父亲面前，用弓射中幼儿之胸，而自鸣得意。这种可怖的印象现在还留在母亲的记忆里。我们这种与之相似的谈论，愈谈愈激昂，我的母亲为使这种杀气腾腾的话转成愉快，便跑到酒窖去拿葡萄酒。在窖里头藏有几大坛远年陈酒，在那里头还有她亲自加意照管的一七〇六年，一九年，二六年，四八年的旧酿，极少打开，只在特别的喜庆日子才拿出来。

当她把那装着深色的醇酒磨光玻璃瓶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她喊道：“这就是真正的暴君之血了！你们喝这个来助兴吧，但是喝了它，你们就不许再在我的屋子里有杀人那样的念头了！”

“对了，这是暴君的血呵！”我高喊道，“没有再象这个暴君那样可怕的，现在把他的心脏的血滴出来陈在你们之前了。你们开怀饮吧，但是，不要过度！为甚么呢？美味和芳烈之气使你们软化、屈服，是不能不提防的呀。葡萄实是全世界的暴君，非斩除根株不可；因此，我们应该推戴色雷斯（Thrazien）

的圣王莱克古斯① 作为守护神，他热心地从事禁酒的可敬的事业，但是后来为骗人的酒鬼巴克古斯（Baechus）所迷惑，而颓废下去，不过，在历来的殉道者中，他是值得首先提及的人物呵。

“葡萄这个家伙，真是最坏的暴君，同时又是伪善者，阿谀者和暴力汉。先喝他的血一两杯使你痛快起来，但是一滴引起第二滴，使你欲罢不能。它们正象是人们恐怕会断掉散掉一串的珍珠那样。”

如果我在这儿所说的话，象古今的优秀的历史家那样，有插入一篇虚构的演说词来代替本来的话的嫌疑，那么，我就只得愿望当时有一个速记员，把我的演词的片段记下，保留到现在。如果真是这样，读者恐怕会发见那速记录与现在所引用的文句在用意上虽完全相同，但词采当较精彩动人吧。总而言之，现在的描写还是缺乏一个青年——自己意识到他的磅礴的精力而不知怎样去发挥它的青年——所应有的滔滔不绝的雄辩和丰富多彩的谈吐呢。

在一个象法兰克福那样的城市，情景是很特别的：常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种种色色的旅客，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世界各地的见闻，而引起人们的旅游兴趣。我在从前已经有许多机缘可以出游，这时候我正要试行一下看能否离开丽莉，加以一种痛苦的不安之感使我无法做预定的事务，所以斯托尔堡兄弟邀我作伴旅行瑞士，我便欣然有行意。我的父亲赞成我这个旅行，并劝我如果时机凑合便不好错过顺道转往意大利旅行。因此，我很快就下了决心，即把行装打叠妥当。我见了丽莉，没

① 莱克古斯（Lykurgus），传说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立法者。

有正式辞行，只暗示有远行之意，便离开了她。她在我的心中长得那样根深蒂固，我以为并没有真个与她分离呢。

从达姆施塔特到卡尔斯鲁厄

不消几个钟头，我便偕同三个愉快的旅伴到了达姆施塔特城。到那儿的宫廷谒见时，我们当然还要彬彬有礼。在这方面，实际上是靠豪格威茨伯爵带头引导。他是我们中最年青的一个，身材很好，仪容温良高雅，面目和蔼可亲，举止时时一样，对人关心同情，但适度而止，故比起其他两人来，他象是一个冷静的人。因此，他必须忍受斯托尔堡兄弟们的种种的戏谑和替他起的绰号。当他们以为可以学"自然儿"那样无拘无束的言行时，豪格威茨伯爵不以这种笑谑为意，可是当着要举动规规矩矩的场合，那就不得不——纵然不是不喜欢——再以伯爵自居，他自己光能以身作则，循规蹈矩，使一切恢复正常，所以在这种场合，纵不能做到礼仪十分周到，然也可以应付过去。

在达姆施塔特逗留的时候，我曾往访默克，与他倾谈。他以靡菲斯特那样的斜眼来睨视我今次的长途旅行，对于曾一度访问过他的我的旅伴作不留情的批评。从他自己的见地看来，他对我是了解得很透彻的，我的改变不了的天真坦白的好心肠，使他感到痛心，我的永远奉行的宽容态度和利己利人的主张，他觉得是一种可怕的事。"你跟这样乳臭未脱的人们混在一起，真是傻瓜！"他对我喊道。他对于他们三人的批评刻画虽有说中的地方，但不是完全对。总而言之，他的论人，是缺乏好意的，所以我相信我的看法可以比他高明些，其实这也不

见得，我只重视他的视线看不到的方面吧。

“你不会长久跟他们一道的！”这是他跟我谈话的结论。说到这儿，我记起他曾对我说过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他后来屡对我重复地说，我自己也屡提起，觉得这话在实际生活上饶有意义。“你的努力，”他说，“你的不肯变的方向，就是想给予现实的事物以诗的形象；而别人却想把所谓诗的，想象的事物现实化，到头来你只落得个干蠢事的结果。”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两种行为的方式的大大不同之处，牢记于心，拿来应用，我们便能对于无数事物得到许多的启示了。

不幸，在我们一行还没有离开达姆施塔特城以前，便发生一些事情证实默克的批评的确凿不可辩驳。“人类必须复归于自然”那样的流行的信条，使我们青年在那时作种种放荡不羁的狂行，在露天的河川洗澡也是其中的一种。我的旅伴守过一些时的正经规矩之后，在这儿也禁不住作这种的撒野的行为了。达姆施塔特城位于砂地的平野，没有河流，在附近却有一个大池塘（我这回才听见有这个池）。生来就热情、这时更加热烈的几位朋友想在这个池塘里洗一个澡来舒散一下。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青年的男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在这个地方算是罕见的事情。不管怎样，市民把这事当作丑闻传开来，默克更以辛辣的话复述他的结论。我不加反驳，催促那三人匆匆离开达姆施塔特城。

即在向曼海姆前进的途上，纵然我们都抱有共通的善良高尚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上的若干的差异已显现出来。利奥波德·斯托尔堡热烈地谈起他怎样同一个美丽的英国女子发生了深挚的爱情，而被迫与她决绝，因此要作这样的长途旅行。当我们向他表示同情，说谁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和心情时，他的青

春无穷无尽的情感便突然沸腾起来。他陈说他的热情，他的痛苦，以至他的爱人的美丽可爱之处，都可以说是世界无双。我们象一般的有教养的朋友所应做的那样，用委婉的话来劝说他安静一点，他的感情更加兴奋。我与豪格威茨伯爵到后来不得不绝口不谈这个问题。到了曼海姆，我们安顿在一家高级旅馆的精美的房间里，在第一次吃午饭上点心的时候，我们免不了又喝酒，利奥波德便提议为祝他的美人健康各干一杯。大家喧闹了一下便把酒呷了。干杯之后，利奥波德又喊道："以后不许再用这个神圣的杯喝酒了，第二次用这杯来祝别人健康，便是亵渎，因此，让我们把这个杯子摔掉吧！"他说完便马上把自己用的高脚玻璃杯掷向背后的墙上去。我们跟着他照样的做，在这刹那，我恍惚觉得默克在牵扯着我的衣领那样。

但是青年人从幼小的时候起便抱有这样的心理，即是无论怎样也不要对好朋友怀恨，一种天真烂漫的友情纵然有时会引起不快之感，但决不应伤害它。

我们把那些视为神圣的酒杯砸碎之后，我们的帐单的数字也增大起来。我们带着满怀的喜慰匆匆赶到卡尔斯鲁厄（巴登大公爵领的首都），好在那儿无挂无碍地进入新的交际社会。我们发见克洛普斯托克也在那作客，他过去的道义上的支配力对于那些非常崇拜他的门徒有很大的影响，我也愿意得亲聆他的教益，因此，当我跟其他三人被召到宫廷去时，我不难把自己装作是一个新进之士，以谦恭自处。不过，在这种场合，动作自然而又不自卑，也是符合要求的。

当时执政的方伯是诸侯中的长辈之一，特别因为他力谋实施善政，得德国各邦君侯的崇敬。我们晋谒他时，他喜欢谈及本国的财政。方伯夫人从事艺术及种种的学术，有精通之称，

也想以风雅的话来表示对我们的关切，我们对于她的这种态度虽表感谢，但回到旅馆里，却不禁又将她的贩卖劣纸，庇护盗印的书贾麦克罗特的行为嘲笑一顿。

在卡尔斯鲁厄逗留的时候，对于我最关重要的一事，就是萨克森-魏玛的小公爵偕同他的未婚妻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露意斯公主为缔结正式婚约而到卡尔斯鲁厄来。为着这事，魏玛的总理大臣冯·莫泽已先行到此，和内政大臣戈尔茨(Görtz)伯爵仔细商量，准备郑重地宣布这种重大的婚姻关系。我谒见小公爵和公主时与他们的谈话最感愉快，当我向他们辞行时，他们一再地说，如果不久能在魏玛再会见我，他们俩都觉得愉快。

我跟克洛普斯托作过几次特别的谈话，当时为他的亲切的友情所动，不禁对他表示坦率和信赖的态度。我告诉他我在《浮士德》中最近构思的几场戏，他象是对它很有好感。后来我也听见，不轻于褒奖人的他对着他人也这样子称赞它，并希望全剧完成。

我的妹妹

我们的狂放不羁，当时称为才子风流的举动，到了卡尔斯鲁厄，便稍为敛迹。这是因为那儿是一个规规矩矩，可以说是神圣的地方。随后我与我的旅伴作别，而取别道往访我的妹夫任知事所在的埃门丁根（Emmendingen）城。我探访我的妹妹，为的是要知道妹妹婚后生活的真相，我知道她所过的日子不幸福，但不晓得这究竟是她自己之过，妹夫之过，还是与环境有关系。她的本性本是奇特的，很难加以说明，我们想在这

儿把可以告诉读者的事情约略说出来。

她的体格在天赋上是很好的，但面貌却不是这样。她的容颜虽然充分地明白地表现出她的善良的气质、理智和同情心，不过还缺乏一种端正和秀丽之美。

加之，她的前额高凸象一个圆拱那样，依照当时的流行的打扮，把头发梳拢到后方去，因此，她的道德和精神的优越性纵然很显露，她的容貌也引起人一种不快之感。到现在我还这样子想，如果她照着最近的时髦的样子，以鬈发覆着她的脸的上部，太阳穴和两颊用发环掩饰着，对镜自照，恐怕会觉得自己悦目一点，不必愁到自己和别人都嫌自己的貌丑吧。况且她还有一种不幸，就是她幼时起便患皮肤病，通常在有喜庆的日子，音乐会跳舞会和其他的宴会中就发作起来，这真是她的命中的磨难呢。

可是，她一方面逐渐战胜这种恶劣难堪的情况，同时她日益把其余的美好的特性培养发展起来，坚强不易挠屈的性格，对他人同情而需要他人同情的心灵，优秀的精神的教养，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二三国语言的精通，书写的擅长，都是她的过人之处，如果她的外貌也得天惠，那么，她真可称为当时的妇女中最为人所追求的一个了。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要揭露出来，就是，在她身上绝没有一点肉感。她跟我一道儿长大，希望一辈子继续在这样的兄妹的和睦中度过。自从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中，我们俩仍是难解难分。我们从衷心上互相信赖，心中有甚么思想、情感、幻想和一切偶然获得的印象，都互相披沥。当我客居韦茨拉尔时，她感到难耐的孤寂，我的朋友施罗塞尔以前既为妹所熟识，又不讨人嫌，这时乘虚而入，代替了我的位置。不幸，

施罗塞尔从兄妹般的友爱再进一步而发生决定的爱情，以他那样的谨严诚笃的人，这还恐怕是最初的爱情呢。他们的结合正是世人所谓门当户对的配偶，曾经有些无足轻重的人向她求婚，提出很好的条件，她总以对方是她所鄙视的男子而断然谢绝，终于给施罗塞尔说服了——我可以这样的说——而同意这桩婚事。

说起她来，我不得不直白地承认，当我有时对于她的命运作种种的遐想时，我不爱把她设想为一家的主妇，而常设想她是一个女修道院的住持，或其他的高贵的教会团体的主管人。她具有这种高尚的地位所必需的资质，而缺乏世俗生活所不可少的条件。她对于同性的人们，具有一种不可抗的魅力，青年的女子给她所吸引而恋慕着她，她凭着内心的优美的德性支配着她们。她跟我同样对于周围的人们抱宽大的态度，对于善良和合于人性的事固不吹毛求疵，即便一切变态的行动，只要不流于邪僻，她也加以宽容，所以任何天资非凡的人，在她的面前用不着隐瞒那成为他的外面的特征的畸行变态，或引以为耻。因此，我们兄妹所交往的人——象以前我说过的那样——常是多种多样，自由无碍，天真烂漫，有时甚至流于大胆放纵。我与年轻的女人交际，所以总能做到规规矩矩，殷勤有礼，而不立即发生决定的恋爱关系，即是完全拜她之赐。从以上所述，那些能够从字里行间心领神会的聪明的读者，当会察知我当日踏入埃门丁根时我的沉重的心情吧。

可是，经过几天的耽搁，跟她作别，她极恳挚地，甚至以命令的口吻劝我与丽莉断绝关系，我心里更觉难受。她自己也因婚期的延宕而尝到很痛苦的经验，禀性正直的施罗塞尔要在任职于巴登大公爵宫廷一事确定，甚至可以说就任以后，才举

行订婚仪式。但是，实际的任命意外地拖延，照我的揣测，原因恐怕是这样的，即是，善良的施罗塞尔虽有精明的干才，但以太过率直之故，大公爵不肯任他为身边的近臣，大臣们更不愿意他厕身于他们的左右。他所预期和急切地企望着在卡尔斯鲁厄任官一事，不能实现。当埃门丁根有空缺时，他很快就任那儿的知事，我就明白他出任延迟的原因了。知事本是一个名誉也好，俸禄也厚的职位，以他的才能，是胜任愉快的。他的见识，他的处事的办法，很宜于独当一面，凭着自已的信念来处理事情，不问他人的毁誉如何，对一切的事情负责。

他出任这个职务是没有甚么可非议之处的。我的妹妹当然要随他赴任，可是任所不是她所希望的首都，而是在她看来不能不说是荒野似的孤寂的小城镇。他们所住的官舍虽是宽敞堂皇，有官衙的威严，但没有甚么社交上的欢娱。有几个以前与她亲交的青年女子，跟着她搬到这里来，格洛克 （Gerock ）一家有许多女儿，她们轮流地来游，因此，她纵然忍受了不少牺牲，但至少总还有一个老朋友作伴，慰她的寂寥。

她既有这种境遇和经验，所以她自以为有理由极认真地劝诫我与丽莉断绝关系。照她的见解，让一个她非常爱重的青年女子，从一种虽不是光华璀璨而饶有活气的生活环境脱离，而嫁到我们的家里来，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们的家纵是有可称道的地方，但还不是一个适宜于上流社会交际的场所。加之，父亲虽是一个慈祥的人，却寡言笑，好教训人，母亲是主母中的极善于操持家务的，每日家务做妥了之后，一边做着女红，一边好与她亲暱的挑选过的青年人作娓娓的谈话，不愿为别事所分心。

她又在反面把丽莉的情况和环境很生动地对我描画出来。

她了解得那样的详细，是因为我在信上和在热烈而率直的闲谈中，把有关丽莉的事情，无论怎样微细，也说过给她听。

可惜，她关于丽莉的这种描写，象是一个好谈人长短而逐渐失去我们的信用的人暗地里说一个朋友几句坏话，只是说得较详细而怀好意罢了。

我虽然承认是给妹妹说服了，但我不肯答应遵从她的话。别时，我心里头怀着谜一样的感情不能解消，我对丽莉的热情反因而继续滋长。纵然希望的女神已迈着大步急急的离开，小爱神还紧牵着她的衣裙不肯放呢。

从那儿到苏黎世，我清楚地记得的只有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士北部地方）的莱茵河的瀑布。这个雄壮的激湍显示出攀登云梯似的山地的行程的第一步，从此以往，山道越来越险阻崎岖，一步一步的高峻了。

在苏黎世与拉瓦特尔重逢

我到了苏黎世从"宝剑"旅馆的门前眺望苏黎世湖，当时入望的景色，到现在还象是历历在目。我说从旅馆的门前眺望，因为我没有进旅馆，而先赶往拉瓦特尔的家去。他很高兴和亲切地接待我，而且，我不能不说，他的殷勤周到，真是无与伦比。与他晤时只觉得他的恳挚，宽大，慈祥，高尚。他的夫人虽有点异样，而流露着恬静敬虔的神态，跟他身边的一切一个样，与他的性情和生活习惯完全融洽无间。

我们最先谈起而且几乎不断地谈及的话，就是关于他的著作《人相学》。那时候——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书的第一卷已完全印出来，至少也离出版不远。他这一新著可以称

为具有独创的兼经验的，系统的兼综合的性质。我自己与它的完成有极特殊的关系。本来，拉瓦特尔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与他合作，参与这书的编成。在旅行莱茵河沿岸的时候，他已叫人替许多知名的人画肖像，想以他们做实例的插画，来引起他们对这书的个人的兴味。他对于画家，也采用同样的做法，他敦请各地画家送给他画像，来达到他的目的。结果，种种的肖像画从各地送来了，但不符合他的规定。他把这些画制成铜版，满堆在他的左右，但也很少能表示特性的。他为准备这本重要的著作，曾费了许多心血，牺牲不少的财力。一切都为人相学争取光荣。现在人相学既要编纂成书，便须以学理为根据，以实例为证明，以求获得科学的尊严，可是它的插图却从没有一幅是能够说明他应该说明的事。对于一切插图都不得不加以挑剔，或附加条件，才能采用，没有可以称许的地方，而只勉强可用，甚至有许多倒为那说明所取消了。我自己做一件事情，通常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前进，故他托我为这著作帮忙一事，实是我所担任的任务中最困难的一桩。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自己推测吧。他的原稿和插入本文的铜版画，寄到法兰克福城给我。他授权我自由地删削我所不喜欢的，以及随我的意思加以改动插入。当然，我不肯滥用他所特许给我的这种权力，只有一回，他插入一篇东西，与一个不公正地非难他的人作激烈的论争，我把这篇拿掉，而补上一首明快的歌咏自然的诗。因此，他骂我不对，可是后来他心平气和之后，又赞同我的做法。

凡是从头浏览过那四册《人相学》并且从头读到尾（这决不会使他后悔吃亏的）的人，也许会猜想到我们两人的聚首是多么有兴趣。那时候，书里头的插图的大部分已画好，一部分已

上铜版，拉瓦特尔和我把它们陈列在眼前，加以检视，想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那些不适当的实例也象是有教育意义，因而变为适当。

现在从头把拉瓦特尔的这本著作再读过一遍，我不觉哑然失笑；仿佛看见一个以前熟识的人的亡灵，这个人我已厌恶，现在已不喜欢再见他的影子那样。

但是，书中那么些的不适切的插画，而仍颇能与本文契合一致，实应归功于利普斯①的画才和铜版雕刻的技能。实际上，他生而善于实物的自由的、散文般的写生，这正符合拉瓦特尔这本书的要求。他为这个具有特殊要求的骨相学者工作，因此必须小心加意，以便能接近他的恩主的要求。这个多才的农家出身的画家，得有机缘为那来自名都大邑的学者兼高僧的主人服务，非常感激，而极用心来尽他的责任替他工作。

我到了苏黎世，同先到的斯托尔堡兄弟们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与他们日渐疏远起来，不过我们之间绝没有发生一点恶感。我们不再一道同作市外的游览，但在城内，我们仍有时来往。他们经我的介绍，也往访拉瓦特尔，青年豪放的贵公子气也露出来。在熟练的观相学者之前，他们的容仪，当然显得有点与众人所见有不同之处。他对于他们的骨相学的判断与我的意见相违。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谈及利奥波德时的话："我不明白你怎样会这样说他，"他喊道，"他诚然是一个高尚优秀多才的青年，但是，人们对我说起他来，把他描摹到象是一个英雄，一个海格立斯（大力神）那样的人，照我看来，他实是我

① 利普斯（Johann Heinrich Lips，1758—1817），画家。1789年，歌德聘他到魏玛去工作。

一辈子所见的青年中最温柔，在必要时还是受影响的青年吧。固然，我的相人之术还没有升堂入室，但是，你和世人所见却未免太悲观呢。”

自从拉瓦特尔旅行下莱茵河以来，世人对于他和他的人相学研究的兴趣大增。各地曾受他访问的人士接踵而至，纷纷回拜，在当地的宗教界和学术界的人物中有第一人之目，且被视为能吸引外国人士的唯一的人物，他因此感到有点不安。为预防一切的嫉妒和反感起见，凡有人来访，他必向他们谦逊地提及当地其他的名流，并敦促他们对后者也表示友好和敬意。

访问老诗人博德麦

在这些人中他特别提起老年硕学之博德麦①，我们为他的话所促动，不能不往访他，表示后进学人的敬意。他的住宅坐落在那位于苏黎世湖水所注出的林马特（Limmat）河的右岸的大城或旧城的小山之上。我们横穿过这城的街市，沿着逐渐险峻的小路步登高墙后的小山上。在山上，有乡村风味似的平地，人家或群居或散处，介居于堡垒和旧城墙之间，是很不错的一个近郊的住区。博德麦一辈子栖留所在的住宅就是在这儿，四周极其空旷明朗，风和日丽，我们在未进门以前已觉得周围的风景至为可人。

我们上一楼梯，被领到一个四周镶着壁板的屋子里，一个

① 博德麦（Bodmer，1698—1783），瑞士的著述家，诗人，有瑞士的“弥尔顿”之称。他与克洛普斯托克友善，对于青年时代的威兰也有影响。歌德到瑞士见他时，他已七十七岁。

中等身材的和颜悦色的老人已站在我们之前，他以通常招呼青年来客的话跟我们招呼，他的辞令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即是，他到了这样高年，还残存于世，为的是能够仍亲切地接受我们青年的访问，多理解我们，亲炙我们的才能而引以为喜，以及为我们无限的前途祝福。

我们觉得这位属于古老时代的诗人，在文教最发达的都市的附近，在天高气爽的环境之中，筑一栋真正牧歌似的住宅，悠然自适地度过一生，高瞻远瞩，游目骋怀，而享遐龄，值得我们仰慕，因致我们的赞颂之辞。

当我们请求他许我们从他的屋子的窗前向四方眺望时，他欣然答应。那时恰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晴朗的阳光之下，风景确美妙无伦。从大城至湖边一带的倾斜地，在林马特河对岸的小城，以至西方的肥沃的西尔田野种种景物，历历在目，在背后的左边，苏黎世湖的一部分闪烁着、荡漾着镜样的波光，岸边丘陵起伏，间以山谷，千变万化，使视线应接不暇。我们目眩神迷，在远远的天际更横有蔚蓝的高山数叠，可以指点出峰顶的名称，我们更流连瞻望不忍舍去。

青年的游客对此绝佳的风景的惊叹，已是多年来司空见惯的事，他顾而乐之，我们还可以说他带着讽刺的神态参加我们的叹赏。我们作为极亲密的友人向他告别，那时，对于青山的憧憬已深入我们的脑际，不能抹去了。

现在，我正想收笔不谈这位可敬的老辈诗人时，我才记得还没有讲到他的体貌、容仪、举止和态度。

但是，我总觉得在旅行的途中访问名流，而把这个人刻画尽致，象逮捕状所填写的内容那样，是不大妥的事。没有人想到，这种刻画只是在数分钟的会见之内好奇心与偏颇的观察的

结果。因此在访问记所描写的名士，时或傲慢，时或谦让，时或沉默寡言，时或谈笑风生，时或愉快，时或郁郁不乐，有时写成真个如此，有时只象是如此。可是，在访问博德麦的场合，我可以说，这个可敬重的大人物的风貌，如用语言表达，恐怕不能形容尽致，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幸而现存有包塞①以格拉夫为依据所绘的肖像画，栩栩如生，与我们眼中的博德麦氏亦无二致，而他的观察和静思时的眼光更画得传神。

帕沙万特与拉瓦特尔

在苏黎世，我邂逅着少年时代的朋友帕沙万特②，我虽不感到出乎意外的喜悦，但也是特别的无上的快慰。他是我们故乡一个宗奉加尔文革新教派的大家子弟，其后定居在这教派的发源地瑞士，后来并成为该派的宣教师。他的躯体不高大，但很灵活，他的容貌与整个风格显出他是富于果断性的人。头发和胡子都是黑色，双目炯炯有神。从他的整个人物看来，他是一个有热情而相当活动的人。

我们才互相拥抱，寒暄数语，他即劝我往各小县区游览。他自己曾遍游各地，觉得非常赏心悦目，也愿我能饱览那些地方的风景。

当我与拉瓦特尔详细谈论紧急重要的问题，差不多彻底地

---

① 包塞（Bause，1738—1814），德国的铜版画家，他所依据的画家格拉夫（Anton Graff）是德累斯顿的宫廷画家。

② 帕沙万特（Jakob Ludwig Passavant），生于法兰克福，比歌德小两岁，曾任法兰克福的宗教顾问，与拉瓦特尔友善。

探讨我们两人共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快活的旅伴已作种种的探胜之举，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遍历各地。帕沙万特既满注我以真挚的友情，以为总可以独占着我，充当我一个人的导游者。我的三个旅伴已不在我的身边，本已容易为他所动而作山区之游，何况我自己又热望以较恬静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意思，完成这个久已向往的瑞士的漫游呢。我们买舟动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溯着秀丽的苏黎世湖而上。

下头插录的一首诗，也许可以把当时的佳兴写出几分吧。

清新的营养，青春的血，
我从空旷的世界吸收：
怀中拥抱我的自然
是多么慈爱，多么温柔！
绿波摇送着我们的轻舸，
双桨有节奏地拨水作声，
高耸云表的一叠远山，
迎着我们的水程。

眼睛呵，我的眼睛呵，你为甚低垂？
金色的梦呵，还会再来？
纵然是多么璀璨，梦呵，给我走开！
这儿也尽有生命和爱。

在软波上闪烁着
万千的浮动的星辰，
层峰矗立的远处

浥着轻烟软雾的氤氲；
清晨的风吹拂着
林木成荫的河浦，
镜似的湖面映出
熟的果实无数。

我们在里希特斯威尔（Richterswyl）上岸，往访拉瓦特尔所介绍之霍齐（Hotz）博士。他是一个医生，而又明达慈祥，在当地和这一带地方都受人的尊敬，纪念这回访问他的印象的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请参照拉瓦特尔的人相学中论及他那一个地方吧。

在瑞士境内游山

我们在他家里受到极丰厚的款待，关于以后的游览路程，他也指点得非常周到，我们别了他，开始攀登村后的山岭。当我们要再向欣德勒基（Schindeleggi）山谷下去时，我们再一度回首眺望苏黎世湖的美景，让它的印象长留在我们的脑际。

当时我的心情怎样，看下录的几行诗，就可以窥见，诗是在那时写的，仍在一小本备忘录中保存着：

可爱的丽莉，如果我不爱你，
这种眺览有甚么欢喜。
丽莉啊，如果我不爱你的话，
究竟甚么才是我的福气？

这几行的咏叹本来也收入我的诗集之中，但插在这儿，我

觉得更富于表情，更为动人。

从此地到圣玛利亚修道院① 的路，虽非常崎岖，我们登山的勇气却不因之受挫。一队参神的香客，我们在山下湖上时已经看见，这时一路登山，一路祈祷和唱着赞美歌，已赶上我们。我们同他们招呼，让他们先行。他们邀我们参加他们的虔诚的礼赞，幽寂的山中一时间为之热闹起来，并增添了异彩。我们看见他们一队人的影子在羊肠似的山径上蜿蜒着，我们也要沿着这山径走的，而且觉得更兴高采烈地跟踪前进。我因想起，罗马教的种种的习俗，从新教徒看来，是饶有意味，并且唤起人们庄严之感的。而后者只认知这些习俗所由生的最初的本质的东西，它们藉以一代传一代的人性的东西，故他所深入探求的是果实的核心，而不同时注意到果实的皮壳，以至果树，枝叶，树皮和根须。

圣母修道院的瞻礼

没有多久，我们望见一所宏丽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没有树木的荒凉的山间。修道院房舍宽敞，规模宏大，位在整洁的新开垦地的中间，因此，可以容纳许多种种色色的香客，而没有局促褊狭之感。

教堂内更有一个小教堂是往日本尼迪克特派的圣者潜修之所，今用大理石镶嵌，尽可能地改建做庄严的礼拜堂。这个覆着圆拱，用圆柱支撑着的圣所，是很新奇的，真为我从来所未

---

① 是本尼迪克特宗派（Benediktiner）的大修道院，建筑于十八世纪初年，以有一个绘得很美妙的圣母像而著称，每年来参拜圣像者达数十万人。

见。为了使往昔的圣者的笃信和净德的一闪的火光长留人间，在这儿不断地燃着熊熊的火焰，虔诚的信徒成群结队，不辞跋涉之苦到这儿来参拜，为的是借这圣火也把他们的小蜡烛点着，我们看了，不禁肃然沉思。无论怎样解释，我总觉得这个事实是象征着人类企望获得与先驱者在最深奥的感情和最牢固的信念中所抱的，所领略的同样的光明和温暖的无穷尽的要求。寺僧领我到宝库去，其中的贮藏丰富，令人起敬，而最使人惊叹的就是圣者和教派开山祖们的原物一般大的，甚至可以说更大的胸像。

其后，寺僧打开一个柜橱给我们看，引起我们全然异样的兴味。那儿藏有奉献布施于该寺的种种的贵重的古物，式样不同的精美的金细工制成的王冠吸引了我的视线，其中更有一顶最使我赏玩不置。那就是一顶尖顶形的古式的王冠，象是古代后妃的图象中所见的那样，但是花样饶有风趣，雕镂精细，具见精工细琢的名匠的苦心，即使那些镶嵌的宝石，也选择配置得很有分寸，十分精巧，——总而言之，它确是一种尽美尽善的艺术品，纵然不能把印象用艺术的眼光说明，然一入眼就可感觉到了。

在这样的场合，——即便美术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觉得到的场合，人们也会怦然心动，要把这些物品派派用场，以至化该珍品为已有，以便能尽情地把玩自娱。我请求寺僧许我拿起这顶小王冠来把玩，当我得到了允许，恭谨地把它托在手上举高的时候，我心里所想的，不外是把它覆在丽莉的金发之上，领她到明镜之前，使她目击自己顾盼生姿的欢悦和周围的人看见她的雍容华贵的仪态时的赞赏。后来，我常常想起，如果她这样的姿容是给名手的画家描出来，一定会成为一幅极赏

心悦目的画图。我又幻想，一个人如能为青年的国王，获有这样的一个王妃和一个新的王国，那是多么值得企求和努力的事啊！

寺僧为了饱我们的眼福，遍观寺内的珍藏，又领我们到美术品、古玩和博物标本的收藏室去。那时的我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还是茫然不知。而且我不喜欢地球构造学和地质学那样的学问"。前者虽是极可称道的科学，但把关于地球表面的美丽的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弄到支离破碎；后者更充满着空想，使我堕入五里雾中。可是充当导游的寺僧偏拿出一个用青色片岩粘土珍藏着的小野猪的头的化石要我谛视，据他说，精于此道的鉴定家非常重视这化石。它虽然已变做黑色了，但从此以后它却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是在拉柏尔斯威尔（Rapperswyl）附近发现的，这一带地方从太古时代起就多沼泽，所以很能够替后世收容和保存这一类的木乃伊。

但是，用玻璃镜架装着马丁·肖恩① 所绘的玛利亚升天的铜版画，对我的吸引力，又完全不同。诚然，只有完全的印本才能使我们领略这位大艺术家的杰作的妙处，但是，即在这个场合，象见了任何种类的尽善尽美的东西那样，我们玩赏之余，不禁产生想要化为己有，以便能不时把玩的欲望，纵然过了很久的时日，我们还不肯放弃这个念头。我后来真个获得了这幅铜版画的一张精美的印本，才得心安，我不妨在这儿就预先说出来。

---

① 肖恩（Martin Schongauer），是十五世纪南德国的名画家。

施维茨的哈根山的登临

一七七五年六月十六日（我的日记到这天才记日子），我们走上崎岖难行的险路；嶙峋奇拔的石山必须越过，四周孤寂荒凉，到了傍晚七时三刻，施维茨的哈根山(Schwyzer Hak-ken,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支脉）已现在我们面前。几峰相并，屹然高插云霄。在路上，我们破题儿第一遭看见雪。在那巉岩的高峰上，雪自去冬以来便积着不消。太古的松柏的森林茂密地填满那深不见底的山谷，俯瞰下去的我们凛然产生一种严肃畏惧之感。我们是要下山到这山谷去，略事休息，精神振作起来，便大胆地敏捷地循着那峻峭的小径，从一个崖到一个崖，从一个岩到一个岩，跳跃似地下山，到了晚上十时，我们便抵施维茨（Schwyz）。我们又疲倦，又精神焕发，又颓然欲倒，又兴奋异常。我们急忙找水喝来润我们的难耐的干喉，饮罢，精神更觉酣畅。读者试将当时的我和我的朋友想象一下吧，我是约略两年前写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青年，而帕沙万特比我还年轻，曾读过我这篇异样的作品的原稿而引起热烈的共鸣。这两人不知不觉意外地置身于某程度的自然生活中，栩栩欲活地回忆已经逝去的旧情，沉陷于现在的热情，随便构想空中楼阁似的计划，凭着自己的蓬勃的精力，而纵横驰骋于空想的世界中。读者如设想及此，就可以推测到我们当时的情景的几分了。关于它，我的日记曾写有这样的一句："尽情的笑和欢呼直至夜半才止，"如果日记上没有这句话，我恐怕还不知怎样描写当日的情景呢。

十七日早晨，我们看见施维茨的哈根山的峻岭矗立在我们

的客舍的窗前。在这个巨大而不整齐的天然的“金字塔”之巅，白云相继升起，飘来飘去。到了下午一时，我们离开施维茨而向里吉（Rigi，海拔一千八百米）进发。下午二时，我们已泛舟于阳光灿然的劳耳泽（Lauerz）湖上。我们高兴极了，目眩神迷，差不多什么都看不见了。操舟的是两个精壮的姑娘，这是惬意的事情，我们就随它去。到了湖中的小岛，我们舍舟上陆，船娘告诉我们，从前的暴君曾在这岛上住过，究竟领主曾否居此，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废墟之间却添了隐遁者的茅舍。

我们登里吉山，七时半，我们已站在“雪中的圣母”峰之前，然后走经礼拜堂和修道院，在“牡牛”旅馆歇宿。

十八日星期日，早晨从“牡牛”旅馆眺望，把礼拜堂画出来。十二时，往“冷浴场”或称为“三姊妹泉”的泉场去。二时一刻，已登里吉山的绝顶，我们身在云中，这回感到有两重的不愉快：望眼既为山峰所障，降下来的雾又沾湿衣裳。可是，有时这儿那儿云破雾消，让我们看见一个为离合变化的轮廓所包围，庄严、澄朗的阳光照耀的世界，我们便不再抱怨了。因为这样的景致实是从前没有见过，一生也难再见的绝景。所以我们宁愿留在这个有点不快的境界中，徘徊不忍去，以便从那些飘忽变化的云海的罅隙之间，领略那浴着日光的一隅的大地，一线的湖岸，一角的湖面的景色。

晚上八时，我们再回到“牡牛”旅馆去，啖了烧鱼和鸡蛋，喝了充分的葡萄酒后，我们的疲倦的身体又复原了。

那时暮色已深，夜也渐渐来了，几种意味深远的谐和之音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缭绕。礼拜堂的钟声，山泉的潺潺之声，不时掠过的微风的瑟瑟飕飕之声，远处传来的猎角之声——倾

听着这些声音的时候，心安神宁，不觉颓然入睡。

传说中的威廉·退尔的遗迹

十九日晨六时半从旅馆动身，先上坡后下山，沿着瓦尔德斯台特湖（Waldstätte）到菲茨瑙（Fitznau），然后由那儿泛舟到格尔绍（Gersau，有名的疗养地）。中午在“湖滨旅馆”用饭。二时左右，我们到了格吕特里①，相传这儿是三个“退尔”（县代表者）会合盟誓之所。继而我们的船经过一个砂洲，据说，退尔曾从小艇纵身一跃上到这儿来，为纪念他起见，还把这英雄的故事在这儿绘成画图。三时，我们到了弗吕埃伦（Früelen，在湖的南岸，有退尔礼拜堂），传说是退尔乘船的所在。四时左右，我们抵阿尔多夫城（乌里县的一城，有专为演席勒的《威廉·退尔》②一剧而设的剧场），据说退尔射苹果就在此地。

游客沿着这样的诗的联想的线索，悠然绕行穿过湖边的迷宫似的崖岩之间。这些峭拔的绝壁，终古沉默无言，寂然屹立不动，恍惚是舞台上的侧面背景那样，幸与不幸，欢乐或悲愁，只是今日粉墨登场的人物的事，与舞台的侧面背景却一点

---

① 格吕特里（Grütli），在瓦尔德斯台特湖的西部的山林牧场。传说1307年乌里、施维茨和温特瓦尔登三县图谋独立，最初在这个地方缔结联盟，其后席勒把这传说采入他的戏曲《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② 威廉·退尔为瑞士传说中的人物。1307年奥地利治理瑞士的官吏格斯拉非常暴虐，立柱于小山上，而覆以一帽，令领内的人民拜它。退尔独不拜。官大怒，因命退尔射他的儿子头上的苹果，苹果落地，而儿子没有受伤。后来退尔将暴官射死。

没有关系。

但是这样的感想，却完全不会在当日我们年青人的脑际产生，我们对于新近过去的事已置之脑后，而未来又象是我们将要跋涉的山岭那样，包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不能预见。

阿姆斯特格与瓦逊

二十日，我们向阿姆斯特格（Amsteg，乌里县的村落）出发，在这儿尝到很鲜美的烧鱼。这一带山峦奇绝，罗伊斯(Reuss)河从巉岩的山壑间迸流而出，清凉的雪水飞溅于洁白的岩石的床上，我到此不肯错过我多年渴望的机会，飞身走下激湍的泉中，一尝涧浴的滋味。

三时左右，我们从那儿再前行，一队驮马在我们的前面走过，我们跟他们一道儿踏过广大的雪块之上，到后来才知道，雪块的下面是空的。而这儿冬天的雪积在峡谷之间，在别的季节，行客必须绕过这谷，现在却堆成一条捷径，人马可以一直走过了。在谷底穿流着的谿水，渐渐使它凹下去，夏季的温和空气使这雪的穹窿日益消融，现在却象一个巨大的桥拱那样，把两边自然地联结起来。当我们冒险从上方向下移动降到峡谷的宽处一看时，我们便目击这种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而深信不疑。

我们继续攀登，下望只见深谷间的松林，有时从林隙间瞥见激溅于峭岩绝壁间的罗伊斯河的片影。

七时半，我们到了瓦森(Wasen)。在这儿我们尝到红色浓烈而带酸的伦巴底的葡萄酒的滋味，不能不搀入水和加许多的砂糖来补充这地的风土所不曾赋予葡萄中的成分。旅馆主人拿出美丽的水晶给我们看，他的价钱虽很贱，但那时我对于这些

矿物还没有研究的兴味，不肯买这种累赘难带的山中土产。

二十一日六时半我们又登山；沿路的岩石越来越巨大，越巉岩可怕。到恶魔岩去的路一步比一步崎岖难走，一直到望见了恶魔桥还是如此。我的旅伴喜欢在这儿歇息一下，他鼓励我把这儿的奇景写入画图。把他的轮廓描出来我还可以，但却不能把前景背景画得玲珑浮凸，远近分明。对于这样的景物，我实在难以形容。我们拖着倦腿再挣扎前进，广大的荒山愈见广漠幽寂，平地变成山岭，峡谷变成悬崖深渊。我的导游者帕沙万特领我到乌尔塞纳洞(Urserner Loch)去，我带着有点不快的情绪穿游其中，以前所见的一切都唤起人们崇高之感，这个漆黑的洞却把这等印象都打消了。

但是，这位恶作剧的导游者，当然预先猜想到我出洞一望的时候一定会惊喜欲狂吧。那有点激湍的河流到这儿便徐缓地蜿蜒于群山四合、而相当地宽广开朗、宜于居住的平坦的河谷间。恰在那平地上对着我们的整洁的小村乌塞伦(Urseren)和它的教堂的背后，有一片松林矗立，村人视同神圣，因为它保障那些在山麓居住的乡民，使免于从高处落下的雪崩之灾呢。这谷中的青绿的草场在近河之处还有矮矮的垂杨点缀着，在这儿我们看到久已不见的植物，而精神一快。心也完全安静下来，在平坦的小路上，我们觉得元气已经恢复，而我的导游者以出我的不意领我到这样的可惊叹的佳境，不禁自鸣得意。

这个牧场出产有名的“乌尔塞纳干酪”，当时得意洋洋的我们，更在旅馆里叫一些葡萄酒来饮，酒味颇佳，我的愉快的心情因此更加增进，我们的探胜的计划又带上一种飘飘欲仙的情调了。

二十二日三时半，我们离开旅店，从平坦的乌尔塞纳谷而

入岩石历乱的里维纳谷（Liviner Tal)，在这儿又马上看不到树木的生长，光秃或长着苔藓的岩石给雪遮盖着，山风不时卷起，白云悠悠地自来自去，在极度的荒凉寥寂中的瀑布的潺潺声和驮马的铃声随风送来，而又不见行客的来去的影子。这儿的岩窟是蛟龙的巢穴，不难想象出来。但是，一条经过无数的曲折、层次泻下来的壮丽多采的瀑布，使我们的心情顿觉爽快振奋。这条瀑布可谓瀑布中的最壮观者，最宜于入画。这时恰值雪融的季节，水势大增。我们伫立它的前头，看见白云往来其间，瀑布时隐时现，心旷神怡，历久也不忍离去。

到后来，我们来到一些小的雾湖（Nebelsee）的前头，这个名字是我给它们起的，因为它们与空际的雾混成白濛濛一片，烟水难分呢。我们前行不远，便有一所房舍从雾中露出来，那是一间游客寄宿所，我们想起就要在它的屋内受到和气的接待而感到很大的宽慰。

第十九卷

到了门口，一个摇尾迎着我们的小狗低声轻吠，报客人来到，一位年老而尚壮健的女人出来亲切地迎接我们进去。她说住持刚到米兰去，但今晚便回来，请我们原谅接待不周之处。其后，她不再说什么，只替我们摒挡张罗。她安顿我们在一个暖和宽广的屋子内，端进面包、干酪和可口的葡萄酒来，且答应替我们预备丰盛的晚饭。于是我们再把出黑洞时的惊喜情形谈起来，帕沙万特以这回的胜游又自赞一番，并说今天过得非常有趣，它的印象非诗或散文所能再创造出来。

黄昏很晚才来临，到了那时，那位道貌岸然的住持终于回来了，他以和蔼可亲而庄严的态度跟我们招呼，吩咐女厨子几句，叫她替我们预备尽可能丰盛的晚餐。我们觉得他在这样荒凉的空山居住，与人世完全隔绝，度过一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禁对他表示出我们的惊异，他却回答我们说，这儿还是与人世时常往来的，象我们这回的来访，就够使山门热闹了。德国和意大利间的货物贸易来往是很频繁的，故不断的货物运输使他与两地的第一流的商店有联系，他常常下山到米兰去，有时也到卢塞恩(Luzern，瑞士中部城市)去。卢塞恩管理这条交通线的邮递业务的商行派年轻的店员到他这儿来，在这个山上交通的辐辏点，学习、了解关于德意间邮递、运输事业的一切实际业务。

当我们这样子拉杂交谈着的时候，夜色渐深了，我们便归房酣然睡去，所睡的床是颇短的，紧附在墙上，与其说是一张床，还不如说是一个柜吧。

清早起来，在寄宿所附近散步，虽在露天之中，但高山四合，地面狭小得很。我坐在那往意大利去的山路之旁，以业余画家的手法写生，所取的景物本来不是应描写的东西，更不能入画。即是说我写的是近处的群峰，它们的侧面，以雪融之故，露出白色的绉痕和黑色的山脊来。这幅速写虽徒劳无功，但我因此却把那时的光景铭刻在记忆中不能磨灭。

意大利的远景

我的旅伴意态洋洋地跑到我身边来，说道："嗯，你听了昨晚那位方丈的话觉得怎样呢？你是不是也象我那样有了兴头，想从这个蛟龙的窟穴的空山下去，飞到那秀丽的意大利去呢？取道这个峡谷下山而往意大利，一定多奇趣，而且不崎岖难行，如果一下山，贝林佐纳（Bellinzona，瑞士的南部的都市）就豁然现在眼前，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呵！听了住持的话，大湖的岛屿的风景再活现在我的眼前。自从开斯勒（Keyssler）的游记出现以来，那儿的景物我们已听到和看到不少了。我真不能遏住跃跃欲试的豪兴呢。"

"你不是也感到这样么？"他继续说下去，"你坐的地方恰是到意大利去的路上，从前我也有一回在这儿坐过，却没有勇气迈步下山。你就这样子下去吧，在爱劳罗村等我，我跟那位住持作别，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便跟同脚夫一块随后追上。"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毫无准备就决定启程前往，我这样子

答他，他喊道：“这还有什么好踌躇呢！到米兰去的路费，我们是够的，在那儿我们还可筹措，自前次集市以来，我认识的米兰商人不止一个。”他的话渐逼渐紧，到后来我说道：“先回去吧！把出发的一切准备都弄好，然后我们再决定。”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觉得自己下不了决心的，倒象是为以前的印象所支配和决定那样，我当时的心境就仿佛如此。在我的心目中，伦巴底和意大利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德意志却是一个熟识、可爱，充满亲切之情，使人怀念的乡土；而且，老实说，在那儿有多年包围着我、支持着我的生命的一切，今已成为我不能缺少的雰围，越出这个范围一步，实是我受不了的事情。一个黄金的心脏形的纪念品，是在与丽莉恋爱最热火的时候她送给我的，到今天仍用她所结的小带子拴着，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们的热情使它暖烘烘的。我从怀中拿它出来，搁在唇间不断地吻。为这事，我曾题一首诗，让我在这儿也把这诗插入吧。

怀念丽莉的诗

你是消逝去的欢娱的纪念，
我还老拴在我的颈上，
是否你联结我俩比心灵的纽带还久？
是否你要将短促的恋爱延长？

丽莉哟，我为避你而远去呢！
我走遍了外国，迢迢的山谷和森林，
你为我结的丝带还是不离我身！

呵，丽莉的心怎能那样快的从我心头消泯。

恰象一头啄断了绳的小鸟飞回高林，
脚上还系着赤绳一段，
留着笼中生活的残印；
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
它已有了主人。

我连忙站起来，以便离开那往意大利去的崄峻的路，免至那个带了掮行李的脚夫赶着跑来的朋友把我拉下坡去。我也回到寄宿所里跟住持道别，不说一句话，就循来时的原路出发。我的朋友略一踌躇也跟着我走，纵然他对我那样的爱和依恋，走了一程，他还是不跟我一道走，故意落在我后几十步，直至后来到了前述的大瀑布附近，我们再合在一道，原定的循旧路回去的计划终于也被认为妥善和有好处了。

关于归途，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记，只有一桩事，就是，几日前与负重的驮马队一道儿泰然踏过的雪桥，今已完全融崩了。我们既要沿着那深陷的广阔的溪谷绕一大弯，更不能不对着那自然的大建筑的废墟而惊叹不已。

我的朋友还是不能打消游意大利的念头；也许他在最初就有这个打算，想故作狡狯，临时才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要我听从他的主意。因此，在归途上，他没有来时那样的高兴地做向导；可是我更得默然循着小路走，很留神地观察，至少也把那伟大的印象——通常在游览之后，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在我们的记忆中被冲淡——的容易把握的特征逐一铭刻于心中。

屈斯纳赫特的退尔礼拜堂

我们带着许多新的和重新寻味的兴趣，经过环着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See）的峰峦，而到达屈斯纳赫特（Küssnacht，施维茨县的村落，在湖的北岸）。在那儿，我们舍舟登陆，继续前行，瞻仰那矗立在路旁的退尔礼拜堂，追想那被全世界誉为英雄的爱国行为的暗杀故事。我们以同样的兴致渡过楚格湖（Zuger See，介于施维茨与楚格（Zug）县间，在里吉山麓），我们前次远远从里吉山上望下时已看见这湖了。在楚格，我只记得在旅馆的屋子内的窗扉上镶嵌着的彩画玻璃，玻璃片虽不是大型的，但花样非常精美。我们从楚格再走，经过阿尔比斯（Albis，苏黎世湖西方的山峰）而到西尔谷（Sihltal，也在苏黎世湖西端的山间低地）。在那儿，我们往访一个生于汉诺威，名唤冯·林道（von Lindau）的青年。他喜欢在这儿过孤寂的生活，在苏黎世时我跟他结识，他曾自告奋勇陪我一道作登山的旅行，我却断然拒绝，在友谊上和礼貌上实有点过分。有他做伴侣诚然增人愉快！但以帕沙万特对我的友情已到嫉妒第三者的程度，有他在倒会惹起不快，所以我谢绝他的好意。现在因到他的寓所，请求他的谅解。

可是在我们离开这些秀丽的峰峦，再下降到湖上和欣然接待我们的苏黎世市之前，我还要说说我以绘画速写摄取这次旅行所经历的风景的尝试。本来，从年少的时候，我就有把风景看作是画那样的习惯，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一看见自然中有画图一般的景色，便不禁马上把它绘成画图，使刹那间的印象明确地留在记忆中。但是一向所绘的对象大都是狭小的景致，现

在与瑞士那样伟大的风光相接触，真感到我的画笔无所施其技了。

在这场合，既必须在短时间内急急画就，我逼着想出一个补救方法来：即是，我一看到一处美丽的风景，即取纸粗略地画个大概，然后在旁边把我用画笔不能描绘刻画出来的景物，用文字详细记叙。靠着这个方法，这些风景便铭刻于我的心中，在后来在诗或小说里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它们便马上浮现出来，听我派用场。

当我回到苏黎世的时候，斯托尔堡兄弟已不在那儿，他们本预定在这城有较久的逗留，后来却莫名其妙地提前返国了。

一般来说，我们都承认，旅行者既离开他的家庭的狭小天地，不独以为是到了陌生的地方，而且是置身于完全自由无碍、可任意行动的地方来，加以当时旅行不象今日那样要给警察检查护照，要纳关税、通行税以及有其他种种的障碍——有这种麻烦，在外头还比在家里不自由不舒服呢——故对于旅行更可存这种幻想。

如果读者会想到当时那种谋求自然的自由之实现的流行倾向，那么，血气方刚的青年把瑞士恰恰当作是发挥他们的年轻的蓬蓬勃勃的天性的牧歌似的地方，是可以原谅的了。而且格斯纳① 的感情细腻的诗歌和非常动人的铜版画，对于青年们这种心理更予以极明确的肯定。

实际上，要体验这种诗一般的自然生活，在野外的池塘河川中洗澡，象是最好不过的方式。不过在到苏黎世的途中，当

① 格斯纳是瑞士的诗人兼铜版画家，参见第七卷"在来比锡一道吃饭的人"一节的注。

地人们已觉得这样的自然行动与近世的善良风俗相抵触，斯托尔堡兄弟也不得不稍为谨慎。可是，到了瑞士看见种种的河流，时而缓流，时而疾走，时而激湍倾泻，时而在平野合流，逐渐水势浩瀚，灌注成大湖。在水光泉声之中，谁也抵抗不住水的诱惑，而跃跃欲试。我自己也不能否认，我也曾跟我的旅伴一块在澄澈的湖水中洗澡，虽然下水的地方不是任何人的视线所能及，但是赤裸的身体在远远也发亮的，谁看见我们这种举动，当然会感到愤慨。

斯托尔堡兄弟的趣事

善良天真的青年，象牧歌中的牧羊人那样半裸体，更或象异教的神那样赤条条一丝不挂，都不以为有什么不雅观之处，但苏黎世的朋友却忠告我们，不好这样干。他们说，我们不是来自原始时代的地方而是来自一个以遵守从中世纪传下来的旧制度风习为适当和有利的国度。斯托尔堡兄弟也欣然接受这个忠告，尤其是因为说起中世纪来，在他们的心目中，中世纪象是第二个天性那样值得尊重。因此，他们离开那众目睽睽的湖边，不作裸浴，可是在山中散步的时候，看见清澈、潺潺沁凉的溪水，而正值七月之半，实禁不住不作水戏了。于是他们更远远的走了一段路程，到了一个幽寂的山谷里。那儿是西尔河从阿尔比斯的背后在苏黎世的下方突然泻下与林马特河合流的所在，渺无人烟，甚至没有一条路可通，他们觉得这儿是水戏很安全的地方，便把衣服脱下，纵身跳入那水花溅激着的波中。在水里洗澡时，他们自不免纵声高呼，一方面由于水的冰凉之感，他方面由于畅适之感所刺激，不禁欢声雷动，这样

子，他们可以把这个树木扶疏的寂寞的岩壑化为牧歌似的场面了。

可是，不知道是否从前跟他们有恶感的人跟踪而至，抑或他们的诗意的喧闹在这荒凉的地方也招惹出敌对者来，总而言之，他们在水里没有多久，便有人从上头的静寂的丛林里不作一声地密密掷下石头。是一个人投的，还是几个人，是偶然的，还是故意，难以断定，他们还是觉得离开这清凉的溪流，飞身上岸穿回衣服是三十六计中的上着。

幸而没有一块石头掷中，吃惊和不快，是精神上所受的损失，他们既是生性快活的青年，这种不如意事很容易就忘个干净了。

不过，他们这种放纵不羁的名声，给予拉瓦特尔以极不好的影响，苏黎世的人们认为拉瓦特尔竟与这样撒野无赖的青年亲交，陪他们一道游览和对他们种种礼待，而这些青年居然在这个文明而有秩序的地方，施展他们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非基督徒的异教徒的劣根性来，弄到丑声四播，因对拉瓦特尔大为不满。

但是，这位宗教家朋友，很识得怎样平息这一类的流言，这事情也给他无形中解消了。当我与帕沙万特回到苏黎世的时候，那两位流星似的游客早已离开，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在我的全集第十六卷新录入的《维特的旅行的片段》中，我企图把这次瑞士之游所体验的矛盾——即是瑞士的可称道的社会秩序，法律上的限制与意兴蓬勃的青年所追求的自然生活间的矛盾——加以描写。但是一般人通常把诗人随便描写的事，当作是他的明确的意见，含有训诫的非难，因此瑞士人看了这种对比很不满，而我也搁笔不继续写下去。本来，我想以旅行

通讯的形式把《维特的旅行》写到他渐陷于烦恼的时候，如果我这样执笔，对于人性研究有兴味的人们恐怕很欢迎吧。

回到苏黎世，我又为拉瓦特尔所独占，再受他的款待，每日大部分的时间只与他两人度过。人相学的巧拙不同的种种肖像画急待整理，他应该做的事情日益繁重。我们按照实际情况详尽地商量讨论，我还答应回到法兰克福城后也给他帮忙。

我所以这样子答应他，实由于我少年气盛，对于自己的敏捷的理解力有绝对的自信，尤其是由于自己极其乐意助人的适应性。其实，拉瓦特尔的人相分析法还不是我赞成的事。我最初同一个人相识时所得到的印象，颇能左右我同他的关系。当然，我心中所抱的一般的好意，与青年人的轻率大意的性情凑合起来，常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使我眼里的事物象是雾里看的花那样，有点朦胧。

拉瓦特尔的性格和著作

拉瓦特尔的精神、人格，具有十分感动人之力；在他的左右，无论何人不能不受到他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也不禁常学他的榜样，观察人的额、鼻、眼、口各个部分以及考究它们彼此间的关系、配合。拉瓦特尔的看相是出自从学理上充分说明他在直观上很瞭然的事情的必要；我却不是这样。当我把坐在前面的人的外貌加以分析，藉此来发现他的品性的特点时，我只以为我所做的是一种恶作剧，是一种侦察似的行为。我倒觉得听一个人随便吐露出来的话，远比看他的相较为可以做判断的标准。其次，我不想否认，在拉瓦特尔的身边，是有点惴

惴不安的：因为他藉着看相术可以看破我们的品性，故在与他交谈的时候，他也瞭然于我们的思想，他只须跟我们问答几句，稍为留神，也就猜中几分。

凡是意识到自己具有丰富的综合能力的人，才会有分析判断的资格；因为他以外部的个别的现象来检验，实证他对内部的全体的看法。拉瓦特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关于他的做法，下头单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了。

拉瓦特尔当了牧师之后，在星期日说教已结束的时候，他也象其他的牧师那样拿一个短柄的天鹅绒口袋，站在门口，接受那些走出去的教徒的施舍，而一边为他们祝福。于是，他在某一个礼拜日，自己打算不看那些走出去的人的脸孔，而只留心他们的手和从而判断他们的体貌。但是，他的锐眼不独注意到手指之形，而且投钱入袋时手的姿势也难逃他的观察，他其后把这种观察的结果对我说过不少。我既有志于人类种种形相的描写，他这种谈话当然给予我以很大的启发和刺激了。

拉瓦特尔是跟我有亲密的交谊的朋友中的最卓越的一个，因此，在我以后的生涯中的许多时期，常会想起他来。下录的几段关于拉瓦特尔的话就是我在不同的时期写的。我与他彼此所追求的人生的鹄的既相异，我们总得渐渐疏远起来，但是这个杰出人物留给我的印象，我仍不愿其消褪。他的风貌言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下录的几段是完全不相联属而记叙出来的，因此其中或会有重复之处，但希望不致有矛盾吧。

拉瓦特尔的思想本来是很现实的，只有带着道德的形态的事物，他才认为是理想的。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们对于这个罕见和奇特的人物，就容易理解了。

他所写的《对永生的展望》①，其实只是现世的延续，那儿的条件比起我们现在所要挨受的较为平易。他的人相学实基于这种确信，即是官能的现存的形态与精神的现存的形态完全合一，前者足为后者的证明，甚至是它的表现。

对于艺术上的理想，他不大抱好感。从他的锐利的眼光看来，他很了然，艺术所描写的理想的人物，总不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他们便流为童话的世界中的人物甚或妖怪似的人物。可是，他想要把理想现实化的孜孜不倦的倾向，使他有空想家之称，纵然他自己确信没有别人比他更力求实际。因此，他从不能发现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谬误之处。

象他那样热烈地力求为世人所称赞的人，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看来，他是宜于做教师的。但是他也为别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改善而努力，所以名誉一事还不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

他平生最关切的一事，就是基督的人格的现实化，他叫人替他图绘，摹写，复制无数基督的像，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意义的举动，也源于这种企图，可是这些画当然没有一幅能使他满意。

他的著作，即到现在还是难懂的，因为真正能洞明他的本意，是不容易的事。象他那样从时代取材和为时代著作那么些东西的人，还没有一个。他的著作，是真正的“日报”，或“日志”，需要从当代的史实寻求适当的注释。他的文章用一种当时小集团流行的暗语，读者必须懂得它，才能正当地理解他的著作，否则在有识者看来，他的书中有好些地方象是愚笨荒谬的

① 《对永生的展望》（《Aussichten in die Ewigkeit》），从神秘的基督教的立场，主张与基督合一，论述来世，共四卷，1768—78年出版。

了。在他的生时和他的身后，这样的非难已听见不少了。

例如我们非常醉心于事物之戏曲化，一切情节均以这个形式表现，以为非此不可，他也受了这种刺激，在他的《庞蒂厄斯·皮拉图斯》①一书中极力指出，《圣经》是最富于戏曲意味的作品，而基督受难史更是戏曲中的戏曲。

在该书的这一章，甚至从全书看来，拉瓦特尔与圣克拉拉（Santo Clara）的长老阿伯拉罕②酷肖。即是，凡是天才的著述，志在眼前产生影响，见功效，往往不免会这样做法。他不得不利用当时流行的好尚、俗语、术语来说教，来达到他的目的，以及接近他欲争取到自己身边来的群众。

他所了解的基督，是《圣经》中和种种的注释书在字面上所讲的那样，这种观念既成为补充他自己的性格所不可缺的要素，他又长年累月在理想中把基督的神身结合进他的个人的人性之中，以致后来他要想自己真个与基督融合，成为一体甚至化为基督。

他这种拘泥《圣经》字面的确定的信仰，进一步自然会使他深信我们在今日也象基督在世的时代那样定能演出奇迹，而且，实际上，他在较年轻的时候，发生重大迫切的事件，他屡能以热情的激越的祈祷，使那濒于危殆的难关好转。因此纵有冷静的理智的人持反对之论，也不能动摇他对奇迹的信仰。此

---

① 《庞蒂厄斯·皮拉图斯》（《Pontius Pilatus》），别名《人类的诸相》或《人性的高度与深度》等等，共四卷，1782—85年出版。

② 阿伯拉罕（Abraham，1644—1709），奥古斯丁的说教僧，讽刺著作家，生于巴登。他曾受玛利亚·特蕾西娅女皇的供奉，任宫廷牧师，以辩才著称。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中的卡普栖派（天主教）僧侣，就是以阿伯拉罕作为蓝本。

外，他还确信为基督所拯救而可登于至福的永生的人类有很大的价值，但同时又熟知人类的精神和心情有种种色色的需要，以及无涯的求知欲，甚至有延长自己至于无尽的空间的欲望，——星辰无数的天空甚至在官能上引起我们这种欲望——因此，他写成《对永生的展望》一书，这书在当时大部分的读者看来当然会觉得十分奇异吧。

不过，这一切的努力、企求、事业，比起他的天赋的观相的才能来，还是相形见绌。正如试金石之藉着它的黑色和特殊粗糙的表面而最准确地辨出所试的金属的种类那样，拉瓦特尔仗着他所抱的关于人类的纯粹的观念，以及敏锐的观相之才（他初时观相只出自一种自然的行动，作表面的偶然的观察，其后却加以深思熟虑，有意地、系统地替人看相，从而精于此道）而认识辨别，以至说出各个人的特殊的品性。

凡是基于纯粹的天赋的才能，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在他人的眼中，总象是神秘的那样，因为我们对于这才能的本身和它的作用都不能赋以一个概念。实际上，拉瓦特尔对于个人的洞察，超越一切概念。当人们听见他关于某人某人的品性生平说得如数家珍时，人们感到吃惊，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自然分隔我们各个人的界限，他也瞭然于胸，同这样一个人相处在一起，使人感到可怕呢。

我们谁都相信自己所有之物可以传给他人，故拉瓦特尔不以自己施展这种惊人的看相之技为满足，而且想在别人之中，甚至广大群众中发见和激发这种才能。他的可注目的人相学的学说之发表，怎样提供人们以不少的机会加以隐约其辞和恶意的曲解，笨拙的嘲笑和卑鄙的谩骂，迄今还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但是，说到这件事，他自己也不能辞其咎。这即是说，他

的内面的本质的统一，虽以高尚的德性为基础，但由于他向多方面活动之故，毕竟不能获得外面的统一，这因为他生来既没有哲学家的头脑，也缺乏艺术家的才能。

他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诗人，甚至也不是真正的雄辩家。他总不能有系统地把握事物，只把个别的事物当作个别的事物那样明确地把握而大胆地把它们并列起来。他的大著《人相学》也是这种处理方法的明显的例证。在他的内心中，精神的人与肉体的人的概念也许构成一个整体，但是在他本身以外，他就不能表达出这个概念，只能在实践上把所经验的个别事物加以表达，正如他把生活上所把握的各个事物说明出来那样。

即便他那本大著也显出有遗憾的地方，这即是：一个象他那样洞察力敏锐的人做极寻常的事也要四处摸索，花了无数的金钱，无论哪一个活着的画家画工都请他绘画不能表现性格的拙劣的肖像画和铜版画，而结果插入书中之后，却得到这样的评语："这一幅，那一幅，都多少有点画糟了，没意思，没用场。"固然，因此他使自己的判断更加尖锐，使读者的判断也尖锐起来，但同时也证明他为自己的爱好所驱使，徒然把经验积累起来，而不知怎样好好利用它们。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从不能单刀直入地得到什么结论，纵然我时常很恳切地敦促他这样做。他日后在与友人亲切的谈话之中说出来，当作是结论的东西，在我看来却不认为是一种结论。因为这只是外貌的线条和其他特征，甚至是痣墨、雀斑等等的列举，他却藉着这些，来观测一定的道德的特性和非道德的特性。固然，这里头也含有惊人的卓见，但是没有甚么论理的系统，一切都是偶然地互相组合错综，既看不见带有指导性的推论，也看不见前后连贯的

脉络。在他的其他的著作中，也同样找不到著作家的条理，或艺术家的头脑。他的一切著作包含的倒常是他的思想和意图的热烈和激越的论述，对他的著作一般论述所不能完成的，他却以一种极其恳切的和富有机智的细端末节的叙述来补足。

天才一词的滥用

下述的一段考察与上述拉瓦特尔的情况有关系，在这儿插入，恐怕是很适当的吧。

无论谁也好，他承认别人的优越性，只在他绝不能否认它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天赋的长处最难否认，然而按照当时一般的说法，只有诗人才够得上天才之称。可是，蓦地出现新的形势，世人在医生、将军、政治家中，稍后甚至在理论或实践上出人头地的一切人中要求有天才。齐默尔曼特别提出这个要求①。拉瓦特尔在他的《人相学》中必然认为种种精神上的天赋分配得比较普遍；天才一名词成为一般的套语，人们听这名词已听得太惯熟了，便以为这名词的内涵也普遍存在。可是，一切人既可向他人要求天才，终于他相信连自己也一定有天才。后来有一个时期，把天才当作是人类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藉着行为和活动而形成法则与规律②，但是这里所述的这个时期离当时很远。据当时的解释，天才之表现，在于对现存的法律的逾越，对现行的规矩的抛弃，以及以奔放不羁自命。因此，要成为天才的人，便很容易了。所以这种放言妄行激起当时

---

① 齐默尔曼医生在他的著作《关于药物学的经验》中提出这个要求。关于齐默尔曼的生平，参见第十五卷“齐默尔曼的为人”。

② 康德在其所著的《判断力的批判》中就是这样主张的。

一切循规蹈矩的人士的反对，认为等于无秩序的状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比方说，有一个人徒步在世界上乱跑，连为什么这样做，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而称为天才的旅行；又比方说有一个人没有目的，没有用处，胡乱做了一件事，而称为天才的举动。这样子，年轻、活泼、常常实际上有天分的人便流于放纵无度；在他方面，年长，有理智，也许是没有真正的才能和天分的人们看了感到极为痛快，存幸灾乐祸之心，把他们种种的失败挫折对着公众加以嘲笑。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为了教养自己和表达自己所作的努力，为志趣相反的人的反对所妨碍，几乎没有为意趣相近的人的协助和影响所妨碍那样的大。贬低天才这种最高的精神的天赋的词句、形容词、惯用语，在那些拾人馀唾的愚昧的大众之间，传播开来，以至到现在，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教养的人们的口里，也时常听见这一类的名词，甚至这类的辞句羼入字典辞书之中，天才这一个字蒙受了那样的误解，使有识者归结到有完全摒弃这个字于德语之外的需要。

本来，在德意志民族中，庸俗的东西比起在别的民族中较容易传播。如果不是幸而有一种较深奥的哲学上的新解说为根据，把天才这个字（天才Genie这个字在外形上固然象是外来语，却是一切国民的共有语）的最高和至善的意义重新恢复过来，恐怕德意志人会失去语言中这个最美丽之花了。

拉瓦特尔给斯托尔堡兄弟看相

前头曾谈及两个人物（译者按：这两人即指斯托尔堡伯爵

兄弟）的青年时代，这两人的功绩在德国的文学史和文明史上永远不会湮没。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只从他们的乖谬的言行有点认识他们，他们之所以入此迷途，是因为与当时年龄相若的青年狎昵，共为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所迷惑之故。现在我们以适当的评价和尊崇来介绍他们的真正的个性和天生的外貌是最合适的了。而锐眼的拉瓦特尔在当时与他们近在咫尺，时相过从，对于他们的品性早已瞭如指掌。可是，拉瓦特尔的大著《人相学》既卷帙浩繁，售价昂贵，恐怕只有极少数读者才会买来读，因此，我毫不踌躇从该书中，把谈及这两个人的地方——即是第二卷的本文与第二四四页的第三十片段——在下头抄录出来：

“这儿附其肖像和剪影的两位青年，恰象请人替自己画像坐在画家之前那样，坐立在我的面前，是请我看相的最初的两个人。

“这两个高贵的青年……我以前也认识，这回破题儿第一遭试替他们看相，按着他们生来的形相，以及根据自己所有的其他知识，观察和记述他们的性格。

“关于他们的整个的人品叙述如下。

“先谈弟弟①：

“看看这位风华正茂的二十五岁的青年呵！富于弹性，飘、浮似的好男子！他不躺，不站，不靠凭，不飞腾；只飘或浮。要静止吗，却过度活泼，要牢牢地站立吗，却过度松弛，要飞腾吗，却过度沉重和软弱。

“那么，是一位飘荡的人了，不踏实地的人了！在他的整个轮廓中，没有一条完全弛缓的线，但也找不到笔直的、紧张的、固定的圆

① 即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斯托尔堡伯爵。

拱形的或奇曲的线；——没有带棱角的沟槽，前额不见岩石似的突出，没有严酷，没有执拗，没有愤怒似的粗暴，没有威胁人似的威势，也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富于弹性和敏感，但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坚定的探索的洞察力；不会从容的考虑或慎重的思量。绝不是左手坚执着天平，右手握着剑的好争辩的人，可是他的眼光也好，判断也好，没有一点的呆板呀！而且他的理解是完全率直——或不如说他有完全不为外物所惑的爱真理的心呀！他老是一个内心善感的人，而不是一个深思熟虑者。他从来不是发明家，虽那样迅速地发现，认识，爱重和把握真理，但决不是把这种真理加以考验和阐明的人。……永远的漂荡者！明眼的人！理想化的人！美化的人！——赋与自己的一切理想以形相的人！常是半醉的诗人，常是见到自己所欲见的；——不是因沮丧而憔悴——也不是不屈不挠的人；——而是高贵强有力的人，稳重地抱着'到太阳去的渴望'，而翱翔于太空，奋身高举，而再——决不是堕下——急降于地上，浴身于山涧的波涛之中，簸荡于回响的岩谷的雷鸣之中，——他的眼光不是雄鹰的火般的眼！他的额和鼻不是表现出狮子那样的勇猛！他的心胸——不是临阵长嘶的战马那样的坚定！但是从全体上看来，却饶有象一般的轻松的柔顺性。……

"鼻子突出，但缺乏棱角，伸出的上唇稍向鼻卷，而嘴巴紧闭，表现出他的趣味的丰富和多情善感。脸的下部表现出肉感、怠惰和疏忽大意。从侧脸的轮廓的全体，看出他是坦白、诚实和富于人情味的人，同时又容易受人诱惑和有一种出自好心的极度轻率，而结果只损害自己而不是别人。嘴巴的中间线在不动时，显出他是率直，无计划和柔顺的善良人物，在动时，又显出他是温柔敏感、极易受刺激的仁慈高尚的人。从眼皮的弧形和眼光看来，征见他不是荷马的本身，而是最深切地、最迅速地体会和理解荷马的人；不是史诗的作家，而是颂歌的作家；他是把一切事物喷涌出来，加以改造，赋以高贵之美和新的形体的天才，使它们飘荡的天才，象玩魔术那样化一切事物化

为英雄的形象，把一切神化的天才。——半合的眼皮弯作弧形，显出他不是照着预定的计划来创作，或穷年累月劳作的艺术家，而老是敏感即兴的诗人，与其说是严格的人，不如说是深情的人。——这个青年的脸庞从全面来看，比起有点过于松弛、过于伸长的侧脸，较为动人，较为有魅力。脸的前部，如略一动，便显出他的多感的、细心的、有机智的和不用施教的内部的善良，以及温柔地抖动、嫉恶如仇、渴望自由的蓬勃之气。这位青年，突然感受或不断感受的印象，就是一点点，也在脸的前部露出来，不能瞒过人。一切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一提起来，便使他的两颊和鼻子都涨着红潮，在与他的名誉攸关的场合，处女似的害羞，象电光那样迅速地泛过他的柔嫩易颤的脸皮。

“以脸色而论，不是创造一切、毁坏一切的天才者的苍白色，不是蔑视一切的蹂躏者的炽红之色，不是呆子的乳白色，不是刚强或韧性的人的黄色，不是孜孜不息勤勉的劳动者的褐色，而是红白色与紫色微妙地交融，象他的整个性格的强点与弱点之混合那样得当。——他的整个脸庞与各部分的精髓，是自由，是有弹力的活动性，容易冲击又容易被回击。从脸庞的整个前部和头的位置，现出豁达大度和磊落豪爽的光辉。——感情的纯洁，趣味的优雅，精神的纯良，心灵的善美和高贵，积极活动的能力，自己的强点与弱点的自觉，这一切在整个脸庞中极明白地透露出来，以至本来的大胆的自负心溶解而化为高贵的谦让，先天的自尊心和青年的虚荣心，不须强制和做作，而美妙地隐晦于这个优美的全人格之中。——带白的头发，修长和不雅观的身材，温柔而轻快的姿势，飘忽的步武，扁平的胸，白而没有皱纹的额头，以及其他种种的特征，使这个人的全体带有一种女性！因此他的内部的弹力为之缓和，内心永远不能作故意侮辱人的事或卑劣的事，而同时，这个勇敢热诚的诗人纵然对于自由和解放有极纯挚的渴望，也因此显然不能成为一个有决心，以坚强的意志贯彻自己的计划的实业家，或成为在血腥的战场立下不朽的英名的人。可是到了最后，我

承认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可惊异的特长讲出来，即是，没有讲到他的毫无娇揉造作的高贵的纯朴！没有讲到他的赤子似的天真坦率！没有讲到他对于自己高尚的外貌之美的完全不自觉！没有讲到他的非语言所能形容的好性情——任人们怎样警告，非难，以致斥责、毁谤他，他也有承受、忍耐的好性情。

“不过，关于这个善良的人物，具有那样丰富的纯洁的人性美的人物，要把我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所感到的一切说出来，真是说个不完呢！”

“兄的相：

“我关于他的令弟所说的话，也有许多可以适用于他。我能够看出的主要之点如下：

“这个人的容貌和性格，比前者较为密实，没有那样扩散。在弟弟的方面，一切都较长较平，在哥哥的方面，一切都较短，较宽，呈现一些曲线和弧形。在前者，一切都较松散，在后者，一切较有稜角。额头也好，鼻子也好，胸部也好，都是这样。他的有目标的活力和生气比较紧密一点，蓬勃一点，较为集中，而没有那样散漫。除了这点以外，是一样可爱的人格，一样的好人！没有那样显著的率直性，而较为圆滑，然而从根本上看来，从实际上看来，他是同一样的诚实的。对于不直和邪恶的难以抑制的憎恶心，对于一切可称为狡猾和诡计的行为的敌忾心，与暴虐专横的不共戴天之心，对于一切高贵的，善良的，伟大的东西的纯真的同感，对于友谊和自由的企求，同样的敏感深情和高尚的荣誉心，对于一切的善良的人，贤明的人，纯朴的人，强有力的人（不管是有名与无名，被认识或被误解的）的宽宏的包容心，以至轻率疏忽，都是跟前者同一样的。可是，也不完全一样！他的脸孔较多稜角，较为收缩，坚定；对于业务和实际问题的磋商，内部较富于容易养成的机智，较富于贯彻初志的气魄这一点，在他的显然突起的钝而圆的眼窝骨上特别表现出来。没有丰富的、纯洁的、滔滔涌出的高超的诗才，没有弟弟那样的敏捷的创作力。但是

在较深的领域中，他也是活泼的，正确的，诚挚的。不是在朝霞的太空之中飘荡着，构成形象的轻浮的光的天才。——较富于内在力量，而也许较少表情！较威猛，较可怖，——而没有那样的漂亮、圆熟；纵然他的画笔不是缺乏色彩和魔力。——较饶机智和有暴躁的脾气；能作诙谐的讽刺，额、鼻、眼光——全是那样下垂，前垂，显出他是具有独创的添人生趣的机智，这种机智不是从外部搜集来，而是从内部迸出的。概括地说来，这性格所具有的一切都是比较突出的，有稜角的，进攻性的，暴风似的！——总没有平坦弛缓的地方，有一例外就是他的深凹的眼窝，在这双眼睛中，象在鼻子和额上那样，耽于肉欲的特性反映出来。除了这点，就是全神所聚的额也好，眼光也好，都非常明确地表现出他的生就的伟大，坚强，强烈的人性，坚毅的意志，素朴和果断。”

我在归途中，顺道往达姆施塔特城再访默克，他听见我说与快活的旅伴斯托尔堡兄弟同行不久便即分道扬镳，自夸他的预言的灵验，我亦不得不佩服他的知人之明。由达姆施塔特回到法兰克福，一切亲友以至父亲都欣然迎我，不过父亲有点不满意于我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听友人之劝，下山往游爱洛罗，给他一封安抵米兰之信。可是父亲的不满，不是明白说出口，而只是暗中示意。特别是当我谈到嶙峋的石岩，云雾的海和蛟龙的窟穴时，他绝不表示一点赞赏之意。他虽不责我，但有时讲起这事来，他便这样说：“山中所见的种种景致没有什么出奇的，谁没有游过那不勒斯才是虚生一世呢。”

同丽莉再会

会见丽莉，这是我不想避免，也不能避免的事。我们俩间

的情形很可珍惜，很微妙。我听见人告诉我，在我外游的时候，有人向她进言，使她也深信她总得与我断绝关系，他们说，这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事情，因为我独自作长途的旅行，而且不告而别，我自己也显然有解约之意了。但是，在市内也好，在乡间也好，我们所往的地方都相同，所交往的人也相同，而他们也知道我们过去的事，所以，尽管莫名其妙地被拆散而仍常相爱着的我们俩想要完全不接触，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俩的情形是可咒诅的，恍惚希腊神话中的"冥土"（Hades），不幸地死亡的人们又在那里幸而聚首那样。

有时，逝去的往日象是重来，但是，又恍惚闪电似的幽灵那样马上消灭了。

怀好意的人曾暗地里对我说，不管人们怎样对她陈说我们结合的种种障碍，她为着与我相爱之故，决心抛弃现时的生活和社会关系跟我一道到美洲去。那时的美洲，在那些被追离弃故国的人们看来，比现在的美洲更是一个"黄金国"（Eldorado）呢。

但是，我原以为足以激发我的希望的事情，倒使希望更加消沉了。现在我父母的美好的家——离她的家才是百步左右——比起那远隔重洋十分渺茫的环境来，确是过得去而且有利的居地。但是，我不能否认，如能与丽莉在一块儿，一切的希望心愿都抬头了，新的动摇不安之感又在我的心中出现。

诚然，妹妹的告诫是很斩钉截铁的；她不独把她所掌握的合情合理的论据完全摆出来，使我瞭然于我们的现况，而且她的真挚、有力而沉痛的信雪片似的飞到，继续谈这桩事，一回比一回说得激烈。"好，"她说道，"如果你们不能避免这样的结局，那么，你们就应该忍受。这样的事，我们只有容忍而

不应选择。”这样子，我与丽莉间的情形，弄到极为可悲，经过了两三个月还是如此。到后来，周围的一切都只有妨害我们的结合。我相信而且知道，能够克服这一切的障碍的力量，只有她一人才有。

我们两个恋人，自觉到彼此间的关系的变化，因避免单独两个人会面；但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我们俩不能在交际场中或别的朋友家里避面不见。那时我经受到最严峻的试炼，如果我把当时的心境详细地说出来，凡是有高尚的情绪的人都会同情吧。

我们一般地可以承认，如果新结识一个可亲的人，发生新的爱慕，恋人也喜欢把往事置之脑后。这种新生的爱情是不为过去的事所烦扰的，它以电光石火那样的速度，迸出来，不知道有过去，也不知道有未来的。固然，我跟丽莉进于更亲密的关系恰是由她关于童年往事的缕述所促成。她细话她从小时候起怎样为许多人所疼爱，怎样特别引起那些来访她的热闹的家庭的陌生客人的钟爱，她自己怎样也以此为乐。不过这些人同她没有进一步结成特别的关系和交情。

丽莉的崇拜者

真正恋爱着的人把他一向所感受的一切都只当作是为目前的幸福而设的准备，为建筑今天的生活的殿堂而打下的基础。过去的种种恋爱经历，象是在幽暗的午夜里出现的幽灵，到了真正的恋爱出现时，便象天破晓时那样马上消逝了。

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怎样呵！一年一度的大集市来临了，于是那些幽灵之群便真个蜂涌而至。丽莉的家既是有名的商

馆，各地的豪商巨贾陆续过访，很快我就瞭然明白，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和能够完全忘掉他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旧谊。其中，年轻的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然也象是很熟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面前采取一种博她欢心的恳切有礼的态度，提出他们的更奢的要求来，他们中有些是容貌英俊而拥有丰厚的财产的人。

可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摆起老伯伯的样子来，真是受不了，他们的手禁不住触到她的身上，作讨厌的抚摩，甚至要求接吻，而亲亲脸颊便不容拒绝。丽莉应接他们的态度都合规合矩，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不过，他们间的谈话引起对过去种种可疑的回忆来。甚么郊游泛舟的盛会呵，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渡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呵，一切的话，惹起那寂寞寡欢的恋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觉得象是多年的辛苦得来的收获却为人暂时所夺取了。不过在那么些客人的纷乱扰攘之中，她没有待慢我，当她与我周旋时，她能够用一两句话说出在我们现在的情境中极适当的温存的话来。

但是，让我们现在掉笔从这个回忆起来还有吃不消的馀痛而转到当时所作的诗上去吧。当时我通过这些诗的写作，自己精神和感情上的苦恼也为之减轻。

《丽莉之园》（《Lilis Park》）大抵是在那时候作的，我不想把这诗插入这儿来，因为它不能表现出我俩当时的缠绵悱恻的心境，而只是极力以天才的激越之调，夸张我当时的不快，并以近于滑稽的苦闷的描写，把我的断念化成绝望。

下录一诗较能把当时我的苦恼的可爱的一面表现出来，故在这儿插入。

可爱的蔷薇花哟，你们凋谢了吧，
我的爱维系不住你们的温馨，
对着失去希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他的心灵！

我悽然惘然思念着往日，
天使呵，那时我对你无限缠绵，
为要窥伺你的最初的蓓蕾，
清晨就步出我的庭园。

一切的花，一切的果，
都捧到你的膝下；
在你的艳姿之前，
希望在我的心头敲打。

可爱的蔷薇花哟，你们凋谢了吧，
我的爱维系不住你们的温馨；
对着失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他的心灵！

我的歌剧《欧文和埃尔米勒》①是得了那出自戈德史密斯的《威克菲牧师传》的可爱的恋歌的暗示而作的，在我与丽莉正极亲热的时候，我们俩以朗诵这歌为乐。那时却绝料不到我们也有相似的运命临在前头。

---

① 《欧文和埃尔米勒》这个小歌剧，歌德于1774年动笔写，1775年脱稿和印行。安德烈为它作曲，1775年9月在法兰克福演出。

我在前几卷已插入一些那时期所作的诗歌，并只希望它们还全部保存下来。在恋爱正打得火热的时候的不断的兴奋，因悲愁的羼入而更增进，引起我的诗兴，这些诗绝不是过于紧张的情绪的流露，而老是歌咏那时刹那间的感情。从社交宴游的诗，到献给她的小诗，一切都历历如在目前，有教养的朋友们都对它们抱有同感。这些诗的情调初时是愉快的，继而是悲痛的，到末了，幸福的绝顶，忧愁的深渊，都有诗咏叹一番。

我的父亲既日益不能希望那个初时称他的心的儿媳妇① 娶到家里来，我这时与丽莉间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心境，自然会令他心中不快，母亲却能极聪明地极干练地把这些事瞒着他。但是象丽莉那样的“贵妇人”（Staatsdame）——这是他暗地里跟母亲密语时给丽莉的称呼——绝不会洽他的意的。

可是，他对于一切事都任其自然，孜孜汲汲地专心办他的法律事务。前头所述的青年法律家（指歌德自己）和那个熟练的书记，在他的事务所中逐渐扩张他们的地盘。正如俗谚所谓“见不到脸的不会被惦挂在心里”，他们便让我自己走自己的路，而在我不会有成就的法律方面日益打下基础。

《爱格蒙特》的写作计划

幸而我所循的方向与父亲的意趣和希望趋于一致。他那时对于我的诗才抱有很大的期望，对于我初时发表的著作所博得的声誉又非常自鸣得意，所以他常常跟我谈到我的新著和新的创作的打算。可是这些社交上的戏作和歌咏爱情之作，我绝不

---

① 指安娜·西比拉·明奇。

敢让他看见。

我自从在《葛兹·冯·伯利欣根》中以自己的手法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象征地描写出来之后，我想在政治历史中细心找寻类似的转折点，作为戏曲的题材。结果，尼德兰的叛乱（荷兰人脱离西班牙独立的革命战争）便赢得我的注意。《葛兹》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英杰，因妄信在无政府的纷乱时代里善良而具有武力的人是有相当作用的，结果导致覆灭。在《爱格蒙特》① 中的主题是说，纵使立场是理直气壮，也难与严峻的有深谋远虑的暴君抗争。我曾对我的父亲讲及我的构思，讲得极为起劲，因此父亲不禁希望我把已完成的腹稿早日写下来付印，从而博得世人的赞赏。

在前一些日子，我还希望可得丽莉作为终身伴侣，故殚精竭虑来研究和实习法律业务，可是现在我幡然改图了，我要以才气洋溢和感情丰富的创作来填补我与丽莉之间的可怕的空隙，因此，我着手开始写《爱格蒙特》一剧，而且我这回与写《葛兹·冯·伯利欣根》时不同，不采顺序写下去的方法，而一写好楔子便马上着笔写主要的场面，而不计及前后各种联络的环节。我这样子写了不少，因为我虽疏懒成性，我的父亲却相信容易构思的也容易脱稿，日夜激励我（这不是夸张的话），不肯放松呢。

---

① 《爱格蒙特》（《Egmont》）是歌德著的五幕散文剧，1787年出版。主人公爱格蒙特为十六世纪佛兰德斯的政治家，崇尚良心的自由，赞美新教的尊严，因反对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的暴政及对于新教的压迫，为西班牙将军阿尔巴公爵等所暗算，蒙叛逆的罪名而被处死刑。

第二十卷

这样子我继续为《爱格蒙特》的完成而努力写下去，藉此我略能排遣去我的失恋的悲哀，加以那时恰与一个精悍的美术家接触，他也帮助我消磨过不少悲痛的时间。我这时——象从前也惯常试过那样——仗着一种为实践上的锻炼而作的结果渺茫的努力，在徬徨无计、濒于绝望的时候，获得灵魂深处的宁静。

美术家克劳斯

这个美术家名唤乔治·麦尔希奥尔·克劳斯①，生于法兰克福城，而在巴黎受教育。那时恰从德国北部的短期旅行回来，到我家访问我，我即感到有与这个人结交的欲望和要求。他是一个乐天派的风流人物，他的轻巧可爱的才能在巴黎恰好找到适合不过的陶冶的地方。

那时的巴黎，在德意志人的眼中，是非常舒适的栖留地。哈克尔特②也客居巴黎，得人的敬重，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以真正的德国的风格，写生的笔锋，巧妙地画风景水彩画和油画，

---

① 克劳斯（Georg Melchior Kraus），1733年生于法兰克福，是个旅馆主的儿子，1761—67年在巴黎受教育。

② 哈克尔特（Philipp Hackert，1737—1807），德国风景画家，大半生在意大利度过，曾以画家身分奉化于那不勒斯王的宫廷。

与当时法国人所崇奉的侧重形式的画法正相反，非常得人欢迎。其次，铜版画雕刻师之威尔（Johann Georg Wille，1715—1808）有大师之称，努力发扬德国风的艺术！格林姆（Grimm）本已声名藉藉，更为他的国人多方尽力。在巴黎学画的德国学生常作愉快的徒步旅行，以便与自然亲炙，作实物的写生，因此获有不少的成就，为后来的收获播下种子。

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70，法国画家）和瓦吐（Jean Antoine Watteau，1684—1721，也是法国画家）是两个真正天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虽然随波逐流，沾染当时的肤浅的画风，但仍极为世人所推重，而且这时也迎合新的倾向，甚至执笔——纵然只是戏作和试作——作这样的画。格勒兹（Jean Baptist 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隐居家中以画自娱，好描写市民的家庭生活，以优雅轻妙的笔触擅长。

克劳斯很能撷采上述各流派的特长，他以社交生活培养他的画才，并以社交生活为画题，能够将家庭的友谊集会象肖像画般细致地绘出来。在风景画方面，他的艺术手腕也不坏。他的风景画仗着整洁的轮廓，浓厚的笔触，鲜艳的色采，十分悦目，而意匠之中有一种素朴的真实味，又予观者以内心的满足，在行家看来特别可称赏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从自然摹写下来的东西立即巧妙地收进画面，加以适当的配置。

他自身是一个极可人意的交际家：无论何时，他的心情都愉快平静，乐于为人效劳，而不卑躬屈节，谨严而不骄慢。因此，无论到甚么地方去，他都是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到处受人喜爱，一方面极为勤勉活跃，同时又悠然自适，无与伦比。具有这样的才能和品性的他，不久便受上流社会的激赏，而斯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1757—1831）特别赏识他，

聘请他到拉因河畔拿骚城的府邸来，辅导他的才色绝伦的女儿①的绘画作业，同时使城中的社交界更添种种生气和韵事。

这个优秀的青年妇女与伯爵冯·维特因（von Werthern）结婚后，新夫妇延请克劳斯到他们的图林根（Thüringen）的广大的领地去，因此，他也曾作魏玛之游。在那儿他亦露头角，得人的赏识，当地的名流学者更欢迎他在那儿作长久的居留。

这回他回到故乡法兰克福来了，到处都好帮助人的他，也激励我——一向只从事美术品的搜集的我——作绘画的实际练习。本来，对于业余的美术爱好者，与真正的美术家的亲炙，是不可少的，因为前者在后者中得到自身所需要的补充，业余爱好者的愿望借助于真才实学的艺术家然后能实现。

我本来有一定程度的画才，稍加练习，已颇能绘出轮廓，在自然界中所见之物也容易摹写入画；不过我缺乏真正的造型的手腕，以及没有藉着浓淡得宜的光线和阴影来使轮廓有骨有肉那样的技能。我的写生是实物在远距离内的近似形，我写的人物仿佛是但丁的炼狱中的缥渺的人物，自己没有影子跟着，看见实物的影而惊恐那样。

我听了拉瓦特尔的《人相学》的煽动——因为拉瓦特尔不独逢人就极力劝他看相，而且还强他绘艺术的或拙劣的画像，所以可以称这种强烈的敦促做煽动——也习会了用黑粉笔和白粉笔在灰纸上写朋友们的小照。我所描的肖像虽与实物相似，但要借助于克劳斯的手加以点窜渲染然后肖像才从灰色的纸面玲

① 她的名字是露意丝 冯·斯泰因（Luise von Stein），生于1752年，她的兄弟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

珑地浮现出来。

善良的克劳斯在旅行中绘有许多画，带了到故乡来，当我翻阅他的丰富的画册时，他把风景或人物的图画指点给我看，而魏玛城的人物及其风景便成为我们最爱好的谈资。而且我对着这些画，也流连不忍释手，因为这些画可看作一篇详细的反反复复的文字，表白那儿希望我去的意思，有虚荣心的青年的我，自会觉得洋洋得意。克劳斯能够用优美之笔来描绘那些向他问候和款待他的人物，使这些交游添了生气。其中有一幅写得很成功的油画：音乐指挥坐在大钢琴之前，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背后准备引吭高歌。看这画时，克劳斯还恳切地说，这对可尊敬的夫妇也会很欢迎我去呢。在他的风景画中，有好几幅是描写布格尔（Bürgel）附近的林地和山地的。在森林中，有一个干练的山林经营家——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了讨他的可爱的女儿的欢心的缘故——住着，在嶙峋的岩石堆中和茂密的林薮中架设桥梁，装置栏杆，辟有可供游人并行共语的小径。画面中绘着两个白衣的女郎在幽邃的小径上漫步，有两个青年男子作伴。其中一个青年，分明认出是伯尔图哈①，他热心地爱上那大女儿一事，不容为讳；第二个青年似是克劳斯自己，我们说他对那妹妹也有情愫，他也不生气。

伯尔图哈是威兰的弟子，据克劳斯说，他的学识和活动都出类拔萃，今已任公爵的机要秘书，前途未可限量。谈到同在魏玛客居的威兰时，我们不断以他的人品的正直，明朗，善良为

① 伯尔图哈（Friedrich Justin Bertuch，1747—1822），著作家和出版家，从1786年到1827年与克劳斯合作，协助威兰出版有名的文艺杂志《德意志信使》。1775年被任命为魏玛公爵的机要秘书。

言，至于他在文学和诗歌方面所抱的可钦佩的革新计划，我们已详细谈及，他主编的《信使》杂志对全德国的影响也是我们的话题。我们还举出在文学、政治和社交方面许多杰出的人的名字，例如穆舍乌斯①、基姆斯②、伯伦第斯③（Berendis）、鲁德库斯④等就是我们所提及的。在许多著名的妇人中，我们特别举出沃尔夫（Wolf）夫人和科泽布⑤的遗孀，对她们的特长，甚表赞美。科泽布夫人自夫被暗杀以来，与她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活泼的儿子共居。这一切人都显示文学和美术界的一种新鲜蓬勃的气象。

我们谈到自从青年的公爵⑥回去后，魏玛的空气逐渐改变，而这种新形势的酿成，他的母亲摄政之力为多。但是重大国政的实施，却听未来的统治者的裁断，这是临时的执政者的当然的职责。因宫城的火灾而留下的荒凉的废墟，人们看了，已预测为新的活动的诱因。久已停顿的伊尔梅瑙（Ilme-

① 穆舍乌斯（Johann Karl Musäus，1735—87），魏玛高等学院教授，威兰的弟子，所著作品以童话著称。

② 基姆斯（Franz Kirms，1750—1826），当时任魏玛公爵的内廷秘书，其后在歌德的领导下任魏玛剧场经理。

③ 伯伦第斯（Hieronymus Dietrich Berendis，1720—83），温克尔曼的朋友，当时在公爵夫人底下任职。

④ 鲁德库斯（Johann August Ludecus），当时任公爵夫人的机要秘书。

⑤ 科泽布（Kotzebue，1761—1819），为德国戏曲家，生于魏玛，曾数度往游俄国，后返德，以其拥护专制，态度反动，在曼海姆为一学生所暗杀。后来其遗孀连同她的儿子、女儿是喜剧作家。

⑥ 这里所讲的青年公爵指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爵（1757—1828）。1758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但丁公爵逝世后，母后安娜·阿玛利亚摄政，至1775年以后他始亲政，极力奖励文学美术，与歌德交往，并招聘赫尔德尔、席勒等。

nau）的矿山，今已投下很大的资金，把深邃的坑道修复，不日再行开工采掘，自在意中。耶拿大学在时代精神上略为落伍，且失去几个很能干的教授，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士已奋起策划这个大学和其他文物制度的革新。这个奋发为雄的邦因此极力搜求可以有种种贡献的人才，精力充沛、意气蓬勃的青年，可以期待有新的上进的机会了。当新的公爵夫人迎娶过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王宫似的壮丽的建筑物，而迎入一个为其他目的建筑的朴素的殿宇内，这事诚然是很遗憾的，但是，埃特斯堡（Ettersburg）和伯尔维德尔（Belvedere）的山庄，各处的别墅和其他的亭苑都是名胜之地，设备完整，足供新君夫妇的现在和未来的欢乐之用，而且这样子既可与大自然接触，又可希望作有益的愉快的活动。

魔力对生活的影响

读者一路读这个自传式的故事，已详细地看见由幼年到童年，到青年时代的我，怎样循着种种不同的途径，不断地谋与超感觉的东西接近。我初时憧憬一种自然的宗教，继而热心信奉一种实证宗教，继而又以自己为中心，试练自己的能力，最后欣然倾心于一般的信仰。当我在这些信仰的领域之间彷徨不定，探索回顾的时候，我碰见许多都不属于这些信仰的领域的事物，因逐渐明白，不把那些不可思议的和不可知的事物加以思索，倒还好点。

我相信在自然里头——不管自然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是有灵魂的还是没有灵魂的——发见有一种只在矛盾中显现，因此不能以概念，更不能以言辞表达的东西之存在。这东

西不是属于神，因为它象是没有理智；也不是属于人，因为它没有悟性；也不是具有恶魔性，因为它是善意的；又不是具有天使的性质，因为它往往使人觉得它幸灾乐祸。它与偶然相似，因为它显不出有什么联系；它又与天道神意相似，因为它暗示有因果关系。这个东西可以突破那些制限我们的一切境界；它象是按照着我们的存在的必然的条件恣意处理，它把时间聚拢而把空间展开。它象是只喜欢"不可能"，而抛弃"可能"，不屑一顾。

这个东西象是羼入一切其他的东西之间，把它们分开，又把它们结合。我仿效古代的人（指苏格拉底）和有着相似的感觉的人，称它做魔神之力（或"超凡"之力）。照着我通常的做法，我躲到具体的形象的背后来逃避这个可怕的东西的威胁。

尼德兰的革命战争一事使后来联合成功的荷兰名垂青史，这事也是我在世界历史中特别注意研究的事件之一。我孜孜不倦地考究当时的史料，尽可能的设法找寻直接的见闻，以及把一切构成历历如绘的想象。我觉得这事件的情节极富于戏剧性，而爱格蒙特伯爵可充当中心的角色，以其他一切的人物配置于他的周围极为适当。伯爵的切近人情的骑士精神的伟大之处，又最称我的心。

但是，为了适合我的使用，我必须把历史上的爱格蒙特伯爵化做戏剧的角色，把他的年龄、境遇改变。即是，使本来是中年人的他变做青年，有妻子的家长变做未婚的男子，一方面抱着自由思想而仍为地位身分等所限制的人，变成独立自由的人物，以便与戏剧的性质相适应。

我既这样子在想象中把爱格蒙特青年化，并使他从外部一切的拘束解放出来，更进一步赋予他以无限的乐生之心，无限

的自信，吸引一切人的魅力，藉此他博得国民的信赖，一个公主的暗地里的倾心，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的公开恋爱，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协助，甚至他的最大敌人的儿子的仰慕。

成为这个英雄的特征的本人的勇敢，是他的整个性格的基础和萌生的土壤。他不知有什么危险，即自己最大的危险临头也茫然不知。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的敌人，毕竟还可以突破，但政治谋略的罗网之冲出却很困难，在这场合，那个魔力便在双方发挥它的作用了，两方面发生冲突的结果，值得敬爱的人败亡，被憎恶的人获得胜利。于是，从这个冲突中会跳出一个第三者，通过这第三者的作用，一切人的愿望都会得到满足。我这一篇戏曲之所以经过相当的时日——诚然不是在发表的当时——博得世人的称赏，至今仍享盛名，正是靠这一点。为许多亲爱的读者的缘故，我想在这儿也把一些事情提前先讲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有执笔的机会，所以将很晚才深信的事情在这里先说出来。

这一个魔力虽然能够凭着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东西而显现出来，并且在动物身上起极显著的作用，但特别在人类身上起作用时，却极奇妙神秘之至，它形成一种势力，纵然不是与世界的道德秩序正相反对，也与它相交叉，所以我们可以把世界的道德秩序称为"经"，而把这种魔神似的力量称为"纬"。

由此产生的现象有无数的名称：一切的哲学和宗教曾谋以散文般和诗一般的手法解释这个大谜和一举作最后的论断，但是他们这种探索今后也许还要继续下去。

可是，这种魔力最可怖的就是它在某一个人身上支配着而显现的时候。在我的一生中，我就有几回看见它在我的身边，时近时远。这样的人不一定是思想才能卓绝的人，更少是以德

行著称的人①；但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力从他们中间发出，及于一切人，一切生物，甚至自然力也为所影响，它的威力伸张到多远，谁能够断言呢？一切道德力结合起来，对它也无所施其技，世人中的明眼者虽斥他们为“被欺骗者”或“欺骗者”，但民众却为他们所吸引。在同时代的人中，能与他们匹敌者很少，甚至绝无。除了他们与之竞争的宇宙之外，无物可以克服他们，“除了神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抗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这句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箴言②之所以出现，大概就是基于这种观察吧。

现在让我掉笔从高瞻远瞩的谈论而回到我自己的渺小的生涯去。不过在我那时的生涯中，至少也象是披上魔神的外衣，而发生意想外的奇怪的事。我从瑞士的哥特哈德（Gotthard）的顶峰．掉转身来，把意大利置于脑后，回到家里，那时因为我不能抛弃丽莉的缘故。男女的恋爱，既基于双方的互相据为己有，和长久的双宿双棲的希望，自不能马上消失。而且，它还为我们对于所抱的种种正当的企求和诚实的愿望的思量、玩味所培养助长。

在这种场合，女的方面比男的方面较为谨慎，是自然之理。为潘多拉（Pandora，希腊神话中所传最初的女性）的苗裔的女性，天赋以媚人动人的可羡的本领，与其说她们出自真实的爱情，甚或放荡的行动招引许多男子在她们的身边，不如说是为朦胧的意图和不能自已的本性所推动，以致她们自身常陷于困境，正如童话中所述的魔术师的弟子，学弄玄虚，招出掀

① 歌德所指的是拿破仑一世、彼得大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一类的人。

② 这句箴言就是本书第四部卷头所录的。

天的大水来那样，她们看见求爱者之汹涌而至，亦为之手足无措。结局，在这场合，便不能不加以选择，男子中有一个人被挑中了，便成为那女性的丈夫。

可是，提供这选择以指南和决定选择者的倾向的，却多是偶然的事。我深思的结果已决定抛弃丽莉，但是我的爱丽莉之心使这种理性的裁断动摇。丽莉也抱有同样的意向与我分别，我便试作散心的胜游，但是结果却正与预期相反。

在我外游的期间，我以为我只离开丽莉，而不是与她断绝。一切的怀念，希望和欲求纷至沓来。现在，我回来了，如果自由地欢畅地恋爱着的人的再会是天国一般的喜悦，那么，单因为理性上的考虑而分离的恋人们的再会便是无法忍受的炼狱之火，冥府的前廊。我再回到丽莉平素活动的环境中去，我感到那妨碍我们两人的关系的不调和的一切更双倍的可恨，当我再站在她一个人的面前，我想起我已失掉她了，便心如刀割。

因此，我决心再逃到远方，恰巧那时魏玛的青年公爵与他的新婚夫人从卡尔斯鲁厄到法兰克福来，将一再邀请我的事再提起，要我跟随他们到魏玛去，我觉得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了。这两位殿下老是表示出对我不变的恩宠甚至信赖的态度，而我则以热诚的感激来酬答。我在最初谒见公爵之时已心悦诚服，至于他的夫人，虽只见过一面，但景仰已久。其次，从前我一半因为任性，一半因为偶然的触发对威兰出言不逊，而他却以那样的宽大的态度待我，这回想要同他晤面，亲自对他表示亲切的友情，以补前过的愿望，也已足以激发我，推动我——纵然我是平心静气、感情不冲动的话——作魏玛之游了。何况现在还有与丽莉这一层关系，无论我走哪一条路，我总不能不避开丽莉，或者南下，或者北上，南方那一条路，则有父亲每日

的讲述使我憧憬那美丽的艺术和自然之乡，北方那一条路则有济济的名流学者向我招手。

小小的误会

青年公爵夫妇在他们的归途中，路过法兰克福城。那时迈宁根（Meiningen）的公爵偕同他的廷臣也在这儿居留，我谒见他和随从公爵夫妇的机密顾问官冯·杜尔克海姆（von Dürkheim），也受极亲切的接待。但是象我那样缺乏经验的青年总少不了一些意想外的奇特的事情，因此，在访谒魏玛和迈宁根的领主的时候，也发生了一场误会，惹出纵然颇有趣而非常狼狈的窘境。

事情是这样的：魏玛和迈宁根的领主同住在一个旅馆。某日我被招到那儿赴宴。我既老把魏玛公爵夫妇放在心里，总不想起向带信的使者详细打听一下，更从不会想象到迈宁根公爵也会对我关心。我穿好齐整的服装到"罗马凯撒"旅馆去，可是魏玛公爵所住的屋子却空无一人，打听一下，知道他们都在迈宁根公爵的屋子里。我便到那儿去，他们都殷勤地接待我。我心中以为这是宴会前的拜访，或者与迈宁根公爵等一道吃饭，亦未可定，正等待着看个究竟，可是忽然间，魏玛公爵一家人告辞出去，我于是也跟着走，但是他们不是到他们的餐室去，而是下楼出门外坐车走，剩下我一个人在街上。

我本来应该回到旅馆去把招宴的事打听清楚才是精细聪明的办法，我却不会想到这一层，按照着我平日的鲁莽躁急的做法，马上回家。两亲恰在吃着饭后的茶果，我把这事略述一遍，父亲听了摇摇头，母亲尽力来安慰我。到晚上，她暗地里

对我讲，我走了后，父亲曾这样的说："我很奇怪，这个孩子怎样会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还不明白所谓招宴等等，只是人们存心愚弄他，羞辱他呢！"但是我不会为这话所动。因为我已在街上碰见冯·杜尔克海姆，他以他一向的和蔼的态度把这事讲出来，用委婉而诙谐的口吻责备我的不当。我这时如梦方觉，请求他代向公爵郑重致谢他的出乎我的希望和期待以外的宠遇，并请求他宽宥我的错失。

这样子，我因上述的种种的理由，答应了魏玛公爵好意的招请，其后便作这样的约定。即是，那时，公爵还有一个侍从武官留在卡尔斯鲁厄，等待在斯特拉堡制造的"兰道"型的马车（车篷可向前后分折，内有相向之四个座位的马车）造好，就于某日到达法兰克福城，我这方面要把一切摒挡好，马上跟他坐该马车一道到魏玛去。我与青年公爵夫妇作别时，他们的和悦优渥和廷臣们的亲切的态度使我觉得魏玛之行是极可庆幸的事，预料此行会一路非常的舒适顺利。

由等待到失望

可是，这样的简单的安排，也因为偶然的事故而复杂化，因为我的易动感情和急躁而弄出麻烦，甚至差一点就成为泡影。我预期某日武官抵达，事前先向各亲友辞别，通知我动身的日期，然后匆匆把行装打叠好，连未刊行的文稿也装进去，等待着预定的时间来临，随同那武官坐着新马车到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去。可是，约定时间到了，还不见武官的来临，那一天也空过了。我既不想作再度的话别，也吃不消朋友的纷至沓来之烦，所以告诉人说我那天早上便不在家。现在武官未来，

我不能动程，只得蛰居家中，甚至蛰居自己的卧室里头，处境便弄到很尴尬了。

可是，这种孤寂偈促的情境一向对我是有利的，我在这种场合被逼着要把时间好好的利用，因此，我便继续把《爱格蒙特》写下去，差不多把它完成了。我读给父亲听时，博得他特别的称赏，他只愿能早日目击这篇戏曲的完成和付印，因为他预期他的儿子的声价将会因这新作而更增高。对于我的父亲，这样一种的安慰和新的满足是必要的；因为，他把武官和马车不来的事作极可疑的解释。照他的推测，这回的招请又只是空中楼阁，不相信有什么新的“兰道”型马车，认为那留下的武官是子虚乌有之流；他虽然只间接地把这个见解告诉我，但已对母亲明言，因此他自己添了许多烦恼，也替母亲添了许多烦恼。他把这整桩事情都看作是魏玛宫廷耍的手段，用来报复我的恶作剧，作践我和羞辱我。结果，我不独得不到那预期的荣幸，而且要丢脸蛰居在家中了。

初时，我自己还坚信武官会来，反以没有朋友访问的烦扰，其他社交的分心，静居一室的时间为乐，继续奋笔把《爱格蒙特》写下去，不过心中已有点不宁。可是这种心境恐怕有利于那篇戏曲的撰作，因为那篇作品中既汹涌着种种的热烈的情感，如果我是寂然无所动于中，也不会写得成功吧。

这样子，过了一周，又过了好几天，杜门独居的境界开始使我感到难熬。许多年来，我已惯于在空旷的户外过活，与朋友们往来，彼此真诚相处，有事彼此通力合作，此外还在一个爱人的附近，我虽然已立下决心离开她，但是，一有机会同她接近，我便不由自主地为她的吸力所摄引——这一切的事情开始使我感到那样的不安，我写悲剧的兴致趋于淡薄，诗的创作力

因我的焦灼而有枯竭之势。已经有好几晚，我不能再安心留在家里。我披着一件宽大的外套在市内周围潜行，经过我的朋友和相识者的门口，甚至还在丽莉的屋子的窗下站过。她住在街角的房子的楼下一间屋子里头，绿色的百叶窗垂下来；但是我还看得清楚，灯仍放在往常的地方。一会，我听见她弹钢琴唱歌之声。她唱的就是以"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Warumz iehst du mich unwiderstehlich"）为主句的歌（参见第十七卷"献给丽莉的两首情诗"），我赠给她这首诗还不及一年呢。在那天晚上，我总觉得她唱得比平时还动人，我一字一字都听得清楚：我把耳朵尽可能地贴着那向外弯的窗格子倾听着。她唱完之后，我看见她的印在百叶窗上的影子，知道她站起来了。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我虽想清楚地窥见她的可爱的姿容，但为厚的布帷所阻，不能如愿。这时幸亏我还有坚决的心要离开这处，不愿使她因我还留在这个地方而感到痛苦，却真个抛弃了她，以及想象到我之再现会引起她怎样的惊异，我才决定离开那近在咫尺的可爱的她。

这样子又过了几天，我的父亲的臆测越来越增加它的盖然性，因为那么久还没有接到一封从卡尔斯鲁厄来的信，说明马车迟迟不来的原因。我的诗思已停滞了，笔也不动了。我为着焦急不安的缘故，心乱如麻，而父亲却乘机来劝说我道：这事情已不会再有变动了。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他将给我钱和支票到意大利去。但是，我必须马上决定，立刻动身。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我犹豫拖延一下，终于这样子答应他，即是，再等到某一天，如果仍没有马车到，又没有消息来，我便动身，不过先到海德尔堡去，然后从那儿——这回不取道瑞士——径由格劳本敦（Graubünden在奥、瑞、意三国边境）或提罗尔，

越过阿尔卑斯山地而到意大利去。

如果一个容易误入迷途的没有主意的青年，更因为长辈的带有感情的谬见而被领到错误的路上去，那就当然会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所谓战略一事通常是在战役完毕之后才能了解，不过这样子做才是青春，才是人生。在单纯事务性的问题上，这种偶然的事情也许容易说明，但是人类偏偏好与谬误勾结在一起而又违背自然的真理，正如我们在分派扑克牌之前和匀，以便偶然性在人为上的作用依然不减那样。这样子便产生一种氛围，那魔神似的东西恰好在这氛围中，对之施展神通，并且我们越预感到它的存在，它便越猖狂。

最后的一天也过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应该动程。那时，我的朋友帕沙万特恰由瑞士回来，我异常迫切地要再见他一面才动身。因为，以我们那样的亲密的交情，我却把我的计划完全瞒过他就走，他确有对我生气的理由。因此我托一个不认识的人约他晚上到某一个地方来，届时我披着大的外套先来到，他不久也来了。他本来已对这个约会觉得奇怪，看见约会的人是我，更大吃一惊。他的喜悦的程度，也不减于惊讶，不过我们已无细谈和商量的余暇了。他祝我意大利之行一路平安。我们分手了，到了第二天，我准时到了山路上。

海德尔堡——德尔佛女士

我之所以先到海德尔堡去，是有种种理由的：有一个理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即是，我曾听说，那位武官是由卡尔斯鲁厄经海德尔堡，到法兰克福。所以我一到驿舍，即留下一封信托驿中人交给乘如此这般的马车道经此驿的武官；第二个理由

是基于情感，跟我从前与丽莉的关系有关。即是：那位熟知我们俩的情谊，和替我们俩做媒取得两亲的同意的德尔佛女士是住在海德尔堡。我觉得在离开德国以前，还得与这个可敬、宽仁、有耐心的女朋友畅话过去与丽莉共处的乐事，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德尔佛女士很殷勤地接待我，并介绍我与城中好几家人认识。其中特别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森林局长冯·W氏①的家庭。主人夫妇是规规矩矩而可亲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女儿很象弗里德莉克。那时恰是摘葡萄的季节，日丽风和，在这美丽的莱茵河和内卡河流域游览之际，从前在斯特拉斯堡游学时所感到的阿尔萨斯的情调复活起来。当时的我，在自己和在他人的身上获得种种特异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仍是在“生成”的路上，模糊而未成熟，关于人生还没有得到什么结论，而在我心里头唤起的所谓“无限”的感觉，倒使我更加迷惑。不过，与友朋交际的时候，那时的我还是依然故我，与从前没有什么分别，或更为可亲，更为善于交际。现在在这个晴和明朗的天空之下，新的快活的朋侣之中，我再寻求那老是使青年感到新鲜有趣的旧梦。在心中，我与丽莉的旧情，还是藕断丝连，我纵然没有把这事在人面前透露出来，想博他们的同情，但他们却已知道了，都安慰我。这样子，我不消几天，便成为这里的人的很熟的朋友，他们甚至依依不欲离开我，我自己却忘记了再谈笑几晚之后，便依着原来的计划继续我的征途了。

世间有一种人虽不是好弄策略，但常是忙着一些事情，使

---

① 冯·W氏即冯 雷顿（Ferdinand Joseph von Wreden），法尔兹选帝侯领地的地方法院书记官（歌德误作森林局长）。

他人也参加进去，一时想实行这个目的，一时又想实施另一个计划。德尔佛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与我的交情既拉得很紧，加以我住在她的家里，她对我陈说留居在海德尔堡城的种种好处，并千方百计地阻碍我动程，所以她更容易引我入歧途和使我久滞该地。当我谈及丽莉时，她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大愿意听和不大同情我的失恋。她倒说我们俩在这样情形之下决心分离，是妥善的办法，并主张人类总要顺从那不可避免的运命，在心中抛掉那不可能的事情，而另寻一种新的生活兴趣。她既然是满腹计划的人，她不欲袖手旁观，任这事情听偶然的摆弄，而早已替我的未来的立身处世，想就一个计划。由此我才明白，她最近邀我到海德尔堡来，决不是象我所想象的那样没有目的。

她跟我说起，巴登的选帝侯卡尔·狄奥多（Karl Theodor,1724—99）素以提倡学术，奖励文艺著称，当时仍驻跸于曼海姆，正以宫廷信奉天主教，而国民遵奉新教之故，新教徒派痛切地感到有招纳精力充沛和大有前途的人材，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的必要。现在我终究要先到意大利去，在那儿培养、增长我的艺术的知识，在这期间，德尔佛女士等便替我想方设法。等到我从意大利回来，W女士(指上述很象弗里德莉克的那个女儿)对我才萌芽的爱苗是生长起来还是萎谢，跟一家名门贵族结成姻戚，在新的乡土安家立业是否得策，就见分晓了。

我听了这一切的话，虽没有拒绝，但是象我那样没有计划的人不能够完全赞同我的工于心计的女友的画策。我对她目前的一番好意感到高兴。丽莉的影子，无论醒也好，做梦也好，都浮现在我的眼前，与那些会使我快慰的事情交集。但是，我记起我这回壮游的郑重的计划，决心用委婉和有礼貌的方法脱

身，在几天之内继续我的旅程。

魏玛的访谒终于成行了

德尔佛女士把她的计划，人们怎样愿意替我设法帮忙等等详细对我讲述，直至夜深。我纵然多少也明白该城有一部分人士有心想利用我和将来在宫廷或会得到的宠遇，来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但我只有对他们的亲切之意表示敬意和感谢。我们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一点钟才各自归房就寝。不消一会，在我已睡熟的时候，驿马车的喇叭声把我惊醒了。德尔佛女士很快拿着蜡烛和一封信站在我的床前，喊道：“这是您的信呵！请您读吧，告诉我是什么事，那一定是魏玛方面的来信吧。如果是请您去的话，您不要答应，记着我跟您说的一番话。”我请她把蜡烛借给我和离开我一刻钟。她带着不高兴的脸色走开了。我不打开信，先思索一会。这快信是从法兰克福城来的，从印章和笔迹就可认出来。那么，那位武官是到了那儿了；他真个来接我，而我们的怀疑不安使我们干出这样轻率的事。他既已确定到法兰克福来，而途中又会因种种的故障而阻滞，为什么我不在这样安宁的城市中耐心静候这位说好一定来的朋友呢？我恍然大悟。从前魏玛公爵对我的亲切、恩惠和信赖再活现在我的眼前，我回想我象野马似的那样奔向岔道的行为，差不多羞惭不能自容。然后我把信拆开，知道事情弄到这样田地都是很自然的。那位留在卡尔斯鲁厄的武官等待那辆在斯特拉斯堡定制的马车，正象我们等待他那样，朝朝暮暮，望眼欲穿，还是等不到，后来马车到了，因为有点事的缘故，他绕道曼海姆到法兰克福来，发现我已外出而吃了一惊。现在他星夜派人送这封快

信来，预期我明白这事情耽误的原因后即回法兰克福，一道同往魏玛，以免使他无法交代，而抱疚于心。

纵然我的理智和感情都倾向于魏玛之行，但现在所走的新路子，我觉得也有可与前者抗衡的好处。我的父亲已替我定好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旅行计划，并给我装备一个小文库，带在身边，有了它，无论到意大利哪儿去观光我都可以有思想准备，游览指南。闲居无聊的时候，我只有以这些书籍自娱，即在这次到海德尔堡的小旅行中，在马车里头，我也拿这些书来看，不忍释手。而且意大利的美丽的景物，我从小时候起已在种种的记述和图画上头亲炙过，它们的印象常涌现我的脑际。现在我既已决心为离开丽莉而远游，那么往意大利去观赏这景物，当是我最希望不过的事了。

我一边在盘算，一边已把衣服穿好，在室内走来走去。德尔佛女士忧心忡忡地走进来了。“您怎样打算呢？”她喊道。“最亲爱的夫人，”我答道，“请您不要劝我了，我已决定回去；它的理由我已充分考虑过了，再讲出来也是没有用处。决心到头总要下的，而除了有切身关系的本人之外，谁下这个决心呢？”

我这时很激动，德尔佛女士也是这样，于是出现了激越的场面。结果，我吩咐我的用人去叫马车来，把这个场面结束了。我请求我的女主人镇静，让我把昨晚我与来客作别的玩笑化为真实，请她想想我这回魏玛之行只是访问的性质，短期的滞留访谒，意大利之游仍不放弃，回来的时候一定到这儿来。可是任由我百般譬解，也是徒然。她堵耳不愿听我的话。本已镇静的我又渐焦急起来。马车已停在门口了，行装也已打叠好，马车夫已显出急不及待的样子，老捏着喇叭相催。我飞身

走出，但她仍不让我走，十分巧妙地举出目前应有尽有的理由来留我，于是，到末了，我热情地激动地喊出爱格蒙特的道白来：

"孩子，孩子，不要说下去了！光阴的白驹象是被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的运命的轻车走了，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地镇定地紧握着马缰，催动车轮，时而左，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吧。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从哪儿来，差不多也记不清了！"